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上)

 **eBOOK**  
网络资料 非卖品

## 凡 例

一、《当代中国》丛书所论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经验。为了说明问题，许多卷书以专章，或在结论及某些章节中，简要地论述了旧中国的有关情况。

二、按内容，本丛书可分为五大类。第一类，综合性的，如《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等；第二类，部门、行业性的，如《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的轻工业》、《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当代中国的教育事业》等；第三类，专题性的，如《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的土地改革》、《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第四类，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编写的地区性的，如《当代中国的北京》、《当代中国的四川》、《当代中国的西藏》等；第五类，人物传记，如《毛泽东传》、《董必武传》、《刘伯承传》等。各卷在出版顺序上不按类别安排，先完稿的先出版。

三、这部丛书共约二百卷，每卷一册，少数卷分上、下册。

四、部分卷的内容，间有交叉，但从各卷的特点出发各有侧重。

五、各卷的结构大体一致，但不尽相同。一般采用编、章、节的形式，有的则不完全是这三个层次；多数卷写有《前言》、《后记》或《绪论》；多数卷编有《附录》，但内容不尽相同。

六、凡附有人名索引者，人名均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七、书中译名，人名采用国内通用译法，并参照辛华编的《世界人名译名手册》；无通用译法者，按“名从主人”原则译出。地名根据地图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出版的《世界地图集》，并参照辛华编的《世界地名译名手册》；自行译出者，仍遵“名从主人”原则。

八、书中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行政区划图，根据地图出版社一九七四年十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绘制；我国古代地理区划图，参考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

九、书中使用的度量衡单位，采用国务院一九八四年三月四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

十、书中统计数字的使用，遵行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的有关规定。

十一、书中所用科学技术术语、名词、名称，以有关方面审定的为准；未经审定和统一的，从习惯。

十二、书中字体，除必要时使用繁体字外，一律用一九五六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

十三、书中所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者以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

十四、书中注释采用脚注方式，当页编码，不编通码。

## 总 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屹立于世，已经整整三十五个春秋。

当此之际，我们决定把三十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分门别类，加以总结，编纂成书，陆续付梓，以献给这一伟大事业的创业者和建设者，献给行将参加到这一事业中来的一代又一代新的建设者，献给全国各族同胞和世界上一切关心我们事业的朋友们。

在中华民族四千多年的文明史上，我们当代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最辉煌的篇章。这个时期，中国大地上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各项事业的兴旺，人民的团结，都是空前的。我们并不满足于既有的初步成就，并不想以此矜夸于人，但是我国人民通过三十多年的实践，确实重新建立了充分的民族自信。实践本身向全世界宣告，有着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恢复了和勃发着青春的活力，她完全有能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扎扎实实，以比较高的速度，迎头赶上，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创业史。其所以艰苦卓绝，一则是由于我们的基础太差，起点太低；二则是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如何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造和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先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不仅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中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之举，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无成例可援。我们固然可以参考和借鉴别人的经验，但从根本上来说，却只有靠我们自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独立地认识和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以无畏的革命创造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找出一条中国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这样，振兴中华的大业才会事半功倍，卓有成效。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是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决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成败的关键。建国以来的历史实践表明，这同样是决定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为此贡献了智慧，付出了劳动，备尝了失误的苦痛和成功的欢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制订和完善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有许多新的创造，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一九八二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又是我们的认识不断提高和深化的过程，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又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通过全体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脚踏实地的艰苦奋斗，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指日可待的。

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还在发展。我们有责任把我国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经验，介绍给全国各族人民，介绍给世界人民。我国人民必能从中吸取到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可贵教益，国外一切关心中国的人也能够由此增进对社

会主义新中国的了解。这就是我们编撰出版这套《当代中国》丛书的主要目的。

《当代中国》丛书，将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不虚美，不掩过，用可靠的事实资料，如实地写出新中国三十多年的建设史，为世人为后代留下一部科学的信史。我们深信，只要把三十多年建设的成功和挫折的经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加以科学的总结，那就会使之成为传诸后世的国宝。

当然，任何珍贵的历史经验，都不应变成妨碍人们继续前进的沉重负担。我们不仅不能重复过去的错误，也不能为成功的经验所束缚，而故步自封。历史经验的可贵，在于提供给人们继续前进的力量，在于给人们研究和解决新问题以智慧。现在，为了实现社会主人现代化，全面进行经济改革和技术革命的历史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重大的新课题，显然是不可能从既往的历史经验中找到现成答案的。我们的任务在于，正确运用历史经验，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以使用科学性和革命性紧密结合的革新精神，去迎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高潮。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五月三日

## 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上）

## 序

《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是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的决定，由总政治部和国防大学共同编写的，经过几十位政治工作者与专家的数年辛勤劳动，现在出版了。这是军队政治工作史学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而在军队中进行的思想和组织工作。它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创立发展起来的，在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实践中所形成的理论、方针、原则、制度和优良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是全军官兵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经历了数十年战斗的洗礼，成为具有鲜明特色和完整体系的科学。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排除千难万险，战胜国内外强敌，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丰功伟绩。新中国建立以后，人民解放军遵循党的教导，在保卫祖国的独立和边境的安宁、参加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伟大历史功绩的取得与政治工作的巨大作用是分不开的。历史充分证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南的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是保持人民军队无产阶级性质、永远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根本保证，是战斗力的重要源泉，也是区别于任何剥削阶级军队的显著标志和我军独特的优势。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肩负着保卫和参加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光荣历史任务。加快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贯彻落实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给军队的改革和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履行好军队所肩负的神圣、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加强和改进军队的政治工作，必须大力继承和发扬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经受挫折的教训，都是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一书的编写，就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有关文件为依据，实事求是地对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七年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三十八年的发展历程和历史经验进行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全书包括绪论和七编二十五章，以史论结合的写法，分别介绍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创立、发展和基本经验；军队在作战、训练、国防科研、后勤保障、施工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治工作；军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干部工作；军队的政治教育和宣传文化工作；军队的政法工作和群众工作；军队的基层政治工作以及军队政治工作的组织制度和作风方法等。它是一部思想性，史料性，可读性都较强的史书，对研究当代中国军队政治工作、探索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都有直接的借鉴价值。

本书下限写到一九八七年。

一九八七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特别是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期间，邓小平同志对军队建设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子弟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他与中央政治局常委谈话时提出：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中央的话，选人要选听党的话的人，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他在接见出席军委扩大会议的领导同志时强调：我们的军队要始终不渝地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一九九二年初，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指出：“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党的十四大前，他又反复强调：军队很重要。军队要听党的话。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指示，语重心长、意义深远、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为指导，对军队的改革和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提出了注重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方针，确立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作出了发扬优良传统，加强廉政建设的决定，重新颁发了经过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等。江泽民同志在多次讲话和报告中。对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有关重要内容进行了系统的阐发和论述，对军队建设提出了“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要求，对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也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他指出：军队一定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军特有的优势。无论是平时部队建设还是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都离不开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要认真学习小平同志的著作，学习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要加强军队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建设，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部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要经常对部队进行我军根本职能和光荣传统的教育，发扬优良传统，保持老红军的本色，牢固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防观念。要紧紧围绕教育训练这个中心，抓好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激发练兵热情，培养不怕牺牲、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加强法制建设和执法工作，依法惩治各种犯罪和粉碎境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加强军队的精神文明建设，大力提倡健康向上、催人奋进、丰富多采的军营文化生活。切实做好拥政爱民工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做出新贡献。江泽民同志的这些重要指示，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意义十分重大。

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军队政治工作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得到加强和改进，为增强部队凝聚力、提高战斗力，有力地发挥了服务和保证作用。组织部队广泛深入地进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教育，系统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大力加强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深入进行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促进了部队的稳定和高度集中统一；加强和改进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狠抓各级党委、领导班子的廉政建设；深入细致地做好实施《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军官军衔条例》和《文职干部暂行条例》中的

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调整配备军、师级领导班子，巩固和发展了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建设的成果；围绕贯彻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普遍进行形势战备教育，做好军事训练中的政治工作；加强部队的思想文化建设，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阵地；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国家的军事利益和军人的合法权益，加强普法教育和预防犯罪综合治理，维护部队的纯洁、巩固和稳定；掀起学习雷锋和“南京路上好八连”活动的新热潮，进一步弘扬革命正气；大力加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部队的全面建设取得新的进步；按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爱人民、学人民、为人民，做好拥政爱民工作，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所有这些，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而对于所有这些，尚须作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总结。

《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是当代中国丛书系列中唯一一部反映政治工作的专著。这部书在编写过程中，始终受到总政治部、国防大学党委的关怀与指导，并得到了各大军区政治机关与全军政治院校以及许多位政治工作者专家、老同志的支持与协助。总政治部各部、国防大学和原政治学院九十多位同志参加了书稿的撰写、修改与审读。相信《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出版，必将对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推动军队政治工作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肯定有不足之处，敬请全军指战员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 绪论——新中国成立前军队政治工作的简要回顾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显著标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对军队实施领导而在军队中进行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政治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提供根本保证，为激发官兵积极完成各项任务提供精神动力。自从一九二七年人民军队诞生以来，军队政治工作从创立、发展到成熟，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理论、方针、原则、制度和办法，成为具有人民军队特色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特别是中国革命军事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智慧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的光辉结晶。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解放军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政治工作是保证人民军队发展壮大，战胜一切敌人的重要因素，是人民军队战斗力的源泉；在和平建设时期，政治工作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和强大动力。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有效地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使他们身上蕴藏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使他们自觉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作出贡献；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坚持正确的方向。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其发展历程中有丰富而宝贵的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重温历史，将有助于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发扬和发展。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创立阶段。在此之前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条件下，周恩来、李大钊、恽代英、肖楚女、李富春、林伯渠、熊雄、聂荣臻、刘伯坚、邓小平等大批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和北方的国民军开展军队政治工作。经过他们的实践和探索，仿效苏联红军的做法，在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

---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79页。

1924年5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推动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共产党人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肖楚女等任政治教官。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把它变为培植国民党军队军官的学校。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随之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基础，将所属军队改组为国民革命军。至1926年7月共8个军约10万余人。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国民党军队仍沿用这一名称。

1924年冯玉祥率部推翻直系军阀曹錕贿选政府，组成国民军，后又称西北军、国民联军等，归国民革命军序列。

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开展政治训练，同时对工农群众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在黄埔军校，共产党人主持制定了《政治教育大纲草案》，开设了政治课，还建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进行了建党工作。在东征和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随军出征，做了大量团结内部和鼓舞士气民心的政治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为夺取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虽然这些工作仅仅是个开端，但却是中国军事制度的一大革命，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曾指出：在大革命时期，“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由于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特殊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在内容、形式和方法等方面都与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有所不同。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至一九二九年，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各地的100多次武装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战争，政治工作制度在红军中逐步创立和发展起来。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动员红军和人民群众，为创建革命根据地，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而斗争。

### （一）军队政治工作伴随红军的诞生而创立。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起义部队首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关，各军、师设军委、师委，各团设支部、支部及小组，以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义部队还设立了总政治部，郭沫若任主任；各军、师设党代表和政治部，团、营、连设政治指导员。在各级党代表和政治部的领导下，在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和组织工作。

同年九月九日，毛泽东等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的革命道路。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改编。在改编中，废除了旧军队的雇佣制，采取“革命自愿”的原则，纯洁了组织。宣布军队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在连、营、团建立士兵委员会，军官接受士兵的监督，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规定把中国共

---

1925年2月，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力进行第一次东征，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东征。两次东征全歼了盘踞潮汕地区的军阀陈炯明的反革命军队。

1926年7月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战争。国民革命军10万余人从广东出师北伐，至1927年初，歼灭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主力，推翻了军阀统治，但胜利果实为蒋介石篡夺。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80页。

产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立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开始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些措施和规定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雏型。

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毛泽东及时总结经验，进一步提出了政治工作一系列原则和要求，主要有：（1）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经过政治教育，使红军官兵懂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的必要，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2）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即：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归公；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成为八项注意。（3）三大任务。即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向群众宣传，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政权和地方党组织。（4）宽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杀、不虐待、不搜腰包，生活上与工农革命军同等待遇，去留自愿，对伤病俘虏给予治疗。这些原则和要求的贯彻实行，提高了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创造性地解决了人民军队内部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等重大政治原则和政策问题，使红军逐步摆脱旧军队的影响，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

井冈山根据地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并被推广到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中去。

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给贺龙和湘鄂西前委发出指示信，介绍井冈山根据地红军建军经验。指出：“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湘鄂西红军在贺龙、周逸群领导下，根据这个经验在连队普遍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加强了部队政治工作。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八年冬，中共鄂东特委在总结经验时明确提出“学习江西井冈山办法”。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鄂豫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由徐向前、戴克敏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强调“造成红军内部的民主精神”，“加强士兵对土地革命和阶级意识的养成和认识”，“加强士兵对群众组织的能力”等等。

在其他革命根据地，红军在开展武装斗争中都把政治工作作为部队生存发展的法宝。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红七军建立和健全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全军设前委，纵队和营设党委，连设支部；军和纵队设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团、营设政治指导员，积极对官兵和工农群众开展宣传组织工作。

## （二）古田会议决议奠定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

红军初创时期，由于各部队人员主要来自农民和旧军队，又是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进行活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比较严重。在红军党内和领导者中，对军队的根本任务、党对军队的领导、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军队内部的民主等问题，都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在一九二九年三月和九月先后召开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对上述一些原则

---

周恩来：《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16页。

问题产生了分歧，经过争论未能统一认识。毛泽东等提出的正确意见，没有被接受，使红四军建设受到了影响。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总结了红军创建两年多来的基本经验，分别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等，作出了规定，系统地提出了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它的基本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服从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

古田会议决议的内容极其丰富。其要点是：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基本任务。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规定红军不仅担负打仗的任务，还执行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即“三大任务”。

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领导的原则。要求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规定每连建立一个党支部，每班建立一个党小组。加强党内教育，严格党的纪律，开好党的会议，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使共产党员在各项工作中“起核心作用”。

对红军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教育。强调必须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非组织观点、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主要表现，产生根源，对革命的影响、危害及其纠正的方法，都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说明，并规定了党内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以及对士兵进行政治训练的材料和具体要求。

阐明了军事与政治、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的关系。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领导政治”、“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等错误观点，明确“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规定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凡是没有建立地方政权的地方，红军政治部即代替执行当地政权机关职能。

确定了正确处理红军内部和外部关系的原则。指出红军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兵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官长应爱护士兵，关心士兵的政治进步和生活，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遵守纪律，接受管理。纠正打骂士兵等旧军队的管教方法。重申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红军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地方党和政府，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

规定了瓦解敌军的政策和方法。提出对俘虏兵，第一是不搜查他们身上

---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通常称为“中央九月来信”（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9—43页）。

的财物，第二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使他们精神上得到欢乐；第三是给俘虏兵以和老兵一样的物质上的平等待遇；第四是愿留者欢迎，不愿留者发给路费放走。

规定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和要求。指出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是红军第一重大工作。宣传内容要根据红军政纲和针对各阶级、阶层不同对象的情况去确定，宣传方式要灵活多样。提出要整理和训练红军宣传队，认为红军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宣传队若搞不好，就荒废了红军宣传任务的一大部分。具体提出了各种宣传方式和方法。

论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要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注意实际情况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的任务主要是指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

古田会议决议把红军初创时期提出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了。它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路线，奠定了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是建设人民军队的纲领性文件。这个决议的精神不仅在红四军和赣南、闽西红军中贯彻实行了，其他各地红军也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从而使红军进一步清除了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总结全国红军政治工作建设的经验，参照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明确阐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使红军成为有力的工农革命武装力量。一九三一年二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成立，毛泽东任主任（十一月由王稼祥接任）。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的制定和总政治部的建立，对统一全国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和加强政治工作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给中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中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的论断。信中说：“政治工作在红军中有决定的意义，每一个红军战斗员不仅要能够有充分的军事技术——手中的武器，而且最重要的是脑子的武装。必须充实现有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实现中央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

一九三三年七月九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并制订了一、二、三级红星奖章，按功绩大小，分别授予“有特殊功绩”的红军军人。其中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人荣获一级红星奖章，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肖克、何长工、程子华、罗炳辉等34人荣获二级红星奖章，王震、杨得志等53人荣获三级红星奖章。随之中国工农红军开展了政治上比进步，作战中比勇敢、比战果和比做群众工作等竞赛活动，以及创造模范党支部、模范连队和模范团的活动。

一九三四年二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贺昌在会上的发言，都明确地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是红军战斗力的源泉”等正确论断，

并提出政治工作要保证提高部队的军事素养和作战的胜利，政治干部要学习军事、深入实际、实行具体领导等重要原则，对推动全国红军重视和加强政治工作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全力推行的情况下，特别是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取消了红军中各级党的委员会，代之以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之后，政治工作的重要原则未能很好贯彻，并受到了严重破坏。

### （三）保证反“围剿”作战和长征的胜利。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这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政治工作保证了作战的胜利和红军的发展壮大。

（1）保证红军战略战术原则的贯彻执行。在红军初创时期，教育部队贯彻“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当红军由游击队发展成正规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时，教育部队贯彻“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战略战术原则。（2）进行土地革命教育和强有力的战时宣传鼓动工作，鼓舞士气，激励斗志，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决心。

（3）建立奖励、立功制度，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4）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广大指战员奋勇杀敌。（5）协助地方党政机关发动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支援战争。（6）充分发挥政治干部的模范作用，使其成为联系群众，团结内部，遵守纪律，执行政策和英勇作战的模范。这些工作不仅对红军取得反“围剿”作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保证作用，而且为后来八路军、新四军战时政治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从一九三四年十月起，各地红军陆续退出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为肃清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总结和记取历史教训，保证长征的胜利，红军开展了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1）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及会后中共中央制定的正确方针。遵义会议精神在各部队传达后，红军官兵精神振奋，消除了疑虑和悲观情绪，坚定了革命胜利的信心。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各部队根据总政治部的指示，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了深入的宣传解释和政治动员，保证了这一战略方针的贯彻执行。

（2）恢复红军中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共中央先后给红军部队发出指示，要求迅速恢复和建立党对军队重大工作的集体领导制度。同时红军总政治部也指示各部队，以最大力量建立连队中的支部工作，克服由书记或指导员包办的现象，使党的支部在连队中起到最高领导的作用。（3）维护红军内部的团结。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东南的达维会师，第二天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红军一、四方面军根据“指令”的要求广泛进行了会师意义

---

1935年1月15日—17日在长征途中于贵州省遵义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常称为遵义会议。

与加强团结的教育，开展了相互慰问和学习的活动，为促进两军之间相互了解 and 团结打下了思想基础。在张国焘制造分裂活动时，红军指战员自觉进行了抵制和斗争，维护了一、四方面军的团结。

(4) 激发红军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团结友爱的精神。长征途中，天上经常有几十架敌机侦察轰炸，地面有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红军战士穿越江河关隘、雪山草地，有时只能以野菜、树皮、草根、皮带充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红军各部队开展了深入有力的政治教育，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发挥了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指战员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不畏艰险，齐心协力，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与装备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英勇作战，战胜了种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长征的艰难任务。(5) 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少数民族的同情和支持。红军长征途经苗、壮、侗、布依、土家、白、纳西、彝、藏、羌、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长期执行民族歧视政策，造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很深的民族隔阂，这给红军长征带来了很多困难。针对这种情况，红军总政治部先后发出了《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注意争取彝民工作的指示》等文件。红军各级领导机关都把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放到极重要的位置上，大力开展民族工作，教育指战员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严格政治纪律，保护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帮助各族人民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使红军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还吸引了不少少数民族青年加入了红军。长征的每一胜利都是与红军中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分不开的。

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北上途中，张国焘突然改变北上路线，擅自率一部分红军南下川康，并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另立“中央”，公然分裂党、分裂红军。由于中共中央的耐心教育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以及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等的坚决斗争，张国焘才不得不取消另立的“中央”，重新率部北上。为统一思想，严明党的纪律，增强党和红军的团结，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相结合的反党反中央的路线，是流氓无产阶级和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党内的反映。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合后，经过深入教育，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错误及其危害增强了认识，进一步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的正确，更加坚定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担负起抗日救国的伟大历史使命。

##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工农红军相继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军队政治工作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诸如，上升到主导地位的民族矛盾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国民党及其军队由敌人变为友

---

1936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到达四川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时，红二、六军团奉中共中央命令，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党、友军；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统一战线环境下各种不良影响对人民军队的侵袭和腐蚀等等。在这样的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最大限度地动员官兵的抗战热忱，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为保持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在理论上有了重大发展。

### （一）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总政治部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红军改编后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保证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九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强调：“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共产党对改编后的红军的领导，设立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方军委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直接受中央军委领导；同时在八路军第115、120、129个师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受华北军分会领导。新四军成立后，又建立了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皖南事变后由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分会代替）。一九三七年十月，恢复了由于受国民党干涉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任弼时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开展了反对新军阀主义的斗争。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还对在王明右倾错误路线影响下制定的《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不敢公开申明新四本的政治工作就是共产党的工作等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军队中政治工作，仍旧是共产党的党的工作，并不因统一战线的环境和战区的指挥关系而有所改变。”“政治工作必须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方法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 （二）团结友军共同抗战。

团结国民党军队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政治工作一个新的重要课题。对于这个问题，许多人曾经认识不足，存在“左”的情绪。政治机关从阐明阶级解放和挽救民族危亡的关系入手，着重抓了国际国内形势教育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引导干部战士弄清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长远任务与当前任务的关系以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提高了官兵的自觉性。在执行这一方针中，有的人又产生了右倾思想，忽视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政治工作通过关于人民军队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的教育，很快纠正了这种偏向。

为了团结友军共同抗战，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提出并率先实行抗日友军互助互让政策。八路军、新四军在自身巩固和扩大的同时，也帮助国民党抗日军队的巩固和扩大。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军委总政治部发布命令，决定在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军区政治部设立联络部，师及分区设联络科，团及支队设



联络员，负责与当地抗日的国民党军队联络，疏通彼此关系，解释与消除误会，交换工作经验，从思想上、政治上影响友军，推动他们进步，坚定他们抗战的决心。同时照顾居住在抗日根据地的友军家属，免除他们的劳役与捐税，使他们鼓励亲人英勇杀敌。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新四军搞“磨擦”，进行挑衅和进攻。对此，八路军、新四军采取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在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努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揭露和打击反共投降分子，最大限度地团结友军官兵共同抗战。

### （三）瓦解敌军。

抗日战争的作战对象主要是日军，其次是伪军。为了加强瓦解敌军工作的组织领导，中共中央设立了敌区工作委员会。一九三七年秋，总政治部设立了敌工科（一九四一年五月扩大为敌工部），团设敌工股，连设敌工小组。

瓦解日军是个新课题。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总政治部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关于敌伪军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应当是用各种方法削弱和降低日军的战斗力，使日军士兵对中国军民，不作盲目的仇视，从感情上的接近逐渐引导到政治的接近”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各部队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散发、张贴各种宣传品，传播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息，揭穿日军的欺骗宣传，造成日军的厌战心理，同时派遣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为了统一政策思想和克服瓦解日军工作的语言障碍，在延安成立了敌工干部学校，八路军、新四军也先后开办了敌工干部训练队（班），培养和训练敌军工作干部。各部队开展了日语喊话训练。为加强对日军俘虏的教育，在延安成立了“日本工农学校”，一些高级领导人亲自做日军俘虏的工作，朱德、任弼时都曾接见过日军伤兵。在华的日本人（主要是经过八路军教育后觉悟的日军俘虏）组织了“士兵觉醒同盟”、“日本人反战同盟”等反战组织，配合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瓦解日军的工作。

对伪军，八路军、新四军采取了削弱其战斗意志，争取他们对抗日的同情、帮助和争取反正的方针。主要做法是：给伪军建立红黑簿（即做好事记在红簿上，做坏事记在黑簿上），德威兼施，争取一部分伪军做革命两面派（表面在敌营垒，暗中为八路军、新四军服务）；动员伪军家属做工作；培养专门人员打入伪军下层开展工作；提出对反正的伪军保证按抗日友军待遇，给以抗日军番号，不缴枪、不编散，一视同仁，共同抗日。

八路军、新四军瓦解日、伪军的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据统计，八年抗战中投诚的日军和反正的伪军共达 18.4 万亲人。这对削弱日、伪军的战斗力，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 （四）整风和生产运动。

一九四二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内容的全党整风运动。同年六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军队中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通过整风，比较系统地清理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使部队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的教育，特别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教育。全军出现了生气勃勃、团结一致的新局面，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整风运动中，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在组织部队认真学习的同时，还注意解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党风、学风、文风不正的问题。比如，宣传工作着重解决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等问题；干部工作着重解决宗派主义和提拔使用干部方面的片面性问题；党的工作着重解决党的团结以及民主作风、重视党员权利等问题；锄奸工作着重解决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逼供信问题，等等。通过整风，军队政治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进。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物资供应出现严重困难。为渡过难关、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王震奉命率第359旅开赴陕北南泥湾、槐树庄等地屯田。接着八路军、新四军在各抗日根据地兴起了大规模的以自给和部分自给为目标的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各部队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积极宣传“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不断提高指战员的认识，采取多种形式表扬先进，开展劳动竞赛，激发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各部队边战斗边生产取得巨大成绩，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改善了军民生活，为加强部队和根据地的建设，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 （五）拥政爱民和尊干爱兵运动。

“团结自己、战胜敌人”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方针。为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官兵之间的关系，密切军队与政府、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作出《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公布了《拥军公约》，决定从一月二十五日到二月二十五日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一月二十五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作出《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二月一日公布了《拥政爱民公约》，其内容是：1.服从政府法令。2.保护政府，帮助政府，尊重政府。3.爱惜公共财物。4.不侵犯群众利益。5.借物要送还，损坏了要赔偿。6.积极参加生产，减轻政府和人民的负担。7.帮助人民春耕秋收和冬藏。8.帮助人民进行清洁卫生运动。9.了解民情风俗，尊重民情风俗。10.向人民宣传，倾听人民意见。并决定从二月五日至三月四日为陕甘宁边区部队拥政爱民运动月。同年十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于一九四四年阴历正月在本地区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抗日军人家属）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自此，拥政爱民、拥军优抗活动逐步走向经常化、制度化，有力地促进了军政军民的团结。

干部爱护士兵，士兵尊重干部，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是在红军时期就提出的原则。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针对部队官兵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发出《关于巩固部队政治工作指示》，要求干部关心战士、爱护战士，照顾战士在政治、工作、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切身利益，及时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提倡干部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一九四四年，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1旅第16团提出“干部要爱护战士，战士要尊重干部”的口号，发动干部战士订公约、写保证。联防军政治部及时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制定

了《尊干爱兵公约》，在部队兴起了群众性的尊干爱兵活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所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中提出，“应在每一部队内举行拥干爱兵运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同时号召士兵拥护干部，彼此的缺点错误，公开讲明，迅速纠正，这样就能达到很好地团结内部之目的。”此后，尊干爱兵运动在全军普遍开展起来，进一步巩固了部队，丰富了政治工作的内容。

## （六）政治工作在理论上的进一步阐述和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领导人和军队各级领导机关不断总结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加以概括和提炼，使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在理论上有了重大发展。

明确提出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宗旨。毛泽东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这一宗旨是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决定的。它是人民军队团结战斗的思想基础和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重要标志之一。

明确提出党指挥枪的原则。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说：“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一九四三年四月，朱德在《革命军队管理原则》中指出，我们的军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这一原则保证了人民军队的性质，保证了军队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奋斗。

明确提出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是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毛泽东指出：“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肉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一九三八年一月，周恩来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中提出，要“努力注意改善士兵待遇与生活”，“消除官与兵的隔阂”，“必须坚决

---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39页。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46、547页。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46、547页。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79页。

周恩来：《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96、98页。

站在保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为人民解除痛苦”；要对敌军进行宣传，“使敌军瓦解和涣散”。一九四三年一月，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演讲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人民群众是“互相依存”、“血肉相连”的，是“关心着人民的痛苦，不侵犯人民的利益，并为保卫人民的利益而进行斗争”的；它的内部关系是“指挥员和战斗员打成一片”，“同甘苦，共患难，衷心地团结一致”。人民解放军就是靠实践这些原则，团结自己，打击敌人，取得胜利的。

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了人的因素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兵民是胜利之本；军队的基础在士兵，将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的思想，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理论。

一九四四年四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和王明“左”倾路线斗争的经验，进一步解决了“党指挥枪”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会上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由党、政、军许多领导干部集体研究后写成，并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批准的。《报告》继承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全面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开始以来军队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许多重大问题，是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重要历史文献。《报告》阐明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使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军队与人民、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报告》论述了政治工作在革命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人民军队的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上规定，并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去保证军队任务的完成。《报告》分析了政治工作中教条主义的表现及其危害，强调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应当适应环境、任务的要求，凡属有利于组织和发扬广大战士群众的积极性，借以完成一定任务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便应当充分利用之；否则，就应当废止，而代之以新的东西。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不仅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的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它标志着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规律已被认识和自觉地运用，许多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政治工作已成为一个科学体系，达到了更加成熟的阶段。

###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民党公然挑起大规模的内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自卫，以大兵团作战的形式同国民党军队展开空前激战。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坚持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贯

---

周恩来：《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96、98页。

周恩来：《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96、98页。

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保证军队为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努力奋斗。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五一年六月共消灭 800 万国民党军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继承红军政治工作和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创造和发展。

### （一）进行形势教育，动员全军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仍然面临成为一个新中国还是保持一个旧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问题。由于对蒋介石妄图独吞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实行反动独裁统治的阴谋认识不足，在人民群众中较普遍地存在和平幻想，部队里也滋长了和平麻痹情绪，对内战的危险缺乏思想准备。在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以和谈掩人耳目，一方面加紧对解放区进攻的情况下，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保证完成从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的转变，树立争取和、准备打，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思想。中共中央及时指出，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阴谋要有充分的准备，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坚决保卫人民斗争的胜利果实，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解放军各级政治机关组织指战员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和对策，引导他们回顾历史，正视现实，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各部队还通过诉苦教育，控诉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对翻身农民反攻倒算、残酷迫害的罪行，有效地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克服了和平麻痹思想，增强了保卫解放区，保卫人民胜利果实，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奋斗的决心。

### （二）保证中央军委作战意图的实现。

在解放战争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解放军各级政治机关大力宣传了中央军委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和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使指战员明确地树立起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和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思想，保证了中央军委作战意图的顺利实现。在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后，各部队政治机关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积极宣传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提出的“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的论断，鼓舞全体指战员发扬不怕艰苦、不怕牺牲、连续作战和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各野战军政治机关对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在部队中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如在辽沈战役中说明“攻锦打援”、断敌退路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在淮海战役中着重宣传首歼黄百韬兵团对于夺取整个战役胜利的意义；在平津战役中讲清抑留傅作义部队对取得战役全胜的作用。通过反复的宣传教育，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深入人心，从而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

毛泽东：《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61页。

### （三）恢复和健全党的委员会制度。

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八路军、新四军的团和军分区以上单位成立了军政委员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机关。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部队中恢复党的委员会制度（简称党委制）。八月，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席，刘少奇任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十一月，晋冀鲁豫军区首先恢复了党委制，在纵队和旅两级建立了党委，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以适应大兵团作战的需要，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发出《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的指示》，规定“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党委制的恢复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贯彻执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保证了部队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的指挥。

### （四）新式整军运动和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

一九四七年七月，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部队发展到 195 万人，大量翻身农民和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军士兵补入了部队。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特别是提高新战士的政治觉悟和纪律性，许多部队结合土改运动，先后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诉苦教育。这一教育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同年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批转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号召全军普遍开展诉苦运动，揭露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和反动社会制度的黑暗，达到提高部队阶级觉悟，巩固团结，增强战斗力的目的。一九四七年冬，西北野战军利用休整时间开展了以诉苦（控诉旧社会和反动派压迫、剥削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具体做法是，先诉苦，激发干部战士对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然后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的整顿。这种新式整军运动很快在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普遍展开。

新式整军运动是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发展。它有效地提高了指战员为解放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为全国土地改革的胜利、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而战的觉悟，加速了把大批被俘的国民党军队士兵改造为解放军战士的过程，加强了军队内部的团结。从此，诉苦、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成了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与方法。

在新式整军运动的基础上，军队内部的民主得到进一步发扬。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指示中，把人民军队的民主传统概括为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政治民主是

---

毛泽东：《关于健全党委制》，《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二版，第 1340、1341 页。

指官兵都是军队的主人，在政治上一律平等，没有人格的贵贱，官兵互相尊重，士兵有权监督和批评军官。新式整军运动后，政治民主又发展到评论党员，推荐干部，巩固部队的内外团结等方面。经济民主主要是由战士选出代表组成经济委员会，协助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维护士兵的经济利益。军事民主是在练兵中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的群众路线的练兵方法；战前召开“想办法会”或“诸葛亮会”，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完成战斗任务；战斗中只要情况允许，就组织战士针对出现的困难，想法制服敌人，战后发动群众及时进行战评，总结作战指挥、战术、纪律、作风等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使全军的民主运动进一步规范化，同年二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在连队中成立士兵委员会的指示》，十月又颁布《关于革命军人委员会（即战委会）条例草案》，对连队开展民主运动的群众组织——革命军人委员会的性质、任务、职权和活动方式作出了统一规定。三大民主的贯彻实行达到了“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

### （五）杀敌立功运动。

一九四六年七、八月间，新四军第一师二团借鉴历史经验，提出了“在战场比比看，为人民立功劳”的口号，在各连建立“功劳簿”，开展了群众性的立功运动。十月，山东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和山东军区武装部也在所属部队中开展了立功运动，口号为“每人立一件功劳”。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抓住这一新生事物，于十一月十一日发表《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的短评，称赞这“是人民自卫战中的一个创举”，号召全军普遍开展这一运动。一九四七年二月四日又发表《再论立功运动》的社论，指出为人民立功是革命战士的最大光荣。随后，解放军各部队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立功运动。从干部到战士，从个人到集体，从连队到机关。迅速掀起了杀敌立功的热潮，并逐渐形成了一套记功、评功、奖功、庆功的方法和制度。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深入部队，广泛开展战场鼓动工作，采用及时宣读贺电、嘉奖令，组织杀敌立功竞赛等做法，使火线杀敌立功运动搞得有声有色。立功运动丰富了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内容，增强了政治工作的战斗性、群众性和号召力，使全军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得到进一步发扬，涌现出千千万万英勇杀敌的英雄模范人物。

### （六）团结互助运动。

团结互助运动又称“王克勤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军队政治工作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的一项运动，在一九四五年十月的邯郸战役中，国民党军士兵王克勤被俘后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他把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对比，体验到了人民军队处处温暖，人民军队中每个成员都是真正的阶级兄弟。他担任机枪班班长后，为发扬阶级友爱把全班编为3个互助组，在练兵、行军和作战中，实行思想互助、体力互

助和技术互助，使全班团结一致，英勇杀敌，屡建战功。这个班被评为战斗模范班，王克勤被评为一等杀敌英雄。王克勤所在的第6纵队和晋冀鲁豫军区发现这一典型后，在军区部队开展了学习王克勤的运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人民解放军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

当时，解放军成员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经过长期战争锻炼的老战士，他们政治觉悟高，又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二是新入伍的翻身农民，他们一心要保卫翻身解放的成果，战斗意志强，但缺乏军事知识；三是解放过未的国民党军队士兵，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军事技术，但程度不同地受到国民党军队不良作风的影响，这些经历不同的战士各有长短处。为取长补短，各部队在开展团结互助运动中把老战士、新战士和“解放战士”，先进者、中间者和后进者合理搭配，建立互助组（也是战斗小组），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督促，共同提高。团结互助运动是人民军队阶级友爱精神的本质体现，从此它也成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经常性内容和有效方法。

### （七）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大兵团作战对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纪律、政治纪律和群众纪律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纪律性，保证部队的高度统一，成为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要求全军深入教育，严格执行。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宗旨，是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行动准则。它的重行颁布对于统一全军纪律，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号召。各部队根据这一精神普遍进行了教育和整顿。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人民解放军解放并接管了大批城市，为了加强城市的接收和管理工作，毛泽东、朱德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了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五月六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城市驻军纪律问题的决定》。全军部队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和有关纪律，发扬了人民军队维护群众利益和艰苦朴素的传统作风。如第3野战军攻占上海后，入城官兵严格遵守《入城守则》中“不入民宅”的规定，一律不进民房和工厂，在马路两旁就地露营。全市人民没有受到任何惊扰，许多人到第二天早上才看到极度疲劳的解放军官兵一排排酣睡在人行道上。解放军的模范行动一下子就打破了国民党对解放军的种种造谣污蔑，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

三大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约法八章的主要内容是：1.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2.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3.没收官僚资本；4.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5.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对一切不持枪抵抗、不搞破坏活动的国民党政权组织人员，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6.为确保城乡治安，一切散兵游勇，应向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并交出武器；7.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改善农民生活；8.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 （八）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

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军事上的重大胜利，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对国民党军队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政治攻势，取得显著成效。在一九四五年十月的邯郸战役中，晋冀鲁豫军区争取了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1万余人举行战场起义。此后各部队开展了“高树勋运动”，通过各种途径向国民党军官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主张，揭露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宣传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及蒋军必败的道理；宣传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策，解除其顾虑。除采取战场喊话、散发传单及广播等形式对国民党军广大士兵进行宣传外，还注意加强对国民党军军官的工作，广泛争取中下层，有重点地积极争取上层，晓以大义，争取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多次成功地争取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率部起义。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五一年六月的四年间，共争取了84.6万余国民党军官兵起义，另有29.3万余人接受和平改编，实现北平等大中城市“和平解放”。这对于加快中国大陆的解放起了重要作用。

## （九）改造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成为人民解放军战士。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数量既大，情况又复杂。一九四八年一月，中央工委召开了敌军工作会议，刘少奇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及处理俘虏问题的报告》，阐述了新形势下敌军工作的方针、策略和具体做法，强调贯彻尊重被俘国民党军官兵人格，对他们不侮辱、不虐待的一贯政策，提出对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应更多地经过教育之后补入部队。同年八月，中央军委在《关于兵员补充问题的指示》中明确规定，今后应以俘虏和蒋、军逃兵为补兵的主要来源之一。十月，东北野战军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即俘即补”的方针，即在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大量俘虏经过短时间教育即可补入部队，使部队始终保持连续作战的能力。实践证明，国民党军士兵绝大多数出身于劳动群众，通过教育，特别是控诉旧社会、旧军队之苦的诉苦教育，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很快就能成为很好的战士。“即俘即补”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的一项新创造。在三年半的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共俘虏国民党军官兵450万余人。仅在战争的头两年，解放军就补充了大约80万左右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兵，使他们掉转枪口，为全国人民的解放而战斗。

## （十）动员人民群众支援前线。

动员和组织千百万人民群众支援战争，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军队发扬了依靠人民群众打人民战争的传统，打到哪里，就在哪里广泛深入地向人民群众宣传解放军战略决战的胜利形势和重大意义，以坚定信心，鼓舞斗志，协助地方发动群众积极支援前线，并协同人民政府做好随军民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辽沈、淮海、平津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在同国民党军英勇作战的同时，抽出大批干部深入人民群众宣传胜利的形势，配合地方政府发动群众积极支援前线。“一切为了前线！”“解放

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成了新老解放区人民群众的行功口号。上述三大战役中支前民兵、民工达 880 万人，各种运输车 140.9 万辆，担架 36.3 万副，运送军粮 6.9 亿多公斤。动员如此雄厚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线作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最有力的保证。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 22 个冬春。在艰苦卓绝的历程中，军队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一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人民解放军就是靠政治工作使全军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靠政治工作最大限度地激发官兵的革命热忱，靠政治工作使军队内部和军民、军政之间达到巩固和团结。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传家宝。同时，政治工作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创新。

## 第一编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政治工作概述

### 第一章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新中国诞生至一九五六年的七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面临着由战争环境向和平环境，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由军队建设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历史性大转变。在这大转变的年代中，军队的政治工作经受了新的考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第一节 保证军队胜利完成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任务

新中国宣告成立时，国民党还有 100 多万军队盘踞在西南、华南和沿海一些岛屿；在新解放区还残留着一批政治土匪、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广大新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和恢复、发展生产的任务十分艰巨。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方针和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昂的战斗意志，胜利地担负起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光荣任务。

### 一、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夺取全国胜利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全党同志必须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解放战争不断取得重大胜利的形势下，军队中曾有一部分人程度不同地产生了居功骄傲、斗志松懈的情绪，甚至有解甲归田过和平生活的打算。面对这种情况，各级政治机关组织部队深入学习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教育干部战士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军队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思想。广大指战员联系“李自成进北京”的教训，着重讨论了怎样看待已经取得的胜利，怎样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关系等问题，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路还很长，坚定了继续战斗，发展胜利，向全国进军的决心。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兵分几路，继续向西南、东南、华南挺进，先后进行了衡宝、漳厦、两广、西南、滇南、海南岛、舟山群岛、昌都等战役。各部队在行军途中、在战场上开展了不间断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富工作，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发扬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保证了进军作战的胜利。

为了祖国的统一和边防的巩固，解放军部分部队接受了向和平解放的新疆、西藏地区进军的艰巨任务。挺进新羽的部队徒步走过荒无人烟的戈壁瀚海，在黄沙滚滚、看不清道路、没有水源的条件下顽强拼搏，战胜重重险阻，行程 1000 多公里，于一九五一年三月胜利完成了向西北边睡的战略进军。进军西藏的部队同严寒缺氧、雨雪冰雹、饥饿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认真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于一九五一年十月进驻拉萨，巩固了西南边防。

为表彰英雄模范人物，鼓励全军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九五一年九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陆、海、空军和民兵战斗英雄及工作模范代表 350 名，劳动模范代表 60 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会议指出，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和强大的经济力量是全国人民的两件大事，号召英雄模范要不骄不倦地努力学习，发挥骨干作用与桥梁作用，团结与带动全国人民为完成这两件大事而奋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全军性的英模大会，对政治工作是一次实际的检阅和推动，对于树立解放军永远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思想起了积极作用。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一年十月，人民解放军采用作战或和平解决的方式，共消灭大陆及海岛上的国民党军队 128 万余人，收编改造了 170 多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官兵，解放了除台湾和少数沿海岛屿以外的全部国

土。

## 二、清剿残匪巩固人民政权

在中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之际，国民党有计划地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地区潜留了大批特务分子。他们麇集溃散的军队，勾结地方惯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组成反革命武装，进行破坏捣乱。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保卫群众利益，解放军调集了约 150 万人的兵力，在各新解放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

剿匪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特殊战斗。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反复教育部队认识清除残匪对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斗争中坚决执行军事进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到一九五三年剿匪任务基本完成，很大一部分匪众是靠政治攻势促其瓦解投降的。

各部队在进行剿匪的同时都承担了工作队的任务，在地方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参加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建立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建立民兵武装、培训群众骨干等各项工作，有力地支持了地方政权建设，也为彻底消除匪患奠定了群众基础。

## 三、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贡献

由于国民党长期的腐败统治和连年战乱，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十分困难。一九五五年六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号召，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虽然军队还担负着艰巨的作战任务，但从全局出发，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决定人民解放军复员一部分人参加国家经济建设。为此，总政治部发出《关于部队整编复员的政治工作指示》。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全军很快就顺利地完成了 150 万人复员转业的任务。这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建设精干的国防力量起了重大作用。

进驻新解放地区的部队都派出大量人员参加城市和农村的各项工作，还抽出人力物力直接投入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如抢修遭到破坏的工业交通设施，修建水利工程，支援文化教育事业等，为减轻人民负担，各部队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节约运动，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做出了贡献。

## 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一九五五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战火很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中共中央根据人民的意愿和国际主义原则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开赴朝鲜战场，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场局部的带有国际性质的反侵略战争。在近三年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继承和发扬了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始终高举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旗帜，向部队反复进行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中心的思想教育，使精神力量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志愿军政治机关还教育部队尊重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爱护朝鲜人民，密切中朝军队和人民的战斗友谊。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制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

和朝鲜人民军一道，面对现代化武装的帝国主义军队，斗志昂扬，敢打必胜，终于以劣势装备打败了优势装备的侵略者。他们为了祖国的安全，为了中、朝人民的幸福，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爱戴，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是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 第二节 新形势下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针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

### 一、健全政治机关，完善政治工作制度

战争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机构一直很小。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对全军政治工作的领导，于一九五一年四月，充实组建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罗荣桓任主任，傅钟、肖华任副主任，同时健全了各业务部门。新中国成立前后相继建立的各大军区、省军区及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等军兵种，也都建立相应的各级政治机关，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军统一的政治工作领导机构。一九五一年九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报告制度的规定》，统一了全军政治机关的工作联系制度，使各级政治机关更便于及时了解情况、指导工作。

为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建设，总政治部于一九五二年组织了专门机构，开始制订全军统一的政治工作条例。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五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颁布施行。这个条例贯彻和体现了毛泽东建军思想，继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总结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也吸取了苏联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条例包括总则，党委员会工作，政治委员工作，从总政治部到团政治处各级政治机关的工作，营政治教导员工作，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和连队党支部、团支部、俱乐部工作，以及学校、海军舰艇部队、空军飞行大队、医院的政治工作，革命军人代表会议条例等，共 20 项。条例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必须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政治工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工作，必须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部队；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提高全军人员的军事素养，使干部战士熟练掌握现代化的军事业务技术；政治工作在保证完成一切任务中必须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条例，并亲笔加上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条例的颁布和贯彻执行，使人民解放军在新形势下政治工作的建设和实施有章可循。

### 二、进行政治理论教育和文化教育

一九五一年底，总政治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军宣教文化工作会议。会议认为，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军队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为了军队的长远建设，必须在各级干部中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理论教育。根据会议的决定，总政治部制定了政治教育规划，要求把政治理论教育作为政治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各部队建立在职干部学习制度，按干部的实际水平分别编组，提出不同的学习要求。总政治部和各大单位都为部队培训了一批学习骨干，担任学习辅导任务。到一九五四年，全军干部普遍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部队干部战士大多数来自工农，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这是进一步提高部队政治、军事素质的一大障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中央军委决定把迅速提

高部队文化水平作为全军教育训练的重点，首先是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要求普遍消灭文盲，并逐步提高到高小、初中水平。全军迅速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并取得显著的成果。

### 三、整顿党的组织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

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作出《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根据决议的精神，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军队的组织状况与思想状况总的看是好的，但革命胜利后，尤其是部队进入城市后，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某些干部中滋长了一些不良倾向。主要是居功骄傲、贪图享乐和腐化堕落。这些不良的思想和行为虽然只发生在少数人身上，却损害了部队的战斗力，妨碍着部队执行新的历史任务。有些部队也存着组织不纯的问题。根据会议的决定，全军在共产党员中普遍进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要求党员按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进行对照检查，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在此基础上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整顿，教育有缺点错误的党员，淘汰确实不够标准的党员，认真解决组织不纯、思想不纯问题。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简称“三反”）运动。这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斗争，也是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造运动。全军于一九五二年初全面投入了“三反”运动。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认真掌握以教育为主的方针，在进行普遍教育的基础上，深入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动员犯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坦白交代和进行检查。这次运动使干部战士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反腐蚀教育，查清了一部分人的问题。运动中一些单位曾发生打击面过大的偏向，伤害了一些好人，在运动后期大都得到了纠正。

一九五四年二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根据这次会议精神，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都先后召开了党委会或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学习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揭发批判高饶反党罪行，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着重检查了个人主义、居功骄傲情绪以及由此产生的妨碍党的团结和党委集体领导的问题。这次学习和检查是对全军高级干部的一次思想整顿，进一步增强了军内的团结。

在全军贯彻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于一九五四年八月八日发出了《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加强对高级干部的思想领导，健全高级干部的党组织生活，使他们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指示》发出后，全军师以上党委和团以上领导干部普遍进行了讨论和检查，对犯有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错误的人展开了批评斗争，并按情节轻重作了严肃处理。这对于端正党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的不良倾向起了很好的作用。

### 四、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全军的政治教育即以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中心内容。着重提高干部战士对实现社会主义改造重大意义的认识，提高执行各项政策的自觉性，激发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经过学习，广大指战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显著提高，许多人写信鼓励亲友，带头参加社会主义改造。许多部队还以大批人力物力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拥护社会主义改造”，“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成了全军最响亮的口号和实际行动。

### 第三节 向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转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时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要有强大的陆军，而且还要有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要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以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根据这个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行统一祖国大陆作战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地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部队的编制体制、组织制度、工作重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转变中，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 一、建立合成军队和组建院校

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多次整编，逐步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为此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军先后集体转入生产建设的部队和转业复员的干部、士兵达500万人，由于思想政治工作得力，做到了留者安心，走者愉快。为组建和充实各总部和军兵种领导机关，全军抽调了大批干部到这些单位工作。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空军领导机关正式成立；一九五〇年，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的领导机关也相继成立。一九五三年，中央军委根据朝鲜停战后的形势，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在提高部队质量的基础上压缩军队定额，减少军费开支。到一九五五年全军总人数比一九五二年精简了23.3%。一九五六年，中央军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加快国家经济建设的精神，再次决定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到一九五八年全军总人数又比一九五六年减少了36%。在这两次整编中，由于思想工作深入，组织工作周密，全军干部战士以国家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决定，留队的努力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离队的积极走上新的岗位，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奋斗。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决定，在战争年代创办的军事院校的基础上，改建、新建一批培养军队现代化建设人才的各类院校。一九五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正式成立，一九五二年组建后勤学院，一九五三年组建总高级步兵学校和军事工程学院，一九五四年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许多军队高级将领和优秀师、团干部进学校学习深造，还组建了一批中级和初级军事、政治、文化、技术学校。全军院校达200余所，一大批有丰富经验的干部到学校担任领导职务和教员，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院校体系。

#### 二、贯彻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精神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七日至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军委副主席朱德致开幕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作了《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报告，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作了关于军事定型定额问题、组织编制问题和领导关系问题的报告及会议总结，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这次会议以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指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四年来的军事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总结，对军队建设的方针任务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并通过了相应的决定，主要是：（一）把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作为军队建设的总方针与总任务。（二）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在发展本国工业的基础上适当引进国外的技术装备，全军武器装备以巩固提高为主，选择重点进行建设。（三）军队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四）军队正规化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条件。全军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加强部队的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五）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强调“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我军根本的领导制度”，政治工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生命线。在现代化建设中要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六）在各项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这次会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各级政治机关迅速向指战员传达了这次会议的精神，对部队进行了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思想教育，统一了认识，纠正了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墨守成规或急于求成的思想偏向。

### 三、动员全军投入正规军事训练

随着各军兵种的建立和武器装备的改善，中央军委决定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军开展大规模的正规军事训练，并要求在训练中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一九五三年五月总政治部发出指示，要求全军指战员深刻认识搞好正规训练是军队建设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的重大步骤，号召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勤学苦练的精神投入到军事训练中去，指出向苏军学习是正规训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各部队根据全军统一的训练计划，结合自身特点，采取竞赛评比、立功创模、举办各种展览、组织参观见学等方式，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了较多的军事知识，提高了战术技术水平。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中央军委组织了辽东半岛抗敌登陆战役演习，叶剑英担任总导演。参加演习的陆、海、空军部队共4.8万人。这次演习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依据，着重体现在现代条件下抗敌登陆中各军、兵种的协同作战。总政治部和参加演习部队的各级政治机关，从始至终参与了演习的组织和思想动员，保证了演习的顺利实施。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等观看了演习，给予了高度评价，使参加演习的干部战士受到巨大鼓舞。

在学习苏军，开展正规训练的过程中，一些单位曾一度出现不从实际出发、照抄照搬等形式主义的偏向，有的甚至偏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对此，中央军委和各级政治机关都及时指出并作了纠正。一九五五年八月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发表了《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一文，指出人民解放军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完全适合中国情况和军队特点的。装备的改变，若干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正规化的措施等等，都不能违背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在一九五六年召

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防部长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在发言中都指出，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不仅要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还应当学习其他兄弟国家军队和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好经验，只要这些工作经验和科学技术有好处，就应当学习。学习外国的东西，要采取虚心而又分析批判、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迷信盲从，机械照搬。同时还要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并强调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坚持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坚持军队民主制度。

#### 四、实行四项制度

一九五五年开始逐次实行的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和颁发勋章奖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步骤，涉及到全军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它的实施给军队政治工作带来了极为繁重的任务。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和颁发勋章奖章的工作指示》，要求全军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和周密细致的组织准备工作。通过反复的思想动员、政治教育和党团会议的讨论，广大干部战士认识到实行由志愿兵役制到义务兵役制的改变，是缩减常备军，训练和储备强大的预备兵员，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措施；实行薪金制、军衔制和对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是国家对军人政治上的关心和生活中的照顾，有利于激发军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推进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实施中，毛泽东、中央军委和各总部一些领导人带头压低自己的薪金级别，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切实执行政策，掌握原则，力求做到对干部的评级定衔公道合理；大力宣传了一些战功卓著或有其他重大贡献的老干部主动要求降低授予自己的衔级的高尚风格；注意克服部队因长期实行供给制带来的平均主义思想，批评争名争利的个人主义倾向。四项制度的改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圆满完成，使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 第二章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一九五七年一月——一九六六年四月）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这十年中，军队政治工作继承和发扬了光荣传统，为保证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显著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也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和林彪的干扰，发生过一些失误。

## 第一节 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政军民关系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提出了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思想。全军用半年多的时间结合工作和实际情况进行了学习。通过学习，广大指战员深刻地理解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意义，明确了区别人民内部与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与处理方法。各级领导纷纷下部队调查研究，重点解决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

军队开始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后，曾一度发生忽视保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优良传统的现象。有些干部片面强调正规化，不重视发扬民主，认为民主会妨碍集中。有些干部不关心战士疾苦，管理教育方式简单化。有些部队住进营房后，同人民群众、地方党政机关的关系较前疏远；修营房、仓库、训练场占用土地过多，划军事禁区过大，参加社会活动和助民劳动少了，还出现了一些违犯政策法规的现象。这些问题经一九五三年底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和一九五六年春军委扩大会议两次纠正，情况有所好转，但是怎样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处理好这些矛盾仍是军队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解决官兵关系问题，各部队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为指针，广泛进行了尊于爱兵教育，使干部战士明确认识官兵之间存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在此基础上发动群众，发扬民主，进行检查整顿。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到群众中听取意见；群众意见较多、较大的干部当众作了检查。对于群众提出的正确的批评建议，领导机关立即研究，制定改正措施。经过民主检查，纠正了干部中存在的把正规化建设同实行民主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以及简单粗暴的管理方法，发扬了人民军队官兵一致的传统。一九五八年九月，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关于军队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规定》。全军各级干部热烈响应，他们以普通一兵的身份下到连队，和士兵一同学习、训练、劳动和生活，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

为改善军民关系，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检查了部队各种侵犯人民群众利益和不尊重地方党委、政府的问题。一九五七年春节前后，根据总政治部的指示，全军各部队在拥政爱民活动中，派专人向驻地群众征求意见，主动向地方党委和政府汇报情况，适当调整与紧缩军队占用的土地、划定的禁区和借用的民房。

一九五七年六月，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到华东、中南地区部队进行考察，提出了密切官兵关系的十二项措施和改善军民关系的八项措施。内容主要有：团以上单位建立士兵代表大会制度，让士兵用批评与建议的方式监督领导，参加部队管理；严格控制连队使用“队前批评”、“队前警告”、“禁闭”和“群众斗争”等几种处分士兵的方式；取消战士吃饭后要整队走出食堂，睡觉要听口令统一动作等规定；实行连队干部同士兵一起生活、一起劳动的制度；重申部队负责干部参加驻地各级党委，加强与地方党政机关联系，接受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部队抽出人力物力助民生产、抢险救灾和参加社会活动等规定。这些措施经过中央军委批准，转发全军执行。

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地方党委对军队的领导

和密切地方党委同军队关系的指示》，建立了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事系统和地方党委对军队的双重领导制度。全军各部队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要求，结合本单位、本地区的情况积极贯彻落实，军民之间、军队同地方党政机关之间更加亲密团结。

## 第二节 “两忆三查”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群众运动

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军队政治思想建设的重要一环。新中国成立后，就在全军干部中进行了有计划的理论教育。

六十年代初，又结合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开展了“两忆三查”教育和以学习毛泽东著作为主的群众性学习运动。

### 一、“两忆三查”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由于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与中国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的全部合同，中国的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一九五九年六月九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在军队中深入进行当前经济情况的宣传解释工作的紧急通知》。全军开展了大规模的关于经济情况的宣传解释工作，向指战员如实介绍了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一帆风顺，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要求全军正确认识形势，在困难面前不埋怨、不泄气，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各项指示和政策，克服暂时困难，继续前进。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总政治部又推广兰州军区的经验，在全军基层连队开展了一次“两忆三查”（忆阶级苦、民族苦，查立场、斗志、工作）教育。经过教育，广大指战员提高了阶级觉悟，认清了形势，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决心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共渡难关。全军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大力节约粮食、经费，加强对武器装备的爱护保养，坚决制止铺张浪费，努力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使部队始终保持高度的凝聚力和旺盛的斗志，圆满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 二、学习毛泽东著作群众运动

一九六〇年三月，总政治部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国革命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武装斗争、军队建设为中心，以毛泽东著作为主要内容，在全军加强理论工作和理论教育。七月十九日，总政治部又批转济南军区《关于组织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报告》，要求各级领导积极组织士兵学习毛泽东著作。从此，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在全军逐步开展起来。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正式发行，总政治部立即发出《关于宣传和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通知》，要求全军官兵把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推向高潮。这一学习以中共党史为线索，强调联系实际，从毛泽东著作中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以自学为主，并加强辅导，举办短期集训班。从一九六一年起，参加学习的人数越来越多，至一九六三年，全军100%的干部、90%以上的战士、80%以上的职工和家属都参加了学习。不少干部战士通读了《毛泽东选集》1至4卷，并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这一阶段的学习对于广大干部战士提高思想政治水平、熟悉党史军史、增强斗志、改进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涌现出



以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一九六四年以后，由于林彪提倡所谓“背警句”、“学语录”、“立竿见影”等，使学习出现了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的偏向，使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受到了很大干扰。

### 三、学习雷锋活动的开展

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伟大的战士》的通讯，详细地介绍了学习毛泽东著作先进典型雷锋的模范事迹。二月九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开展宣传和学习雷锋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雷锋的生平事迹是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的活教材，是加强部队思想建设，推动创造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的强大思想动力；全军干部战士要学习雷锋爱憎分明、永不忘本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工作态度，艰苦朴素、克勤克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品德，以“钉子精神”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思想行动的“方向盘”的学习精神。各部队普遍展开了学习和宣传雷锋先进思想和光辉事迹的活动。三月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尔后又发表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董必武的题词。全军兴起了学习雷锋的高潮，涌现出一大批雷锋式的好战士，在部队中形成了积极学习，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风气。同时，雷锋精神也传遍了全国，产生巨大的影响。

---

雷锋（1940—1962），湖南长沙县人，出身贫农家庭，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6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入工程兵某部运输连4班。入伍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被评为节约标兵和模范共青团员。196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任班长，当选为辽宁省抚顺市人民代表。1962年8月15日在执行运输任务中发生事故殉职。

### 第三节 加强基层建设

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长期战争中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必须把连队及一切基层单位建设好。加强连队建设的重点，是加强中国共产党在连队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调动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一九六〇年前后，全军在连队建设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做了许多工作。

#### 一、开展“四好”、“五好”运动

总政治部总结了群众创造的经验，从一九五八年起，在全军普遍开展了以“努力学习好、爱护武器装备和一切公物好、消灭事故好、生产节约好、锻炼身体好”为内容的创造五好战士和五好连队运动。一九六〇年军委扩大会议把原来“五好”的内容改为“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不久，又改为创造四好连队（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五好战士（内容同上）的运动。按照“四好”的四个方面全面建设连队成为全军政治工作经常性的中心任务，创造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运动在全军开展了十年之久，出现了大批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这对于加强连队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林彪错误主张的干扰，四好连队运动出现了偏差，由“一好”（政治思想好）带动“三好”，改变为“一好”代替“三好”，削弱了部队正常的军事训练和管理教育。

#### 二、整顿基层党支部

一九六〇年四月至五月，全军在贯彻中共中央指示，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中，发现有些基层党支部存在不少问题。七月十二日，总政治部作出了分期分批整顿基层党支部的部署，从七月至翌年二月，全军用七个月的时间，进行了这一工作。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共派出7.8万余名干部深入连队具体帮助工作。全军82%的党支部进行了整顿。经过整顿，健全了组织，严格了党的生活，使广大党员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有所加强，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一年全军共发展党员22.9万多名，充实了连队的党员队伍，使党员达到连队总人数的26.1%。全军的连队基本上做到班有党员，排有党小组。根据总政治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的通知，全军普遍恢复了连队的革命军人委员会。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总政治部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要求加强共青团支部建设，调动广大青年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共青团在创造四好连队中的突击作用。革命军人委员会和共青团这两个组织，在连队成为党支部联系群众、开展工作和完成各项任务的得力助手。

#### 三、加强对基层建设的领导

---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制定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林彪把这三句话八个字称为“三八作风”。

一九六〇年以后，总政治部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基层的领导。十一月发出了《关于军、师、团负责干部同连队支部建立联系制度的通知》，要求军、师、团党委成员和司、政、后机关领导人都要直接联系一个或几个支部，了解情况，帮助工作，推进基层建设。根据《通知》的要求，全军军、师、团领导干部和机关普遍同连队建立了联系，及时了解和解决基层存在的问题，总结推广基层的先进经验。随后又多次发出关于领导干部下基层蹲点的指示。根据指示的要求，各部队团一级领导干部加强了对基层的面对面领导；军以上领导干部每年到基层蹲点1至2次，每次一个月左右。

一九六一年一月，根据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执行毛泽东指示，立即进行调查研究报告的通知。军队干部特别是政治干部，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七月，中央军委作出克服“五多”（表报多、文件多、会议多、领导干部蹲机关多、一般号召多）的若干规定，领导干部纷纷走出机关下到基层，“五多”现象明显减少。一九六三年，总政治部颁发《改进机关对连队领导的六条措施》，规定领导机关给连队下达任务的同时要给时间；假日和课外时间，由连队支配；机关不向连队要书面报告，连队只填军委统一制定的一张报表；连队要经常保持三分之二的干部在位工作等等，要求领导机关树立面向基层，为连队服务的思想。

通过大抓基层，连队建设有了长足的进展，卓有成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保证了部队在执行东南沿海紧急备战和中印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出色地完成任务。

## 第四节 掀起练兵热潮和保证完成作战任务

### 一、发动全军青年学习军事技术

为了有效地提高部队军事技术训练的水平，一九六一年一月总政治部召开的青年工作会议提出，在全军青年中开展创造优等射手、特等射手和技术能手活动（简称“三手”，一九六二年改为神枪手、神炮手和技术能手）。各级政治机关通过各种形式反复进行创“三手”的宣传，要求指战员带着敌情、带着英雄形象苦练杀敌本领；号召广泛开展思想互助和技术互助；发动以党员为骨干的群众性比学赶帮；及时表扬先进，树立标兵，推广先进经验。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干部战士的积极性，一个创“三手”的群众性练兵活动在全军迅速开展起来。部队训练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许多特等射手能够在刮风下雨、山地丛林、夜暗黄昏等复杂条件下弹无虚发；许多神炮手在无照明的夜间可以装定表尺，变换方向。空军出现许多“全天候”飞行员，海军舰艇上的技术能手对本职范围内的每个电钮、机件了如指掌。全军射击和各种专业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许多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在备战和各次作战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 二、掀起群众性的练兵比武高潮

全军在提高军事技术水平的基础上，重视抓好战术水平的提高。南京军区某军的一个副连长郭兴福在战术训练中注意从实战需要和战士的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施教，充分发扬军事民主，调动战士的积极性，把军事训练和思想工作结合起来，取得很好的成绩。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向全军推广了他的经验，号召全军大张旗鼓地宣传郭兴福教学法，掀起比学赶帮超的热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部队、深入基层具体指导；政治干部必须学习军事、懂得军事、把思想工作渗透到军事训练中去；军事干部要会做思想工作。各部队迅速行动起来，对照本单位的情况找差距、订措施，集训基层干部，提高军事训练的水平。五月七日，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根据全军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取得的经验，制定了《连队基础训练方法二十等（草案）》下发试行，以加强连队基础训练和训练中的思想工作。

一九六四年六月，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一次全面的“比武”活动，以进一步提高部队的训练水平。这次比武不仅比技术、比战术、比训练方法，还比思想、比作风。各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积极开展迎接比武的大练兵。政治工作反复宣传“比武”

的目的和意义，强调比出干劲、比出团结，成绩优异不骄傲，名次落后不气馁，认真学习他人的好经验，防止锦标主义。对有些单位出现的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现象及时作了纠正，使练兵比武收到了预期的成效。

### 三、保证胜利完成炮击金门的任务

国民党军队残余的武装力量逃往台湾以后，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一面积极准备“反攻大陆”；一面以其占据的金门等沿海岛屿为基地，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为了打击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挑衅，反对美国入侵台湾

海峡，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从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起对金门岛的军事目标发起炮击。到十月五日的44天中，对金门全岛实施全面的炮火封锁，陷金门驻军于严重困境，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和美国当局的气焰。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力图拉美国与其并肩作战，美国则要台湾当局从沿海岛屿撤退，搞“两个中国”。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为了反对“两个中国”的阴谋，稳定金门国民党军队，拖住美国，决定采取打打停停，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斗争策略。十月六日发表了国防部长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严正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的问题，建议举行谈判，和平解决。并宣布暂停炮击七天，让国民党军队补充供应。十月二十五日，又发表了《再告台湾同胞书》，重申中国人的事，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不许美国插手。同时宣布逢双日不打金门的机场、码头、船只，使金门等岛上军民同胞得到充分供应，以利长期固守。这种打打停停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旬，福建前线部队停止炮击。炮击金门作战即告结束。

炮击金门不仅是一场军事斗争，也是一场政治斗争。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的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坚决贯彻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决策、命令，教育部队坚持军事行动服从政治、外交斗争的原则，叫打就打，叫停就停，叫打哪里就打哪里，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既打击了国民党军队对大陆的袭扰活动，又挫败了美国政府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在炮击作战中，政治工作发挥了持续的、强有力的保证作用。广大干部战士发扬了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光荣传统。海岸炮兵一五连战士安业民，在炮战中被火烧着，衣服和皮肉粘在一起，他不顾战友阻拦，坚持战斗40分钟，胜利完成任务。最后他因严重烧伤，献出了生命。解放军空军僚机飞行员杜凤瑞，在迎战窜犯的国民党飞机时，为了援救长机，不顾自身安危，切入重围之中，打下两架敌机，他的飞机也被击中，在跳伞时彼敌击中光荣牺牲。他们的英雄行为，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斗志。炮击金门的胜利，也是军民协力，团结战斗的结果。福建前线各级政府对部队作战全力支援，“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在战斗最紧张阶段，仅厦门市的民兵和群众每天参加支前的就有4000人。全省共动员支前民工48.5万人次，运送各种作战物资36万吨。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 四、保证东南沿海紧急备战和中印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任务的完成

一九六二年春，台湾国民党当局积极策划大规模窜犯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活动。五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进行紧急备战，并于六月一日命令各参战部队立即准备出动。六月三日，总政治部发出政治工作指示，号召全军紧急行动起来，积极作好战斗准备，彻底消灭敢于来犯的国民党军队。人民解放军各有关部队深入宣传中央军委确定的作战方针，迅速调整组织、补充兵员；开展车运、行军和战前练兵的思想动员和宣传鼓动工作；同时，在东南沿海人民群众中进行支前动员，加强对台湾国民党军官兵的宣传，等等。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各预定参战部队克服了各种困难，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迅速完成各项战备工作。由于人民解放军有了充分准备，国民党当局被迫放弃了冒险行动。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印度军队就不断越过中印传统习惯边界线，蚕食中国领土，建立侵略据点。中国政府多次建议双方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均遭印方拒绝。一九六二年十月，印度军队大举越过中印边界东段、西段双方实际控制线，向中国西藏和新疆边防部队发起全线进攻。二十日，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各部队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发动工作，转好由平时到战时的弯子；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命令和指示统一指战员思想和行动；用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激励指战员吃大苦耐大劳，以顽强意志克服险恶的自然条件造成的各种困难；广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激发指战员的爱国热情和英勇杀敌的积极性；教育指战员切实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和宽待俘虏的政策，从而保证了作战的彻底胜利。至十一月二十二日，全面粉碎了印军的进攻，清除了印军入侵的全部据点。

## 第五节 “左”的指导思想对军队政治工作的影响

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强调在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对军队政治工作也产生了影响。

### 一、反右派斗争中“左”的偏向

一九五七年五月，在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下，全党和全军展开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但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整风机会，向中国共产党发起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全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这对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正确的建军方向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发生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了敌我矛盾，把许多正常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视为右派进攻，把一些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扩大了打击面，政治工作实事求是的传统受到了损害。

一九五七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确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是政治思想战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好形式。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在军队的机关、院校和连队中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采取了大搞群众运动。开展“四大”的方式，对干部战士对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政策的意见进行阶级分析，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加以批判，造成政治压力，甚至个别单位在战士中划了“右派”或“反社会主义分子”（随后均已纠正）。这种以政治运动解决部队内部认识问题的做法，给部队政治工作带来不好的影响。

### 二、反“教条主义”和反“右倾机会主义”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召开了有1000多人参加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部队在学习苏军经验时出现的、已基本纠正的一些偏差和军队管理、院校教育中出现的一些缺点说成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教条主义”，对负责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几位领导人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会议作出的决议把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出现的一些工作上、认识上的分歧夸大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把严格管理，按科学规律办事，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等正确的东西说成是单纯军事观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会后，全军由上而下展开了反“教条主义”和“单纯军事观点”的教育和斗争。这次错误的批判，对当时和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军队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

一九五九年七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开展了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会议上，把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同意见说成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把实事求是的正确意见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为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中央军委于同年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二日

召开扩大会议，对彭德怀、黄克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斗争。会后，各军区、各军兵种根据总政治部的指示分别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一方面继续批判彭、黄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另一方面揭发批判本单位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半年时间的揭发批判，将许多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总称）表示异议的人和对彭、黄表示同情的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一批对“三面红旗”有所疑虑的人划为“中右分子”并作了处理。这次反“右倾”斗争伤害了许多好干部，破坏了中国共产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给部队的思想建设和正规教育训练造成了损害。

经过反右派、反“教条主义”、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潮在军内发展起来。这就使得军队政治工作不能很好地贯彻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定的正确方向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确路线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正确指导思想。

### 三、一九六一年军委扩大会议

一九五九年九月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打出了举红旗、反右倾的旗号，大讲政治挂帅，提倡个人崇拜。这些观点和主张受到邓小平、罗荣桓和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领导人不同程度的抵制。林彪为了排除他推行“左”的错误主张的阻力，提出了端正军队政治工作方向的问题。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四日至十月二十日的军委扩大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会上，林彪指责政治工作强调保证训练和各项技术业务工作的完成，重视抓部队的文化学习等等是“方向有些偏”，提出要坚持“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简称“四个第一”），并且说这是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四个第一”片面地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把政治工作抬高到不适当的位置，其实质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否定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根据林彪的意图，会议对谭政和总政治部其他一些领导人罗织罪名，进行批判，并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谭政中央军委委员和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改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在上述情况下作出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指导思想和一些主要观点上贯彻了“左”倾思想和林彪的错误主张。例如：把阶级斗争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把反“右倾”作为政治上的主要任务；把政治工作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使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发生了偏差。这个决议尽管也包含了一些正确的东西，例如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建军和政治工作的指针，强调学习毛泽东著作，要求继承“古田会议决议”所建立起来的军队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基层建设，改进政治机关的工作方法等。但是由于《决议》的基调贯穿了“左”的指导思想，因此，影响了这些正确内容的贯彻落实。

### 四、“突出政治”的提出及其危害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彪在全军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十二月二十九日召见总政治部的领导时又提出：“现在出现了



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大多，军政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一九六五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其用意在于否定全军群众性练兵的成绩。林彪“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观点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和《解放军报》连续发表的七篇关于“突出政治”的社论的宣传以后，被当成军队各项工作的总方针和必须恪守的原则。

“突出政治”把全军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压了下去，停止了全军正在实施的普及中、高等文化教育的十年计划，大砍大减军事训练时间，从而打断了有计划地提高全军军事和文化水平的进程。在“突出政治”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军队院校事实上废止了“以教学为中心”的方针，全军事事实上废止了军事、政治、后勤、科研等方面许多所谓与“突出政治”相抵触的条令、条例、制度和规定。在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中大讲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使一些干部不敢抓军事，不敢抓技术，不敢抓业务，不敢抓科学研究，否则就要彼扣上“脱离政治”、“白专道路”和“单纯业务观点”等等帽子，严重影响了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和技术、武器、装备的研究与改善。

为了从组织上保证“突出政治”的推行，林彪把是否“突出政治”作为考核、选拔、使用干部的主要标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由于对“突出政治”有不同意见，进行了抵制，被加上“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罪名。林彪还诬陷罗瑞卿“妄图夺取兵权”，对他进行批判，并被中央解除了在军队、党内和政府的全部职务。接着，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都批判斗争了一些所谓反对“突出政治”、与罗瑞卿有牵连的领导干部。随后又在全军以“突出政治”为标准，对各级干部进行了“排队”和审查，错误地批判和斗争了许多不积极拥护“突出政治”的干部和比武中涌现出来的“尖子”，使一大批好干部受到排斥和打击。

“突出政治”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辩证统一的观点，使许多人对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作用产生了误解，使政治工作在一段时间内走上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歧途。许多党委和政治机关把领导部队开展政治运动，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搞大批判当成部队建设的中心任务和主要工作。影响了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政治工作的威信也受到损害。

###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一九六六年五月——一九七六年十月）

在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左”倾严重错误的影响，军队的政治工作遭受了严重挫折，其作用与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害。但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军队政治工作也作了许多正确的指示，如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加强军队的组织纪律性，抓好部队的训练等等。还由于不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众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仍在军队的重要领导岗位上，他们对保持军队的正确方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军队政治工作有几十年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各级政治机关和广大政治干部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靠群众，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保证了部队的基本稳定，保证了军队所担负的许多艰巨任务的完成。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对军队政治工作的严重破坏

### 一、开展“文化大革命”成为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一九六六年二月，江青、林彪相勾结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制定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经毛泽东修改和批示发至全国。这个《纪要》提出：全国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它还特别强调：军队“要积极参加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彻底清除这条黑线对部队的影响”。依据《纪要》精神，总政治部于四月八日召开全军文艺创作会议，会议断言“部队文艺工作者十几年来受黑线的影响很普遍，涉及的面很广”，“在军队内部，也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代表人物”。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号召全军“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提出：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的反动立场，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五·一六通知》的公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总政治部很快将宣传贯彻《五·一六通知》，开展“文化大革命”作为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向全军作了布置。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军队的院校、文艺团体和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省军区的领导机关从一九六六年九月开始展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即“四大”）。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根据林彪的意见，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由党委领导的规定和其他所谓“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这些单位的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即刻陷于瘫痪，党员不能过组织生活，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秩序遭到破坏，群众组织纷纷出现，解放军的许多高级领导机关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呈现出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确定军以下部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不搞“四大”，这是从部队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考虑所作出的正确决策，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在教育中采取了一学习、二讨论、三批判、四表态的方式，迫使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反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正确性”，把拥护不拥护“文化大革命”提到是否“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毛主席”的高度来认识，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统一部队的思想和行动。

### 二、全面推行“突出政治”的方针

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就把“突出政治”提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突出政治”成了军队建设的“百年大计”、“政治工作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成了检验各项工作的主要标准。

一九六六年二月，中共中央批示同意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文件提出，“突出政治”就是“抓阶级斗争”。这个文件在部队大力宣传贯彻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待一切”

成为政治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开展“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兴无灭资”、“斗私批修”成为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发展党员、选拔干部、评比先进都以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为主要标准；遇事都用“大批判”开路；处处查阶级根源，找阶级烙印，对人搞无限上纲和急风暴雨式的批判斗争。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对部队军政教育时间的比例作了调整，规定政治教育时间占部队工作对问的50%，并规定军事训练、生产劳动等如果和政治工作发生了矛盾，就要给政治工作让路。这就从制度和时间上使林彪“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方针获得保证，从而使政治工作严重脱离军事、技术、业务，脱离现代化建设的总任务。

“突出政治”在干部工作上的表现是，对拥护“突出政治”的就提拔重用，有怀疑和抵触的就批判、罢免，以人划线，以派划线，大搞唯成份论，破坏了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使一大批好干部受到打击和迫害。

林彪借“突出政治”一方面大肆宣扬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制造个人迷信，另一方面又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把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性活动引向实用主义的邪路，严重破坏了军队思想理论建设。在政治工作中提倡“紧跟”、“照办”、“不过夜”、“不走样”等形式主义的做法，破坏了实事求是、讲究实效的优良作风，助长了做表面文章，说大话、假话、空话等不正之风。

### 三、政治工作机关受到严重冲击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总政治部即很难正常履行职责。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公然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企图把军队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搞垮。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军委办事组的政工组取代了总政治部。次年十月，又对总政治部实行了“军事管制”。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总政治部是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管理全军党的工作和组织全军进行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在全军以至全国享有很高的威信。总政治部被“砸烂”，严重损害了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政治工作的威信。总政治部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多是从全军选拔出来的优秀干部，被诬蔑为“一筐烂梨”。大批干部遭到迫害，大量重要文件、资料被销毁散失，给军队政治工作建设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与此同时，全军凡开展“四大”单位的政治机关都普遍受到冲击，许多大单位的政治部被扣上“阎王分殿”的帽子不能正常进行工作；在未开展“四大”的部队，政治机关的工作也遭到损害。

#### 四、担负“三支两军”任务

“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与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使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灾难和混乱。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三月十九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这是在全国严重混乱的情况下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艰巨任务，目的是保证“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制止不断发生的武斗，恢复和保持社会的稳定，保证工农业生产的进行。

在“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奉命先后派出 280 多万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把保证完成这项任务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全军师以上机关设立了“三支两军”指挥部（或办公室）。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在极其困难复杂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对于缓和紧张局面，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一些老干部，减少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三支两军”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的非常措施，不可避免地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支配，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的东西，比如派性和其他一些“左”的东西。

## 第二节 两次转机和挫折

一九七一年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军队政治工作曾出现过两次转机。但是，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又两次遭受挫折。

### 一、批林整风转向批“极右”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军队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在运动前期，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思潮、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正确指示，做了许多有益于纠正“左”的思想，发扬优良传统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在批林整风中深入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揭露了他是一个野心家和阴谋家。同时，有重点地清查了参与林彪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人和事。对与林彪反革命阴谋活动有牵连，犯有严重错误的人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并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作了严肃慎重的处理。

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总政治部下发了《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全国人民的指示的通知》，全军开展了学全国人民的运动。各部队一方面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另一方面认真检查部队在执行政策纪律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措施，改善了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

批判了林彪破坏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罪行，扭转了多年不读马列著作的状况，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新高潮，并且使学雷锋活动又逐渐在全军恢复起来。

对林彪在干部政策上大搞任人唯亲、以“我”划线和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的罪行进行了深入批判，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恢复了一批遭受打击迫害的领导干部的职务。为培养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全军恢复和增建了41所军事院校。

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加强了对军队的管理教育，逐步恢复和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了基层建设，使部队组织纪律性得到加强，官兵关系得到改善，各种事故明显下降，部队的战斗力有所增强。

经过一段批林整风，部队的思想作风建设有了加强，其他各项工作也有了起色。但是，江青等人却竭力阻挠对林彪“左”倾错误的批判，加之当时毛泽东也认为林彪是“修正主义”、是“极右”，这就把批林彪的极左变成了批“极右”，使清除政治工作中“左”的影响的工作不能很好进行。一九七四年，江青等人又选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派人到部队煽风点火，将批林与批孔（孔孟之道）联系起来，并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矛头指向坚持正确主张的周恩来、时剑英、邓小平等人。这样就不仅未能把林彪的罪行与错误批深批透，反而使一些领导干部重新受到批判，使刚刚趋向稳定的局面又遭破坏。

### 二、整顿军队与“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并在八日至十日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常委，十八日被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代理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二十五日，他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指出：“从一九五九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军队臃肿不堪。”因此，“军队要整顿”，“优良传统要恢复”。“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他还强调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调动群众积极性。同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顿军队、纠正不正之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安排超编干部，加强军事训练，恢复和发扬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等问题。邓小平作了《军队整顿的任务》的讲话，叶剑英作了会议总结。七月十九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邓小平和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所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实质上是对林彪所推行的“突出政治”等一套“左”的东西的否定。根据这次会议精神，部队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积极行动，为贯彻落实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做了许多工作。

着手整顿了各级领导班子。整顿中，撤换了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严重错误的干部，批评了某些领导班子中的“软、懒、散”现象，平反了一部分干部的冤假错案。在此基础上重新配备和调整了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班子。与此同时，为解决军队规模庞大、机构臃肿问题，开始了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安排超编干部的工作。

进行了关于安定团结的教育。教育中，批判了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现象，严肃整顿了部队军容风纪。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各部队广泛开展了“学红军，忆传统”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全军讲大局、讲党性、讲纪律的自觉性。

继续清除“突出政治”的影响，开展群众性的练兵活动，使战备训练出现了新的局面。

但是，邓小平、叶剑英等一系列正确主张和整顿军队的各种措施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强烈反对。他们多次向重病中的毛泽东作歪曲情况的汇报，攻击邓小平搞“右倾翻案”。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以后，在全党全军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九七六年四月，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使军委扩大会议决定的各项工作和军队整顿的重大措施未能得到贯彻落实。

### 第三节 政治工作在逆境中发挥作用

十年动乱使军队政治工作遭受严重的挫折。虽然如此，政治工作在逆境中仍然发挥了许多积极作用。

#### 一、保持部队稳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部队的正常工作秩序受到干扰和破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保持部队的基本稳定，中央军委于一九六七年二、三月间连续颁发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关于高等军事学院等四单位参加支左、支农、支工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把军队开展“四大”的范围由军以上机关缩小到军区机关以上，将可以夺权的范围限制于部分院校、文艺团体，规定军事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的战斗组织，决定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等三所高等指挥学院和军事科学院暂停“四大”。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又作出各级军区机关不搞“四大”的决定。这些规定和决定有利于部队的稳定和团结，受到广大干部战士的拥护，通过宣传、贯彻和思想政治工作，使军队领导机关和部队的工作秩序有了不同程度的好转。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一伙掀起“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军乱军的浪潮，使军队几乎所有领导机关和许多部队驻地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部队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针对这种情况，军队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和全体干部积极宣传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和中央军委关于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的命令，并向冲击部队的群众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广大干部战士严守纪律，坚守岗位，保卫了军事领导机关和部队驻地的安

#### 二、保证作战和海边防斗争的胜利

十年动乱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政治机关和广大政治干部始终不忘军队担负着保卫祖国的神圣使命，在组织部队进行战备教育中，坚持把提高广大干部战士的警惕性，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光荣传统，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作为重要内容。各部队在国内局势混乱的情况下仍然做到常备不懈。在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全国最乱的时候，美国空军和台湾国民党空军飞机不断到大陆侦察袭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执行“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的命令，先后击落侵犯大陆领空的各种飞机17架。一九六九年三月，苏联边防部队入侵珍宝岛，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民兵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奋起自卫还击，打退了苏联军队的挑衅，捍卫了国家的尊严。一九七四年一月，南越当局武装侵占中国西沙永乐群岛的甘泉、金银、珊瑚岛，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在远离大陆、情况突然的不利条件下，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收复被占岛屿。这次作战规模不大，然而却是一次以海战为主的陆、海、空军和渔民、民兵参加的协同作战。参战人员英勇顽强，团结战斗，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军民密切协同，互相支援；严格执行对敌斗争政策，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因而取得了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事实



表明，由于政治工作的有力保证，人民解放军始终保持着优良的战斗作风。

### 三、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援越抗美、援老抗美

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五年，在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政府应越南政府的请求从物资和人力上给了越南人民以真诚、巨大、有效的援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扫雷等部队 32 万多人到越南北方担负支援任务。各援越部队教育干部、战士，发扬国际主义和吃大苦耐大劳、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把支援越南人民作为自己光荣和神圣的职责，作为为祖国争光、为解放军争光的实际行动。干部、战士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英勇奋斗，胜利完成了各项任务。担负筑路施工任务的部队在敌机不断空袭和酷热多雨，洪水成灾的情况下，提出“为了越南人民不受难，千难万难顶得住，千苦万苦耐得住。”先后共新建铁路 117 公里，改建铁路 362 公里，建桥梁 30 座、隧道 14 条，新建和改建公路线 1206 公里，建公路桥 305 座，保障了作战运输的需要。防空作战部队，发动全体干部、战士的积极性，采取机动伏击的灵活战术，作战 2153 次，击落美机 1707 架、击伤 1608 架，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侵略者。海军扫雷部队，航程 1.75 万海里，清扫了 201 平方公里海域，以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排除敌人布下的水雷，为打破美军的海上封锁作出了贡献。在援越抗美斗争中，有 1000 多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在此期间，部队组织了 25 支文化工作队，随援越部队行动，活跃艰苦环境中的文娱生活，深入基层进行创作、演出、辅导和参加战勤工作。援越部队十分重视中越人民的友谊。各级政治机关经常教育部队，以团结抗美的利益为重，尊重越南的党和政府，尊重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爱护越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从而赢得了越南人民的爱戴。

在老挝人民进行抗美战争期间，根据老挝人民的要求和中老双方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提供了军事技术援助。这方面的援助从一九六二年就已开始，先后有防空、工程、地面警卫、后勤等部队共 11 万多人，开赴老挝修筑公路和进行防空作战。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渗透在这十多万人的队伍中，保证了援老抗美的胜利。至一九七八年五月，在复杂的热带山丘丛林地克服了千难万险，修筑了 800 多公里高标准公路。在修筑孟北公路时，悬崖峭壁高 20 米，战士们悬空打眼放炮，有的在狭窄的导洞中，跪着打眼，爬着运渣，空气闷热，多次晕倒，仍不肯离开战斗岗位。防空部队共击落美国飞机 35 架、击伤 24 架，有效地保证了筑路部队和民工的安全。援老部队的干部战士认真执行领导机关的有关规定，虚心向老挝人民学习，热情为老挝人民做好事。他们利用施工和作战间隙，为老挝盖小学 32 所，修便桥 130 座、便道 30 公里，挖水井 100 口，修水渠 5.1 万米，治病 26 万余人次。708 大队 3 连副指导员杨金堂，在当地村庄遭洪水袭击时，带领战士奋力抢救群众，不幸被洪水吞没牺牲，被老挝政府授予一级英雄勋章。解放军对老挝的无私支援，受到老挝人民革命党和老挝政府的高度评价，称作是“在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援助”。

### 四、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建军宗旨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采取种种手段对军队又打又拉，企图把军队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然而他们的罪恶阴谋始终未能得逞。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多次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军队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尽管受到“左”的影响，但始终坚持了军队中党的集体领导原则，重视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坚持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部队，使广大干部战士把参加和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自觉地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全军涌现和宣扬了刘英俊、盛习友、李显文、胡业桃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卫生科”等一大批英模人物和先进集体。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参加国家工业、交通方面的建设事业。军队还派出大批人员到农村助民劳动，支援春耕秋收，并派出大批医疗队上山下乡，深入农村和边远贫困地区为群众送医、送药。在抢险救灾中，军队更是哪里艰险就出现在哪里。广大指战员用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历史证明，在社会大动乱、国家严重困难的考验面前，人民解放军不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政治工作不愧是人民军队的传家宝。

---

刘英俊，解放军某部重炮连战士，1966年3月为保护群众安全，勇拦惊马，光荣牺牲。

盛习友，解放军某部排长，1967年7月在山东省章丘县水灾中，为抢救落水群众献身，中央军委授予他“爱民模范”称号。

李显文，解放军总后勤部驻四川某汽车团副教导员，1967年8月在执行任务中牺牲，是军委命名的“川藏运输线上十英雄”之一。

胡业桃，海军航空兵某部导航连战士，在战备施工中为抢救战友而牺牲，1970年11月中央军委授予他“模范共青团员”称号。

#### 第四章 拨乱反正、改革创新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一九七六年十月—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军队政治工作和全国各条战线一样进入了拨乱反正、改革创新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邓小平在规划整个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同时，规划了军队建设的新蓝图，提出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建设目标。主要有，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把军队建设的立足点由过去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军队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忠实可靠的人手中；军队建设要以现代化为中心；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位置；军队要整顿，克服“肿、散、骄、奢、惰”，搞好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原则；坚持人民战争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建设强大的后备力量；进一步搞好军政、军民关系，军队不仅要成为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还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这些思想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平时时期人民解放军建设的行动指南。在这些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军队政治工作围绕着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于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保证军队在政治上永远合格，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取得了许多新的成绩和经验。

## 第一节 拨乱反正

### 一、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人民解放军依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以一年多时间进行了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活动，对他们篡党夺权、反军乱军、祸国殃民的罪行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为进一步清除其流毒和影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军委副主席时剑英在会上提出，全军要紧密联系部队实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把部队建设好。根据这次会议的要求，全军开展了“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和讨论。即：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应该不应该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应该不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应该不应该按照接班人“五项条件”搞好老中青三结合；应该不应该强调军队要稳定；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应该不应该坚持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应该不应该搞好战备，准备打仗。通过讨论，全军指战员重温了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在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上清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思想影响，保证了军队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高度集中统一，保持了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

### 二、开展学习先进典型活动

为了清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流毒，恢复和发扬军队的优良传统，总政治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一九七七年全军政治工作安排意见》中提出，在全军广泛开展学习雷锋、学习“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十二月，中央军委通报表扬空军航空兵1师领导班子，号召全军各级领导班子向该师领导班子学习。从此，全军开展了个人学雷锋，基层单位学“硬骨头六连”，领导班子学航空兵1师的活动。《解放军报》陆续发表社论、评论、专题报道，介绍这三个典型的事迹和经验。各部队以师或团为单位召开动员大会，反复宣传恢复和发扬军队优良传统的重大意义；开展革命竞赛，进行评比检查，表彰学习活动中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一九七九年八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学习雷锋、硬骨头六连、空军航空兵一师活动的通知》，要求改进学习方法，注重实际效果，不搞群众运动，围绕教育训练这一中心学习三个典型的基本经验，解决部队建设中的问题。

在开展学习先进典型的活动中，全军涌现出张华、朱伯儒、华山抢险战斗集体等一大批先进个人和集体，对于推动部队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 三、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

---

张华，第四军医大学学员，1982年7月，为抢救落入粪池的农民而牺牲，中央军委授予他“富于理想，勇于献身、新时代的优秀大学生”荣誉称号。

朱伯儒，解放军空军某部干部，1983年7月军委命名为“学习雷锋的光荣标兵”。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六日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结束十年动乱后的第一次军队政治工作会议，是一次在邓小平主持和指导下拨乱反正的重要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人民解放军战斗力的问题。会议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清算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破坏军队政治工作的罪行，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方向、任务和方法。会议讨论和修改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经中共中央于七月十八日批准，即发至全军贯彻执行。

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在会上作了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的战斗力》的报告。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到会讲话。叶剑英着重说明了政治工作永远是人民解放军的生命线。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精辟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通过的《决议》，从军队建设包括政治工作受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严重破坏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作了具体规定，强调要提倡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反对无政府主义；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作风；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和发扬三大民主等，对军队政治工作建设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

这次会议特别是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拨乱反正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只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会议通过的《决议》仍然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一些不正确的提法。

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军队政治工作在拨乱反正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十分严重，全党对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缺乏全面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特别是由于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坚持“左”的错误，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简称“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使军队建设的许多领域清除“左”的影响的工作受到了束缚，政治工作的拨乱反正受到了限制。

## 第二节 学习和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开始全面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军队从根本上进行了拨乱反正，政治工作端正了方向，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扬。

### 一、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总政治部曾先后两次下达指示，要求全军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调整国民经济、农村经济政策、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等五个问题进行深入学习。这次学习以干部为重点，各大单位普遍举办了领导干部学习班。通过学习，多数人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恶果，认识到搞“两个凡是”的不良影响，认识到党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全国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军队也参加了这一讨论，但搞得不够深入。一九七九年七月，邓小平在对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全军从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开始普遍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各部队认真组织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观，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使干部战士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消除了唯心主义的影响，端正了思想路线，加深了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为开创军队建设的新局面打下了扎实的思想基础。

### 二、平反冤假错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一大批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为从组织上全面、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创造了条件。根据全会精神，总政治部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三日发出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的通知。部队各级党委、政治机关以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对一九五七年错划的右派予以改正；对一九五九年错定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平反；对一些历史积案作了复查审理，全部错了的全部平反，部分错了的部分平反，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妥善做好青后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对于克服“左”的影响，医治“文化大革命”的创伤，促进安定团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 三、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社会上出现了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九七九年三月，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明确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为使全军干部战士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一九八一年一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确定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作为政治工作的一项根本任务，并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首先学好。四月二十三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通知》。从这年五月到年底，全军团以下部队普遍系统地进行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干部战士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增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觉性。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政治部在政治学院举办了全军高级干部读书班，专门进行了学习。全军上下通过对决议的深入学习，着重解决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伟大作用的评价问题，对新中国建立三十二年来成就、错误及其历史经验的认识问题，以及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等重大是非问题，统一了认识，增强了团结。

#### 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一九六九年以后，中共中央多次指出，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九八一年二月，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部队的特点，提出把“四有、三讲、两不怕”（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作为军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本内容。一九八二年一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提出，在全军开展以“四有、三讲、两不怕”为基本内容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连队和先进个人的群众性活动。

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全军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组织全体人员认真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和《邓小平文选》，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反腐败教育，结合各种活动培养文明新风，使精神文明建设渗透到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

### 第三节 加强教育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大搞“突出政治”，使部队正常的军事训练受到严重破坏。加强教育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是军队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

#### 一、深入宣传教育训练的战略意义

一九七五年七月，为了改变教育训练的落后状况，邓小平提出，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这一重要方针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邓小平于一九七七年八月再次提出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同年十二月，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作出《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要求全军下大力气把教丙训练工作搞上去。

为保证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总目标的实现和军委训练方针的贯彻落实，部队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干部战士认识到搞好教育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是军队担负的保卫祖国的任务所决定的，是适应现代战争特点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的迫切需要，是关系军队建设、国家安危的大事，纠正那种认为和平时期教育训练可有可无的错误认识。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明确要求，政治工作要像战争年代保证完成战斗任务一样贯穿到教育训练中去。根据这一要求，各级政治机关都把保证军事训练任务的完成作为经常性的重要任务，由领导干部具体组织实施。要求政治干部认真学军事、懂军事，同时发动各级军事指挥员、教练员一边抓训练一边做思想政治工作，以增强政治工作的及时性和针对性。一九八一年九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地区举行了一次现代条件下大规模的诸军、兵种协同战役演习，同时进行了战时政治工作的研究和演练。这次演习取得了圆满成功，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保证作用，经受了实际的锻炼。

#### 二、恢复和建设军队院校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建设和调整，到一九六八年末，解放军共建立了 125 所各级各类院校，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军队院校体系。“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的干扰破坏，一九六九年二月，军委办事组批准《军队院校调整方案》，82 所院校被撤销，仅保留 43 所，院校体系搞得残缺不全，严重影响了军队干部的教育训练。一九七七年八月，邓小平提出要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的培养与训练问题，原有的学校除个别的以外都要恢复起来。随后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总政治部和各大单位政治部迅速选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充实院校或组建新的院校，抓紧落实有关建校、收生、教学等问题。经过几年努力，全军院校又恢复到 100 多所，建立了初级、中级、高级指挥院校的三级训练体制，完善了中等和高等两类专业技术学院。各院校党委、政治机关认真贯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教学为中心，

---

邓小平：《军队整顿的任务》，《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7 月第 1 版，第 21 页。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院校教育与部队建设相结合的原则，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 三、保证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

七十年代后期，越南当局推行反华排华政策，制造边界纠纷，挑起中越边境武装冲突，给中国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起进行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作战部队政治机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动员，使干部战士明确认识自卫还击作战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在作战过程中搞好战场宣传鼓动工作，开展立功运动，使部队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为改善边境防御态势，从一九八一年起，中国边防部队又在扣林山、法卡山、老山、者阴山等地进行了拔除越军侵略据点的作战。面对越军凭借有利地形构筑的大量工事和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边防将士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气概，英勇顽强，前赴后继，达到了预定的作战目的。转入坚守防御作战阶段后，在各边防部队中反复进行人民军队宗旨和光荣传统的教育，开展军民共建精神文明、共建共守祖国边疆的活动，保证了边防的巩固和边境的安全。

## 第四节 贯彻中共十二大精神，加强政治工作建设

一九八二年九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计划。大会要求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使军队不仅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而且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军队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认真宣传贯彻这次大会精神，根据面临的形势任务和部队的实际情况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 一、全面整党加强党的建设

按照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关于全面整党的决定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全军整党工作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五年春分两期进行。在整党中坚持了中共中央规定的正确方针，结合部队的实际情况，摸索创造了不少好的经验。一是认真学习文件，全面地系统地理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对整党的认识。二是普遍进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教育，消除“三支两军”的消极后果，增强军队内部和军政军民团结。三是摒弃过去政治运动中“左”的一套做法，总结和运用了以发扬民主、自我教育、提高思想认识为主的一些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新方法、新经验。四是边整边改，着重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强调领导干部带头学习，搞好对照检查，带头纠正不正之风。五是清理了“三种人”和其他有严重问题的人，清理中严格执行政策，慎重进行组织处理。整党结束时，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由上而下派出工作组进行了检查验收。从整体上看，军队的整党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也有教训，有些单位对不正之风纠正不够有力，使作风的整顿出现了前紧后松的现象。

### 二、按照干部“四化”方针建设干部队伍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全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调整和健全了领导班子，提高了干部队伍素质，改善了干部队伍结构。大力培训干部，建立了指挥干部三级（排、团、军）培训体制，优先培训作战部队主官和战斗骨干，同时抓好干部的在职培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通过完善和落实政策，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抓紧建立和健全干部工作制度，进行了干部管理制度的改革，以适应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需要。

### 三、提高科学文化素质，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央军委和各总部要求把科学文化教育作为教育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各部队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开展中高等教育，同时积极开展国防科普教育，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科学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为了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各级领导

---

“三种人”：指“文比大革命”期间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

机关还十分重视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队地方两用人才。总政治部先后几次宣传推广了几个典型单位的经验。许多部队注意采用多种方法培养人才，并使这项工作逐步走上经常化和制度化。开展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活动，使部队成了培养人才的大学校，增强了吸引力，密切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改善了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军政训练和各项工作。

#### 四、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十年动乱使军民关系遭到损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恢复和发扬军民一致的光荣传统，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从一九八一年开始，一些部队在搞好自身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与营区周围的村庄、街道、学校等单位挂钩，开展了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军地双方互相学习，互相支援，着重促进双方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这一活动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肯定和重视。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到全国各地。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促进了军政军民团结和社会风气、治安状况的好转，也为军队提供了向社会和群众学习的大课堂，促进了军队自身建设和各项任务的完成。

## 第五节 保证实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军队建设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思想，即军队工作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充分利用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相对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军队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军政素质，增强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这是军队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政治工作有力地保证了这一战略性转变在全军的贯彻落实。

### 一、进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教育

为了使指战员认清形势，了解全局，把思想统一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上来，全军进行了形势任务的教育、服从大局的教育和人民军队宗旨的教育。经过这些教育，全军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认识到，战争的危险并未完全消除，但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世界大战是可能的；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重要力量，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断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全军上下更有计划地加强了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更自觉担负起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光荣任务。这一教育为精简整编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 二、保证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顺利进行

一九七五年七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就决定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解决部队臃肿的问题，并决定精简总兵力的26.2%。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这次精简整编没有完成就停了下来。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央军委再次决定完成一九七五年规定的精简整编任务。一九八五年五月至六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在两年中再减少军队员额100万人。会议讨论了《军队改革体制精简整编方案》，研究了贯彻落实的政策和措施。这次精简整编撤销大军区4个，减少军级单位31个、师和团级单位4054个，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全军机构、编制这样大的变动，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为保证精简整编的顺利进行，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积极行动起来。一是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使干部战士明确认识，中央军委的决策是依据对国际战略格局的正确分析。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和军队建设的要求出发制定的，革命军人必须在大局下行动，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整体利益，严格遵守纪律，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二是提倡顾大局、讲团结，保证搞好单位的合并，使合并的单位在人员、思想、感情上融合成新的战斗集体。三是搞好干部的进出调整，本着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原则，配备各级领导班子，调整干部队伍，妥善安排编余干部。四是教育各级领导干部要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在精简整编中以身作则、模范带头，防止和纠正不正之风。五是做好稳定干部思想的工作，扎扎实实地抓好基层，不因整编而放松对部队的管理和教育训练。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到一九八七年底，

全军精简整编、减少员额 100 万的任务顺利完成。

### 三、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至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之后所要解决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和国防建设问题，其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将这一《决定》转发全党。

《决定》从军队在新时期为实现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三大任务所承担的历史责任的高度，进一步阐述了新时期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主要任务、方针政策和基本方法，提出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保证军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军队内部和军政军民团结，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动员和团结全体官兵把解放军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决定》概括了军队政治工作丰富的历史经验和优良的光荣传统，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政治工作改革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政治工作改革应坚持“尊重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方针。《决定》就如何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开展政治工作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内容：（1）加强以思想、纪律为重点的思想教育；（2）健全和发展部队的民主生活；（3）培育部队的优良作风；（4）注重科学文化教育，培养军地两用人才；（5）加强军事训练、科学研究和后勤保障中的政治工作；（6）大力开展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7）做好基层政治工作；（8）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还特别强调了各级党委要建设成为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坚强核心。

《决定》是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好章程，受到了全军干部战士特别是广大政治干部的欢迎。它对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高战斗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 四、召开第二次全军英雄模范代表会议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在北京召开了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代表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军性的群英盛会。来自全军各条战线的 400 名英雄模范代表出席了会议，特邀武装警察部队、民兵、转业退伍军人和拥军优属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代表 100 人列席了会议。邓小平、李先念、彭真、徐向前、聂荣臻等领导人为大会题词或写信勉励。杨尚昆代表中央军委讲话，余秋里作了《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的报告。杨得志致开幕词，张爱萍致闭幕词，洪学智宣读了三总部给英雄模范代表颁发荣誉证书、证书的决定。这次会议对新时期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

---

三大任务是：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规范化建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 五、集中力量大抓基层政治建设

一九八三年七月的中央军委座谈会提出了大抓基层的要求。八月和九月，总政治部分别在北京和济南两地召开有部分军区领导干部参加的基层建设座谈会。会后，全军各级领导机关积极行动起来，领导干部带领大批机关干部深入部队作调查，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基层建设的特点和经验。通过抓基层，发现了一批先进典型，解决了一些难题，同时推动了领导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

一九八七年五月五日至十五日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基层政治工作会议。各大军区、各军兵种所属的40多个典型单位在会上介绍了经验。会议研究了基层建设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讨论通过了指导基层建设的4个文件：《新时期连队党支部建设纲要》、《士兵政治教育大纲》、《新时期基层团支部建设要点》、《连队军人委员会工作暂行规定》。会议要求各级领导机关一定要充分认识加强基层建设的重要意义，切实把主要精力转到基层建设上来。会议明确规定了新时期连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即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四项基本原则，保持连队建设的正确方向；要坚持高标准，着眼于提高战斗力；要扎扎实实打基础，全面加强连队建设；要加强连队党的建设，提高基层干部的素质；要结合新情况，继承和发扬连队建设的优良传统。

各部队认真传达贯彻了基层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并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基层，使连队建设得到明显加强。

## 六、加强新时期政治工作研究

政治工作的研究工作，是对政治工作进行的调查研究、经验总结和理论探讨。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创立起，政治工作研究就引起了应有的重视。毛泽东曾经指出：“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颁发的大量关于政治工作的法规性文件，就是战争年代政治工作研究成果的集中反映。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成为落实政治工作各项任务的重要手段，成为各级政治工作机关和政治工作干部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军委对做好新形势下的军队政治工作研究十分重视，多次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一九八六年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要形成学习和探讨的空气，开展政治工作研究，增强工作的预见性，为部队建设和政治工作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依据。要加强对政治工作研究的组织领导，推广优秀的研究成果。”全军各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充实和加强研究机构，大军区和军兵种级以上单位的政治工作研究室得到加强，军以下单位的政治工作研究则责成专门部门负责，全军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专职人员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研究队伍，造成了研究新情况、探讨新问题的浓厚空气，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七年全军发表政治工作研究方面的论文和经验

---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54页。

800 余篇，出版专著十余部，同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达到一个新水平。八十年代以来，除各部队经常召开政治工作研讨会外，全军性的政治工作研讨会每年都要召开一至两次，研究和解决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遇到的新问题。一九八七年一月和八月，全军系统先后在成都和上海两次召开军队政治工作理论研讨会，来自全军各大单位、各院校的近二百名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和政治工作干部，集中探讨了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军队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问题，提出了一些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理论，使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和理论体系进一步得到深化和完善。随着政治工作研究的进展，全军各院校的政治工作教学也逐步实现了系统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 七、学习贯彻中共“十三大”精神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政治报告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和面临的主要矛盾，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定了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大会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中共“十三大”闭幕后，各部队根据总政治部的通知，认真学习、领会“十三大”精神。各大单位普遍举办了团以上干部和宣传理论干部轮训班，上万名团以上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进行宣讲和辅导，同时还采取参观访问、搞社会调查、请地方有关部门作报告等方法，使干部战士更多地了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通过持续深入地学习，广大干部战士进一步领会了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认清了国家发展前进的方向和道路，体会到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全军上下统一了认识，自觉地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紧紧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全面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为完成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而努力奋斗。

## 第二编 作战、训练和完成其他重大任务中的政治工作

### 第五章 肃清大陆残敌和防御国民党军进犯作战中的政治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国民党军尚有 140 余万人控制着华南、西南地区的一些省份和沿海一部分岛屿。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关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和朱德关于“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的命令，开展了大规模追歼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和剿灭上匪的斗争，陆续解放了华南、西南等地区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以外的沿海岛屿，胜利地完成了进军新疆、西藏的任务，同时团结改造了 177 万起义、投诚与接受和平改编的国民党军队。此后，把防御国民党军队的进犯，保卫大陆的安宁作为长期的任务，在完成这些任务中，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威力。



## 第一节 在追歼残敌作战中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起，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国民党军队的整个防御体系土崩瓦解。各路野战军立即向西北、西南、华南、东南地区进军，追歼逃敌。至九月末，第1野战军在华北野战军配合下，解放了西安、宝鸡，兰州、西宁、银川等城市及西北大片地区；第2野战军和第3野战军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南昌、福州等城市及东南大片地区；第4野战军解放了武汉、宜昌、沙市、岳阳、常德等城市及湖北、湖南大片地区。国民党在大陆的主力部队只剩下华南和西南的白崇禧，胡宗南两个集团及闽南地区汤恩伯的几个兵团。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鼓舞人民解放军数百万将士在广阔的战线上奋勇作战，乘胜追击。

在胜利的形势下部分干部战士开始滋生松懈轻敌思想。有的人对迅速向华南、西南进军的意义认识不足，以为几个残兵败将慢慢收拾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把部队搞得太累；有的人消极保命思想抬头，觉得好不容易从枪林弹雨中闯了过来，快要胜利了，可别在小战斗中牺牲或致残。针对这些问题，各野战军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报告和《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联系实际，深入进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使全体将士深刻认识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命令的战略意义，牢固树立不怕流血吃苦，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信念。第2野战军政治部发出《关于进军西南政治工作指示》，要求通过思想教育引导指战员“从政治上认识进军西南对于人民革命战争全局发展的重要意义，利用思想动员和进军中的不断的政治教育，来提高全体人员的政治觉悟，克服存在的保守、怕困难、不愿再进军的思想。第4野战军政治部在《继续进军最后消灭蒋白军的政治工作指示》中，要求部队“集中力量解决干部思想问题”，“首先要使所有干部充分懂得战争与军队对革命的重大意义，树立终身为部队服务的观念，热爱军队，全心贯注于战争”。各兵团政治机关也颁发了进军的政治命令、政治工作指示、进军誓词、口号等，号召全体指战员再接再厉，无敌无畏，誓死将革命进行到底，在进军中再立新功。深入的动员教育，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认识，增强了执行中央军委命令消灭残敌的决心。第4野战军的干部战士提出了“消灭白崇禧，胜利进广西，向新中国献礼”的口号。第2野战军的干部战士表示：“这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一定要参加到底。”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部队，尽管其顽固分子还在做着建部重庆割据西南的美梦，但多数已成惊弓之鸟。为彻底消灭国民党军，不让其跑掉，中央军委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总体作战部署是，第4野战军及第2野战军的第4兵团，在林彪、罗荣桓、邓子恢指挥下，越过逃敌，直取广州，继而迂回包围白崇禧部，聚歼该敌于广西境内，尔后西出昆明，经营云南；第2野战军主力，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待第4野战军解放广州，在广西作战期间，从东南面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退往云南

---

毛泽东：《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逃敌》，《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342页。

的道路；第1野战军一部和华北野战军第18兵团，在贺龙指挥下，先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第2野战军断敌退路后，迅速南下，由北面直扑成都外围，会同第2野战军聚歼胡宗南集团于四川盆地。中央军委要求各部队前进时完全不理敌人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或者迫其起义或投诚。

为圆满实现中央军委的作战部署，长距离快速行军就成了这次战略行动的主要特点。许多部队常常远距离昼夜奔袭，一次战役行程即达800至1500公里，一日行程五六十公里，有时多达上百公里，休息的时间很少。加之绝大部分北方籍干部战士初到江南，气候环境不适应，病员较多；进军路上多是深山丛林，人烟稀少，部队又是远离后方的大兵团作战，补给线不断延长，供应困难，在偏僻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又有向导难寻和语言障碍等，进军的困难是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部队排除困难，走得快走得好，按时到达目的地，就成为政治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各部队不间断地进行思想动员，使广大指战员充分认识走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树立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同时发动干部战士出主意，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协同司令机关和军事干部严密细致地做好行军的组织工作，派政治干部参加团以上部队的设营组织和收容组织，加强设营人员和收容人员的思想工作。各连队根据人员思想、体质情况，按照强弱均衡、自愿结合的原则，编成行军互助组，把思想互助与体力互助结合起来。设营人员除勘察地形、划分宿营地外，还负责筹措给养，帮助炊事人员预先烧好水，做好饭，引导部队进入宿营地，以争取部队有较多的休息时间。各部队注意做好行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设宣传站、鼓动棚，宣传胜利消息和好人好事：开展行军互助比赛和文娱活动，使战士们喜气洋洋地走，有说有笑地走。共产党员、骨干分子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仅自己带头走好，还带领大家走好。做好后勤保障人员的思想工作，把武器、弹药，给养、服装、医药、蚊帐等及时发到连队，为部队战胜困难提供物质保证。

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使各部队正确领会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保持了高昂的斗志和无坚不摧的锐气，以神速的动作完成了包围歼敌任务。第4野战军的第45军135师，在一九四九年九、十月衡（阳）宝（庆）战役的一次追击中，快速行进三十六小时、100多公里，在金兰（今金兰寺）、洪乐庙附近国民党军的空隙中突过衡宝公路，出其不意地插入国民党军队几个军的侧后，使白崇禧集团大为惊恐。白崇禧集中5个师的兵力，企图围歼135师。135师在东西50公里的国民党军阵地内实施突击，激战五天五夜，打得国民党军晕头转向，为衡宝战役迅速取胜创造了条件。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比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取广州后，国民党驻广东部队除一部向粤桂边逃窜外，其主力向阳春、阳江方向撤退，企图经雷州半岛逃往海南岛。为追歼逃敌，第4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跟踪猛追，经七昼夜急行军，于十月二十四日，将敌第21兵团部及4个军包围于平岗圩、白沙圩地区，经激烈战斗，于二十六日将敌4万余人全部歼灭。第2野战军13军37师，从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二年二月，曾连续征战四十八昼夜，从桂西打到滇南，且战且进1000公里。部队穿越桂西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翻过滇南的高山峻岭。碰到

激流，撑着竹竿、拉着绳索，手拉手地通过；遇到瘴气，嘴里含着大蒜，用毛巾捂着鼻子前进；脚上磨起了血泡，挑破后继续走；有人晕倒，战友们扶着、背着，一同前进。在艰苦疲劳的行军中，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干部下到连队，同战士们一起徒步行军，一起在山巅露宿，河滩野营。配备给营以上干部的马匹，几乎全部用来驮病号、背包和粮袋。被称为爱兵模范的红军团团团长顾永武，全身有50多处伤疤，走路一跛一跛的，可他的马整天给有病的战士骑。在夜以继日的行军作战中，干部战士常常吃不上饭，只能吃生米。指战员只有一个心思：“战胜饥饿、疲劳，拼命追击，决不让敌人得到喘息的机会！”在川陕交界地带担负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任务的第1野战军一部和第18兵团，在第2野战军进至川东、川南切断敌人退路时，从秦岭猛扑下来，紧咬着撤退的胡宗南集团穷追猛打。其时适逢大雪纷飞，战士们的棉衣上都结了一层冰，但情绪仍十分高涨，到处唱着“要捉胡宗南，不怕蜀道难”，“快快追，快快赶，不怕足肿不怕寒，赶到成都捉战犯”，由于解放军追得快，使胡宗南集团尾部8万余人未能跑到成都，即被歼灭在川北地区。接着，第1野战军和第18兵团又急速前进，占领了绵阳及其东西一线，配合第2野战军主力，把胡宗南集团和川境其他残敌数十万人全部围歼在成都地区。进军华南、西南，是几个大战略区部队的共同行动，重大战役均有若干兵团、几个或十几个军共同作战。根据作战需要，在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常常调整部队的指挥隶属关系。不仅有成建制的师、团指挥隶属关系的临时变动，而且有成建制的兵团、军指挥隶属关系的临时变动。原属华北野战军建制的第18兵团，在向西北进军时，配属第1野战军指挥，在向西南进军中，又改归第2野战军指挥。原属第4野战军的第50军、第47军和第42军一部也曾一度划归第2野战军指挥。第2野战军的第4兵团，也曾一度由第4野战军指挥。在远程奔袭作战中，各部队的行动路线，时而平行，时而交叉，常常形成两个部队同走一条路，同宿一个村的情况。各野战军之间、各部队之间的协同行动增多了。此外还有中共华南分局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与野战军的配合。每当与兄弟部队接触或配合作战行动，各野战军、各兵团、各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都预先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准备工作，号召指战员学习兄弟部队的光荣历史、优良作风和先进经验，为兄弟部队的行军、宿营、作战提供物质条件，创造种种方便，在整个进军过程中，只要两支不同建制的兄弟部队相遇，就会出现团结互助的动人场面。行军中互相让路：宿营时互相让房；驻地毗邻互相参观、慰问，座谈联欢；友军路过烧水送茶，欢迎欢送；战场杀敌争先恐后，奋勇当先；胜利战果你推我让，功归对方。第2野战军主力部队向西南的大进军，是分别从华东地区的芜湖、上饶、吉安等地出发的，途经华南地区。为了支援第2野战军西进，中共中央华中局（后改称中南局）和第4野战军成立了支援第2野战军西进委员会，并在党政军民各系统中，进行了团结友爱教育，号召部队“宁可自己受些困难，必须尽先保证2野需要”。沿途各级政府也成立了相应机构，筹措给养，组织动员群众给2野部队烧水、腾房，筹集了大批猪肉、毛巾、纸烟等物资慰问2野过境部队，使2野部队深受鼓舞和教育。第2野战军胜利地完成了向西南大进军的任务之后，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人代表2野全体指战员，向华北、华中、华东、西北等中央局以及第1、3、4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发出了《感谢支援电》。

向华南、西南的大进军，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成都解放基本结

束。华南、西南大陆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全部解放；白崇禧、胡宗南两个集团及残留在华南、西南的国民党其他武装力量，除起义、投诚者外，大部被歼。短短几个月，取得如此光辉的胜利，除决策英明外，坚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对保证士气高涨，指挥顺畅，内外关系协调，起了重要作用。

## 第二节 群策群力剿灭土匪

国民党政府在其全面崩溃、节节败退之际，在大陆有计划地留置了大批军事人员和武装特务。这些军事人员和武装特务，搜罗散兵游勇，纠集反动会道门、地主恶霸、地痞流氓，组织反动武装，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对新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造成严重威胁。一九五〇年初，全国还有国民党军残部和土匪武装人员 105 万多人。其中西南地区为 65.5 万多人，中南地区为 28.8 万多人，华东、西北地区分别为 5.9 万多人和 4.2 万多人。他们以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恢复“中华民国”为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暴乱颠覆活动。占据浙、闽沿海岛屿的海匪，一九五〇年一年，在华东沿海登陆达 309 次，煽动反革命暴乱 770 余起，抢粮 500 余万公斤，杀害革命干部 1000 余人。西南诸省在解放之初，有些边境县城仍在土匪控制下，他们公开发行纸币，开设工厂，架设电台与台湾直接联系。西北 5 省股匪所到之处，不仅烧杀破坏，而且煽动民族武装冲突。从中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起，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先后抽调了 41 个军部 140 个师大约 150 万人执行剿匪任务。各剿匪部队在地方党政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援下，采取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政策，放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剿匪斗争。经过重点清剿、分区清剿和肃清残匪等阶段，至一九五三年底基本上肃清了匪患。在剿匪斗争中，各部队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政策，积极做好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把清剿上匪与执行工作队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对土匪大力开展政治攻势，有力地保证了剿匪斗争的胜利。

### 一、激发部队参加剿匪的政治热忱

由于武装斗争在全国取得决定性胜利，剿匪作战初期，部队中存在着轻敌麻痹思想，对剿匪肃特斗争的重要性、复杂性、尖锐性缺乏认识，有的滋长了畏难怕苦和担心野战军地方化的情绪，认为“几百万国民党军队都消灭了，一点点土匪不值得用野战军去打”：“野战军东走西走，还有希望回北方，把‘野’字一丢，就甭想回家乡了”。为了纠正这些不正确的思想认识，各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中南军区和西南军区在分别召开的研究剿匪工作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突出强调了剿匪的重要性，坚定了剿匪决心。尔后，各省军区、军以至师团，相继认真传达贯彻了高干会议精神。各部队根据中央和上级指示精神，加强思想领导，运用党代表会、士兵代表会、英模代表会、剿匪立功誓师大会和访苦诉苦等方法，深入进行思想发动，加深指战员对人民群众的阶级同情与对土匪的仇恨，使大家把剿匪作战同全国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胜利联系起来，同人民政权的巩固与发展联系起来，明确地认识到：不消灭土匪，人民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人民的政权就不能巩固，土地改革就不能进行，恢复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便无从谈起。这些做法有效地激发了部队剿匪作战的积极性。

在剿匪过程中，各部队注意不间断地进行思想动员，做好现场鼓动工作，激励干部战士在围歼股匪的艰苦斗争中，发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土匪出没不定、行动狡猾，剿匪部队往往一而再、再而三扑空。广大指战员本着“十网打鱼九网空，一网打中就成功”

的精神，穷追猛打，连续作战，不给土匪以喘息的机会。在艰险的剿匪斗争中，各部队涌现了许多英雄单位和英雄人物。西南军区第16军140团副班长、共产党员肖国宝，在生擒贵州省境内最大匪首“贵州人民反共自救军总司令”曹绍华的战斗中，率领全班冲入匪群，展开肉搏。当他发现上匪一挺机枪正疯狂地用火力掩护群匪突围时，为了减少部队伤亡，便毫不犹豫地冲向敌视枪火力点，用身体压住了敌人的枪眼，英勇捐躯，保证了战斗的胜利。中南军区第45军400团在围攻上匪盘踞的盘古村时，由于敌人依托碉堡顽抗，部队伤亡较大。副班长徐汉林接受了爆破任务，当他突过鹿苔时雷管被碰掉，他用手握住手榴弹引爆了炸药包，炸毁了碉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部队顺利地冲进村内，将一个团的敌人全部歼灭。战后，中共第45军委员会追认徐汉林为模范共产党员，追记特等功。盘古村人民为纪念这位英雄战士，将村名改为“汉林村”。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头门山剿匪海战中，人民海军击沉匪船一艘，击伤3艘，毙敌30余人，伤敌20余人。这次海战，温台巡防大队415艇正在修理不能出航，该艇弹药手王维福主动要求随414艇参加战斗。战斗中，一块弹片击中了王维福的左手食指，鲜血直流。这时，一艘匪艇向414艇逼近，王维福急忙端起冲锋枪猛扫过去，不料，他的下颚和左肩又连中两块弹片，右手腕也负了伤。他不顾多处负伤，继续向敌人射击。十月十七日，华东军区海军授予王维福战斗英雄称号。

## 二、开民政治攻势

剿匪斗争一般都经过三大阶段，集中优势兵力军事进剿股匪，分区驻剿残匪，结合农村民主改革运动清剿潜散匪特。各部队在清剿中坚决执行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研究匪特活动规律，利用匪特内部的矛盾，在军事压力之下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攻势，这对瓦解土匪武装、清除匪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政治攻势的开展，土匪投降自新的人数比例迅速提高。西南军区一九五一年二月份共歼匪31749人，其中投降自新者307人，仅占1%；三月份共歼匪48636人，其中投降自新者8888人，占18.27%；四月份共歼匪95218人，其中投降自新者39453人，上升到41.4%；五月份共歼匪114403人，其中投降自新者61613人，进一步上升为53.8%。

各部队在开展政治攻势中，大力宣传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国内外形势和解放军剿匪的决心和政策。重视利用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攻势，做到人人开口，个个宣传，标语上山，传单入洞，家家访问，村村开会，打破土匪“等待国际事变”、“反攻复国”的幻想；同时公布人民政府的政策，明确宣布“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指出“缴枪投降予以宽大处理”，“继续抵抗则坚决消灭”两条道路。盘踞在广西北部四十八寨山区的一股上匪，就是在解放军严厉的军事打击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下被肃清的。四十八寨纵横百余里，山高林密，遍布溶洞。一股匪特利用这里的地理条件，成立“桂中军政区”和“反共救国军”，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一九五一年三月，解放军第52军215师等部对四十八寨实行严密封锁，分进合击，勇猛围歼，在二十多天奔袭中，先后击毙匪首多人。与此同时，剿匪部队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大力争取被裹胁上山的居民回家，使残匪陷于孤立，失去生活来源，内部矛盾加深，惊恐动摇情绪蔓延，很快土崩瓦解。至四月初，这股土匪被干净彻底歼灭。

在剿匪作战初期，有些部队未能很好地执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或者过于宽大，对俘匪不加甄别、不经教育即行释放，结果有的匪徒屡次被擒释放，不思悔改，仍然为非作恶，引起群众不满；或者盲目强调镇压，发展为乱打乱杀，结果使想缴枪投降的匪众也畏而怯步，不敢投降了。为了纠正这两种偏向，保证正确执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各部队加强对干部战士进行政策教育，同时研究制定了若干具体规定。如第4野战军政治部规定，（1）对于土匪亲属一律不捕不扣，采取争取感化的方针，动员他们规劝其子弟、丈夫投降，匪徒的私产一律不动，个别罪大恶极人人痛恨的匪首的财产，等到匪患肃清后由地方政府另行处理。（2）对于自首或投降的土匪，一律不捆不押，经短期教育后，立悔过自新保证书，取保释放，对其中的匪首、惯匪、敌特等集中训练，待土匪剿灭后分别处理。（3）对战斗中被俘的土匪或零星捕获的土匪，一律禁止打骂侮辱，更不允许擅自枪杀，但须加以扣押，暂不释放；胁从分子及为匪时间不久且罪恶不大者，经审查清楚后，允予悔过取保释放，由政府与群众予以监督；惯匪或敌特分子，集中看押，进行劳动改造，直至当地匪患肃清，秩序安定，群众业已发动为止；罪大恶极为群众所痛恨者应公审，经过一定法律程序，公开枪决，以取得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他剿匪部队也都作出了类似的具体规定，纠正了过宽或过严的偏向，正确地贯彻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剿匪初期，为打开争取匪众投降的门路，对投降的土匪，一般实行以宽大为主的政策；在清匪反霸阶段，则按“首恶必办”的政策依法处决在押首犯，以鼓舞群情，震慑残匪。广西龙州分区处决了几个匪首后，人心大快，各地降匪增多，半个月即争取投诚土匪50余名。

在开展政治攻势中，还积极做好开明士绅、保甲长、匪众的亲属及已投诚土匪的工作，通过他们去争取匪众。有些地区吸收上述人物组成规劝委员会，由他们出面设立自首登记处，开展对匪众的争取工作，效果很好。第45军通过一匪营长家属做工作，使该营长率全体部下投降。广西龙州军分区利用开明士绅写劝降信，二十天内有匪副司令以下130人投诚。

在西北地区，匪特利用当地少数民族多，民族矛盾尖锐这一特殊情况，不断挑起民族纠纷，制造武装骚动和叛乱。剿匪部队依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坚决执行“军政兼施，分别对待”的方针，把匪特问题与民族问题区别开来！把土匪与群众区别开来；把首恶分子与胁从分子区别开来，镇压匪特，保护群众，惩办匪首，宽大胁从分子，团结争取少数民族群众和一切可能中立的社会力量。如第4军11师32团在甘肃临夏处理60余名土匪时，除匪首马福龙、黄有才等长期关押外，大部分予以释放，少数民族群众称赞“解放军有服力”。

### 三、发动群众，根绝匪患

剿匪之初，股匪在军事打击下，多由集中转为分散，由公开转为隐蔽，利用封建势力和反动会道门，进行欺骗宣传，造谣惑众。许多群众担心惯匪卷土重来，不敢和部队配合，有些部队进剿时由于信息不灵往往扑空，成效不大。针对这种情况，各剿匪部队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再向指战员说明剿匪与发动人民群众的关系，使大家认清剿匪不是单纯的军事任务，而是非常艰巨的政治任务，只有深入群众，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使群

众为自己的解放，同军队一起对土匪进行斗争，部队才能消息灵通，使土匪失去藏身之处。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各部队普遍实行“工作队化”，即除了组织所有参加剿匪的连队做好宣传工作以外，还专门抽调干部战士组织工作队，深入群众开展工作。中南军区抽调了3万余名干部战士组成工作队，投入地方工作。西南军区部队，除以一部准备进军西藏外，均分散到各地区，分区包干，担负接管城市、开辟农村和剿灭土匪等任务。西北地区的剿匪部队抽调干部及优秀战士集中训练，学习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城市政策，调查民族风俗和匪情，研究工作步骤和方法，尔后再组成工作组或武工队派在各地，有匪剿匪，无匪则做群众工作。

新解放地区的人民群众，由于长期受反动政府、反动军队及土匪的欺凌压榨，加之反动势力的造谣欺骗和威胁恫吓，在刚与人民解放军接触时，大部疑虑重重。为解除群众的疑虑，各部队严格执行有关政策，自觉遵守群众纪律，用实际行动感化群众。到达新的剿匪地区，未经人民群众允许，宁可露营野外，也不擅住民房；宁可忍饥挨饿，也不动用老百姓的粮食；群众躲避离家了，主动帮助守护财产，喂养牲畜，打扫院落。一旦群众敢于接近时，立即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解释工作，向群众表明部队剿匪决心，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实际问题，同时揭露土匪的罪行，启发群众的觉悟，使群众对部队由怀疑到相信，克服畏匪情绪，勇敢地投入剿匪斗争。中南军区第46军411团进到湘西南武冈县第2、第3区时，正值当地发生严重虫灾。他们立即帮助群众捕捉蝗虫，连续捉了四天，蝗虫扑灭了，发动群众剿匪的局面也打开了。西南军区第13军113团进入云南省丘北、广南、砚山三县交界地区剿匪时，正逢青黄不接季节，又因遭受土匪劫掠，绝大多数群众断粮断炊靠上山挖野菜充饥。该团除号召部队节约用粮救济群众外，还通过地方政府，动员有存粮的地主捐出互助粮，解决了群众的燃眉之急。当地苗族、壮族和彝族群众感激地说：“解放军救了我们的命！”“活了一辈子，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群众很快发动起来，主动向部队提供匪情，做土匪家属的工作，使土匪无藏身之地。

各部队在剿匪斗争中还注意发现和培养群众骨干，做好建立群众组织和乡村基层政权的工作，为根绝匪患打下组织基础。西南军区剿匪部队普遍举办了农民培训班，召开农民代表会议或农民大会，开展诉苦运动，建立和健全各级农协组织，纯洁和加强农协的领导骨干，逐步建立起“剿匪自卫队”，负责维持农村治安，管制投降自新匪特，肃清小股土匪，对深入开展清匪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南军区第45军第397、398团，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进入广西横县水淳以南地区剿匪时，在12个乡中帮助建立农会370个，发展会员2230人。在18个乡中，组织民兵6200余人。这两个团在农会和民兵组织的有力配合下，在短短二十天中，就剿灭土匪6170人，捕捉大小匪首923人，缴获长短枪1.6万余支。

广大群众提高了觉悟并组织起来，积极投入了反匪斗争。他们从向部队报告匪情，充当向导，到帮助部队运送弹药和其他物资，从防匪自卫到劝匪投降，从随军作战到独立歼匪，无不踊跃参加，勇往直前。当人民解放军对上匪发动重点进剿时，人民群众赶着马车，推着小车，挑着担子，背着背篓，把粮食、弹药运送到前线。当人民解放军对土匪实施包围合击时，不论白天黑夜，路途远近，部队打到哪里，广大群众和民兵就把支前工作做到哪里，有力地配合了部队的剿匪行动。仅据广西军区统计，在广西剿匪作战中，民



兵参战就达 6400 余次，配合部队歼匪 81293 人。广西博白县交新村民兵赵雄武，曾先后配合部队剿匪作战 16 次，其中有两次负伤不下火线，共毙俘土匪 20 余名。一九五 年二月，在进剿下街村土匪时，他随部队冲锋 4 次，在敌人密集火力下，冒着弹雨陆续将 9 名伤员抢救下来，还为部队运送弹药，把上匪的碉堡炸毁，使部队顺利冲入村内，将土匪全歼。在剿匪中赵雄武荣立大功两次，被广西军区授予民兵英雄称号。

### 第三节 在渡海作战中

为了全国的彻底解放，人民解放军在大陆大部解放之后乘胜前进，先后进行了解放海南岛、万山群岛、舟山群岛、一江山岛等规模较大的渡海作战，陆续解放了除台、澎、金、马以外的沿海岛屿，警惕地守卫着海防，保卫了大陆人民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据不完全统计，自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五年七月，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沿海岛屿和保卫海防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队（含登陆的武装特务）357198人，击落击伤飞机246架，击沉击伤舰艇56艘，缴获舰艇364艘。

在解放沿海岛屿的作战中，解放海南岛和一江山岛是具有代表性的两种作战方式。前者为陆军单一军种实施的规模最大的渡海登陆战；后者则是诸军、兵种合同的登陆战。作战方式不同，政治工作也各具特点。

#### 一、群策群力征服海洋，解放海南岛

海南岛战役是一九五一年三月五日开始进行的。当时盘踞海南岛的国民党军队有10万余人，军舰约50艘，飞机42架。他们依仗“海陆空立体防御”，企图凭海据险，长期固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之前，在海南岛已有琼崖纵队，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3个总队共10个团，约2万人。这支队伍经过以往长期奋战，创建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和沿海游击活动区，是支援渡海登陆作战的坚强力量。人民解放军第40军和第43军，配属两个炮兵团及工程兵一部，在既无海军、空军配合，又无现代舰艇，更无海上作战经验的情况下，完全以民用木船渡海，在琼崖纵队的接应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贯彻分批偷渡与主力强攻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即首先以小部队分批偷渡，加强岛上力量，为大规模强渡作有力策应；尔后以主力在琼崖纵队及先期登陆部队接应下强行登陆。至五月一日，经过6批次渡海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所谓“固若金汤”的“立体防御”，解放了海南岛，歼灭国民党军5个师9个团，共33148人；缴获火炮418门、飞机4架、坦克和装甲车7辆、汽车140辆；击落飞机2架，击沉军舰1艘、击伤5艘。这次渡海作战政治工作的特点是：（一）教育部队树立敢于渡海作战的决心和信心。参加海南岛战役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绝大多数没有见过大海。他们虽然对解放海南岛的重要性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但是对于乘木船渡海作战普遍存有疑虑。主要是怕敌海空封锁，怕晕船、翻船，怕船小海宽渡不过去。海上练兵刚开始时，一个连队登上船，80%的人头晕呕吐，出海归来，每个人都像害了一场大病，脸色苍白，吃不下饭，有的连队出海后，遇到风暴，船被打得桅断帆破。有的战士说：“这次可真的革命到底（指海底）了。”针对这种状况，在两个月的作战准备阶段，各部队按照先干部后战士、先党员后群众的顺序，进行了普遍深入的思想教育和细致的思想工作。

首先是集中时间专门进行思想教育。第43军先以团为单位集中干部轮训，尔后再对全体干部战士普遍进行教育。第40军用两周时间分级召开各种会议，进行了广泛的思想发动。各部队在动员教育中认真分析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进行光荣传统和战役意义教育，及时向干部战士传达第128师382团4连在海练中用木帆船打退敌军舰及两个先遣营偷渡奇袭成功的消息和经验，有力地鼓舞了士气。

其次是发动大家学习海洋知识，了解海洋，增强渡海的信心。干部战士们有的登门请教有经验的老渔民、老船工；有的邀请老渔民、老船工给部队讲授海洋常识，表演驾船技术，介绍航海经验；有的买来旧书摊上的《航海手册》和《潮汐表》研究参考。军、师领导机关和团、营指挥所都移到海边，搭起草棚，指战员一起学习，一起下海，摸索和掌握航海规律。

三是加强海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各级政治干部深入到船上去开展政治工作，军、师宣传队也深入连队配合教育，组织晚会，不少连队布置了船上俱乐部，在船与船之间开展革命竞赛。在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推动下，广大干部战士苦练渡海作战的技术与战术，滩头上到处有人打秋千，走浪桥；到处有人练摇橹，学掌帆。为了克服晕船呕吐，许多连队自动加大训练强度，取得了满意效果。步兵第375团3营8连，第一次海练时，115人中头晕呕吐者72人，到了第八次海练就只有3人了。各部队还开办了船工水手训练班、机帆船舵手训练班。步兵、炮兵、通信兵认真摸索各种情况下的战术技术动作。有的部队总结了“先岸后海”、“先昼后夜”、“先近后远”、“先单船后多船联合”的海练经验。经过三十多月艰苦训练，那些原来认为“旱老虎下海，有威风使不出来”的人，感到有了办法，增强了必胜信心。

四是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军事民主，群策群力解决渡海作战的战术、技术、器材等问题。各级领导干部发动大家想办法，发挥集体智慧，共同突破困难。第40军开展了“出主意，想办法”

的活动。许多部队用汽车上的发动机把木船改造成机帆船和能使用迫击炮，九二步兵炮的上炮艇，创造了“4组1船”、“6组1船”、“8组1船”等不同的战斗组织，解决了“航海队形”、“海上联络”、“各种情况之处置”等问题。

经过上述工作，广大参战人员打消了思想顾虑，战斗情绪空前高涨，普遍要求参加渡海作战，要求先渡早渡，担任第一梯队。渡海作战具备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把政治工作做到每一条船上。三月五日，组织部队进行第一批偷渡。第一个渡海先遣营乘13只木帆船起渡时，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0军军长韩先楚亲临起渡场为部队壮行，把一面绣着“渡海先锋营”的红旗授给渡海勇士，大家受到了极大鼓舞。以后各批次渡海作战部队，针对渡海船只规格不同、性能各异、航速不等，在海上航行战斗队形很难保持，指挥联络存在较大困难等情况，以船为单位设立党支部或分支部，使政治工作深入到每一条船，有力地发挥了政治工作在渡海作战中的保证作用。步兵第359团9连政治指导员王广文率领的单船，渡海中遇上了国民党军的炮艇，双方展开激战，王广文负了伤仍背靠桅杆指挥战斗，鼓励全体人员“沉着应战，拼死求生，和敌人拼到底”。他牺牲后，全船喊出了“为指导员报仇”的口号，斗志更加昂扬。轻机枪手负了伤，副班长、共产党员周全生接上去打，边打边喊：“我是共产党员，不怕牺牲，誓死不放下机枪！”周全生牺牲了，左肩已经负伤的8班长、共产党员董文浦接过机枪继续射击。后来董文浦右肩也负了伤，不能抵肩射击，就用肚子顶住机枪打，并鼓动大家“为指导员报仇，在战斗中立功！”党员们的模范行动带动了全船指战员。战士董树柏腰部负伤仍坚持战斗，还喊着：“靠近敌艇，坚决打！”7班副班长魏新增负伤后坚持摇橹，第二次负伤后站不住，就坐在船上摇橹，直到牺牲。由于大家英勇顽强，终于打退了敌人的炮艇。

在异常激烈的渡海作战中，每一只船必须全船人员协调一致，才能取得最快的航行速度，最佳的射击效果，发挥最大的战斗力。各渡海作战部队在动员教育中普遍提出“同舟共济，团结一心，同生死共患难”，“沉着冷静，分工合作，坚守岗位”，“有一个人就发挥一个人的作用”等口号。步兵第356团2连连长率领的1只由机帆船改装的上炮艇，在中途与敌艇“海硕”号展开炮战，船上干部大部负伤，他带伤指挥战斗，并不断鼓励水手船工“把船开好，消灭敌人”，带动了其他伤员和全船船工水手坚持战斗，直到战斗结束无一人离开自己的岗位。有1位60多岁的老船工左臂负了伤，仍然紧握舵把岿然不动，战士们扶他下舱休息，他谢绝说：“你们负伤还坚持战斗，我穿上军装不也是解放军吗！”经一小时激战，终于将敌艇击伤。土炮艇虽然严重损坏，但在全船人员共同努力下仍胜利抵岸。

抢占滩头阵地是渡海登陆作战最激烈的时刻，也是政治鼓动工作最关键的时刻。部队接近滩头阵地，整个船队就进入了敌稠密的火力网，每只船上都喊出了“坚决前进，绝不后退”，“看谁是第一名登陆英雄”的口号，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冲向敌人阵地。当船只离岸还有五六十米时，战士们就跳下齐胸深的海水，向陆地冲去。第356团9连11班班长刘玉，在下船前负了伤，还鼓励人家：“实现我们决心的时候到了，要坚决打到底，争取立功！”4班丁炳林头部负伤，血流满面，仍然继续往前冲，摔倒在地还大声喊着：“同志们，冲啊！”鼓舞着后续部队向敌前沿阵地冲去。

（三）团结船工如兄弟，使他们成为共同完成作战任务的战友。在渡海作战中，凡是征集的民间船只，领航和操纵船只的大都是船工水手。因此，做好船工水手的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他们在渡海作战中的作用，是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作战准备阶段，担任渡海作战任务的师以上部队的领导机关，都成立了船只船工征集管理委员会，负责征集船只、动员教育渔民船工等工作。船只只是渔民的重要财产和生产工具，渔民视船只如生命。因此，做好征集和管理爱护船只的工作，本身也是对渔民船工的思想发动工作。

海南岛战役共征集各种民船2219只，雇请船工3400余名。经地方政府与渔民协商，确定了船租和船工待遇暂行办法。船租折合大米，3桅大船每只每天7.5公斤，2桅中船6公斤，1桅小船4.5公斤。船工伙食每人每天1.25公斤米，菜金2角（以银元计，下同）。船工工资按技术分为3等，甲等每人每日1元，乙等8角，丙等6角。对船工、船只的善后工作也作了妥善规定。船工牺牲者，同部队烈士一样抚恤；负伤者，按规定发给治疗费，介绍入后方医院治疗，与部队伤员同样待遇。船只损坏，照价赔偿。要求部队像爱护武器一样爱护船只。这些政策措施得到了广大渔民船工的赞同和支持。

各部队向全体指战员进行了团结船工的教育，提出了“为船工服务就是为战争服务”，“爱护船只如武器，团结船工如兄弟”的口号，并广泛开展了与船工交朋友的活动。每只船都组织了团结船工小组。战士们除每天帮助船工担水、刷船外，还用自己的津贴买烟送给船工，把得奖的毛巾赠给船工。船工生了病，热情照顾，细心治疗。大多数连队还集体购买慰问品、捐献衣物送给船工。有的还在慰问品上写上：“送上衣服两三套，表示慰问和慰劳，船工军队一家人，同船过海把仇报！”老船工黎七，从13岁当水手，四十多年的海上生涯，终年不得温饱。家中仅有的1间破草屋和两只小舢舨，又被

国民党军的飞机炸毁。团结船工小组的人员发动战士们捐出钱、物，帮助这位船工渡过困难，使广大船工深受感动。他们说：“解放军真是穷人的队伍，只有穷人的队伍才爱穷人。我们要团结一条心，坚决打到海南岛，穷人大翻身。”

在战斗中，许多船工在敌火力下沉着掌舵，开得稳，走得快。有的船工腿被打断，就卧着掌舵；臂被打断，就指点别人掌舵。有1名船工胸骨被弹片削断，还一手捂着胸部，一手坚持掌舵，直到船只抵岸后壮烈牺牲。

## 二、保证“三军”协同作战，解放一江山岛

解放一江山岛战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具有一定程度的现代化作战特点。

一江山岛位于浙江沿海东部、台州列岛岛链的中心，扼守南来北往的海上通道，是国民党军上、下大陈岛防卫区的前哨阵地，也是国民党军护卫台湾、袭扰大陆的重要据点。据守一江山岛的国民党军队约1100人，他们背靠大陈岛，随时可能取得海空支援，依托本岛设防工事及有利地形，能够对解放军海、空力量和登陆部队进行有力的反击。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长期盘踞一江山岛的阴谋，保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央军委命令华东军区以第60师为主，组织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解放一江山岛。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这次战斗的有陆、海、空三军的十几个兵种，各种类型舰艇137艘，航空兵22个大队又1个中队，各种类型的飞机184架。由于是首次渡海联合作战，缺乏经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空军以及其他一些特种兵部队尚属初创阶段，武器装备有好有差，规格多样，性能不一；各军种、兵种之间对彼此武器装备的战斗性能、特点不甚了解，战术思想也不尽统一。因此，从组织上、思想上加强统一指挥和协同动作是取得这次战斗胜利的关键。

一九五四年八月，中央军委指示华东军区成立浙东前线指挥部，任命张爱萍（华东军区参谋长，解放一江山岛战前升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部下设空军、海军、登陆3个指挥所和政治、后勤两个工作组。随后，对攻取一江山岛进行了周密的侦察、计划和准备，在近似实战的地形条件下进行了由简到繁、由单一军种到诸军兵种联合的训练和演习。登陆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夺取战区制空、制海权，掩护三军进行战前训练；第二阶段为实施渡海登陆作战阶段。在浙东前指的统一组织指挥下，陆、海、空各参战部队，继承、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时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学习、吸取万山、海南、金门、东矾等渡海登陆作战的正反经验，深入进行战前训练、战斗动员、战斗发起、战斗实施等阶段的思想政治工作。各部队采取各种形式和方法，激发全体干部、战士、船工的参战热情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并针对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作战的特点，自始至终都把保证军兵种之间、军兵种内部的密切协同，树立高度的集中统一观念、战斗整体观念和坚强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严格地保守秘密、封锁消息等，作为取得战斗胜利的关键。

在战斗准备阶段，发扬军事民主，深入进行思想工作，树立胜利信心。在陆军部队中，解除“海军有没有把握送登陆部队登陆”，“船打翻了怎么办”，“会不会送错登陆点”等顾虑；在海军登陆艇部队中，解除“怕陆、空军配合不好，火力压不倒敌人”，“怕碰水雷”等顾虑。有的指挥员过分

强调本军种、兵种在战斗中的地位，要求以我为主，不适当地要求其他部队“配合”自己。针对这些问题，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在思想教育工作中，首先要求指战员牢固树立密切协同的整体观念，克服一切不利于协同作战的思想和行动，提出“坚决服从渡海作战最高指挥机关的统一指挥，严格地切实地执行协同作战计划”的共同要求，并根据各自部队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具体要求。陆军登陆突击部队强调树立“敢于独立积极歼敌”的思想，要求在战斗中发挥最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即使在暂时失去其他军、兵种支援的情况下，也要继续独立、顽强地完成作战任务。海、空军以及其他兵种，则强调树立为步兵服务的思想，提出“以步兵的需要为需要，以步兵的困难为困难，以步兵的胜利为胜利”的口号。空军同时提出了为海军服务的口号，要求参战空军积极支援海军战斗。

在深入进行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各参战部队认真细致地做好战斗准备工作。一江山岛海区冬季雾多风大，为了寻找一个适合渡海登陆作战的好天气，气象人员深入渔村反复调查，收集有关历史资料，并对一江山岛海区的气象情况进行长期观测，提供了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六日至十九日为“少云，风力4级”的准确气象预报，并表示愿立“军令状”作保证。前线指挥部考虑到渡海作战物资消耗量大，运输任务重，江、陆、海运输环节多，对三军后勤保障人员实行统一组织指挥，统一后勤保障计划，统一筹集使用舰船，把主要人力、物力集中用在保障登陆部队上，及时保障了部队供应。各参战部队还纷纷派代表互相访问，介绍本部队武器装备的战斗性能、特点；学习和宣扬兄弟部队的优良传统和英雄事迹，交换战斗决心书，相互预祝胜利。例如，登陆艇大队主动向步兵部队介绍登陆艇的战斗性能，共同研究登陆部队怎么乘船，到达滩头后怎么下船；空军部队主动到海军参观舰艇的特点和性能，增强空中识别能力；陆军部队到海军舰船上参观，听介绍，然后到战区观察登陆点的地形地貌。有的登陆部队感到少数舰艇火力弱，双方就一起探讨如何把陆炮架在船上增强火力。通过互访互学，各军兵种之间加强了了解和信任，为协同作战打下了基础。

攻占一江山岛本岛的战斗于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八时发起，由于各军、兵种指战员牢固地树立了合同作战的整体观念，彼此相互信任、相互支援、密切协同，一切为了战斗的胜利，涌现出许多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支援兄弟部队作战的生动事例。空军强击机大队为了支援登陆步兵的冲击，在完成预定的攻击任务之后，主动请求推迟返航时间，又实施两次俯冲攻击后才脱离战区，受到步兵的赞扬。登陆第一梯队营营长孙勇说：“当我们占领敌人前沿阵地时，空军在敌支撑点上轰炸扫射；我们占领支撑点后，炸弹又在敌制高点上爆炸，离我们只有几十米远，及时有力地支援了我们的战斗行动。”海军输送部队在“以满足登陆部队的要求作为完成任务的标志”，“一切战斗行动为登陆部队的胜利服务”的口号鼓舞下，克服船只、装备性能不一，驾驶人员新老不齐等困难，各船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前进，努力保持战斗队形，按时到达预定战斗海区 and 登陆地点。登陆艇大队第204艇，在前进中连中敌3枚火箭弹，部分水兵伤亡，其余人员仍英勇顽强地战斗，一面抢修机械、扑灭大火，一面坚持操纵登陆艇迅速前进，直至登陆成功。为了充分发挥舰炮效能，海军第6舰队和战舰大队分别进至距岛20至40链处开

始射击，有效地打击了岛上国民党守军。经过海军、空军和炮兵部队各种火力打击之后，一江山岛守军前沿突出部的工事大部被摧毁，火力被压制，通信联络中断，指挥瘫痪，为登陆部队顺利登陆突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经过十个小时激战，至十七时五十分夺取一江山岛，共击毙国民党军官兵 519 人，俘虏 567 人，击沉军舰 3 艘，击伤 4 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和巨大军事压力下，国民党军大陈防卫区的体系瓦解，其驻守其他岛屿的部队陆续撤往台湾。二月八日至二十六日，渡海登陆作战部队乘胜进占披山、上大陈、下大陈等浙江东南沿海岛屿，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重大胜利。

## 第四节 进军新疆和西藏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向新疆、西藏两个地区进军。由于新疆、西藏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恶劣，加之当时还残留着部分国民党反革命势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军中遇到了无数艰难险阻。各路进军部队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动员教育全体官兵战胜困难，坚决执行政策纪律，依靠少数民族群众，以一往无前的精神，胜利地完成了进军任务。

### 一、挺进新疆政治工作发挥威力

一九四九年九月下旬新疆和平解放前，驻守该地区的国民党军为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所部整编第42师、78师、骑兵第1师及骑兵第9旅等共7万多人。陕、甘、宁、青4省基本解放后，新疆守军处境更为孤立。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下，陶峙岳接受8项和平条件，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通电起义；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政府人员于二十六日也通电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为接管新疆，巩固国防，中央军委决定第1兵团部率第2军、第6军（欠第18师）进驻新疆。命第6军进军北疆之哈密、奇台、迪化（今乌鲁木齐）、伊宁等地区；第2军进军吐鲁番、焉耆、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区。从准备进军到进军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军队的政治工作都显示了强大的威力。

在进军准备阶段，各级加强了对部队的组织领导和思想工作。十月初，第1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到酒泉参加了有师以上干部参加的第1兵团党委扩大会议，部署进疆的准备工作。会上，兵团司令员王震作了关于新疆情况的报告；1野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就执行中共民族政策作了重要讲话。五日，陶峙岳、包尔汉赴酒泉，与彭德怀商讨人民解放军进疆及起义部队整编问题，并应邀为第1兵团党委扩大会议作了关于新疆情况的报告。彭德怀对进军新疆的部队提出了4项要求：（一）热爱新疆各族人民，搞好与新疆民族军的团结，坚决执行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团结各族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中。（二）对起义部队采取诚恳、热情的欢迎态度，帮助他们改造成为人民的军队。（三）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四）发扬解放军爱护人民，纪律严明的光荣传统。第1兵团党委向部队发出了“不怕一切牺牲，不怕一切困难，奋勇前进，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的战斗号召。各级党委都向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组织指战员学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将革命进行到底》，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介绍新疆各族人民盼望解放的迫切心情，开展了诉苦等阶级教育，提高了部队对进军新疆战略意义的认识，激发了革命斗志，掀起了表决心、挑应战的热潮，干部战士人人制订立功计划，个个献计献策，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加紧进行进军的组织和物资准备，争取尽快入疆。第1兵团为改造起义部队准备了政治干部和派往各地方工作的干部，用维吾尔、蒙古两种文字向新疆各界、各族人士分发的宣传品，兵团机关派第2军联络部长等有关人员先期赴迪化、焉耆、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策，为解放军进疆做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新疆民族军广泛



开展相应活动，积极、有力地接应解放军入疆。

一九四九年十月，进疆部队经过充分准备，以空运、车运和徒步方式同时向新疆进军。以战车第5团附1个加强步兵连组成的先遣支队，开进迪化担负接管市区任务；第2军分两个梯队，由480辆汽车轮番运送，直达南疆接管防务。第6军乘飞机和汽车开进北疆和东疆接管防务。徒步开进的部队于十月上旬先后从酒泉、张掖等地出发，西出玉门关，北穿星星峡，数路大军齐头并进，向新疆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从酒泉等地到新疆各防区相距1000多公里，途中戈壁荒原渺无人烟，风沙、严寒、干渴等等艰难险阻威胁着每一个远征者。新疆的气候恶劣多变，当时已经下雪，而部队的御寒装备很差，指战员们仍穿着单薄的征衣，有的甚至连一双好一点的鞋子都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工作充分发挥动员、号召、组织作用，教育全体指战员深刻认识这次进军的伟大意义，重视困难，藐视困难，开展革命大竞赛，以压倒一切的革命英雄气概向千里戈壁迈进。全体指战员发扬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吃苦耐劳、英勇顽强的光荣传统，抱着为新疆各族人民解除痛苦的急切心情，顶风雪，冒严寒，跋山涉水，日夜兼程。没有车辆运给养，就自己背上粮、柴、水；没有房子、帐篷，就在戈壁滩上露营。由于连续行军，许多干部战士的脚磨破了，腿走肿了，仍坚持长途跋涉。战士们豪迈地说：“不怕戈壁大，不怕天山高，我们一定要把胜利的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

在解放军奋勇西进的时候，隐藏在起义部队中的美蒋特务分子，策动驻防哈密、鄯善、吐鲁番、库车、轮台等地的部分部队骚乱，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残害人民。解放军闻讯后，立即昼夜兼程，飞奔出事地点，以迅速果敢的行动平息骚乱。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当第2军5师15团到达阿克苏时，和田地区正酝酿着一场反革命叛乱。为了争取时间，第15团奉命以急行军速度，横穿培克拉玛干千里大沙漠，赶赴和田。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是“进去出不来”的意思，历来被称为“死亡之海”。在行军前，团党委对部队进行了紧急动员，充分阐明这一军事行动的意义，号召部队发扬艰苦奋斗光荣传统，拿出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精神，战胜一切困难，以最快的速度进军和田。会后，全团指战员纷纷订计划，表决心，相互开展革命竞赛。战士们把决心书写在纸上，贴在枪炮上，挂在背包上，敲锣打鼓，把挑战、应战书送到兄弟连队的营地。全体指战员不畏艰险，身背全部武器装备，迎着刺骨寒风，一步一步顽强地向黄沙漫漫的戈壁瀚海进军。进入戈壁腹地，大风暴突然袭来，狂风卷着沙土，搅得天昏地暗，使人睁不开眼，站不稳脚，辨不清方向。战士们依靠指南针指引，手挽手地抗击着风暴继续前进。在干旱的沙漠深处，部队往往整天喝不到一口水，指战员们嘴唇干裂，病员一天天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各营连加强宣传鼓动工作，编印行军快报，开展谈心互助。有的在途中设立宣传鼓动站，进行化妆鼓动，有的在营地召开篝火晚会，指战员携手联欢；有的在行军途中编唱快板书：“同志们，快加油，要喝开水别发愁，我这没有前边有，咱们还是快点走。”生动活泼的政治工作有力地鼓舞了部队。干部战士们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从战友肩上抢下武器，搀扶着病员迈进，不使一人掉队。就这样，第15团以每天50多公里的速度，顽强地走了十五天，行程750多公里，胜利到达和田，迫使敌人放弃反革命叛乱计划。第15团得到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和第1野战军的通电嘉奖。

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各级党委、领导干部和政治干部不断对部队进行

政策纪律教育，经常进行群众纪律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广大指战员自觉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到一地，主动为群众挑水、打柴、治病、扫院子；宁愿露宿野外，也不擅自进群众的房子；炊具不够，宁可轮流做饭，也不任意借群众的炊具。有的战士把节约下来的津贴费送给生活困难的群众。在平息骚乱地区，部队派人救人安民，访贫问苦，扶困济危，帮助群众重建家园，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揭露反动分子的罪恶阴谋。这不仅保护了各族人民的利益，为他们撑了腰，同时也教育了起义部队的广大官兵。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各族人民打着羊皮鼓，弹起冬不拉，载歌载舞，夹道欢迎。许多群众不避风险，为解放军送情报，当向导，侦察敌情。伊犁地区人民得悉解放军奋勇西进的消息后，纷纷献粮献物，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就筹集几十万公斤粮食和大批物资。各族人民的信任和爱戴，使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无比感动，更加坚定了保卫和建设祖国边疆的决心。

进疆部队到达各地区以后。认真执行“工作队”、“宣传队”、“生产队”的光荣任务。他们先后抽调2万余名干部战士，组成各级工作团（队），深入农村、牧区，参加地方民主建政、减租反霸、牧区改革、镇压反革命等项运动，斗倒了恶霸地主、反动伯克（牧主），摧毁了封建统治的根基，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使各族人民从政治上得到了翻身，并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始终把建设社会主义新疆当作中心任务。进疆部队在酒泉集结时，即打造工具，收集种子，派先遣部队及技术人员到驻防地区调查研究，勘察测量，准备修渠开荒。部队进疆后，立即发扬南泥湾屯垦的光荣传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广大指战员一手拿枪，一手拿砍上耨（农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荆棘丛生的荒野碱滩上，挖开冰雪，安营扎寨，向塔里木、准噶尔盆地的千里荒原展开了新的进军。他们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兴办牧场、渔场和各类作坊，在天山南北开发了石河子和塔里木垦区。为了发展新疆的工业，广大指战员节衣缩食，自己动手，艰苦创业。兴建了钢铁厂、纺织厂、发电厂、农机厂、水泥厂、煤矿等企业。到一九五一年秋，初步改变了新疆经济困难的局面，许多厂矿先后投产，农业取得了好收成，军民生活大大改善，解放军受到了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

## 二、进军西藏“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

西藏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时，以大扎 摄政为首的西藏反动势力，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积极策划“西藏独立”，妄图使西藏脱离祖国，使西藏人民永远为他们所奴役。一九五一年，他们成立以大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应变机构，任命总管噶伦，积极扩军备战，并将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二约10个代本（团），部署于昌都一带，妄图凭借金沙江，阻止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

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中共西南局和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派出部队占领康定后，即筹划入藏事宜，决定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

---

大扎，亦译达扎或打扎，时为西藏地方摄政王。

噶伦，亦译噶隆或噶布伦，旧西藏地方政府大臣。

治委员谭冠三率领该军和第 14 军一部执行进军西藏的任务。中共西北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确定由第 1 军派骑兵支队从青海进军西藏，第 2 军组建独立骑兵师从新疆进军西藏阿里地区，配合第 18 军的行动。

第 18 军等部于一九五 年十月到达澜沧江畔的昌都，进行了昌都战役，藏军 10 个代本除部分起义、逃跑外，余被全歼，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粉碎了帝国主义和亲帝国主义分子妄图分裂中国的阴谋，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有力感召下，西藏当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张，派出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和平谈判代表团到北京，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二十三日举行了签字仪式。根据协议规定，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 18 军和西北军区组建的独立支队，于同年八、九月间，分路自西康甘孜、昌都和青海香日德、新疆于田等地出发，向西藏的拉萨、日喀则、阿里地区进军，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艰难跋涉，于同年十二月一日前陆续到达预定地区。为保证这次进军胜利，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 （一）教育部队吃大苦耐大劳，战胜艰难险阻。

西藏高原平均海拔 4000 米，有“世界屋脊”之称，是“山的世界，雪的海洋”，山山相连，重峦叠嶂，无数雪岭冰峰横亘在进军路上。按照藏族人民的说法，从昌都到拉萨共 24 个马站，分为穷 8 站，富 8 站，不穷不富又 8 站。穷 8 站地势高寒，人烟稀少，光秃秃的石山，草不生，树不长。天晴时阳光灼热，强烈的紫外线晒得人脸上脱皮，唇上起泡；天阴时狂风顿起，雨雪冰雹夹杂，飞沙走石齐下。再加上语言不通，风俗不同，民族隔阂较深，进藏部队军需给养必须靠内地供应，靠部队携带。这一切给进藏部队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进军一开始，中共中央军委就指示进藏部队，要准备吃大苦、耐大劳。中央军委副主席朱德向进藏部队提出：“进军西藏，巩固国防，是光荣而伟大的任务”，“要发扬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怕困难，不怕险阻，管你崇山峻岭、雪山草地，我们可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没有人民解放军通不过的道路”。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和第 2 野战军联合颁布了《解放西藏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无限忠诚于革命事业的精神和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坚决勇敢地完成解放西藏、保卫国防的光荣任务。进藏部队根据这些指示和要求，普遍进行了解放西藏、建设边疆、巩固国防的教育和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向大家全面介绍了西藏地区的情况，阐明了解放西藏的重大意义，组织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建立了各种机构，选配了各级干部，制定了《进军西藏守则》，进行了高寒山区行军作战知识学习。广大干部战士表示，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决完成进军西藏的光荣任务。在进军前的动员誓师大会上，张国华代表全体进藏人员宣誓：一定完成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交给的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坚决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为了有力地支援进藏部队，西南军区成立了支援司令部，发出了《关于动员全军支援 18 军进藏的指示》，提出了“前方部队需要什么，即用一切力

量供应什么”的原则。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亲自筹划进军的准备工作。当时重庆刚刚解放，正忙于军事接管工作，原国民党所属军需工厂未及整顿改造，私营厂商未恢复生产，筹借物资的任务十分艰巨。西南军区后勤系统采取各种措施，如期完成了支援任务，保证了进藏部队的需要。

进藏部队为了适应高原长途行军的需要，提出了“生活高原化”的口号，进行了高原适应性行军训练；人人学会了吃酥油糌粑和牛羊肉。酥油糌粑是藏族人民常用食品，可是对于汉族干部战士来说，吃酥油糌粑非常困难，有的人一闻到酥油茶的味道就要呕吐。为了尽快适应，许多干部战士特意在身边带上1块酥油，经常拿出来闻闻，终于突破了这道难关。

在进军西藏的过程中，尽管后勤部门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补给线越来越长，部队缺粮的难题越来越大。针对这种情况，各级领导一方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鼓励大家发扬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精神；一方面号召指战员节约用粮，互相支援，组织人力采挖野菜、捉地老鼠（兔科小动物，后来了解到藏族同胞禁忌捉地老鼠，就不再捉了）、捕麻雀充饥。

新疆独立骑兵师的先遣队，翻越海拔6000多米的昆仑山，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向西藏阿里地区进军。由于大雪封山，给养断绝，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加上高山缺氧，气候恶劣，很多人得了“高原病”，面色发黄，全身浮肿。他们猎兽为食，掘地为房，用兽皮、麻袋缝制衣服御寒。他们每到一地，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同藏族人民结成了血肉相联的亲密关系，在“世界屋脊”上深深地扎下根，为后续部队到来打下了基础。

（二）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始终非常重视进藏部队执行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的问题。为慎重、恰当地解决进军西藏所涉及的政治、宗教、民族等敏感复杂的问题，中共中央于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七日就进军西藏的方针给西南局作了明确指示。六月二日又批准了西南局拟向西藏当局提出的包括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解放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原有各种政治制度不变、保证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等10项政策。毛泽东指出：“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3000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他指示进藏部队：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亲密团结藏族同胞，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亲帝分裂主义分子。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强调指出：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对于进军和解放西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到西藏去，就是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去把康藏广大的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和第2野战军联合发布的《解放西藏政治动员令》，要求进藏部队“忠实正确地执行共同纲领规定的团结友爱互助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

---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3页。

即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约法八章，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学习当地语言，了解当地人民生活状况，关怀人民疾苦，并积极地帮助他们解除疾苦和困难”。政治动员令指出：“是否能够团结康藏人民，这是解放西藏，巩固西南国防的决定关键。”

为了密切与藏胞的关系，进藏部队掀起了学习藏语藏文的热潮。第 18 军包括军长、政委在内，每人都有 1 本藏文课本，除了学习藏文字母、拼音之外，主要学习日常生活用语和部分政策用语。许多人在很短时间里，就可以用藏语进行简单的会话了。

在经济政策方面，为了贯彻毛泽东提出的“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部队衣、食、住、行方面所需要的物资，绝大部分从内地运去，在当地只作少量采购。部队进入康定地区以后，即按藏族的习惯，以银元为流通货币，并禁止私人购买当地任何物品。

为了争取西藏上层人士合作，保证和平进军，部队每到一地，总是广泛地宣传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团以上领导干部必去登门拜访当地头人，或者召开座谈会，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西藏地区，历史上民族隔阂很深，许多问题往往和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因此，干部战士服从执行政策这个大局，对于广大藏族群众只帮助看病、放电影、背水、扫地、劈柴、割草等方面的工作；看到奴隶们被头人奴役，却只能强忍怒火不予干涉。

人民解放军入乡问俗，每到一地，即进行调查研究和政治宣传。对于藏族的寺庙、经幡、经塔、神山、神树、嘛呢堆等与宗教有关的物品以及风俗习惯，一律加以保护和尊重。无论是狂风暴雨、冰雹大雪或茫茫黑夜，部队从来不进寺庙，不住民房；饿了，宁肯几个人分吃一碗炒面，也不向群众征一点粮。部队的行动给了藏族人民良好的印象，有的欢呼“菩萨兵，菩萨兵！”有的主动要求给部队带路。

第 152 团 1 连初到斯俄村的时候，一些藏民把房门锁起来，把背水的桶、煮饭的锅埋藏在牛粪堆里，赶着马群、牛群躲进荒山。1 连的干部战士就住在畜棚里，白天到地里为群众劳动，晚上为群众补房、修路、打扫马棚。过了几天，躲在荒山里的群众赶着牲畜回来了，请部队到家里住。他们诚恳地说：“你们亚姆亚姆（很好）！”

人民解放军模范地执行政策、遵守纪律，博得了广大藏族群众的爱戴和支持。部队到达西康地区不久，藏族人民便组织起牦牛运输队。部队从昌都向拉萨进军时，藏族人民的牦牛运输队一直跟在队伍后面，不断把军需物资送到前方。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仅康北人民为支援进藏部队就先后出动牦牛近 20 万头。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四年，昌都地区群众运送的进藏物资共达 50 万驮。

“经受过霜雪的花儿最香，经受过考验的友谊最牢固”。这是藏族同胞向进藏部队常说的一句话。“哈达不要多，只要一条洁白的就行；朋友不要多，只要结识一个解放军就行。”这是藏族同胞常唱的一首民歌。在进军西藏中，人民解放军与广大藏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三）动员组织部队一面进军，一面建设。

西藏高原自古就没有一条像样的通往内地的道路。一九三一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纪要》中是这样描绘西藏的交通状况的：“乱石纵横，人与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状”，“世上无论何人，到此未有有胆战股栗者”。为了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巩固国防，加强西藏与内地的联系，中共中央、毛泽东

命令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西南军区从一九五〇年四月中旬起，6个工兵团、3个步兵团又2个营以及部分后勤部队，投入川藏公路施工。云南军区滇西援藏委员会公路局组织军工、民工共1.7万亲人，抢修大理至中甸的公路。西北军区新疆独立骑兵师组建后投入了于田至阿里的公路建设。驻青海的第1军也抽8000亲人，在湟源以西到玛多县黄河沿镇一线修建进藏公路。至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东起西康雅安，西至拉萨，全长2255公里的川藏公路竣工。在四年零七个月中，共完成土方工程1278万立方米，石方工程515万立方米，相当于开凿1条15米宽、3米深、650公里长的运河。工程之巨大和艰险，在中国公路建设史上是空前的。

在一千六百五十多个日日夜夜里，战斗在康藏高原上的人民战士，白天在冻雪泥浆中劳动，夜晚在寒冷潮湿的帐篷里睡眠。粮食供应不上，喝稀饭、吃野菜，劳动强度不减。许多人幽默而自豪地说：“我们这里，住的是海拔5000米高度，睡觉是斜坡30度，水的沸点是70摄氏度，气温是零下20摄氏度，可是我们的生活却沸腾到了100摄氏度！”就是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经过革命战争千锤百炼的钢铁战士们以英雄的气概，劈开了险峰峭壁，战胜了汹涌激流，拦住了排山倒海的流沙，穿过不见天日的森林，征服了举步难行的泥沼，把公路铺筑在“世界屋脊”上，为沟通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巩固西南边防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进藏部队针对西藏经济十分落后的状况，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一面进军，一面生产”的指示，以边疆为家，每到达一个指定位置，就带着满身征尘，投入开荒种地。工具缺乏，轮班干；畜力不足，人拉犁。他们说：“不建设，西藏就不会变成繁荣的地方，藏民就得不到幸福，国防也不会巩固。天大的困难，我们也得克服！”有一个营的部队经过一百天苦干，在荒原沙滩上开垦了2641亩土地。仅一九五二年，进藏部队即开荒约9.33万亩，修水渠60余公里，收获粮食50余万公斤，蔬菜全部自给。

闻名于西藏地区的农林牧副综合农场——拉萨西郊“八一”农场，是在进藏后不到一年时间内建成的。拉萨郊区农民看到这个农场生产出来的各种蔬菜，都不由得连声称赞：“解放军真是了不起，能用灵巧的双手把荒地改成美好的良田。”当得到解放军赠送的蔬菜种子时，他们高兴地说：“这种子像一颗颗珍珠那么宝贵。这不是普通的种子，是藏汉民族团结的种子，是解放军给藏族人民带来吉祥的种子！”

---

西康，旧省名。在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1955年撤销，以金沙江为界，分别将东部划归四川省，西部并入西藏地方（今西藏自治区）。

## 第五节 团结改造百万原国民党军队

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几百万军队在人民解放军猛烈的军事打击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下，绝大部分被歼灭，有 177 万人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其中陆军有 153 个正规师，海军有 97 艘舰艇，空军有各种飞机 143 架。人民解放军对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的国民党部队，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教育改造，使他们转变成为人民的军队。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战局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关于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的提出，大批国民党部队纷纷举行战场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仅一九四九年就有 100 余万人。最著名的有：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部 25 万人，在北平接受和平改编；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等率部 7 万余人，在长沙起义；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董其武等率部 6 万亲军，在绥远起义；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等率部 7 万余人在新疆起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率两个军在昆明起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率部 5.3 万余人分别在雅安、彭县起义。

大批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灭，有利于人民解放军大陆作战的最后胜利。对此，中共中央领导人给予了高度重视和评价。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宴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 26 名前国民党军政高级要员，庆祝他们举行起义，参加和平运动。周恩来、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粟裕、罗瑞卿、黄克诚等出席作陪。毛泽东在会上说：“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的国民党部队的情况十分复杂，要把他们改造好，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这方面充分显示了特殊威力。

### 一、教育改造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的国民党部队为数众多，成份十分复杂，要将他们切实改造好，真正转变立场，决不是简单的军事改编，形式上改旗易帜、换个番号所能实现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强调，改造好这些部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政治任务，同时指出做好这一工作有很多有利条件。第一，反蒋起义、弃旧图新是大势所趋，是国民党军队人心所向。第二，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和进步人士，不愿继续打内战，渴望和平，愿走爱国的道路；绝大多数士兵出身于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家庭，本质上都是好的，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和高压政策怀有强烈不满。第三，中共团结改造原国民党军队的

---

“三种方式”是：天津方式，即武力解决的方式；北平方式，即和平改编的方式；绥远方式，即起义后暂时不变动，过一段时间再行改编。

《人民日报》1949年9月24日第1版。

政策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也是与原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的切身利益相一致的。第四，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有一批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并有改造国民党军队经验的干部。因而是可以把这些军队改造好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及所属部队，根据中共中央对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的国民党部队“团结、教育、争取、改造”的总方针和原国民党军队各个部分的具体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仿照高树勋榜样在内战前线举起义旗，站到人民方面来的部队，授予番号，正式编入解放军序列，通过新式整军运动和一系列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转变他们的立场；对以北平方式解决的国民党部队，则撤销原来的指挥机构，将部队开到指定的地点，实行分散改编；对以绥远方式解决的国民党部队，保持原部队序列编制暂不变动，经过相当的时间之后再将他们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团结改造过程中，对原国民党军队官兵进行政治整训，改造他们的立场、观点、作风；废除国民党军队制度，按照解放军的建军原则和宗旨建立民主制度；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树立革命的优良作风，使之转变成成为忠诚地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在对新疆起义部队的改造整编中，特别强调了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和宗教信仰。

为了加强对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的国民党部队的改造工作，保证中国共产党有关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各野战军都派出了军事代表，与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的国民党部队团以上单位的各级主官组成军政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大小事情需反复协商，取得同意，如不同意，便可以缓办”的精神开展工作。

## 二、稳定思想和调整组织

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组织上脱离了国民党集团，但多数官兵的思想意识还是旧的。他们对共产党、解放军的认识不足，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对立情绪和各种各样的思想顾虑。加之少数极端反动分子的破坏捣乱，使他们的思想比较混乱。因此，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向原国民党军队官兵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解释工作，着重指出起义是光荣的，是对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具体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原国民党军队起义后采取的团结改造，爱国一家，革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一视同仁和立功受奖的政策；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对任何原国民党军队官兵，不问其过去如何，只要他们幡然悔悟，脱离反动营垒，都是欢迎的；介绍中国共产党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所采取的各项政策，如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等等。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代表深入原国民党军队下层，开展思想工作，帮助解决物质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起到与原国民党军队官兵联络感情、增进彼此了解与团结的作用，使原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解除疑虑，稳定情绪，迅速转变立场，提高觉悟。

在通过宣传教育稳定原国民党军队的同时，对国民党在军队中的政训、特务组织坚决予以取缔，对一些特务分子、反动军官的破坏、捣乱和抵制改造的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一些起义、投诚军队曾发生过零星叛乱事件，有的甚至杀害解放军的干部、战士和政府工作人员。对这类事件，除了在军事



上坚决打击，政治上揭发争取，对叛乱首犯进行公开审讯镇压外，对绝大多数胁从者主要是加强教育，促使他们划清界限，明辨是非，提高觉悟。

另外，对吸毒、赌博、贪污等非法行为严令禁止，以扶植正气，压倒邪气。

在稳定情绪的基础上，按照解放军的编制和精简的原则，对原国民党军队人员进行调整。把思想较好，态度积极，有工作能力，愿意为人民军队服务的留在部队工作，其中一部分作为在职人员送军事院校培养深造。对于思想较差的，给予离职学习改造思想的机会。对于少数仍与人民为敌，继续进行破坏捣乱屡教不改的分子，按照有关政策规定予以处理。对老弱病残，不能在部队工作的，给予妥善安置，不愿继续留队，要求回家的，发足薪饷和路费；如家在解放区，回家后分给一份土地；如本人是地主，按土地法大纲规定，既往不咎。这些做法，对于扫清改造过程中的障碍，纯洁部队，起到了重要作用。

### 三、建立中共军事代表团委员会和政治工作制度

在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的国民党各部队中都建立了中共军事代表团委员会，使整个部队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军事代表团党委成员由军事代表团主要干部组成。军事代表团党委工作的重点是掌握对原国民党军队的改造方针，并注重做好争取改造原国民党军官，全力进行发动士兵群众的工作。各级军政委员会在中共军事代表团委员会和直接上级机关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它是在原国民党军队中逐渐建立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一种好形式。随着军事代表深入基层，各项工作的开展，在原国民党军队中逐步建立起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基层普遍建立了革命军人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有的称伙食委员会）、俱乐部等群众组织，并充分发挥这些组织的作用，开展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改善伙食，搞好连队文化娱乐活动。同时，积极开展其他各项政治工作，如：颁发革命军人家属通知书，使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部队官兵的家庭得到优待；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好人好事；关心士兵的疾苦，对病员予以特殊照顾；帮助有恶习的官兵改掉旧习惯；开展尊干爱兵活动，克服军阀残余习气，废除谩骂和体罚，密切官兵之间的感情；开展文化教育，帮助不识字的人学习文化：建立军事邮政机构，为士兵免费邮寄信件，等等。

通过各项政治工作，使广大基层官兵了解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解放军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解人民解放军的各种制度、纪律，特别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解人民解放军的官兵关系以及与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划清新旧两种军队的界限。使他们认识到起义光荣，当人民解放军更是无上光荣，使他们感受到革命军队的温暖，体会到政治地位的变化，从而加速政治立场和思想感情的转化。

在教育改造中，军事代表还注意发现积极分子，大力培养典型，开办积极分子训练班，提高他们的觉悟。军事代表中的共产党员注意发挥模范作用，处处以身作则，为人表率，使广大群众更加拥护和热爱共产党。这样做，为在条件成熟时接纳中国共产党新党员和建立基层党组织打下了基础。

### 四、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各军事代表团为了从根本上转变原国民党军队官兵的立场、观点、思想、作风，始终把政治思想教育作为改编工作的中心环节。首先进行两种军队、两种政府、两种社会的对比教育。采取参观访问、讲述士兵本人或家庭过去被压迫被剥削的事实等形式，进行算帐、对比、挖根，实施通俗易懂的阶级教育。为了增强教育效果，部队文工团演出《白毛女》、《刘胡兰》、《血泪仇》等反映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剧目，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然后，开展以上兵为主的反对封建军阀制度的民主运动，以诉阶级苦、民族恨为中心的诉苦运动，以及与旧社会、旧军队割断联系，摆脱其影响的阶级自觉运动。此外，还进行了战争观的教育、团结内部的教育和政策纪律教育。通过这些运动和教育，在内部关系上，使全体士兵获得了民主权利，政治上翻了身，进一步树立了投身革命。跟着共产党走的思想。一些欺压打骂过士兵的旧军官主动承认和检查了错误，更加靠拢革命。在军民关系上，士兵们分清了两军根本区别，明确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自觉地检查了违犯群众纪律的错误。一些过去危害过人民群众的旧军官，也主动坦白交代了错误和罪行，表示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政治思想教育的开展，提高了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部队广大官兵的阶级觉悟、政治思想水平和革命积极性，改善了官兵关系，加强了军政军民团结，为把原国民党军队转变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思想基础。

## 五、做好爱国将领的工作

在整编改造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部队过程中，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到各级党委、政治机关都十分重视做好其上层人物的工作。国民党爱国将领率部起义，为加速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起义后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接受整编改造，积极要求进步。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他们始终坚持团结的方针，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首先，对爱国将领政治上信任，生活上关心。程潜将军起义后，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第一次到北京时，毛泽东等领导人亲往车站迎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凡是起义的高级将领都安排了相应的领导职务。程潜将军先后担任湖南省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傅作义将军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后，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部长。刘文辉、卢汉、邓锡侯、潘文华、邓宝珊等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都分别在中央人民政府或地方有关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一九五五年人民解放军评定军衔时，授予陶峙岳、董其武、陈明仁等上将军衔，授予原国民党第1兵团副司令曾泽生等中将军衔，授予原国民党海军海防第2舰队司令林遵、原“重庆”号舰长邓兆祥等少将军衔。一九五六年，陈明仁上将接受采访时的香港《文汇报》记者说：“在起义时，还认为共产党不一定会原谅我的，心里惴惴不安。可是，起义以后的事实，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共产党对起义的将领和起义军队是一视同仁的。在待遇方面，许多地方还特别照顾。我从起义时候起，一直没有离开过军队，职位是一个司令员。去年还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这个军衔比起国民党时候，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更加高升了。”在起义的中

上层军官中，包括陶峙岳、董其武、邓兆祥等高级将领在内，不少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其次，工作上尊重爱国将领的意见，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经常教育和要求党内同志本着起义有功，爱国不分先后，革命不分早晚的原则，在工作中尊重爱国将领。对在军内担任领导职务的爱国将领，各部队在教育训练、行政管理等工作中，都主动向他们请示汇报，使他们有职有权、发挥作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原国民党首席和谈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张治中去新疆视察工作，新疆建设兵团特意邀请他给起义部队的军官讲话。张治中将军在两次讲话中，以自身的经历和感受说明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艰苦性，勉励大家认真改造思想，改变领导方式，改变工作作风，改变生活习惯。他指出起义部队只有彻底改造，首先是彻底改造自己，改造部队，向人民解放军学习，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他的两次讲话在起义部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三，注意保护爱国将领。在改造教育国民党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部队过程中，其官兵在控诉旧社会、旧军队时，也难免涉及某些爱国将领过去的所作所为。为了顾全大局，增进团结，负责教育改造原国民党军队的解放军工作人员积极引导士兵认识国民党军队种种罪恶、坏事的阶级根源，使他们把仇恨记在旧社会、旧制度上，而不去算个人的旧帐。同时做好爱国将领的工作，引导他们正确对待士兵的揭发，正确认识 and 自觉检讨过去的所作所为。这样，既提高了原国民党军队官兵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他们相互间的谅解和团结。

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开始，到一九五二年六月结束，人民解放军顺利地完成了团结改造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的原国民党部队的任务，其大批官兵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合格成员。不少人在参加肃清国民党在大陆残余势力的战斗中表现很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了战功；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第六节 打击国民党军窜扰活动中的政治工作

国民党当局溃逃台湾之后，在美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下，不断派遣武装人员，从海上和空中对大陆进行各种袭扰破坏活动。逃往缅甸的国民党军残部也不断窜扰云南边境地区。这种窜扰活动，在一九六二年之前以中、小规模为主，以后以小股武装袭扰为主，到一九六九年基本结束。在长时间、大范围的反袭扰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大力加强政治工作，保证广大指战员提高警惕，苦练技术，英勇作战；保证各部队密切协同，和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海上、空中和陆地，给予国民党军队的窜扰活动以狠狠的打击。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四九年秋至一九五三年七月，即粉碎国民党军中、小规模袭扰活动71次，歼敌7900余人。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九年，人民海军舰艇部队海上作战241次，击沉国民党海军舰艇18艘，击伤49艘；击沉特务船和胶舟53艘，击伤特务船21艘，缴获各种艇船207艘，歼国民党军特人员6727人。从一九五一年开始，人民解放军对逃缅国民党军和国民党武装特务进行大小战斗1302次，共歼灭2.98万余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取得反窜扰斗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 一、教育部队树立常备不懈的思想

大陆全境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的任务逐步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部队进驻广大乡村，挑起“工作队”。“宣传队”的重担，协助地方建立、巩固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多数部队作战的任务明显减少，军、政训练任务不断加重，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摆上了中心位置。到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随着战争硝烟日远，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一些干部战士对敌斗争的弦时紧时松，形势紧张，战备工作就做得好一些，形势缓和就松劲；有的承认战备工作重要，然而经不起时间考验，时间一长就轻敌、麻痹思想抬头，“常备不懈”思想树的不牢。

为了使全体将士树立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思想，增强战备观念，随时做好打击国民党军队窜扰活动的准备，根据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及时下达指示；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干部深入检查战备情况；《八一杂志》及以后的《解放军报》等报刊开展广泛的宣传报道活动。例如，一九五四年八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军委总政治部下达了加强对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政治工作指示。全军各部队结合自己面临的敌情、任务及官兵的思想情况，普遍深入地进行了战备思想动员教育，使干部战士充分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国民党统治集团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阴谋，防止并克服因朝鲜和东南亚停战而产生的和平麻痹情绪。

国民党军队对大陆的窜扰活动常常变换策略与手法。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用猛烈的炮火，给予国民党金门守军的袭扰、炮击活动以有力的打击。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国民党军队减少了军事袭扰，加强了“心理作战”，用广播、宣传弹等展开精神攻势。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干部战士以为国民党军被解放军打怕了，不敢窜扰了，麻痹轻敌情绪抬头。总政治部领导深入前线发现问题后，很快组织部队进行了战备思想的检查教育。

在旷日持久的反窜扰斗争岁月里，全军各部队，特别是驻守边海防前线

的部队，经常对官兵进行形势任务、当面敌情、反窜扰斗争特点等等教育，定期检查战备工作、通报敌情、宣传表彰反窜扰斗争的成绩和先进典型，把战备思想教育渗透到政治学习、军事训练、战备值勤、日常管理等活动中去，此外，注意发挥报刊、通俗读物、电影、戏剧、歌曲、幻灯、图片、广播以及连队俱乐部各种活动的宣传作用，激励部队树立更旺盛持久的战斗意志，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觉悟。通过经常性的战备思想教育，使广大官兵妥善解决反窜扰活动中遇到的种种矛盾，正确处理战备和训练、现代化建设和戍边卫国、有备无患和备而不战等关系，百倍警惕地守卫着海岛、边防。

五、六十年代，国民党军队飞机、舰艇的火力、机动力较强，对大陆的侦察、骚扰活动富有突然性，常常是“抓一把就走”，时间往往只有几小时甚至几分钟。人民解放军的海军、空军和地面部队为了捕捉瞬息即逝的有利战机，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常年累月地在有利战区设伏待机。在待命和待机中，舰艇长时间在海上抛锚、漂泊，经常实行灯火管制，水密门关闭，空气不畅通，淡水、蔬菜缺乏，书报难于收到，精神生活枯燥，加之日以继夜的值勤值更，干部战士身体疲劳，容易产生急躁、轻敌和厌战情绪。针对这些情况，海军各级党委和艇队党（团）支部、政治工作干部紧紧掌握部队的思想情况，教育干部战士发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和团结友爱的精神，努力防止可能产生的急躁、埋怨和松懈麻痹情绪，使部队始终保持高涨的战斗热情和高度的警惕性，多次取得海战的胜利。

一九五四年，台湾国民党海军以金门、马祖、大陈等岛为基地，经常派遣舰艇到靠近大陆的海区进行袭扰活动。华东军区陆海空各部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队保持高度戒备，多次取得了打击国民党海军袭扰活动的胜利。人民海军鱼雷艇第31大队1中队在出海待机时间较长的情况下，政治工作人员不断深入分队、各艇了解情况，反复说明，国民党军舰吨位大，机动力强，人民海军快艇所能利用的有利作战时间短促，充分的准备工作是夺取战斗胜利的保证，向艇员们提出“战前准备好，胜利有保障”，“多一分准备就多一分胜利把握”的口号。与此同时，依靠党团小组的活动，及时解决部队所发生的思想问题。出海第一天，各艇的党团小组即召开会议，研究如何保证战斗的胜利。在一次出击未果和连续七天刮台风的情况下，有些战士产生了急躁埋怨情绪。中队军政干部及时到各艇做工作，各艇党团小组也召开会议，开展互相帮助，使部队情绪重新稳定下来。大家认识到，要战胜国民党海军的大型舰只，必须寻找良好的战机；而要寻找良好的战机，就必须忍受各种困难和艰苦。因此长时间的设伏待机，全体指战员丝毫没有懈怠。十一月十四日，1中队一举击沉国民党海军护卫舰“太平”号，受到了中央军委通令嘉奖。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国民党海军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由台湾左营隐蔽出航，六日晨驶抵广东沿海。海军4425部队和4412部队，由于平时政治工作坚强有力，全体官兵树立了“宁肯十备九空，也不放松一次战机”的常备不懈思想，接到紧急出航的命令后，各舰争分夺秒做好战斗准备，119艇装填两条鱼雷只用十二分钟，所有艇只全部准时出航，为抓住宝贵战机，击沉两艘敌舰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长期防空作战中，人民空军和防空部队深入持久的战备思想教育发挥了巨大威力。许多部队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教育干部战士正确认识和处理“备”与“战”的关系，反复说明有备无患的道理，使大家认识对敌斗争

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把战备工作落实到每时每刻。一九六一年八月二日九时零八分，设在闽江口的地面观察哨及时发现国民党空军 1 架 RF-101 型飞机，贴近海面高速向福州机场突袭。严阵以待的高炮部队，迅速抓住战机，集中火力猛烈射击，从发现敌机到将其击落，前后不足三分钟。从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末，中国人民解放军仅航空兵部队就击落入窜国民党空军飞机 46 架。国民党空军由于屡遭沉重打击，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减少了对大陆的空中袭扰活动。

## 二、军民携手建立钢铁防线

在反对国民党军队窜扰大陆活动的长期斗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边防各部队尊重、团结、依靠驻地党、政、警、民，同建共守海边防线。各级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人员，重视宣传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和优良传统，宣传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有关方针政策和指示，引导全体官兵深刻认识辽阔的海边防线反窜扰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自觉克服不相信地方群众的觉悟与力量、过分强调保守军事秘密、单纯依靠部队力量戍边等思想，把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任务结合起来，努力建设以人民解放军为主干，党、政、军、警、民同心协力的钢铁防线。

大力开展渔民工作，依靠渔民战胜敌人。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保卫边海防“要依靠人民群众，依靠渔民，要到渔民中扎根。”一九五一年八月，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在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沿海和岛屿的居民工作是很重要的。军队要在沿海岛屿扎根，从而战胜国民党军队，必须做好护渔、救生等群众工作，与沿海岛屿居民保持亲密的团结。一九五四年八月，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加强对国民党军作战的政治工作指示中强调：“沿海地区和海岛上的驻军，应继续组织和派出民运工作队，协助地方进行工作，团结和教育沿海的渔民、盐民，在保护捕捞、保护生产的基础上，使他们积极参加对敌斗争，只有紧紧地依靠沿海和海岛的广大人民，才能使海上对敌斗争的胜利获得可靠保证。”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一年春，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叶剑英多次亲临海岛视察，对海防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一九五七年二月，彭德怀视察舟山时指出：“必须紧紧地依靠舟山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扬我军政治上的优势，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把建设海防和对敌斗争与发展生产结合起来，党政军民结为一体，把舟山群岛和嵎泗列岛建设成攻不破打不烂的军事要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刘少奇视察舟山时题词：“建设舟山群岛，巩固海防前线。”沿海和海岛部队认真、深入地宣传贯彻这些指示，从多方面开展群众工作。例如，揭露国民党军以小恩小惠对渔民进行欺骗性宣传，企图高间渔民和大陆党、政、军团结的阴谋；协助地方党政机关解决渔民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帮助渔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向渔民进行对敌斗争政策的教育，促进渔民正确掌握斗争方向，加强斗争的效果；了解渔民的思想状况，对渔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教育，提高渔民的思想觉悟；加强对官兵进行拥政爱民教育，主动解决军政军民关系上存在的矛盾。有的守岛部队把保卫海防和维护群众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爱岛如家”、“群众的利益就是部队的利益”的口号，帮助群众开荒筑堤，扩大耕地面积；生活上与群众同甘共苦，当群众蒙受自然灾害时，部队全力以赴抢险救灾。由于部队

积极做好群众工作，群众把部队当作自己的“靠山”，主动配合部队巡逻、站岗，围追、搜捕混迹于渔区的国民党军队的船只。

做好民兵政治工作，发挥军民联防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解放军十分重视做好民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挥民兵在边海防建设和反击台湾国民党军队窜扰大陆中的强大作用。为了加强民兵的政治思想教育，总政治部采取了许多措施。一九五一年七月，发出了《关于民兵政治工作指示》，强调对民兵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提高民兵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思想觉悟，增强革命斗志。一九五三年三月和七月，又先后颁发了《民兵入队誓词》和《民兵守则》，从政治上和组织纪律上，对民兵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自一九五八年九月毛泽东主席发出“大办民兵师”的号召至一九六一年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前后，人民解放军对人民战争思想、民兵的战略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二日，总政治部批转了总政宣传部《关于加强民兵宣传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在部队中普遍组织报告员队伍，对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有计划地进行革命传统和国防知识的口头宣传活动”；“适当加强中央和地方报纸、广播电台关于民兵建设和活动的报道”。军区以下各级政治机关，尤其是处于海边防的省军区、军分区的政治部，加强对民兵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结合所在省、区的实际情况贯彻落实上级的指示，摸索总结经验。针对民兵既是“兵”又是“民”，既是武装组织又是生产骨干的性质和特点，许多政治教育活动在地方党政机关统一领导下进行，坚持劳武结合原则，农闲多搞，农忙少搞。政治教育的内容，除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外，主要是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民兵的性质、任务、组织纪律教育，国防知识教育。

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了民兵的全面建设，加强了沿海边疆地区的军民联防，从而为反击国民党军队的窜扰活动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五、六十年代，驻防福建的部队，团、营、连三级分别派1名负责干部，参加地方同级党的组织，建立统一的指挥和领导，营、连两级参加地方党委的干部，同时兼任民兵的教导员或副教导员、指导员或副指导员；民兵配合部队的作战计划，由部队和当地党委、武装部门共同商定，纳入部队作战计划之内，并由部队派干部帮助指导和组织实施。军民一体，建立起海上、海岸、陆地、隐蔽斗争4道防线。在沿海地区，建立了民兵固定哨和巡逻哨，制定了民兵配合部队的作战方案，并且进行了战斗演习。在内地凡国民党军有可能空降的地区，组织了反空降的武装基干民兵连，部署了防空哨。对铁路沿线、公路干线和主要车站、桥梁渡口等加强了防护。据统计，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二年，福建沿海军民协同作战达28800余次，歼敌33500余名，捕捉“水鬼”、特务170余名，缴获各种枪16300余支，炮39门。云南省的民兵配合部队及单独作战3800余次，歼敌16500余名，缴获各种枪5960余支。一九六二年十至十二月，广东省广大民兵群众密切配合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公安机关，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了9股国民党武装特务，歼敌172名。缴获电台9部，各种枪159支，子弹15000余发。在这些作战行动中，政治工作都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 三、保证东南沿海紧急备战任务的宗成

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从一九六二年二月开始，台湾国民党军队转入

战时状态。根据众多迹象判断，有极大可能对大陆发动一次有二、三十万人参加的冒险进犯，以图在东南沿海地区建立一块反革命根据地。

针对台湾当局的狂妄企图，中央军委于五月向全军发出紧急战备指示。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高警惕，从各方面做好准备。为了保证战备工作落实，五月二十六日，总政治部召开电话会议，向各军区通报了东南沿海的情况，要求部队进行紧急战备教育。六月初，总政治部发出紧急战备政治工作指示和连队战备动员要点，并派出7个工作组分赴各参战部队检查紧急战备思想工作落实情况。

全军参战部队接到中央、总政治部关于紧急战备的指示后，立即从干部到战士，从党内到党外，广泛深入地进行政治动员和思想工作，说明这次备战的目的和意义，有利条件和困难，以及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办法，宣传部队的光荣斗争历史和英雄模范事迹。通过紧急动员，部队掀起了高涨的求战热潮。广大官兵都以参战为荣，争上前线。休假探家的闻讯归队，住院养病的提前出院，要结婚的自动推迟了婚期。一个打过多次报告请求复员的干部自动撤回报告，说“打仗不再考虑回家”。服役期满的老兵愉快地留下来，准备参战。

为了把干部、战士高昂的战斗热情巩固下去，把粉碎国民党军队冒险窜犯的战备动员再深入一步，六月二十七日，总政治部发出指示，决定在全军所有连队和基层单位，立即开展一个控诉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罪行的思想教育活动。七、八月，控诉活动在全军普遍进行。第一步，由团以上干部亲自上课，系统地讲解蒋介石集团祸国殃民的罪恶历史，揭露其反动派本质。同时，讲清美蒋关系，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第二步，采取了官兵同诉和军民同诉等多种方式发动控诉。有的部队到雨花台、花园口、中美合作所、上饶集中营等美蒋反动派残害人民的遗址进行现场控诉。第三步，请老干部和战斗英雄大讲英雄故事和战斗传统，坚定必胜信心。控诉活动后，广大干部、战士带着强烈的仇恨心投入了紧张的战备、训练和其他工作。一线部队的广大官兵，冒着酷暑展开战前练兵，随时准备迎击敌人。守备部队提出要创造“上甘岭式的英雄阵地”；机动部队争着上第一线，争取打第一仗；铁道兵和铁路抢修部队，表示要“创造抗美援朝式打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在政治动员中，各部队结合所担负的任务，积极贯彻执行中央军委确定的作战方针，并制定出作战方案，展开战前练兵、抢修加固工事、储存粮弹柴水。一线部队还挑选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加强基层，保证每连有2至3名经过战斗锻炼的连排干部。同时，抽调老兵，补充到参战部队作骨干，加强对新兵的教育训练；调配好党团员，做到了班和技术小单位部有党员，排有党小组，连有健全的党支部委员会。每个班都组织安排党团员做战时宣传鼓动工作。南京军区所属部队在调整战斗骨干时，注意全面兼顾和正确使用老兵。就骨干本人来说，既考虑思想条件，又考虑身体和技术状况；就单位来说，既加强步兵分队，又照顾专业分队和分散小单位。4612部队对由兄弟部队调入的大量士兵，提出了主动团结，热情照顾，一视同仁，合理调配的要求，加强了管理教育，保证了内部团结。

在紧急战备政治工作中，各部队还注意做好以下工作：1.加强对官兵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下发开展杀敌立功运动的指示，一旦战斗打响，立即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杀敌立功竞赛；2.热情地帮助干部、战士解决粮食、经费、



柴水、治病等实际问题，做好干部家属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离队返乡，鼓励亲人积极参战；3. 针对战区天气较热，雨水较多，流行疾病，物资供应有一定困难等问题，加强行政管理，防止非战斗减员；号召官兵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团结互助，克服困难；4. 做好战区群众工作，积极向群众宣传作战的意义和目的，揭露国民党的罪行和欺骗宣传，鼓舞群众和民兵的参战热情。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群众利益，向一切违反政策纪律和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作斗争。帮助民兵进行战备训练，向民兵传授战斗技术和经验，指导民兵执行防好反特和反空降的任务；5. 加强后方勤务中的政治工作，发挥后勤工作人员的政治责任心和积极性，任劳任怨，不怕困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证战争物资供应、伤病员的治疗转运、武器装备的维修、营房的管理和农副业生产任务的完成；6. 党委和政治机关适应紧急战备情况，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70%以上的领导干部和机关于部都深入到下面去检查和帮助工作，传达指示、反映情况、解决问题比较快，各项工作都比较活跃。

由于亿万军民百倍警惕，严阵以待，台湾国民党军未敢大规模窜犯大陆。至一九六二年冬，全军紧急战备工作告一段落，入闽部队陆续归建。这次东南沿海紧急战备是一次大规模的备战演习，就部队政治工作来说，是一次成功的战时政治工作预演，对保证部队由和平环境全面迅速地转入战时状态，积累了宝贵经验。

## 第六章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工作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二十七日，美国政府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同时命令其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随后，美国政府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作出决议，组成以美军为主的英国、法国等 15 个国家的军队参加的“联合国军”。九月十五日，美军共 7 万余人在仁川登陆，十月七日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把侵略战火迅速烧到鸭绿江边，使中国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十月八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并立即准备出动的命令。十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

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战略反攻和战略防御两个阶段。在战略反攻阶段（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贯彻了“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大胆迂回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经过七个半月的连续作战，取得了第一、二、三、四、五次战役的重大胜利，歼敌 23 万余人，把美军和南朝鲜军从鸭绿江边赶过三八线，扭转了朝鲜战局，迫使敌人停止了战略进攻，为停战谈判奠定了基础。战略防御阶段（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至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贯彻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与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对敌军打谈结合，以打促谈，经历了两年零一个月的顽强战斗，迫敌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在这场艰巨、尖锐、激烈的战争中，中朝人民军队以劣势装备与敌军浴血奋战，歼敌 109.3 万余人（其中美军 39.7 万余人），击落击伤和缴获敌机 12224 架，击沉击伤敌舰 257 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朝两国军民共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人地生疏；作战的主要对象，是拥有技术装备绝对优势的美国侵略军；作战形式多半是大兵团、诸兵种协同作战，组织指挥极其复杂；在长期的对峙作战中，军事斗争和政治、外交斗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如此艰难复杂的国际性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政治工作，继承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教育、鼓舞全体指战员，牢记祖国、党、政府和人民的重托，发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强敌，不怕困难，团结、尊重朝鲜党、政、军、民共同英勇作战，不仅保证了作战的胜利，而且有许多创造与发展，获得了极为丰富的经验。

## 第一节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

中国人民志愿军从组建的那一天起，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就坚持对部队进行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中心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各部队针对一些人存在的“该不该打”、“能不能打”的问题，组织全体参战人员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中央人民政府的声明和民主党派联合宣言。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中朝人民的传统友谊以及地理位置上，讲情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不仅破坏世界和平，而且严重地威胁新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不能置之不理，志愿军出国作战是必要的和正义的；从美国侵略者没有人民支持，兵力不足，士气不高，后方太远，同盟国不齐心等战略弱点上，说明它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从志愿军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丰富经验和光荣传统，有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大力支援，说明一定能够取得抗美援朝作战的胜利。通过教育，指战员们认识到这一仗应该打，只有抗美援朝，才能保卫祖国的安全、朝鲜的独立以及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这一仗能够打，只要扬己之长，击敌之短，就能战胜美国侵略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以后，各部队运用干部战士看到听到的美国侵略军犯下的罪行和朝鲜人民遭受苦难的情景，进一步进行具体生动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边行军作战，边进行教育。如第42军372团4连，看到朝鲜的许多城镇和乡村变成一片焦土，到处是被杀害的人民群众的尸体，到处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到处是逃难的群众。指导员及时抓住这些材料，给全连讲了“为什么要入朝作战”的问题，使干部战士加深了对抗美援朝作战意义的认识。第二次战役后，4连执行穿插作战任务，一路上看到了更多的朝鲜人民惨遭杀害的景象，指导员又给全连上了一课：“敌人为什么要残杀人民？”并组织干部战士倾听朝鲜人民对美军暴行的控诉，进一步激发了大家对敌人的仇恨。另一种是利用战役间隙，集中一段时间，有计划地进行教育。许多连队的做法是：第一步，组织受难的朝鲜人民进行控诉，访问被洗劫过的村庄。第二步，提出问题，进行座谈讨论，辅以上课讲解，反复说明如果美军打到中国，我们的同胞会遭受同样深重的灾难。教育中，干部战士自觉地查思想，查斗志，评表现，比贡献，决心把仇恨化作英勇杀敌的行动。

为了使干部战士对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志愿军各部队从始至终进行了仇视、蔑视、鄙视美国侵略者的“三视”教育。各部队通过回顾历史，联系现实，教育指战员不忘美帝国主义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不忘美帝国主义过去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妄图分裂中国，霸占中国领土台湾；不忘美帝国主义占领与中国唇齿相依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而觊觎中国河山的罪恶企图。引导指战员一方面认清美国侵略者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本质，在战略上藐视它，另一方面又看到它有现代化装备的优势，在战术上重视它。“三视”教育，使志愿军指战员深刻认识到不打败美帝国主义，新中国就难以巩固，世界人民也不得安宁，从而增强了敢打敢胜、善打必胜的信心。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指战员们渴望了解祖国经济建设、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情况。各部队适应指战员向往祖国、热爱祖国的心理，进行热爱祖

国，为保卫祖国建设而战斗的教育。通过作报告、上政治课、收听广播等多种形式，向部队介绍祖国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介绍祖国人民热烈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全力以赴地支援志愿军的壮举，激励大家的斗志。从一九五一年六月到一九五二年五月，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开展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从百岁老人到七、八岁小学生，共捐献人民币 55650 亿元（旧币。1 万元等于 1955 年 2 月改制后的新人民币 1 元。以下同。），可购买 3710 架战斗机。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领导的“香玉剧社”全体人员，从一九五一年八月起的半年内，在陕西、湖北等 6 个省巡回义演 170 多场，他们把义演的收入捐献了 1 架“香玉剧社号”战斗机。武汉市申新纱厂女工朱金枝，把十多年积蓄起来的准备自己死后丧葬用的 30 枚银元，全部献给了志愿军。这些消息传到朝鲜战场，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战士。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还先后组织两次归国代表团、4 次归国观礼代表团，一方面把志愿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向祖国人民汇报，另一方面把祖国建设的成就、人民的关怀带回部队，鼓舞士气。祖国人民也 3 次派出赴朝慰问团，深入前线慰问。代表团成员中有著名艺术家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马连良、常香玉、常宝坤等，他们深入部队巡回演出，向志愿军战士问寒问暖。常宝坤在为部队演出时遭美机轰炸，牺牲在朝鲜战场上，随后他的弟弟常宝华又参加慰问团前往抗美援朝前线。祖国人民的关怀和鼓舞，成为激励志愿军英勇杀敌，完成各项任务的巨大动力。

## 第二节 保证作战方针的贯彻执行

在抗美援朝作战中，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根据朝鲜战局的发展变化，适时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指导方针和相应的战略战术原则。志愿军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把保证部队贯彻执行作战方针，列为政治工作极其重要的内容。

### 一、“打好出国第一仗”，增强必胜信心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二十一日，毛泽东电示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及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要“先在朝鲜北部尚未丧失的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为贯彻这一指示，第13兵团政治部发布了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保证首战获胜，转变朝鲜战局，为祖国争光，参战的志愿军第38、39、40、42、50、66军等部队，反复宣传打好出国第一仗对战争全局的意义，并具体分析敌军情况，特别是南朝鲜军士气低落等弱点，提高指战员必胜信心。志愿军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反复向干部战士说明，敌人装备精良，机械化程度高，火力强，各兵种密切协同作战，阵地最能发挥其长处。但敌人的长处在于运动战中则会受到种种限制，如火力不易展开，飞机、火炮不易发挥作用，机械化部队对道路和后方依赖大，等等。而运动战、近战、夜战又是志愿军的长处，是对付优势之敌的最好战法。只要坚决执行运动战的方针，正确运用近战、夜战的战术原则，敌人的进攻是完全可以打退的。经过这样分析，指战员信心百倍，情绪高涨，响亮地提出“打好出国第一仗，为祖国争光，为中国人民争气”的战斗口号。十月二十五日，各部队按照统帅部指定的方向和目标，勇敢地向敌人发起进攻，经过十三昼夜苦战，到十一月六日，给分东西两路向中朝边境冒进的南朝鲜军第6、8、3师和美国骑兵第1师以有力的打击，共歼敌1.5万人。仅第40军354团，就在温井以西的两水洞地区全歼南朝鲜军第6师前卫营和炮兵中队500余人，生俘敌官兵100余人，缴获榴弹炮12门，汽车38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取得的第一次战役的胜利，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清川江以南，粉碎了“联合国军”企图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并取得了同美、李（承晚）军作战的初步经验，增强了胜利信心，同时也极大地震撼了敌人。“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惊呼：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的行动，“就会使我军有被最终消灭的危险”。他的继任、美国陆军上将马修·李奇微在回忆“鸭绿江边险遭惨败时”说，中国军队当时就像从地下钻出来一样，以很凶猛的近战打击了美军和南朝鲜军。

---

毛泽东：《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给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的电报》、《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二时半给彭德怀并告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及高岗、贺晋年的电报》，《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651、652页。

马修·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74页。

马修·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61页。

## 二、宣传贯彻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针

在第一次战役取得胜利以后，十一月十三日，中共志愿军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第一次战役进行总结并对下一步的作战方针、任务作了研究和部署。会议认为，第一次战役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全军坚决贯彻执行了“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下一步战斗，志愿军在空军、炮兵、坦克兵尚未组成前，仍贯彻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方针，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会议决定第二次战役采取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准备将西线之敌诱至大馆洞、温井、平南镇一线歼灭之，将东线之敌诱至旧津里、长津一线歼灭之。

为了确保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志愿军政治部发布政治动员令。动员令指出，志愿军已经取得初战经验，只要继续很好地运用近战夜战、分割包围、大胆插入敌人侧后的战法，胜利一定会到来。在第二次战役中，参加西线反攻的许多部队在“诱敌深入”、“大胆迂回穿插”的作战方针指导下，不怕敌人重重阻拦，不怕悬崖陡壁，不怕天寒地滑，像尖刀一样勇猛地插向美国第8集团军腹地三所里、龙源里地区。第38军113师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深入团队边走边动员，宣传这次穿插任务的重要性，要求部队不怕苦、不怕累，不惜一切代价按时赶到指定位置，把敌人截住。该师指战员人人奋勇向前，在海拔1200米的高寒地区十四小时前进70公里，在三所里地区截断了敌人后撤的一条主要交通线，堵住了敌人南逃的退路。然后，该师不怕敌人后撤部队与增援部队的夹击，激战五十余小时，歼灭了大量敌人，打乱了西线敌人的整个部署。志愿军的西线反攻，彻底粉碎了敌人从三所里、龙源里突围的企图，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圣诞节“总攻势”变成了总溃退。为表彰战绩显著的第38军，彭德怀签发了嘉奖令。

运动战的特点是情况变化快，任务来得急，有时接到命令就出发，战斗前往往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思想动员。针对这种情况，各部队重视利用行军途中和战斗间隙进行思想工作。战斗在东线的志愿军第9兵团，在第二次战役中接受了穿插至长津湖地区，分割包围美军陆战队第1师和美军步兵第7师的任务。兵团所属各部队在长达200多公里的行军途中，边走边动员，讲清这次穿插的意义，鼓励大家以大无畏的精神去战胜一切困难，发动党团员骨干开展互助活动，使部队以高昂的情绪投入战斗。战士们在摄氏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作战，饿了吞几粒炒豆，渴了吃几块冰雪，手冻肿了，脚冻僵了，耳、鼻也冻破了，仍然保持着坚强的战斗意志；有的机枪冻得拉不开栓，射手就用自己的身体温暖枪身。第20军172团3连连长杨根思，带1个排坚守下碣隅里外围的1071.1高地东南的小高岭，卡住一条公路的隘口，对被包围的美军形成很大威胁。敌人为打开南逃的通路，用重炮、飞机掩护步兵进行8次集团冲锋，都被杨根思和他的战友们击退。当全排只剩下9个人，弹药快要打完时，敌人又发动了第9次攻击。战士们甩出了所有的手榴弹，打完了最后1排子弹，用刺刀、枪托、铁锹、石块与敌人拼杀，最后只剩下两名伤员，仍坚守阵地。当敌人的后续部队再次向山顶爬来时，已负伤的杨根思抱起仅有的1个炸药包，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保住了阵地。战后，志愿军领导机关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称号。第9兵团各部队以这种坚韧不拔、顽强战斗的精神，奋战了几昼夜，美陆战队第1师遭

到惨败，该师1个团遭到歼灭性打击，团长麦克里安上校被击毙，给美国侵略军又一次有力的打击。

以运动战为主，还需辅之以必要的防御战。第一次战役后，志愿军仅仅依靠临时构筑的简易野战工事，抵抗敌人飞机、大炮、坦克和步兵的疯狂进攻，伤亡很大。因此有些人反映：“宁可攻两个山头，也不愿守一个钟头”。为了解决这一思想问题，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积极宣传防御战的重要作用，教育干部战士懂得：在运动战中，一些部队担负防御任务，是为了保证整个运动战的胜利。要树立一切从全局需要出发的思想，既敢打运动战，又敢打防御战。这一教育收到了显著效果。各个部队表示：“攻要攻得猛，守要守得硬”，“攻加猛虎，守如泰山”。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第四次战役中，在汉江南岸执行坚守防御和宽大正面机动防御任务的部队，在没有得到必要的休整和物资补给，天寒地冻工事不易构筑的情况下，抗击了在大量大炮、坦克、航空兵支援下的敌步兵的猛烈进攻，持续苦战八十七天，歼敌7.8万余人，为以后的战役行动准备了有利条件。

### 三、宣传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

第五次战役后，交战双方在三八线地区形成对峙局面。为使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加强正面和东西海岸的防御，巩固阵地，稳定战局，持久作战，并以军事斗争配合停战谈判，迫敌妥协，结束朝鲜战争，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从此志愿军进入战略防御作战阶段。志愿军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在保证部队贯彻执行这一方针过程中，进行了极其艰苦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

——做好作战方针转变时的思想工作。由进攻到防御是一个大的转折，许多干部战士一时想不通。有些人认为“防御就是被动挨打”，缺乏长期防御作战的思想准备。为了帮助大家转好这个弯子，各部队进行了战争形势教育，说明志愿军虽然连续取得了5次战役的重大胜利，把敌人从鸭绿江、图们江赶回三八线，扭转了朝鲜战局，但是，敌人仍有装备上的优势，掌握着制空权。志愿军在装备落后、运输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只有及时地把运动进攻作战改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才能争取时间，改善技术装备和加强后方供应，寻找有利时机消耗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保持战场上的主动权。在战争形势教育的基础上，各单位抓紧时间调整了组织，配备了干部，选拔了骨干，发展了党员，加强了党团组织建设和群众性的“比条件，评利害，论战法”的讨论，使大家对“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有了深刻的理解，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完成了由运动作战到防御作战的转变。

——加强构筑工事的政治工作，提高部队的生存能力。志愿军转入阵地防御作战以后，敌人不分昼夜地把大量炮弹向志愿军的阵地上倾泻，简易野战工事常常被敌火力摧毁，人员伤亡很大。为坚守阵地，许多部队修起了大小不等的防空洞，进而又把防空洞挖深打通，成了马蹄形的小坑道。彭德怀深入前沿发现这种创造后，立即指示在各防御部队推广，并迅速组织部队相互参观，交流经验，在全线迅速构筑起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在构筑工事过程中，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反复宣传构筑坑道工事与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方针的关系，讲明只有依托坚固的坑道工事，才能以我之长击敌

之短，有效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坚持持久作战，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构工就是战斗，工地就是战场”，“多吃一点苦，多挖一寸土，胜利就多一分保证”的号召，调动了干部战士的积极性，掀起了劳动竞赛热潮。许多部队采用给阵地命名、祝贺工事落成、进行评功贺功、组织慰问和英模报告等各种活动方式，激励干部战士构筑坑道的热情。为了解决技术难题和缺乏工具器材的困难，还开展了钻研技术、就地取材、提合理化建议、推广先进经验的群众运动。同时重视改善指战员的物质生活条件，预防因劳作过度而引起各种疾病；严格劳动纪律，做好防险保安工作。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开山劈石，经过近十个月日日夜夜的艰苦劳动，在西起汉江口，东至高城，长达250余公里，纵深20至30公里的战线上，构筑起坚固的坑道工事。到停战为止，构筑的大小坑道总长1250公里，挖的战壕和交通壕总长6250公里。坑道顶部厚度20至50米，可以顶住500磅到2000磅炸弹的轰击。坑道内设有粮库、澡塘、俱乐部，成为攻不破、炸不烂的地下钢铁长城。这种以坑道工事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的形成，不仅降低了敌人优势装备的作用，使志愿军保存了有生力量，而且有利于发挥近战威力，大量杀伤敌人，积小胜为大胜，最后打败敌人。

——做好狙击运动中的政治工作，推动冷枪冷炮歼敌活动的开展。为了贯彻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志愿军转入阵地防御后，把防御和进攻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开展狙击活动，采用“零敲牛皮糖”的战法，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狙击活动开展初期，有些人怕暴露阵地，怕敌人报复，对用冷枪冷炮消灭敌人的战法认识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志愿军党委和政治机关加强对开展狙击活动积极意义的宣传，发出了创造“杀敌百名神枪手”的号召，制定了“狙击杀敌立功标准”，开展了杀敌立功大竞赛，从而使狙击活动在各个阵地上迅速广泛地开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九五二年五月至八月，志愿军狙击作战即歼敌1.36万余人（不含游动火炮狙击战果）。第15军135团在四个月中歼敌2677名，其中用狙击手段歼敌2327名，占歼敌总数的78%；而自己仅伤亡3人，敌我伤亡数是387.8比1。敌人惊恐地称该团6连守备的537.7北山阵地为“狙击兵岭”。战士们高兴地说：“这样积小胜为大胜，几天就是个小歼灭战，真是本钱少，胜利大。”第24军211团1连战士杨友奎，四十天内杀敌79名。特等功臣张桃芳，开始用12发子弹也没打死1个敌人，经过分析原因，总结出对运动中的敌人“跑步瞄前，上山瞄头，下山瞄脚”的射击要领，做到弹无虚发，成了杀敌200余名的优秀狙击手。他的经验得到了广泛推广。

——做好防疫中的政治工作，粉碎敌人的细菌战。美帝国主义为挽救其在军事上的惨败，从一九五二年一月起竟惨无人道地向中朝人民发动细菌战，把大量带有各种细菌的苍蝇、跳蚤、蜘蛛、甲虫、老鼠、树叶、鸡毛等撒向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部分地区。为了粉碎敌人的细菌战，志愿军领导人发布了紧急指示和命令，并规定了反细菌战的方针：在被污染区，严密监视疫情并消毒杀虫；在未被直接污染区，加强疫情侦察；进行预防注射，全面开展打扫卫生、捕鼠、杀虫、灭蝇运动。各政治机关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对细菌战或畏惧、或满不在乎、或存侥幸心理，深入进行反细菌战动员和宣传教育，组织大家学习《人民日报》、《志愿军报》刊载的《细菌战也挽救不了帝国主义的死亡命运》、《防御细菌战常识》、《防疫常识讲座》等材料，及时收听广播，参观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罪行的展览，召开控诉美帝国主



义进行细菌战的大会，编演各种反细菌战的文艺节目，宣传《卫生守约》和《卫生守约说明》，请昆虫学、细菌学和卫生防疫学专家对部队反细菌战进行技术指导。通过这一系列工作，使指战员进一步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凶恶本质，增长了反细菌战的知识，坚定了反细菌战的信心，一个反细菌战的卫生防疫运动蓬勃地开展了起来。各部队划分了卫生防疫区，组织了对敌机监视组，构成反细菌战的严密情报网；克服困难，制造各种灭鼠、灭蝇防疫工具，人人动手灭鼠、捕蝇，大搞环境和个人卫生，打预防针，开展防疫竞赛，奖励防疫模范单位和模范人物。据统计，共制造捕鼠工具 140 余万件，捕鼠 500 万只以上，建洗澡塘 8200 余所，灭虱室 3500 余所，隔离室 3100 余所。除给全体人员注射了各种疫苗外，还给朝鲜人民注射了 130 万人次各类疫苗。志愿军开展的反细菌战运动，不仅使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遭到彻底失败，而且使志愿军的卫生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有效地保证了人、马的健康和持久作战方针的贯彻。

——做好坚守坑道的政治工作，为反击作战创造条件。部队转入坑道作战后，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把政治工作重点放在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上。在阵地防御中，部队比较分散，1 个连守备的阵地有时多达 8 个，防御正面宽达 1 至 1.5 公里。在敌人炮火的封锁下，通信联络不便，加之配属分队比较多，1 条坑道内常常容纳几个不同建制的单位。为了更好地把各单位的人员、兵器统一组织起来，坚守坑道的部队通常都建立临时党支部，统一组织领导和开展思想工作，统一指挥对敌斗争。上甘岭战役中，第 45 师 134 团派党委委员、2 营政治教导员李安德，组织进入 597.9 高地 1 号坑道的部队成立以 8 连为主的坑道党支部。这个党支部充分发挥了堡垒作用，使部队在作战指挥、安顿伤员、管理武器弹药等方面，都做得相当出色，从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坑道作战的胜利。敌人占领地表阵地后，经常破坏、堵塞志愿军的坑道工事。各级政治干部教育指战员克服过分依赖坑道的情绪，树立以坑道为依托，在坑道外消耗敌人、歼灭敌人的积极作战思想，采取一切措施粉碎敌人堵塞坑道的阴谋。有的部队为了保护 and 扩大坑道口，沿坑道挖 1 条交通沟到坑道外，并在洞口挖 1 个 1 米深的坑，使敌人投来的炸药包、手榴弹，都掉进坑内顺沟滚出洞外爆炸。为了限制敌人的活动，各部队发扬孤胆小兵群独立作战的精神，坚持在坑道口外同敌人作斗争。在坑道外构筑各种依托坑道的野战工事，组织配备火力，主动灵活出击，积极打击敌人，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挤占作战双方接触的中间地带和攻取敌突出的连、排支撑点。第 12 军在官岱里西侧无名高地与敌反复争夺十昼夜，毙伤敌 2000 余人。第 39 军在 190.8 高地与敌反复争夺八天，毙伤敌 2900 余人。上甘岭战役中，23 个坚守坑道的分队，在二十多天时间里，向敌人袭击 158 次，歼敌 2000 多人，夺回班排阵地 7 处，打得敌人日夜心惊胆战。志愿军随着坚守坑道时间的延长，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有的坑道缺粮弹，断水源，伤病员得不到治疗，烈士遗体无处安置。在困难面前，各党支部和政治干部教育指战员紧密团结，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眼前的艰苦，战胜暂时的困难；号召党团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群众，采取措施战胜各种困难。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部队都保持着高昂的战斗意志，出现了许多感人的事迹，1 壶水你推我让，1 块饼干、1 个苹果你送给我，我送给他，危险的任务抢着去完成，生动地体现了指战员们团结奋斗的坚强意志和革命大家庭的深情厚谊。

——改善部队物质文化生活，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阵地防

御作战中，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部队的日常生活用品难以及时运上。指战员战斗在狭小的坑道里，环境十分艰苦，生活非常枯燥。为解决这一问题，志愿军政治部在一九五二年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大力改善部队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会后，各部队根据“面向前线，面向坑道”，“先连队后机关，先战士后干部”的原则，在同敌人的严密封锁进行斗争的同时，把各种罐头、蛋粉、豆类、菜蔬和文娱器材、书报杂志送到了坑道、工地、作业场。文工团、队在“文艺工作上高山，进坑道，上火线”的口号下，有计划地深入前沿阵地，开展“写兵、演兵、为兵”活动，编写出许多生动感人的优秀节目。许多连队开展了“自编、自演、自看”文艺节目活动，工程兵有的连队编出近百个小节目，90%的人员参加演出。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改善，大大鼓舞了指战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进一步巩固了持久作战的思想。

#### 四、树立和贯彻“坚决打，争取和”的指导思想

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美国侵略者被迫同意停战谈判。但其在谈判过程中，又企图以恐吓、讹诈的手段，得到它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开始，它以海、空优势要挟，企图在陆地分界线上得到“补偿”，无理地提出把军事分界线划到朝中方面实际控制线以北几十公里处，妄想白白强占包括开城在内的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无理要求被拒绝之后，又向中朝军队施加军事压力，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对志愿军运输线展开“绞杀战”。它这一系列军事行动被粉碎后，被迫接受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协议，然而又以遣返战俘问题阻挠停战，并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发动金化攻势（志愿军称之为“上甘岭战役”），惨败后，才被迫于一九五三年四月再次回到谈判桌上来。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于朝鲜战争的持久性以及迫使敌人谈判的可能性，早就有所考虑和准备。第五次战役获胜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为保证这一指导方针的贯彻，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志愿军政治部发出了《对长期作战的思想教育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加强对于部战士进行思想教育，说明朝鲜战争的性质、前途、敌我条件、战略方针及作战方法等，树立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立足于打、以打促谈的思想，克服急躁、速胜情绪。志愿军各部队开展了正确对待停战谈判的教育，向大家说明，以打促谈，是取得谈判胜利的关键，必须着眼于坚决打，而不能幻想和。各部队把战争和谈判的情况及时告诉指战员，把他们关心谈判的心情引导到积极作战方面去。广泛深入的教育，使大家认识到，只有坚决打，才能争取和，只有使敌人在战场上失败，才能迫使敌人老老实实地回到谈判桌上来。干部战士认清这个道理后，自觉地丢掉幻想，克服急躁情绪，把关心谈判，渴望和平，怀念祖国的思想，变为积极作战的动力。一九五一年九月底，美国侵略者在谈判桌上的讹诈失败后，向中朝军队发动了秋季攻势。志愿军各部队顽强地抗击了敌人在东西两线的进攻，歼敌7.9万余人。这次作战的胜利，使美国谈判代表醒悟到“真的不能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不得不重新恢复谈判。

志愿军党委和政治部在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坚决打，争取和”的指导思想

想中，经常教育部队认清军事斗争和谈判斗争两个方面错综复杂的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各部队有关军事打击的时间、目标的选择等，均能自觉地根据政治斗争的形势来确定。有些仗已决定打，但为了谈判的需要，就延期或改变计划。有的仗原不准备打，因谈判斗争的需要，又积极准备，随时进入战斗。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中断七个半月的朝鲜停战谈判复会。志愿军为了促进谈判迅速达成协议，在多数兵团尚未完成新的战役准备的情况下，提前于五月十三日（原定六月一日）发动了夏季进攻战役。五月下旬，当停战谈判有了明显进展，美、英方面态度有了好转，唯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从中阻挠时，就将以西线为重点、打击美军为主的计划，改为以打击南朝鲜军为主，适当打击美军，暂不打英军。六月，在停战谈判各项协议均已达成，志愿军准备结束夏季进攻战役之际，李承晚集团又企图扣留中朝军队的被俘人员，破坏遣俘协议。为了狠狠打击南朝鲜军，志愿军又组织了夏季战役的第三次进攻作战。至六月二十七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 12.3 万余人，收复土地 238 平方公里，迫敌当日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

### 第三节 保证后勤保障任务的完成

美军在侵朝战争中，始终把破坏志愿军的后方基地和补给线作为战略战术的重要目标，用很大部分空军、火炮和其它兵器摧毁志愿军的后方要地、军事设施和运输线，妄图切断志愿军的物资供应，阻隔志愿军前方和后方的联系，窒息志愿军的作战力量。志愿军后勤人员牢固树立“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思想，在航空兵、高射炮兵和朝鲜广大军民的支援配合下，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繁重的前送后运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 一、树立“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思想

抗美援朝战争是大兵团作战，物资消耗极大。在整个战争期间，全国人民为朝鲜前线提供的各种作战物资共达 560 余万吨。这样大量的物资，基本上是从中国经过长途运输送到前线的。此外还有大批伤病员的转运和其他运输任务。志愿军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完成这样繁重的任务的。敌人利用空中优势，疯狂破坏志愿军后方运输线，尤其是战争的第二阶段，对朝鲜北部的铁路与公路干线实行“重点封锁”、“重点轰炸”和“绞杀战”，给志愿军的运输工作增加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朝鲜山多水多，夏季洪水泛滥，冬季千里冰雪，使得物资运输、保管和维修的难度更大。

面对巨大的困难，志愿军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经常组织后勤人员学习朱德关于“能否打胜仗，后勤有一半的作用”的指示和彭德怀关于“战斗的胜负，后勤要负 50% 的责任”的指示，教育后勤人员深刻认识后勤工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树立“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思想，使大家认识到，大兵团、多军兵种的协同作战，后勤保障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前线的胜负；于后勤工作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分工的需要，同样是光荣的。随着认识的不断提高，志愿军全体后勤人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时时处处想前线所想，急前线所急，按时把物资送到前沿阵地。有的部队贯彻了后方支援前方，二线支援一线，机关支援连队的工作原则。必要时，果断地组织机关和连队勤杂人员组成运输队，参加运输工作。各部队还普遍对后勤人员进行忍受艰苦，克服困难的思想政治教育，向干部战士详细介绍一线部队浴血奋战的情况，号召大家向一线部队学习；及时宣传前线的胜利，讲明后勤部队艰苦奋斗的作用；及时给那些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完成后勤工作任务的人报功、贺功，宣扬他们的事迹；在运输线上设立鼓动站，随时宣传勇于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好人好事，激励大家坚定“打到底，运到底，运到胜利”的信念。

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思想指导下，志愿军的后勤工作取得了极大成绩。铁路运输里程由一九五 年底的 384 公里，延长到停战前的 1382 公里。修复桥梁 2294 座次，新建公路 2510 公里，加宽公路 8100 多公里。运输物资损失率逐年下降，运输效率逐步提高，保证了前线部队的供应。一九五一年十月，当敌军还穿着单衣在寒风中颤栗的时候，志愿军战士全都穿上了新棉衣。一九五二年志愿军的冬装从鸭绿江送到前沿每一个山头，仅用了七十二小时。一九五三年三月下旬，部队棉衣还未脱下，已领到了夏季服装。对此，连美军第 8 集团军司令官范佛里特也不得不承认：“在冬季的几个里，

共军有着很好的冬季被服，而且供应非常充裕，现在共军换了夏季服装，甚至比第8集团军还换得早一点。他们还有着充裕的粮食，有着充裕的弹药。”

“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于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 二、发动群众开展反轰炸斗争

美军对志愿军后方和运输线的破坏，分为3个阶段。战争初期，主要是对志愿军后勤人员、物资、车辆进行“全面轰炸”；战争中期，主要是对后方铁路、公路、桥梁和交通枢纽进行“绞杀战”；战争后期，主要是对后方水电设施和兵站、仓库进行“重点破坏”。据不完全统计，三年中，敌机仅在铁路上投弹就达19万余枚，平均每7米1枚。因此，发动群众开展反轰炸斗争，是志愿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各后勤部队号召和组织干部、党团员带头到反轰炸斗争第一线，了解群众的思想变化，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群众积极开展反轰炸斗争。在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期间，某部汽车第3团2连有两名排长，每夜冒着敌机的轰炸，同驾驶员共同执行运输任务。驾驶员反映：“干部都不怕，我们还怕啥！”许多运输部队把干部带车定为制度，一般规定：出发5台车以上由1名排级干部带车；15台以上由1名连级干部带车；1个连以上出发，又有重要任务时，由1名团级干部带车。这对开展反轰炸斗争，保障运输任务的完成起了重要作用。

各级政治机关、政治干部和军事机关、军事指挥员一起研究敌机活动规律，及时总结推广反轰炸斗争经验。一九五一年七、八月间，美军利用朝鲜北部的洪水季节，肆意轰炸志愿军后方铁路线上的桥梁、渡口，并阻止抢修抢渡。志愿军铁路运输部队发动群众研究对策，创造出“顶牛过桥”的运输方法，就是在新修复的铁路桥承载力低、机车过不去的情况下，在桥的一头用机车把车厢顶上桥，在另一头用另一辆机车把车厢接过桥去。这一经验推广到各铁路运输部队，使1000多节车皮的作战物资在八月份胜利运往前线。一九五一年八月至一九五二年六月，美国空军实施十个月的“绞杀战”，一些重要地段的铁路受到了严重破坏，铁路运输中断。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组织汽车运输部队和装卸部队实施长区间的倒运，将物资送过铁路中断地区，再装火车前运。与此同时，志愿军加强对空防御，加强铁路线的抢修，对粉碎美军的“绞杀战”起了重要作用。为对付敌机轰炸，汽车运输部队在千里运输线上选择有利地形，构筑起大量临时性或永久性的汽车掩体。有了这种掩体，汽车遇到敌机可以就地隐蔽，伺机而行；晚上可以提早出车，天明可以推迟收车，从而增加了行车时间，提高了运输效率。一九五一年三月，志愿军后勤第1、第3分部为能及时发现敌机空袭，在公路干线上设置了防空哨。后勤部队党委立即推广了这种做法，至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在志愿军后勤（不含军以下）管辖的长达2500多公里，32条主要公路干线上，先后设置了3.3万个防空哨。这些防空哨不但负责对空监视，鸣

---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98—99页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98—99页

枪报警，还兼管防奸肃特，排除敌机投下的三角钉和定时炸弹等路障，因而减少了汽车被炸和翻车因素，提高了行车速度，保证了公路畅通。上述对策，使志愿军运输部队车辆损坏率逐步下降。从赴朝作战到一九五一年底，志愿军运输部队损失车辆占总数的 53.3%，一九五二年下降为 6.4%，一九五三年一至七月又下降为 3.8%。这是志愿军发动群众开展反轰炸斗争取得的胜利。

### 三、保证各军兵种在反轰炸斗争中密切协同

一九五一年五月，志愿军党委在《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保证运输安全，争取快跑多运，是后方各军兵种共同的奋斗任务。志愿军政治部和各级政治机关、政治干部，结合作战初期某些部队之间因缺乏协同给运输造成困难的教训，反复宣传“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指导思想，认真纠正论门户、摆资格、闹分散、搞独立的偏向，加强纪律性、计划性、灵活性，促进了各军兵种在保证运输安全中的密切协同。空军部队进行了“协同作战，主动支援”的集体主义思想教育，使指战员牢固树立起主动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的思想，在清川江以北，为确保固定目标，保卫交通运输线的顺畅，积极打击敌机，取得辉煌战绩。高炮部队以“减少敌人命中率，增加我之命中率”为口号，在一九五二年击落敌机 264 架，击伤敌机 1070 架。铁道兵和工程兵为减少线路中断时间、增加通车时间和提高线路质量作出极大努力。一九五一年八月至年底，铁道兵共修复线路 6330 余处，桥梁 1006 座，延长线路 500 余公里。三年中挖掘和填铺的上石方达 1170 余万立方米。工程兵部队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思想指导下，树立起为胜利勇于自我牺牲的观念、为兄弟兵种服务的观念和确保运输线冲不垮炸不烂的观念，三年中，不畏敌火力重点封锁和敌机轮番轰炸，英勇奋战，新修公路 2200 多公里，桥梁 1100 多座；构筑地下仓库、医院、营房、掩蔽部等 7 万多个，参加并指导全军构筑各种工事 23 万多个。兵站和装卸部队在快装快卸，安全保管，保证前线供应不缺的口号下，把大批作战物资运往前线。铁路公路运输部队、公安部队，为反轰炸、保证运输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整个后勤战线各军兵种主动配合，相互支援，像 1 条钢铁“传送带”，把大量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

### 四、防敌特破坏，确保后方安全和运输线畅通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南朝鲜增设了庞大的特务机构，大批特务分子潜入朝鲜北部。这些特务与当地内奸勾结，刺探各种情报，进行暗杀和各种破坏，给敌机指示轰炸目标。因此，配合朝方防敌特破坏，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确保后方安全和运输线畅通的重要手段。

各部队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关政策规定和志愿军政治部制定的“严密防护，积极打击，防打结合，以防为主”的肃特斗争方针，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如组织武装工作队，协助当地政府清查户口，发动群众清剿匪特；在交通要道口设盘查站或盘查哨，盘查来往行人，捕捉流窜特务，等等。此外，配合军事清剿进行政治瓦解，对敌特及家属反复宣传首恶严惩，胁从宽大，自首不究，区别对待的政策，尽力争取胁从分子自首。有的部队

协助当地政府召开宽大处理奸特大会。特务家属看到对罪恶不大的奸特实行宽大处理，就想方设法劝说自己的亲人自首。有1位老太太为找儿子自首，上山去了两天，不仅找回了儿子，还带回6名奸特投案。一九五一年初，风山郡舍人面地区的469名特务分子，在志愿军后勤第3分部的军事清剿和政治攻势的压力下，十六天内有393人投案自首。反敌特斗争的广泛开展，对保证志愿军后方运输的安全起了积极作用。

## 五、开展爱伤员、爱车辆、爱物资活动

各后勤部队普遍开展了爱伤员、爱车辆、爱物资的“三爱”教育，使干部战士充分认识爱伤员、爱车辆、爱物资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具体表现，是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实际行动。有的部队针对一些人存在的“敌人有优势装备，我们损失难免”的消极思想，发动群众用算细帐的办法进行自我教育，使大家认识到，1辆车、1门炮、1发弹都是祖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的，来之不易，务必倍加爱惜。许多部队十分重视宣传爱伤员、爱车辆、爱物资的模范事迹，推广先进经验。第3分部4团3连驾驶员尹继发首创安全行车4万公里的记录，总结出对车辆“天天保养”，做到一让（主动让路）、三不超（道不宽不超，路危险不超，未经前车允许不超）、四慢（拐弯慢、错车慢、下坡慢，过桥慢）、一注意（防空）、三勤（勤检查，勤修理、勤注油）、四不要（不要开飞车，不要猛加油，不要急刹车，不要乱拆乱卸）的爱车经验。志愿军后勤部党委和政治部为尹继发记了特等功，全面推广他的行车经验，使汽车部队安全行车出现了新局面。到停战时，全军安全行车4万公里以上的车辆有600多台，十四个月未损坏1台车的连队有12个。此外，各仓库开展了“五防”（防空、防特、防火、防潮、防腐烂变质）“三保”（保质、保量、保安全）立功活动，取得很大成绩。据统计，通过开展“三爱”活动，志愿军的物资损失率由战争初期的13.4%下降到后期的0.8%。

## 第四节 开展立功运动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群众性的立功运动，大大激发了指战员的革命精神，成为他们克服困难，战胜强敌，夺取战争胜利的强有力的精神武器。三年中，志愿军涌现出功臣 302724 人，班以上集体立功单位 5953 个，荣获英雄、模范称号的有 502 人。

彭德怀、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杨连第、邱少云、伍先华、胡修道、杨育才、杨春增、李家发、许家朋等，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卜广德、于泮宫、于喜田、王兆才、王学凤、王海、王德明、孔庆三、刘玉堤、刘庆亮、刘维汉、孙生禄、沈如根、吴志洲、余新发、李凤林、李延年、陈德忠、杨宝山、员宝山、周厚刚、张永富、张积慧、赵宝桐、倪祥明、柴云振、秦建彬、徐长富、高成山、高景灏、郭忠田、郭恩志、曹玉海、曹庆功、黄家富、崔建国、雷宝森、谭炳云、魏玉德等立特等功，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志愿军开展立功运动的做法与经验是：

### 一、激发为祖国、为人民立功的政治热情

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行动，赢得了祖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重。他们亲切地称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多次派代表团深入前线慰问，邮寄数以百万计的慰问信和慰问品。志愿军回国汇报的代表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人民群众的盛大欢迎。朝鲜政府和人民也给志愿军以热情鼓励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 5 次为志愿军有功人员授勋授奖，给予了崇高的荣誉。千千万万封战士家信也殷切地期望亲人杀敌立功，为祖国、为和平做出贡献。这一切为开展立功运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各级政治机关

---

孙占元排长。河南省林县人。1952 年 10 月 14 日在上甘岭战役中，他率突击排英勇反击，在子弹打完后，拉响最后 1 颗手雷，炸死敌 8 人，自己壮烈牺牲。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

杨连第副连长。天津北仓人。1951 年 7 月清川江桥被洪水冲毁，他带领 1 个排，在流速 6 米/秒的激流中日夜奋战，创造性地架起钢轨浮桥。1952 年 5 月 15 日，在指挥部抢修清川江桥时，被美军定时炸弹击中牺牲。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

伍先华班长。四川省遂宁县人。1952 年 9 月 29 日，在金城郡官岱里以西反击战危急关头，他抱起炸药包冲进敌坑道，炸死 40 多人，自己壮烈牺牲。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爆破英雄”、“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杨春增副排长。河北省抄河县人。1952 年 8 月 5 日夜，在金城座首洞战斗中，率 1 个班坚守 541 高地，击退敌多次反扑，毙伤 200 多人。战至最后，他举起 1 颗手雷冲进敌阵，壮烈牺牲。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李家发战士。安徽省南陵县人。1953 年 7 月 13 日夜，在金城反击战中，为掩护部队冲击，挺身扑向敌一暗堡，用生命为部队夺取桥岩山开辟了道路。他所在部队追认其为中共党员。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

许家朋战士。安徽省绩溪县人。1953 年 7 月 6 日夜，在铁原以西石岬洞北山反击中，他抱起炸药包冲向敌堡，爆破未成，他毅然以胸膛抵住机枪射口，英勇牺牲。他所在部队追认其为中共党员。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



充分运用这些事实，通过各种形式宣传祖国的重托和人民的厚爱，宣传朝鲜党、政府和人民的信任与期望，使“当最可爱的人，要做最可爱的事”成为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愿。

许多部队不愿从第一线阵地换下来休整，要求多打几个漂亮仗，多为人民立功；有些战士因为没有立下更大的战功，而羞于给家里写信。第 63 军 189 师 566 团 3 连班长姚显儒在“立大功回国见毛主席”口号的鼓舞下，冒着生命危险摸索排雷方法，在一九五二年春的几个月内，共起回敌埋设的地雷 227 个，破坏 300 多个，并把 400 个地雷搬了家，炸死敌人 20 亲人。姚显儒荣立一等功，获得二级起雷英雄称号。第 63 军 187 师 561 团 2 连战士、战斗英雄刘光子立功后，他的家乡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第四区尖子地乡开了 2 万人参加的庆功大会，给他家挂了“爱国功臣”的金匾。这一消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到刘光子所在部队，引起了强烈反响，政治机关进行了广泛宣传，军首长亲自写信向刘光子贺喜。这件事有力地推动了部队的立功运动。

志愿军各部队普遍进行了中国历史上抗击敌寇的英雄人物事迹的教育，介绍了一九五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召开的全国英模代表大会的盛况以及本部队的光荣历史，开展了向英雄学习的活动。志愿军空军还开展了向陆军学习的活动，学习陆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不怕挫折、百折不挠的意志，连续作战、不怕疲劳的作风，机动灵活、以智取胜的经验。这些活动给了部队巨大的鼓舞，激发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涌现出众多的杀敌英雄。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使年轻的志愿军空军不畏强敌，英勇战斗，取得光辉的战绩，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志愿军空军第 3 师 9 团 16 架米格——15 歼击机在安州、清川江上空执行任务。第 1 大队大队长王海忽然发现左前方低空有美 F—84 型战斗轰炸机群正向清川江大桥投弹。为了保护运输大动脉，王海立即坚定地对本大队发出“跟我攻击”的命令，迅猛地向美机群冲击。仅几分钟，就干净利索地击落美机 5 架，尔后安全返航。该大队荣立一等功，被誉为英勇的“王海大队”。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九日，在反击上甘岭 597.9 高地的战斗中，黄继光奉命执行摧毁敌人火力点的任务。当他和战友们运动到距敌堡三四十米时，1 个战友牺牲，1 个战友身负重伤，他自己也负了伤。他忍着伤痛，顽强地向敌堡爬去，在距敌堡八、九米时，又被敌人的机枪打中昏了过去。他被雨水激醒后，将仅有的 1 枚手雷投向敌人，敌人的机枪不响了，可是部队刚刚发起冲击，敌人的另两挺机枪又突然响了起来。这时黄继光手中已没有武器，他毅然扑向敌堡，用胸膛堵住了敌人吐着火舌的机枪射孔。战友们趁机冲上了 597.9 高地，全歼守敌 1200 名。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邱少云，是在英雄事迹感召下出现的另一个英雄人物。他所在的第 15 军，经常组织英雄人物作巡回报告，把英雄事迹编成戏剧、歌曲演唱。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铭刻在邱少云心中，他订出了杀敌立功争当英雄的计划。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一日深夜，邱少云所在部队为攻占金化以西 391 高地的美军前哨阵地，派出 100 多人秘密地潜伏在距敌前沿阵地 60 米的蒿草丛中。次日中午，美军 1 发燃烧弹落在邱少云潜伏的草丛中，大火烧着他的棉衣、头发和皮肉。为了战斗的胜利，为了潜伏部队的安全，邱少云严守战场纪律，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让烈火在身上烧了三十分钟，直到光荣牺牲没吭一声。战后他被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

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人物的事迹在部队中广为传扬，为全军树立起崇高的榜样，进一步激发了广大指战员杀敌立功的积极性。

## 二、结合不同任务开展立功运动

志愿军的立功运动是同各个时期的作战方针、各项任务、各部队的实际情况、各军兵种的特点紧密联系着的。在战略反攻阶段，各部队要求指战员敢于大胆突破、穿插、包围，敢于孤胆作战，敢于在敌机、敌炮轰击下坚守阵地，歼灭敌人，提出了“穿插立功”、“孤胆作战立功”的号召。在这些口号鼓动下，出现了众多英雄模范，如带着1个小组执行穿插任务，十八个小时前进70多公里，按时插到敌人防御纵深——洛宁里的英雄冷树国，坚守阵地的英雄杨根思、郑起等。在战略防御阶段，各部队相继开展了“坚守阵地立功”、“狙击杀敌立功”、“筑城找窍门立功”的活动，涌现出成千上万的英雄。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九日的上甘岭战役中，第15军45师134团4连政治指导员赵毛臣，在正、副连长相继负重伤后，指挥连队连续猛攻6次，占领了主峰阵地，在3面受敌的情况下坚守七小时，协同兄弟部队打退敌人60多次反扑，歼敌400多人后转入坑道作战，坚持坑道斗争十五昼夜，在大反击时指挥连队冲出坑道，配合反击部队收复了表面阵地。在坚守上甘岭597.9高地的战斗中，第12军31师91团5连战士胡修道，在友军和炮兵配合下，在阵地上仅剩两人的情况下孤胆作战，一天打退敌人41次冲击，歼敌280多人，守住了阵地，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还出现了狙击杀敌立功的张桃芳、吕中和，用身体接通线路的英雄电话员牛保才，双腿炸断仍顽强地接起3根电线的金耳世等英模人物。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三日，在反击南朝鲜军的战斗中，第203师607团副排长杨育才，率领侦察班机智勇敢地通过敌人层层封锁，仅一个多小时插入敌纵深10多公里，经过十多分钟的激烈战斗，将南朝鲜号称“白虎团”的首都师1团团部全部消灭。

在朝鲜战场上，敌人的飞机很猖狂，严重影响了部队的行动。为消除敌机的严重威胁，入朝初期，志愿军政治部发出“在反轰炸斗争中立功”的号召。许多部队开展了打敌机立功运动。敌机一来，不但高射武器打，轻重机枪、步枪也参加了对低空敌机的射击，被击落击伤的敌机不断增加。特别是志愿军空军部队，截至一九五二年五月底，共有9个师18个歼击机团和2个轰炸师参战，先后出动飞机680批、11177架次，空战85次、战机1602架次，共击落敌机123架，击伤41架。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上午，志愿军空军第4师10团、12团共34架米格—15型歼击机奉命攻击在隅里附近轰炸铁路的美机群，第3大队大队长张积慧和俯机单志王突然发现右后方云层中窜出8架美机向他们扑来，张积慧猛然右转上升，美机扑空而过，张、单顺势咬住美机的长机，双炮齐发，将其击落，随即趁敌机群混乱之际又击落敌机1架。空战结束后，从美机残骸中发现，被击中的是美军“空中英雄”、“王牌驾驶员”戴维斯。志愿军空军的英勇作战，有力地打击了美军的气焰，迫使敌人再不敢为所欲为了。一九五二年一月，美军第5航空队发言人为此哀叹：“美国空军通行无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在立功运动中，各军兵种都注意根据自己的特点提出具体要求。铁道运

输部队开展了“百日千列无事故”立功运动；汽车运输部队开展了“万里安全行车”立功运动；铁道兵、工程兵开展了抢修立功运动；装卸部队开展了快装快卸竞赛；空军和高炮部队开展了多击落敌机竞赛，等等。在立功竞赛的鼓励下，广大指战员英勇机智地进行反轰炸斗争。一九五一年七月，铁道兵团第1师1团1连副连长杨连第，在抢修清川江大桥中，带领1个排12次搭设浮桥，并创造出“钢轨架浮桥”，保证了正桥施工，使几次中断的大桥顺利通车。铁道兵918号机车在一次运输中，利用有利地形，连续闯过22个照明弹和4个闭塞区间，安全完成了任务。某部汽车驾驶员杨从芳用“调虎离山”的妙计骗走敌机，保护了几十台汽车的安全。铁道兵某部领工员丁文礼，冒着12架敌机的轰炸，率领工友用四个小时在古仁至狗岷之间抢修通了4对回线，保证了当晚顺利通车。志愿军空军在开展立功运动中提出“一切为了战斗胜利”，“胜利表现在天空，胜利保证在地面”的口号，并规定了“凡击落敌机1架者为二等功，击落敌机2架者为一等功，击落敌机3架以上者为特等功；凡击伤敌机1架者为三等功，击伤敌机2架者为二等功，击伤敌机3架者为一等功”的标准，以及在飞机上画红五星（即每击落敌机1架就在有战功的飞机上画1颗红五星）的鼓励办法。有些部队还根据个人在作战中的功劳不易明显看出来特点，提出了“集体立功”、“协同立功”的口号，鼓励1个作业组、1门火炮、1辆坦克、1个机组或炮群、坦克群、机群的全体人员集体立功，把个人立功和集体立功结合起来，有力地保证了协同作战任务的完成。第64军190师在反敌登陆备战中，全师有162个隧道洞口作业组（每个洞口有4个作业组）订立了协同立功计划，五个月内就有12个洞口作业组共同立了功。协同立功的开展，有效地提高了工程进度。

### 三、加强立功运动的组织领导

志愿军入朝初期，各部队的立功标准不尽一致，批准权限也不相同。为了统一立功标准，统一立功等级，志愿军政治部于一九五一年召开了组织工作会议，专题讨论了加强立功运动的组织领导问题，并根据总政治部下发的《解放军立功与奖励工作条例(草案)》，制订了《志愿军立功条例(草案)》，统一了志愿军的立功标准和评功、报功、批功、奖功、贺功的步骤以及授予各级英雄称号的做法。为了准确掌握立功标准，保证英模人物的先进性，许多部队采取民主评功和领导批功相结合的办法产生英模人物。每个立功者，首先由群众推选，经过主管部门反复核实后，领导机关再予批准。同时，注意记功、评功、奖功的及时性，以便更好地发挥立功运动的激励作用。不少单位采取边打边评、昼打夜评的做法，必要时运用电报、电话报功。这对鼓舞士气，完成艰巨的战斗任务，起了重要作用。第68军203师在攻打572.4高地战斗中，担任主攻的第609团5连一举突破和占领敌主阵地后，师首长马上宣布给5连请功，并立即通报各单位，极大地激发了部队的斗志。与5连并肩作战的4连在这一通报的鼓舞下，很快攻占了敌人的右翼阵地，师首长又宣布为4连请功。由于请功及时，坚定了部队扩大战果和固守阵地的信心。第15军134团4连在上甘岭执行坚守任务的十五个昼夜中，进行了3次民主报功，使表现突出的干部战士及时得到鼓励，调动了大家的战斗积极性。

随着战争的发展，志愿军立功运动开展得愈来愈广泛，水平不断提高。

记功、评功的对象，不仅注意到战斗分队，也注意到后方勤务分队；不仅注意到连队，也注意到机关；不仅注意到战士，也注意到干部，从而使立功运动深入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岗位，每一项工作，每一个人。立功标准也随各项工作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比如战争初期，后勤汽车运输人员安全行车 1 万公里即可立一等功。由于运输部队在实践中总结了对敌斗争经验，安全行车的人员越来越多，到战争后期，安全行车 3 万公里甚至 5 万公里才能立一等功。在这种情况下，各运输部队注意教育战士正确对待成绩和荣誉，努力创造更优异的成绩。

#### 四、做好伤员的评功和对烈士的追记功绩工作

志愿军各部队重视做好伤员和阵亡干部战士的褒扬、奖励工作。办法是通过指挥人员谈伤员和烈士在阵地上的表现，通过抢救人员谈烈士牺牲时的情景，把伤员、烈士的事迹了解清楚，然后，适时地给予评功记功。抢救人员发现第 67 军 595 团 1 连战士李家发的遗体紧紧堵在敌碉堡枪眼上，胸部有很多弹孔。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到李家发在战斗中极为英勇，领导机关追认他为战斗英雄。一九五三年夏季的进攻战役中，一个部队在清理战场时，从敌人尸体堆中发现 4 位烈士：小组长张长发的手紧抓着敌人的头发；青年团员何述林抱着敌人的腰；战士马德金 1 只手卡着敌人的脖子；新战士吴德华手里还握着折断的冲锋枪。他们牺牲时的壮烈形象，表现了生前与敌人英勇搏斗的情景，说明他们不愧为伟大的战士，部队为他们追记了战功。

## 第五节 瓦解敌军

瓦解敌军，宽待俘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积极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军事打击。美国陆军宣传处承认，志愿军的宣传“涣散了士兵的战斗情绪”。美国的“心理战专家”认为，被志愿军改造的美军俘虏“有三分之一的人对美国的制度发生了怀疑”。

志愿军瓦解敌军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认真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

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敌军气焰嚣张，即使被志愿军分割包围，仍然负隅顽抗，拒不缴枪。第一次战役时，被击毙者多，被生俘者少。其原因主要是敌军接受了欺骗性宣传，怕当俘虏被杀害。

为消除敌军的疑虑，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彭德怀发布了关于对待投降的敌军官兵和俘虏的四项保证令：保证生命安全；不没收私人财物；不虐待、不侮辱人格；受伤者给予治疗。志愿军各部队以四项保证为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教育，提高了指战员执行俘虏政策的自觉性。同时通过新闻渠道和战场宣传，使敌军官兵了解四项保证的具体内容。为了用行动揭穿敌人的欺骗宣传，在第二次战役前夕，志愿军就地释放了一批美军、英军和南朝鲜军的俘虏。释放前进行了简短教育，开了欢送会，然后用汽车把他们送到阵地前沿，告诉他们通过警戒线的办法，并说明万一过不去还可以再回来。战俘感动地拥抱志愿军，一再表示：“我们永远忘不了你们的好处，以后决不再与你们为敌了。”俘虏回去后逢人就讲志愿军不仅不杀俘虏，而且在生活上给予优待。敌军指挥官对此大为震惊，不得不下令将这批俘虏运回国内。但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还是在敌军中迅速传播开来。据第二次战役的俘虏反映，美军第24、25师、骑兵第1师的官兵，差不多都知道志愿军的宽待俘虏政策。在第二次战役中，美军出现了两起集体投降的事件。一起为240亲人，内有美军160亲人，南朝鲜军80余人。另一起是由美黑人组成的1个工兵连120余人。第五次战役后，还出现了南朝鲜军战俘主动为志愿军背伤员，带志愿军绕过地雷场的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志愿军释放战俘这一作法给予充分的肯定，指出：“你们释放一批俘虏很对”，“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

为解决语言不通的困难，志愿军配备了几百名懂英语和朝鲜语的敌工干部，负责组织和指导战场上对敌喊话，宣传宽俘政策，同时还组织部队学习一些必要的喊话用语，如“缴枪不杀”、“宽待俘虏”、“跟我走”等，并印制了大批“代言片”，上面用英文和朝鲜文印着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作战时干部战士随身携带，捉到俘虏时就拿给他们看。

---

转引自《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136页。

毛泽东：《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给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的电报》、《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二时半给彭德怀、邓华、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的电报》，《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672、674页

## 二、有的放矢地开展对敌宣传工作

对美军，主要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正义性；宣传中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贯主张和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揭露美国统治集团推行战争政策、发动侵略战争给美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对南朝鲜军，除了宣传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宣传朝鲜政府对起义投诚人员的奖励办法和宽待俘虏政策之外，主要是揭露美国政府的侵略阴谋和南朝鲜李承晚政府的罪行，号召他们不要再替美国人当炮灰，不要再为李承晚集团卖命。志愿军有针对性的宣传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陆军宣传处说，志愿军的宣传中“有一个得意的战略论题”，就是：反对战争，要求和平。许多南朝鲜军官兵慨叹：“我们的苦难谁都不知道，只有广播机（指志愿军对敌宣传用的扩音器）给提出来了。”

志愿军还根据敌军不同时期的思想状况，提出不同的宣传内容。战争初期，着重宣传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正义立场和主张，宣传中国的和平政策和宽俘政策，以减少敌军对志愿军的敌对情绪。在连续取得五次战役胜利的有利条件下，宣传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是不可战胜的，美国的侵略战争一定要失败，以涣散敌军的士气。停战谈判开始后，则抓住敌军士兵渴望和谈成功的情绪，向他们指出“和平就在眼前，保住生命好回家”，并宣传白马山、老秃山、上甘岭等作战的胜利，向敌军官兵指出“山头就是坟墓，投降才是出路”，以动摇敌人军心。

## 三、开展多种形式的火线政治攻势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组织了 9 次较大规模的政治攻势，散发宣传品 6000 万份，对敌广播 5000 余次，大大削弱了敌军士气。政治攻势采取的主要形式是：

——结合军事打击，进行火线喊话，散发用英、朝等文字印有解释志愿军宽俘政策和规定的安全通行证。这一政治攻势取得了显著效果。一九五一年，志愿军有 1 个军在战斗中经过火线喊话争取投降的敌人，占俘敌总数的 30%。一九五二年秋季反击战中，据 2 个军的统计，因喊话而投降的敌人，占俘敌总数的 40%。一九五三年夏季反击战中，据 3 个军的报告，因喊话而投降的敌人，竟达俘敌总数的 60—80%。

——利用传统节日开展政治攻势。一九五一年圣诞节期间，据志愿军 6 个军的不完全统计，共散发宣传品 150 万份，宣传袋 2500 个。有的部队还自制圣诞老人、圣诞树、和平袋、礼物篮、和平信箱、留言片、标语牌、漫画等散发给敌军。这些宣传品，引起了敌军官兵强烈的思家、厌战情绪。据当时被俘的美军第 3 师士兵兰菲说：“我们连长昨天捡到 1 个圣诞袋，里面有印着和平鸽的宣传品。连长非常得意，对排长说，‘我的运气真好，我一定把这少有的纪念品带回家去。’排长羡慕地说：‘我没有你运气好，我也能得到 1 个’。”一九五二年“八·一五”朝鲜解放纪念日和中秋节期间，

---

转引自《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解放军出版社 198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43 页。

转引自《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解放军出版社 198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44 页。

志愿军政治部 1951 年《圣诞节对敌政治攻势初步总结》。

志愿军对南朝鲜军展开群众性的阵地喊话，散发宣传品 100 多万份，着重揭露美国取代日本奴役朝鲜人民，害得朝鲜人民南北分离不能团圆，同时赠送米糕、月饼、酒、糖果以及毛巾、香皂等物品，向南朝鲜军官兵祝贺节日。在这次宣传攻势中，有 10 名（其中 4 名带有武器）南朝鲜军投诚。其中 1 个叫吴志瑞的士兵说：“我们听了你们的喊话，心里很难过，更不愿意打仗了。”

——举行火线联欢。一九五二年圣诞节和一九五三年新年、春节，志愿军在一些阵地上与敌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举行火线联欢。这种“给敌人放假”的政治攻势，收效甚大。不少美国兵把志愿军送给他们的礼物寄回国内，有的转送给别人。一些南朝鲜军士兵说：“共军物资一定很丰富，不然他们怎么会送给我们吃。上级说联军飞机切断了共军的供应线，这话一定是假的。”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停战协定签字后，志愿军又在敌我双方各自从军事分界线后撤 2 公里的七十二小时内，在全线与敌人进行大小联欢 100 余次，收到良好效果。参加这次联欢的敌军有 900 余名，其中美军、英军与南朝鲜军约各占一半。英军二线阵地的炮兵也赶来与志愿军联欢。志愿军送给他们和平鸽纪念章、纪念册、钢笔、项链、手绢以及香烟、罐头等物品，他们则把臂章、军徽、小刀、烟盒、照片等送给志愿军，有的在纪念品上写上“反对战争，争取和平”；有的当面称赞“中国人和气善良”；大多数人在志愿军准备的留言簿上签了字，其中有的人写道：“我深信中国人爱好和平”，“我永远是你的朋友”，“今后不再和中国人作战了”。在联欢过程中，有一批南朝鲜军士兵向志愿军投诚。

#### 四、战俘的管理和遣返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先后收容了美、英等 12 个国家军队的俘虏 3900 余名。志愿军按照一九四九年各国在日内瓦签订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以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管理战俘，扩大了志愿军宽待俘虏政策的影响。

战俘进入战俘营以后，志愿军除了对他们进行宽待俘虏政策教育，使他们从思想上消除恐惧以外，还尽一切可能改善战俘的物质、文化生活，并准许他们与家庭通信。这使战俘非常感动。

曾经当过德军和日军俘虏的美俘认为，任何国家的俘虏营都比不上中国的俘虏营好。美军俘虏坦维斯在家信中说：“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是最幸运的战俘了。”一些伤病俘虏由于得到出乎他们意料的良好照顾，更是感动得流泪。美俘巴克在给亲友的信上写道：“中国人已尽了他们的能力在做一切事情（指志愿军照顾病俘），他们难得睡觉，他们一直关怀着我们的健康。”志愿军本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保护战俘的正常宗教活动，给他们以种种便利。每逢圣诞节、开斋节等宗教节日到来，都为他们准备一些必要的物品，让他们愉快地过节。一九五一年，战俘营专门给美、英军战俘安排了一个圣诞晚会。战俘们说：“志愿军不信宗教，但却为我们筹备了一个极隆重的圣诞节，给我们极好的待遇，我们深深感到中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

战俘营在生活上让战俘自己管理自己。按战俘国籍、官兵分别编队，成立了俱乐部，具体负责俘虏的文娱体育、环境卫生、看书读报等日常事宜；管理战俘伙食，月初公布供给标准，月终公布帐目，及时征求俘虏们对伙食的意见。战俘营俱乐部定期召开代表大会，听取各种意见。为活跃战俘的文娱生活，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在朝鲜碧潼开了一次各战俘营代表参加的秋季运动会，会期十二天，运动项目包括球类、田径、团体操、技巧运动、拳击、摔跤等，裁判均由俘虏推选产生。比赛结束时，由战俘营长官颁发奖品，俘虏代表主动向大会献旗，宣读他们的感谢信和诗歌文章。战俘们称颂运动会丰富多采、生动活泼，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一名美军中校俘虏赞美这次运动会是“志愿军创造了俘虏营前所未有的历史”。许多俘虏激动地说：“我们简直忘记自己是俘虏了”，“这次运动会完全是为我们开的，没有政治宣传”。他们向国内写了几百封家信，详细介绍了运动会的情况。

战俘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有些人偷吸毒品，或秘密聚赌，或打架闹事，破坏战俘营的生活秩序。一些流氓分子、反动的“三K党”分子，煽动战俘逃亡，还组织秘密的小团体，进行破坏活动。战俘营采取说服教育与严格的军事管理相结合的方法，参照《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制定了《战俘守则》和《对违法战俘处分条例》。对遵守规定和制度的俘虏，给予表扬；对违反制度规定的俘虏，给予批评或必要处分；对那些查有实据的破坏分子，则依据情节轻重依法惩处，以维持良好的生活秩序。对战俘的思想教育，以宽俘政策、拥护和平、反对战争、增进中国同各国人民友好为中心内容，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方式灵活多样，有集中上课，解答问题，举办演讲会，组织讨论，自由阅读书刊画报，个别交谈，听时事广播，看电影，办墙报，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等，取得了良好效果。几乎所有的俘虏都认为美军不应来朝作战，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美、英军的、很多战俘表示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并在和平宣言上签了名。战俘营还号召战俘写信、寄照片、搞录音广播，向亲友宣传中国的和平主张和志愿军的宽俘政策，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三年中，战俘们共向家属、亲友写信12万多封，寄照片6万多张，搞录音广播900余次。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呼吁国内人民与前线官兵反对战争，拥护和平。一九五一年八月，侵朝美军第8集团军军法处长汉纳上校发表谈话，诬蔑中、朝军队虐待和杀害战俘。许多俘虏及其家属对此提出抗议和批驳。有个美俘的母亲说：“关于中国人虐杀俘虏的谎言，只不过是使士兵更坚决地打仗而已。”不少俘虏家属将亲人寄回的信件印成传单散发；有的将呼吁和平的信件送给总统杜鲁门；许多战俘亲属积极参加要求朝鲜停战的和平运动。有1名美俘家属向总统和国会呼吁停战，让他们的亲人早日获释回家，三周内就有近百万人在呼吁书上签了字。英军俘虏家属还到议会集体请愿。

一九五二年一月，在板门店停战谈判桌上，美方提出被俘人员“1对1交换”、“自愿遣返”、“以平民顶战俘”、“将战俘假释而不予遣返”等“六点方案”。这是一个违反《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强迫扣留战俘的方案，立即遭到美英等国战俘的强烈抗议。在朝鲜的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发表公开信，批驳了这一方案，要求美方同意释放和遣返全部战俘。

一九五三年四月，志愿军按照中朝与美方达成的关于遣返俘虏的协议开



始释放俘虏。许多俘虏在离别时，同志愿军俘管人员握手、拥抱、唱歌、交换纪念品、照相或签名留念。一名美俘说：“过去我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过一天算一天，从没有想到将来。在志愿军的帮助下，两年来我的眼睛逐渐明亮起来了。”一名英俘说：“中朝人民军队对我们的友谊就像横跨在一条鸿沟上的桥梁，如今我已走过了这座桥，使我认识到对面的真实情况，回去后我还要领别人来过这个桥。”许多俘虏回国后，成为反对侵略战争的活跃分子。美国国防部一个专门审查和研究志愿军释放战俘的机构公开承认，美国“在朝鲜的一场思想交锋中极明显地失败了”，“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使我们的俘虏顿时陷入思想混乱”。有的美俘和英俘拒绝遣返，自愿到中国定居。对于自愿留下的战俘，中国政府尊重他们本人的意愿，妥善安排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公民一视同仁。一位名叫温纳瑞斯的美俘被安排在济南市当工人，后当了大学教授。一九七六年他回美国探亲，受到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美中友协请他到各地巡回演讲，介绍他在中国居住二十余年的情况，宣传新中国的成就和各项政策。他的八旬老母嘱咐他：“要好好谢谢中国人民”。

## 第六节 尊重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爱护朝鲜人民

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里指出：“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九五二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提出了“团结朝鲜人民的四项原则”：严格遵守朝鲜政府的政策法规；拥护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金日成首相；爱护朝鲜人民利益；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缺点、增进团结。志愿军党委和政治部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中央军委的指示，在部队中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尊重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团结朝鲜军队和人民的教育，大力宣传朝鲜劳动党、政府和人民对志愿军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全力支持；大力宣传朝鲜人民及人民军在反侵略斗争中的英勇事迹和取得的重大胜利；大力宣传朝鲜人民所进行的反侵略斗争对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与中国的安全作出的巨大贡献。通过教育，使干部战士深刻认识到，中朝两国人民是为两国的安全与独立、为保卫亚洲与世界的和平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的。抗美援朝，既是对朝鲜的支援，也是保家卫国；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既是保家卫国，也是对中国人民的帮助。没有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中国的安全也没有保障。这些教育，为部队做到自觉尊重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团结朝鲜人民和人民军，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 一、遵守朝鲜党和政府的政策法规

入朝初期，有些干部战士在朝鲜市场上使用人民币，违背了朝鲜政府的政策规定。志愿军政治机关发现问题后，及时发出通报，说明这是涉及朝鲜财政金融和国家主权的问题。此后，大家就不再使用人民币了。各部队每到一地，都通过朝鲜派驻志愿军师以上机关的政治文化联络部，主动与当地政府取得联系。遇到对敌斗争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时，召开志愿军与当地政府代表联席会议，共同协商提出办法，然后由双方组织实施。一九五三年为做好粉碎敌人登陆作战的准备，在解决战区居民的转移、支前工作的组织动员、筑城木材的筹集以及防奸肃特等问题时，各部队都是这样做的，从而既完成了任务，又杜绝了违反朝鲜政府政策法规的现象。有的部队偶尔违背了朝鲜政府的政策法规，政治机关即本着严以责己的精神予以处理。如1个团为了军事演习的方便，未经当地政府同意，擅自开闸放水淹了700多亩农田。部队领导发现后，立即向朝鲜地方政府道歉，征求他们对此事的处理意见，并在双方召开的联席会议上进行公开检讨，宣布对肇事人员的处分。朝鲜地方政府和人民代表对此深感满意。

---

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2、33页。

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2、33页。

转引自《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176页。

## 二、维护朝鲜人民的利益

志愿军赴朝前后，进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要求全体人员认真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模范地遵守纪律。第19兵团政治部还颁布了《遵守政策纪律守则》，把“爱护朝鲜人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列为第一条。有的部队冬季行军宿营时，为了不打扰居民，经常在山坡上或雪地里露营。深秋季节，有的部队宿营在苹果园里，树上挂满又大又红的苹果，指战员们没有一个人去摘。一九五一年夏季在金城阻击战中，适逢山洪暴发，桥梁冲坏，物资供应极为困难，战士们每天只能分到0.25公斤粮食，而当地到处都是成熟的庄稼，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动它。某部一个连进驻古直里，发现一栋房子被敌炮轰塌，房东逃难走了，战士们把废墟中的农具挖出来，妥为保管。房东回来一看，一件不缺，感激地竖起大拇指。

为了保证群众纪律的严格执行，志愿军政治部作出《关于借物手续与损坏赔偿办法的规定》，要求部队尽量少借、不借朝鲜人民的的东西，必须借的一定要经物主同意，并给予借物证。各基层党支部都设有群众工作委员，每个连队都建立了群众工作小组，随时检查群众纪律的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有的部队还在朝鲜政府和群众帮助下，经常联合进行纪律大检查，表彰先进，纠正错误。由于志愿军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维护群众利益，密切了同朝鲜人民的关系。

## 三、帮助朝鲜人民克服困难

侵略者燃起的战火使朝鲜的许多城镇乡村变成一片废墟，人力、物力、财力遭到了空前破坏，无数朝鲜人民无家可归，田园荒芜，生产、生活遇到了极大困难。志愿军各部队在不妨碍战斗的原则下，大力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战胜困难。一九五一年在平康、金化地区执行防御任务的第26军，有组织有领导地利用战斗间隙，帮助驻地农民抢收庄稼357.13公顷，耕田锄草38.4公顷。有的部队刚打完仗就参加秋收。阵地前沿的庄稼熟了，因受敌人火力威胁，群众不敢去收割，志愿军战士就化妆成农民抢收庄稼。某部副班长任廷昌，在帮助淮阳郡古直里农民种地时，不幸被敌炮击中牺牲。当地人民将他播下的稻子收割后，用红布包着，全里每家分了1包，准备来年做种子。他们说：“要把志愿军用鲜血给朝鲜人民种的稻子，拿来种在朝鲜人民的土地上。”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共帮助朝鲜人民耕地28449公顷，播种3158.8公顷，插秧9839.7公顷，开荒421.8公顷，锄草、收割156266.13公顷。有的部队帮助驻地群众收割庄稼占了总面积的70%以上。此外，部队还帮助群众修堤坝2226条、水渠330多公里，挖水沟40多公里，打井1167眼，修桥75“座次，盖房11965间，植树500多万株。朝鲜最大的见龙水库，可以灌溉平原、顺安、大同等郡1万多农民的3001.5公顷土地，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二日和十四日被美国飞机炸毁。在志愿军的帮助下，经过八十四天的紧张劳动，于八月十日修复。这一工程，志愿军共投入20万个人工，运土近30万立方米，挖泥2300多立方米，填坝心优质土1.12万立方米，修水渠4600多米，修公路4.75万米，修筑高3米、宽4米的分水坝626米。平安南道人民为了纪念这个水库的修复，特地在水库旁立

了一个纪念碑，用中朝两国文字写着：“是谁破坏了水库堤坝？是野兽般的美帝国主义者；是谁帮助我们修复了它？是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修复了水库，是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巩固的友好团结又一次新的胜利的表现。”

各部队还积极参加了救灾工作。一九五一年朝鲜遇到水灾，农业歉收，各地出现严重饥荒，有的地区50—60%的人断粮，靠树皮、草根、野菜度日。为帮助朝鲜人民度过灾荒，志愿军领导机关提出“部队驻地不饿死一个人”的要求，拨发粮食救济灾民。各部队普遍开展了节衣缩食，积极支援灾民的活动，每人每日节约1两米，把节余的大米、伙食费、津贴费用来救济灾民。大批干部战士还捐献出衣物、日用品送给军烈属和孤儿。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救济朝鲜人民粮食500余万公斤，衣服33.6万余件，鞋11.6万余双，棉花66850公斤，日用品14.6万余件，人民币22174.8万元（旧市），对帮助朝鲜人民度过难关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保证志愿军干部战士防病治病的前提下，广大医务人员踊跃开展为朝鲜人民群众服务活动，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共为朝鲜群众免费治疗疾病64.1万余人次。在反细菌战争阶段，为群众注射鼠疫、五联、斑疹伤寒疫苗72.4万人次，使朝鲜北部一九五二年的伤寒、副伤寒、斑疹伤寒、回归热的发病率比一九五一年还要低。

当朝鲜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志愿军战士总是挺身而出，奋力抢救。他们从敌人的炮火下共抢救朝鲜人民3753人，粮食近50万公斤。在12架敌机袭击金化曲元里时，志愿军共产党员赵承英不顾个人安危，从震塌的房子里先后救出6个小孩和一位老大娘。被救孩子的父亲在看望赵承英时激动地说：“你比我这个作父亲的还强。”有的战士为了抢救朝鲜人民的生命财产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就是突出的一个。一九五二年一月二日，罗盛教在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附近的栎沼河上，发现一个正在滑冰的朝鲜儿童掉进了冰窟，他立即脱下棉衣棉裤，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毫不犹豫地跳进2.7米深的冰窟。他连续3次潜入水中，竭尽全力把落水少年顶出水面。少年得救了，罗盛教则因体力不支光荣牺牲。石田里人民悲痛地请求将烈士遗体交给他们，按朝鲜人民最隆重的礼仪安葬。被救少年崔莹跪在墓前庄严地宣誓：学习罗盛教哥哥舍己救人的崇高品德，长大后当一名人民军战士。石田里劳动党支部书记指着冰封的栎沼河激动地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栎沼河畔的人民今天更清楚了。就在这条河里，志愿军为救我们的一个孩子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也在这条河里，美国鬼子用我们亲人的鲜血染红了河水。乡亲们，让我们世代都记住罗盛教的名字吧！”

罗盛教烈士的国际主义精神与朝鲜人民永远共存！

金日成

图14 金日成为罗盛教烈士写的碑文（解放军画报社提供）

#### 四、向朝鲜军民学习

志愿军始终把团结朝鲜军民，虚心向朝鲜军民学习，作为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经常向部队宣传朝鲜人民军顽强的战斗作风，正规化的制度，良好的组织纪律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一九五一年秋，第68军同人民军第5、2、3军团在文登公路至北汉江一线共同执行阻击敌人进

攻的任务。战前，双方指挥员一起观察地形，判断敌情，确定作战方案，组成了联军指挥所。作战中，双方主动配合，搞好协同动作。十月八日，志愿军的1个团正要接替人民军第5军团位于文登公路两侧的防务时，敌人发起了进攻，受到敌人40辆坦克的集中攻击，团指挥所的安全受到威胁。这时，朝鲜人民军立即从工事里推出76.2野炮，一举击毁敌坦克4辆，协同志愿军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随后，人民军又派出1个7人反坦克小组，配属志愿军前沿连指挥，直到敌人用坦克进攻的战术完全失败以后，才回归建制。第68军军、师领导机关号召干部战士，学习朝鲜人民军这种互相支援、紧密协同的精神和顽强的战斗作风。朝鲜人民军在1211高地的防御战中打得很成功，敌军称该高地为“伤心岭”。志愿军第15军在上甘岭战役中学习朝鲜人民军这个战例，并提出“把上甘岭变成敌人第二个‘伤心岭’”，“把金化变成‘无底洞’”的口号，取得了重大胜利。第15军组织上甘岭有功人员同朝鲜人民军英雄举行经验交流会，畅谈防御作战的经验体会，双方都受到了巨大鼓舞。

从志愿军入朝第一天起，朝鲜人民就像爱护自己的儿女一样爱护志愿军。部队每到一处，当地居民宁可自己受冻，也要把房子、热炕让给志愿军，把最好的苹果、玉米和新米饭送给战士们吃，许多群众不惜一切代价救护志愿军伤病员。上甘岭战役打响后，被誉为“志愿军妈妈”的咸在福大娘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住，把最好的被褥给伤员用。峰栈里50多岁的卢炳太，冒着敌人的轰炸扫射，从烈火中抢救出住在他家的5名志愿军伤员。昌都里19岁的姑娘韩桂芝在敌机轰炸中，冒着烈火浓烟冲进屋里，不顾小弟弟的哭喊，先把4名志愿军伤员背出来，最后去背小弟弟时，弟弟已被烧死。在上甘岭战役中，金化、淮阳、平康3个郡的人民群众，组织了8400余人的支前大军，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抢救伤员，还在通往前线的路上设茶水站、苹果站、鼓励站。公洞里自卫队长白景龙，听说志愿军在坑道里喝不上水，跑了90多公里，到郡里买了300个苹果送给志愿军。朝鲜劳动党党员、农民朴在根在运送志愿军伤员时，遇敌机扫射、轰炸，他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员而光荣牺牲，被称为“罗盛教式的英雄”。朝鲜人民关怀、支援志愿军的感人行动和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有力地教育了志愿军指战员。志愿军政治部和各级政治机关紧紧抓住这些激动人心的事实，通过报刊、广播广为宣传，宣扬勤劳勇敢的朝鲜人民为争取独立自由而英勇斗争的光荣历史及其在反侵略战争中的英雄事迹，宣扬朝鲜党政军民对志愿军的巨大支援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各单位结合实际情况，通过走访、座谈、联欢等方式，广泛开展向朝鲜人民学习的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与朝鲜人民的团结。

中朝人民用鲜血和生命结成的战斗友谊，受到了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的赞扬。他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利用战斗的空隙时间，帮助我国农民耕地、播种和收割，帮助修复被破坏的水库和堤坝，帮助修复公路和桥梁。”“罗盛教烈士为了救出朝鲜儿童，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农民朴在根为了救出受伤的志愿军，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敌人的弹片。这些事实，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我国人民之间所结成的深厚友谊的表现。”

---

金日成：《在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部队大会上的讲话》，《金日成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27—328页。

## 五、军队撤出，友谊长存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九日，中朝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一九五八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为圆满完成撤军任务，志愿军党委向部队发出了“不骄不燥，善始善终；军队撤出，友谊长存”的号召。志愿军政治部发出了《关于我军撤出朝鲜的政治工作指示》，并制定了《撤军政治工作三十条》，对撤军政治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各部队根据上述指示和要求，普遍进行了撤军政治教育，做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各部队在移交防务前，对坑道、战壕、掩体和其他各种工事、道路，进行了彻底整修、清扫和加固，并组织力量把一些未完成的工事突击完成。各级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对作战方案重新进行了研究，修正了战斗文书和各种图表，准确无误地转交给人民军。各部队对营房营具作了认真的修整，平整了操场、洗拭了体育器材，精心布置了礼堂和俱乐部。对移交和赠送的物资器材，反复检查核对，整理登记，分类存放。然后举行隆重的仪式欢迎人民军来接防。各部队还掀起了助民劳动热潮。广大指战员在“多流一把汗水，多留一份友谊”的口号下，抓紧时间帮助朝鲜人民挖渠、打井、修堤、筑坝、铺路、播种、收割、植树和修建房舍。据不完全统计，志愿军在撤军前的有限时间内，共帮助朝鲜人民播种、插秧 3201 公顷，锄草近 3927 公顷，收割 122.1 公顷，平整土地 610.5 公顷，植树 460 万棵，送肥积肥 2750 余万公斤，运送物资 1150 万公斤，修堤坝 329 条（长 8.3 万米），修水渠 533 等（长 27.1 万余米），修桥 156 座，修建房屋 996 间，修建公共场所 166 处，打井 47 眼，修路 13.5 万余米。修建定州水库需动用 77 万个劳动日，志愿军投入大批人力昼夜苦战，撤军前帮助完成了水库工程的 55% 以上。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留下了难忘的友谊。

各部队离开驻地前，政治机关根据志愿军总部制定的《尊重朝鲜政府、爱护朝鲜人民公约》，邀请当地党政负责人和居民代表座谈，倾听他们的意见。还组织纪律检查组，挨家挨户检查群众纪律，切实做到借物送还，损物赔偿，不欠一笔帐，不留一个问题。

志愿军归国时，朝鲜人民与志愿军依依惜别。朝鲜劳动党和政府领导人亲自看望、慰问和欢送志愿军；以全朝鲜人民的名义给志愿军全体官兵和中国人民写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授予志愿军全体官兵“祖国解放战争纪念章”；在平壤市建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友谊塔”；普遍整修了志愿军烈士墓。志愿军发表了由首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署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给朝鲜人民的告别信》，深切感谢朝鲜劳动党、政府、军队和人民对志愿军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援。为欢送志愿军凯旋，朝鲜内阁组成了“中央欢送委员会”，各道、市、郡也分别组成欢送委员会，走遍前沿和后方，热情地进行慰问和送别。志愿军离开驻地时收到了朝鲜人民送来的珍贵礼物，其中有老太太当年戴的结婚戒指，有祖传几代的宝剑，有小学生的作业本，有姑娘的绣花荷包，有妇女用自己的头发编成的草鞋。在撤离部队通过的各主要道路上，朝鲜人民肩背石子，头顶沙袋，修桥补路，到处是高举中朝红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的群众盛装夹道欢送，许多人拉住志愿军的手不放，只是流泪说不出话来。在佳川里，1000 人左右的志愿军队伍通过 500 多名群众的送别行列，整整走了三个多小时，感动得前来采访的记者和摄影师也泪如泉涌，无法再作记录和拍摄。这种山河般的友谊，骨肉般的情感，是中朝两国

人民心连心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工作巨大威力的展现。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工作经验极为丰富，概括起来有以下4个方面：第一，充分调动国内外、军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高度发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第二，斗争越复杂，战争越残酷，任务越艰巨，就越需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越需要发扬民主作风和贯彻群众路线。第三，在出国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以及进行现代化大兵团、诸军兵种协同作战情况下，必须不断增进军队内部与外部的团结。第四，只有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不断加强政治工作，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才能克服万难，战胜敌人。

## 第七章 守卫边海防和自卫还击作战中的政治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国政府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维护和发展同邻国的友好关系，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有些国家却无视中国的主权，挑起武装冲突，侵犯中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敢于来犯者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先后多次击落了入侵中国领空的美国飞机，取得了中印边境、中苏边境、西沙群岛、中越边境等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和多次空战、海战的胜利，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政策，捍卫祖国的尊严，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在完成上述重大任务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第一节 常备不懈守卫边海防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配合下，警惕地守卫着祖国，坚决打击来自陆上、海上和空中的武装入侵者，维护了祖国尊严，保证了祖国安全。一九五二年七月间，驻澳门的葡萄牙军队，4次武装越界，8次向中方射击，打伤中国哨兵。中国边防部队坚决还击，迫使澳门地区当局向中国道歉，赔偿损失和后撤哨位。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国边防部队在东北地区击落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间谍机关派遣的C—147型飞机1架。从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八年，中国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先后击落击伤窜入中国东南、中南、华北、西南等地区上空进行侦察、骚扰的美帝国主义军用飞机16架；一九六四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击落侵入中国海南、云南、广东、广西地区上空的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20架。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还击了印度军队的入侵，取得了重大胜利。一九六九年三月，苏联边防部队多次入侵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中国边防部队予以英勇还击，打退了苏军的入侵。同年八月，中同边防部队又击退了入侵中国新疆铁克提边境地区的苏军。一九七四年一月，中国海军粉碎了南越军队对中国西沙永乐群岛的侵犯。

为了适应陆海边防建设和对敌作战的需要，各部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

### 一、牢固树立为国戍边的思想

中国疆界漫长，陆地边界长达2万多公里，海岸线长达1.8万多公里，有大小岛屿7000多个；还有辽阔的领海海域。

在一九八七年底之前，陆地与12个国家毗邻，海上与8个国家和地区为邻。边防、海岛大多环境十分艰苦。边防哨所、雷达站、观通站，有的设在海拔数千米的高山之巅，有的设在人烟稀少的边陲，有的设在远离大陆、交通不便的海岛上，有的设在没有居民的孤立岛礁上。为使干部战士安心服役，完成守卫陆海边防的繁重任务，各边海空防部队的党委、政治机关和各级领导始终把教育部队树立以苦为荣、常备不懈守卫祖国的思想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进行“热爱边疆”、“热爱海岛”的教育。三十多年中，在陆海边防执行任务的广大干部战士，以“边疆海岛我们守，乐为祖国做奉献”的博大胸怀，克服各种困难，经受生与死、苦与乐的考验，忠诚地守卫在祖国的边海防线上。但是有的干部战士长期驻守边防哨所或海岛，面对艰苦的环境，也难免会有一些想法，如认为：高原边防“人迹罕至，有什么好守的？”“馒头大的小岛，有什么价值？”等。针对这些思想反映，各部队十分注意进行戍边守岛意义的教育。讲清这些“人迹罕至”的地方、“馒头大的小岛”是祖国领土的一部分，是抵御入侵者的第一道战壕。它们的安危，同祖国的尊严、命运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的幸福联系在一起，只有边防安全，边境安定，才能国泰民安，解放军指战员应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责任感，为祖国站好岗、放好哨。某部守备4连自一九五七年进驻东南沿海某小岛后，每当新战士和新干部上岛，就组织他们参观小岛，观察周围情况，讲述小岛的重要地位和

守卫在这里的意义，指着隔海相望的某城市的万家灯火，进行“一人辛苦，万人幸福”的教育，使干部战士懂得了辛苦守岛的意义，逐步树立起“以岛为家，长期守备”的观念。广州空军某部有一部分干部战士长年驻守海岛，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艰苦，战备任务很重，这个部队的政治委员带领工作组深入这个海岛，向指战员介绍这个海岛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宝藏、灿烂的文化 and 它的战略地位，讲“热爱海岛就要艰苦奉献”，为国家安全、人民幸福而奉献是革命军人应有的品德，激发了大家坚守海岛，自觉为保卫祖国、保卫四化建设奉献的精神。驻守广西边防前沿的某守备团7连，常年在高山上守卡，在风雨中巡逻，在夜间潜伏，既要忍受高温蒸烤、毒蛇袭击、蚊虫叮咬、泥水浸泡，又要忍受寂寞和孤独，还有休假难保证、找对象困难等许多实际问题。为保证全连干部战士安心守边，该连党支部运用形式多样的教育方法，首先组织党员到驻地附近的古炮台讲传统，到阵地前沿忆英雄，到烈士墓前话得失，自办《妈妈心，战士情》小报，开展“同龄人两地书”活动等，使党员牢固树立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艰苦奋斗建功立业的观念，甘心吃苦、乐于奉献的观念。在党员的影响带动下，全连官兵更加热爱边防，安心边防，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7连一九八二年被广州军区授予“边防前哨模范连”称号，一九八七年光荣地派代表出席了全军英模代表大会。

在进行“热爱边疆”、“热爱海岛”教育的同时，各边海空防部队重视结合驻守地区的实际情况，年复一年地对于部战士进行国际形势教育和边境斗争复杂性的教育。讲清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总是千方百计地对中国进行各种渗透和破坏活动；中国同一些邻国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的“未定界”问题，也常常被与中国为敌分子所利用，借故挑起争端，对此不能不引起高度警惕；与邻邦友好相处是中国的基本方针，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或新产生的领土争议，采取互让互谅、友好协商的办法，以求得合理解决。但由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不排除发生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势力的情况下，中国的边海空防部队不能不有所准备，不能不提高警惕，自觉保卫祖国的每一寸领土。各边海空防部队还重视结合现实对干部战士进行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教育，引导干部战士认清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本质，增强国防观念，提高搞好战备的自觉性，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

为了在干部战士中造成“热爱边疆、热爱海岛”的风气，各边海空防部队开展了学习先进和执勤竞赛活动，使干部战士在艰苦的环境里，振奋起革命精神。南京军区某守备连一九五六年进驻远离祖国大陆的幸福岛时，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全连干部战士硬是靠顽强的革命斗志，一把泥土一把汗，在“石头的世界”、“风的世界”里人工造地，种出了蔬菜，饲养了鸡兔，盖起了营房，修建了操场，大大改变了生活条件，出色地完成了战备执勤任务，受到上级的表彰。一九六三年南京军区在守岛部队中宣传这个连的事迹，开展学习幸福岛守备连的活动，产生了广泛影响。守岛干部战士以幸福岛守备连为榜样，以岛为家，以苦为荣，艰苦实干，努力把自己守卫的海岛建设好，为长期坚守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海军某岛观通站的干部战士，在提高战备自觉性的基础上，苦练观测本领，做到在实兵演习中，对十分隐蔽的潜水艇，只要刚伸出小小的潜望镜，就能在荧光屏上捕捉到目标，几秒钟之内把情况报到指挥所。佳木斯军分区担负800多公里巡逻、定点观察任务的几十个观

察哨，地处中国北部边陲，山高谷深，漫长的冬季冰天雪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由于该军分区在这些哨所中开展了生动活泼、丰富多采的思想政治工作，干部战士个个争当先进，爱边、知边、守边的积极性得到最大的发挥。

在卫国戍边部队中有一大批十几年、二十几年忠于职守的“老边防”、“老海岛”，他们以身作则做榜样。如某军分区副司令员张敬一，艰苦面前不退缩，闹市生活不留恋，在祖国西北边陲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西藏边防某团5连指导员刘世忠，入伍十多年，一直守卫在海拔4700米的高山上，得了高山反应症等病，但他先后4次谢绝组织照顾，坚守在边防哨卡。广州军区三门岛守备营教导员邹正亮，守岛十七载，并在岛上安家，他的爱人也为守岛作出了贡献。六十年代末，一批毕业于内地的大学生，胸怀壮志，投笔从戎，为国戍边，至一九八七年，他们已霜染双鬓，携儿带女，克服艰难困苦，坚守在东北边陲。各边海防部队充分利用这些“老边防”、“老海岛”的感人事迹去教育戍边守岛的广大干部战士。新疆军区边防某部，多次请“老边防”到连队作报告，鼓励干部战士长期扎根边疆，建设边疆。某边防团在精简整编时，一些连排干部因考虑个人出路不太安心，团党委请来14名“老边防”作巡回报告，用他们长期戍边卫国的事迹激励大家，使全团绝大多数基层干部思想稳定下来，安心边防。在职十年以上的连级干部中，有11人在一九八七年被上级树为“老边防”先进典型。

为了激励干部战士热爱边海防，安心边海防工作，每当新战士补入边防、海岛的部队时，领导干部都要组织他们学习民族英雄镇边守关的事迹，或请当地居民、渔民讲地区史、岛史。一九六三年某守岛部队补充了一批新战士，部队政委当即邀请岛上老渔民、大队党支部书记讲述了岛上渔民在旧社会受渔霸欺压的血泪史和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史，希望战士们提高本领，保卫渔民的幸福生活，坚定了战士们的守岛决心。又如八十年代到长江入海口处一个小孤礁上值勤的一些海军新战士，由于岛上环境艰苦，生活困难，有的人望海兴叹，埋怨“祖国这么大，城市这么多，为什么偏偏要我守孤礁？”指导员针对这种情绪，给大家讲当年帝国主义军舰就是从这里进入吴淞口炮击上海的。今天守卫这个孤礁，就是守卫祖国的大门，是为了防止旧社会有海无防受人欺负的历史重演。海军政治机关针对一些战士对南沙群岛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不多的情况，在赴南沙执行任务的部队中开展了以“了解南沙、热爱南沙、保卫南沙”为中心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海洋国土观念教育，提高了广大官兵的认识，强化了保卫南沙的责任感和光荣感。赴南沙的海军官兵经受了苦与乐、生与死的考验，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大无畏的精神，守卫着祖国的海疆，还建成了南沙永暑礁海洋气象观测站，用鲜血和汗水培育出热爱祖国，英勇作战，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团结友爱的“南沙精神”，受到中央军委领导人的高度赞扬。

思想政治教育焕发出官兵艰苦创业，努力把边防哨所和海岛建设好的极大热情。浙江沿海的大陈岛一九五五年国民党军撤退时被破坏殆尽。经过驻岛部队艰苦奋斗，修建起一批新房，建起水库和生产设施，开垦了大片荒地，使荒凉败落的大陈岛成了坚固的海防前哨和繁荣的渔业基地。驻守在帕米尔高原某哨卡的干部战士，从山上背石头，山下背泥土，修建起边防战士之家，筑起一等条1米高的防风墙，种起了“试验田”，在万山丛中奇迹般地种出了嫩绿的蔬菜，收成一年比一年多，使部队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海军驻西沙中建岛部队，自一九七五年上岛以来，常年守卫在西沙群岛最南端1块不

足2平方公里的海岛上。干部战士把爱岛同爱国联系在一起，以苦为荣，以岛为家，在气候酷热，交通和供应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以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战胜重重困难，把沙滩建成林木葱茏、瓜果飘香的“海上家园”，出色地完成了守岛、建岛任务。一九八二年八月，该守岛部队被中央军委授予“爱国爱岛天涯哨兵”的称号。边海防部队的辛勤劳动改变了环境，进一步巩固了官兵戍边守岛的思想。

## 二、认真执行边防政策

中国政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信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这个基础上，努力同一切友好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和睦相处，友好合作。自六十年代起，中国政府和中央军委根据各个不同时期和毗邻国的不同情况，陆续作出关于中缅（缅甸）、中尼（尼泊尔）、中苏、中蒙等边境地区边防工作的若干具体政策和规定。在这些政策规定中，都强调了要维护和增进中国人民同对方国家人民的友好睦邻关系与传统友谊；强调要严守国界，妥善处理边境事务，避免发生边界纠纷，保持边境安宁。明确提出不主动惹事，不挑起事端；发生事件时，顾全大局，以最大的忍耐避免发生冲突等要求。为保证中国政府和中央军委有关边防工作的政策规定得以贯彻落实，边海防部队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深入边海防连队、哨卡向干部战士传达，使每个人都及时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和执行边海防任务应遵循的各项规定，对上级精神领会好，贯彻好。六十年代初，中央军委关于西南地区边防守则和中缅、中尼、中老（老挝）等边境地区边防政策规定制定后，各军区立即行动，有的分别召开各级干部会议，有的结合干部集训集中传达学习和讨论中央军委规定的边防政策和边防守则。一些边防团通过开办训练班，对重点哨卡党团员和骨干进行短期轮训；一些边防部队根据边防守则和各项规定，结合本区情况，编写了通俗易懂的教材，在部队中反复系统地进行教育。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还遵照军委指示组成了3个边防工作组，到云南、西藏、新疆军区，协同各级领导机关将政策规定直接与广大官兵见面。经反复深入的宣传教育，部队的政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边海防部队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在向干部战士反复宣传中国政府和中央军委关于边防政策规定的同时，还重视进行边防部队基本任务的教育，使干部战士具体了解和掌握作为一名边防军人应担负的本职工作：（一）认真学习、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边防斗争方针、政策和规定。（二）提高警惕，加强战备，严守国界，保卫边疆，同帝国主义、地区霸权主义在边界上的侵略、蚕食、颠覆、挑衅作斗争；防范和打击特务、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三）加强同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四）搞好调查研究，熟悉边界走向和争议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查看维护国界标志；加强侦察、观察、巡逻，严密注视当面情况，及时准确上报。（五）做好群众工作，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参加边疆社会主义建设，帮助群众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生活；抓好民兵工作“三落实”，搞好军民联防。（六）加强边境管理，维护边境秩序，保护边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七）搞好会谈会晤，密切配合外交斗争，正确处理边境涉外事务。（八）战时要坚守阵地，迟滞、消耗和消灭来犯者，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

上级命令不准撤退。

通过反复的思想教育和对政策任务的学习，在边防部队干部战士中着重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提高了对执行边防政策意义的认识，使大家认识到，边防部队是国家的“哨兵”，一班哨、一枪一炮、一举一动往往同国家的荣辱相连，边防政策执行的好坏，不仅关系到边防斗争的成败，而且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威望和外交斗争的主动权。原昆明军区某边防团，为了提高干部战士执行边防政策的水平和处理边防事务的能力，把政策教育搬到演习场演练，既讲又练，练讲结合，改变以往只是在课堂上讲解、讨论的做法，大大增强了教育效果。干部战士反映，通过演练，政策条条“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学了就可以用”。二是使每个指战员都熟记有关边防工作的方针、原则和具体规定，并在执行任务中认真贯彻执行，正确处理发生的各种情况和问题，发展与邻国的友好关系。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八十年代在全团开展“四会”、“五熟悉”活动，即会依据政策处理边防事务，会分析报告边防政策执行情况，会依据政策组织实施各种边防勤务，会依据政策介绍、解释边防各种情况；熟悉边防政策，熟悉疆界，熟悉对方情况，熟悉己方情况，熟悉地形，在边防一线的人员中始终保持60%以上的“活地图”、“边防通”，全团执行边防政策的整体水平大大提高。由于广大戍边卫士熟知中国政府和中央军委的边防政策规定，任务明确，因而他们在长年累月远离领导机关的情况下，在尖锐、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能够正确地分析判断边境发生的问题，采取灵活、正确、果断的办法，维护祖国的尊严，保卫祖国的主权不受侵犯。

### 三、军政民合力巩固边海防

守卫祖国漫长的边海防线和大小岛屿，只靠部队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紧紧依靠边海防地区的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搞好军民联防。实行军民联防，就是把军民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充分发挥陆海边防地区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确保边海防的安全。为此，各部队十分注意依靠驻地政府，发动人民群众，共同守卫祖国大门。主要做法有：（一）搞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争取地方政府对部队工作的支持，配合地方政府向居民进行保卫边海防的爱国主义教育。（二）关心当地人民群众的疾苦，尽力帮助当地群众发展生产，抢救抢种，护渔护航，为群众医疗疾病，兴办教育，抢险救灾，以密切与当地人民群众的关系。（三）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边疆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说伤害民族感情的话，不做伤害民族感情的事，努力搞好民族团结。（四）做好民兵工作，使民兵工作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部队驻在哪里，就负责哪里民兵的训练，协助地方政府对民兵进行思想教育，学习边防政策，并教给他们军事技术、执勤方法，使民兵真正成为边海防部队的得力助手。（五）协同地方建立健全军民联防组织，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联防会议，经常相互交换情况，统一部署联防工作，共同担负起守卫边海防线的任务。（六）重视总结军民联防工作的经验，宣扬表彰先进单位的事迹，不断调动军地双方携手联防的积极性、创造性。对搞好军民联防，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历来是十分关心的，在一九七三年的全国第一次陆地边防会议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指出：要搞成一个巩固的边防，不依靠群众是不行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告诫边防部队不能孤零零地保卫

边防，而要 and 那个地方的劳动人民一起共同保卫边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边防会议，对边疆地区群众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重视，边海防地区的军民联防工作越做越好。

进入八十年代，边海防各守备部队把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军民共同守卫边海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例如在海南岛，从一九八五年开始，驻岛部队倡议开展了“富岛强兵”活动。通过这一活动，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把海南军民“经济上想富裕，精神上想富有，军事上想富强”的愿望变为行动，推动了生产发展，增强了军民爱国戍边的意识。群众说：“富岛强兵”的活动，使老百姓和解放军的心贴得更紧了。总政治部向全军推广了海南的经验。在江苏省沿海，自一九八五年五月起开始摸索把海防战备工作和发展沿海经济建设结合起来的路子，使江苏千里海防线形成了哨船、哨所、民兵、部队多梯次配备，军、警、民共守共建的新型联防体系，肩负起战备值勤和沿海经济建设的任务。海军驻海岛、码头、机场等部队，在共建共守活动中，做到“平时互相支持，战时共守海防”，取得了明显效果。

全军各边海防部队与地方共建精神、物质文明的基本做法：一是在共建活动中及时纠正只重视物质建设忽视守卫边海防的倾向，把共守列为共建的重要内容，造成建设边海防、保卫边海防的良好风气。二是组织部队积极参加边海防地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帮助边境地区发展生产，支援边境、沿海地区的重点工程建设，广泛开展智力助民，帮助落后地区发展、完善文化教育事业，主动协助地方维护边境、沿海地区的治安秩序，为富边强边作贡献。三是通过共建活动学习人民群众的好思想、好作风、提高部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促进部队的自身建设，使部队居安思危，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守卫在边海防线上。

#### 四、做好改革开放形势下的思想工作

八十年代以后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特别是沿海地区、边境口岸的对外开放，使边海空防部队的物质文化生活同富裕地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反差加大，给边海空防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为了使边海空防部队干部战士适应变化的新情况、新形势，完成守边御敌任务，各部队党委和政治机关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了不少做好干部战士思想工作的有效措施。

教育干部战士为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作贡献。在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拨乱反正中，边海防各部队积极引导干部战士充分认识国际斗争新形势，自觉维护祖国尊严，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邻国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和睦相处，友好合作，边海防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如在中苏边境，中国边防部队以友好的态度对待苏方。驻黑河地区边防部队在边境执勤中对苏方做了许多宣传工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争取了对方的合作。红其拉甫口岸正式开放后，驻守在中巴（巴基斯坦）、中阿（阿富汗）、中苏边防线上的某边防团和新疆军区红其拉甫会晤站的干部战士，为了维护中国的声誉和民族尊严，既警惕个别敌对分子混进来，又以满腔热情接待过往国际友人。会晤站前哨班每天接待六、七百外国人，做到了礼貌待客，不卑不亢。对未持有有效证件的外国游客，用文明语言劝说其不要越过国境线；对企图非

法入境的外国游客，向其讲清中国政府的有关规定，劝其返回。由于他们文明执勤，被誉为“国门口的文明卫士”。

坚持反腐败教育。许多边海防部队长期驻守在对外开放区，与外界直接接触多，干部战士面临西方腐朽思想、生活方式的影响和敌特用金钱、女色进攻的考验。因此，各边防部队的党委、领导机关重视把反腐败教育列为一个重要课目，经常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宣传人民解放军“拒腐蚀，永不沾”的光荣传统，引导指战员自觉抵制腐朽的东西，做到“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不为金钱、女色所动；二是引导干部战士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正确处理生与死、苦与乐、荣与辱、得与失的关系，经得起各种严峻考验；三是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使干部战士树立起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做到不仅在敌人枪弹面前不屈不挠，而且在“糖弹”面前不失国格、人格，表现出铮铮铁骨。反腐败教育使部队保持和发扬了艰苦奋斗、一尘不染的优良传统。广州军区某部2连，驻守在珠海特区的拱北口岸，与澳门水陆相连。全连干部战士在社会上刮起“一切向钱看”的歪风时，顶住了几十次金钱物质贿赂和女色引诱。在那样的环境里，全连官兵自觉遵守边防政策和纪律，做到不看港澳电视，不看黄色书刊，不购买走私物品，不与地方乱拉关系，成为祖国南大门的文明哨兵，被广州军区授予“口岸执勤好二连”称号。南京军区某守备师，地处福建侨乡，担负着250多公里的海防守备任务。自一九八四年以来，该师坚持把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作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长期任务，在思想教育中着重抓了“三防”，即防止敌对势力“心战”的腐蚀，防止“一切向钱看”思想的腐蚀，防止淫秽思想的腐蚀，机关各部门围绕反腐败制定了相应的制度和措施，增强了干部战士抵制资本主义思想侵蚀的能力，经受住了考验，全师连续四年没有发生严重违法乱纪问题，被南京军区评为预防犯罪先进单位。驻守西藏边防樟木桥头的某部2班，担负着口岸检查任务，一九八三年后的几年中，全班共抓获走私90多起，收缴黄金、麝香、珍奇兽皮等价值达25万多元，用实际行动谱写了“拒腐蚀、扬军威”的颂歌，被部队称为不染铜臭的“铁兵”，受到领导机关的表扬。

加强经常性思想工作。边海防前线，自然环境艰苦，内外关系复杂，边防斗争尖锐。各边防部队的党委、政治机关，非常重视这一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经常性的思想工作。兰州军区政治部，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针对本区边防部队驻在高原、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特点，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着重抓了5个方面：1.突出抓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的灌输和培养；2.运用各种可以借助的教育手段，深入进行思想教育；3.下大力提高连队党支部组织和领导经常性思想工作的能力；4.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5.领导机关为基层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积极创造条件。南京军区舟嵎守备区政治机关，重视针对海岛守备部队的特点，加强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每年到普陀山等地游览观光的中外游客超过100万；每年渔汛季节，到辖区渔港停靠的港澳台轮、外轮近千艘。敌人实行心战策反，海漂心战品增多，多次发现特务活动和特嫌船只；由港澳台轮及外轮、境外游客带入的淫秽、反动书刊、录像大量发现，渗透与反渗透、腐蚀与反腐败的斗争尖锐复杂。为了确保部队经受住考验，圆满完成海边防战备值勤任务，舟嵎守备区部队运用多种形式，经常向干部战士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部队的思想情况，及时矫正官兵的理想、信念、政治观点等方面的偏差；根据海岛驻地社情特点，建立定期点验检查制度，坚决堵塞

各种精神毒品流入军营的渠道；大力加强部队的思想文化建设，普遍开展了“弘扬革命精神，青春奉献海防”、“筑牢思想防线，粉碎‘和平演变’”、“红心向党守海防”等专题读书演讲活动，对于激励官兵安心守岛、抵制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五、不断改善官兵的物质文化生活

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党委和领导机关，对边海防部队的建设十分关心。“为基层服务，为边海防部队服务”，是各级领导机关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之一。三十余年中，各级领导机关坚持经常派工作组到边防站、哨所、岛屿去看望干部战士，调查了解情况，帮助解决急需解决的问题。地处新疆、西藏、黑龙江、福建、广东等边海防前线军区的领导人，经常深入分布在边海防线上的连队和哨所，熟悉边海防情况，不断解决实际问题，总结工作经验。从一九八一年起，沈阳军区后勤机关根据军区党委的要求，协同政治机关坚持到边防部队流动办公，一九八三年派出38人到所有守备部队的团和70%以上的连队，就地研究解决了130多个问题。他们还注意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方法，在工作的指导思想上，由开始主要给钱给物，解决供应保障方面的问题，变为既为部队“雪中送炭”，又注意帮助部队抓好管理；在下部队时间的选择上，由过去多为温暖季节，改为最能暴露问题的严寒季节，以便亲身体会战士疾苦，增强解决问题的迫切感。空军驻西藏某指挥所，一九八六年后把加强边远连队的建设作为提高部队整体建设水平的重点，坚持深入连队调查研究，帮助干部战士排忧解难，改善连队物质文化生活，对边防连队干部实行“四优先”，即晋职、安排入学深造优先，安排休假优先，安排家属就业优先，为连队干部及其家属办理进出藏飞机票优先，受到边防连队干部欢迎。

从一九八二年中央军委作出关于边海防三年建设规划后，三总部和各军区、军兵种领导机关，对全军所有边防点和设防岛屿，进行了调查，经上下共同努力，逐步实现了三年规划，使边海防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九八六年总部派出工作组深入边海防部队了解情况，拍摄了实况录像片，并向中央军委领导作了汇报。为解决边海防部队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总政治部和各军区经常组织文工团、宣传队深入边海防慰问演出，并拨出专项经费给边海防部队添置文娱器材等物资。在国家经济生活严重困难的六十年代初期，总政治部曾购置一大批乐器发给边防、海岛守备部队；七八十年代，军委拨出一大批专款购买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陆续配发给边海防连队，一些海岛部队还配发了电冰箱。原乌鲁木齐军区党委为解决边防一线连队看电影困难的问题，压缩其他方面的开支，购置了价值100多万元的录像器材，为边防一线连队建立了闭路电视系统。成都军区领导机关为解决驻守在海拔5300米的西藏边境某部队的住房问题，于一九八七年拨专款11万元，为他们修建起350平方米的新住房。海军某守备队地处西沙群岛最南端，交通不便，供应困难，海军驻西沙群岛领导机关为解决该守备队在珊瑚沙上种菜的困难，专门调拨船只为岛上运送泥土。一九八五年，商业部和总后勤部联合发出通知，决定从当年四月一日起对边防海岛部队全部供应细粮，以改善边海防干部战士的生活。旅大警备区为解决所属海岛守备部队随军家属安置就业、子女入学入托等问题，经与大连市政府协商同意，从一九八七年开始，



由海岛部队投资 130 万元，在政府有关部门帮助下，建成总面积为 2500 平方米的随军家属基地，解除了守岛干部的后顾之忧。广西军区领导对边防部队大龄干部进行详细的调查摸底，造册登记，主动与地方有关单位联系，军地共同牵线，使几十名大龄边防干部喜结良缘。

云南省军区守备 2 团为解决边防基层单位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给超过 25 岁尚未找到对象的干部每年增加十天探亲假。一九八六年八月，总政治部组织驻守高原、海岛、戈壁部队的干部及烈士子女参加科技夏令营，在北京参观了科研机关和工厂，游览了名胜。

为了鼓励边海防干部安心戍边，人民解放军领导机关从五十年代起相继作出一系列规定，给在边防、海岛的干部以休假、地区补贴等优待。一九六三年四月二日，总政治部制定并经中央军委批准下发了《关于加强海岛部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几个问题》，规定“独立守岛部队主官的编制军衔，可以根据所担负的任务，比一般部队同职务的干部适当提高”，“在一个职务上工作时间久的，也可以根据德才情况，不经副职直接提拔为上一级的主官”。一九六三年召开的全军海岛工作会议还确定，对驻海岛干部每人每月增发 10 元海岛补助。从一九八一年起，根据新的情况对一些旧的规定作了修改，并制定了一些新的规定。当年十月十三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军队干部退休的暂行规定》，凡在高原缺氧、特别艰苦的边防、海岛等地连续工作十年以上的干部，退休生活费可以提高 5%；连续工作十五年以上的，提高 10%；连续工作二十年以上的，提高 15%。一九八五年七月九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军队工资制度改革方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驻守海岛的干部、志愿兵、义务兵，按海岛的设防任务不同和艰苦程度不同，划分为一、二、三类岛屿，给予海岛补助；对参战的边防一线连队、哨所的干部战士每人每月的“临时补助”也有所增加。为解决边海防干部家属住房困难问题，一九八五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在分配住房时，把家属未随军的军队干部计为分房人口，“对在边防、海岛和高原地区工作的军队干部家属，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安排”。在安置干部转业方面，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三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认真做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的意见》提出，对“长期守卫边防、海岛的转业干部，要给予照顾。”一九八六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又发文重申：对长期在边海防工作的转业干部在分配去向上要给予适当照顾，“除了回原籍或入伍地外，也可以到其父母或爱人所在地区”。

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关怀，政治工作春风化雨般的灌输，激起了万里边防海疆戍边卫士的崇高政治责任心。广大边防部队官兵把上级的关怀作为动力，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崭新的精神面貌，扎实的工作作风，搞好部队建设，为祖国边疆的巩固和稳定，作出了新的贡献。

## 第二节 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

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早在十九世纪末，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印度时期，就向中国提出无理的领土要求，遭到了清朝政府的拒绝。一九一四年三月，英国代表亨利·麦克马洪背着中国政府，与西藏地方当局搞了一个所谓“印藏疆界”，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将中印边界东段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英属印度的版图。中国历届政府都明确表示“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无效的。印度独立后，印度当局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的扩张政策，不断侵占中国的领土。五十年代初，又派兵侵占了中印边界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对于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求得合理解决。而印度政府却于一九五九年公然要求将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共12.5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理所当然的拒绝。一九六一年以后，印度军队不断侵犯中国边境，在中国境内设置据点，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印度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克制忍让，公然命令印军越过中印边界东西两段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向中国边境发动大规模进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奉命进行自卫反击。至十一月二十日，中国边防部队经过两个阶段的作战，粉碎了印军的进攻，拔掉印军入侵据点90余个，歼灭入侵印军一部，驱逐了入侵的印军，取得了全线的胜利。为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国边防部队从二十二日零时起主动停火、后撤，并释放被俘的印军，交还缴获的印军物资，中国的正义行动，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热烈赞扬。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在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下和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为保证作战的胜利，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威力。

### 一、激发指战员反对侵略保卫边疆的斗志

在中印边境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各边防部队及时向干部战士讲清中印边界的历史，讲清印度军队在边境制造的种种罪行，讲清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使广大指战员认清中印边界争端是印度挑起的，是印度对中国神圣领土的侵犯，中国对入侵印军进行自卫反击作战是迫不得已的正义之举。许多参战部队抓紧临战前的有限时间，召开报告会、控诉会、誓师会，对指战员进行形势、任务、敌情教育和战前动员，提高大家的参战热情。为了捍卫祖国的领土和尊严，全体边防战士高度警惕，严阵以待，从思想上、物质上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纷纷表示：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祖国的神圣领土决不容许侵犯。“保卫祖国，打出军威国威”成了全体边防战士的行动口号。许多人写了请战书，许多老战士要求超期服役。大批新战士也坚决表示，要在战斗中经受锻炼，为人民立功。

为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各部队请老干部讲革命传统，举办英雄事迹报告会，观看影片《钢铁战士》、《英雄儿女》，广泛宣传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的事迹。广大干部战士庄严宣誓：党和祖国需要我堵枪眼，我学黄继光；需要我炸碉堡，我学董存瑞；需要我守阵地，我学上甘岭的英雄们，为祖国争光，为军旗增辉。在艰险的自卫反击作战中，大批卫国英豪不怕枪林弹雨，不怕高山奇寒，以有我无敌的英雄气概奋勇作战，用鲜血与生命谱写

了一曲曲爱国勇士之歌。被国防部授予荣誉称号的“阳延安班”和“战斗英雄”肖明生、司马义·买买提、陈代富、吴元明、张映鑫、周天喜、罗光燮、王忠殿以及“爱兵模范”张代荣是杰出的代表。被国防部命名为“阳延安班”的勇士们，在战斗中以压倒敌人的气概勇猛冲杀，班长阳延安倒下了，副班长指挥；副班长牺牲了，战士代理指挥；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战士冲上去。全班8个人，最后只剩下1人，仍坚持战斗，同本连5班一起，连克印军碉堡27个，歼灭印军60多名。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消灭敌27号据点战斗中，陆军某师直属工兵营罗光燮所在连奉命担任打开雷场、开辟通路的任务。罗光燮在炸掉左脚、枪被炸坏、爆破筒滚下斜坡的情况下，毅然用自己的身体滚向雷区，为部队开辟了通路。国防部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战斗英雄王忠殿在一次清除印军入侵据点的作战中，两次将爆破筒塞进印军碉堡内，均被印军推了出来，他再次用力将爆破筒推入，并用身躯紧紧顶住，一声巨响，这位年仅18岁的战士与印军同归于尽。新疆军区某部机枪连班长司马义·买买提，在收复羌山口敌据点战斗中，当所在班处于敌火力网下时，为扭转被动局面，他挺身端起冲锋枪向敌人射击，吸引了敌人的全部火力。敌人的一颗子弹穿过他的手腕打进胸膛，另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右肋后，他继续向敌人猛烈射击，直到再次中弹壮烈牺牲。

参战部队广泛开展了杀敌立功运动，充分调动官兵的战斗积极性。战前，各部队政治机关号召士体指战员“为祖国争光，为人民立功”。许多部队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的规定，结合本单位的情况和具体作战任务，补充了立功的具体条件，并组织指战员认真学习，明确立功的目的、意义、条件、要求，制定个人和单位的立功计划，使“人人立功，事事立功，集体立功”的口号落到实处。在战斗中，各部队做到及时评功，抓住典型及时宣传，给大家指明努力方向。某团2连班长谢道银在卡龙战斗中连续爆破，炸毁了印军的主要地堡，自己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并俘获印军中校营长1名、上尉2名。西藏军区前指当即给他记了一等功，从连队报功到批准立功只用了二十五分钟。这一消息宣布后，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向谢道银学习，为人民立功”的口号响彻阵地。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有7146名官兵立功，有615个单位集体立功。他们的事迹被及时传播，极大地鼓舞了部队斗志，使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得到了充分发扬。

## 二、发动官兵战胜高山严寒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在“世界屋脊”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主脉南侧地区进行的。西段的喀喇昆仑山海拔在4000—5000米以上，主峰在6000米以上，终年积雪，地形复杂，空气稀薄，严重缺氧。部队刚上山时，多数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不想吃，不能睡，甚至躺倒起不来。有的地区最冷时达摄氏零下50多度，很容易冻伤，武器也常因冻结发生故障。

东段的克节郎地区，山高谷深，森林密布，道路崎岖，气候恶劣，昼夜温差很大。这种自然地理条件，使部队机动受到很大限制，容易发生非战斗减员；工程作业困难，效率很低；武器的技术性能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因此，鼓励指战员们征服自然困难，成为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取得作战胜利的先决条件。

各部队组织干部战士学习红军长征和上甘岭英雄战胜困难的事迹，使大

家增强了排除万难的勇气，自觉地做到在战略上藐视困难，敢于向困难作斗争；在战术上重视困难，善于同困难作斗争，想出许多对付困难的办法。例如，战胜高山反应要坚持不躺下，坚持把饭吃下去，逐步加强适应性的行军、爬山锻炼。山地越野要由近及远，速度由慢到快，负荷由轻到重，循序渐进，防止过度疲劳。高山防冻要“吃热、穿暖、勤活动”，“不可不动，不宜大动，经常小动”；御寒装具带足、管好、用好，保护好手、脚、耳、鼻、两颊等容易冻伤的部位；掌握长途乘车、露宿、过冰河、守阵地、打伏击、负伤后等容易冻伤的时机，及时进行预防。用擦干净，少上油，抱在怀里温暖的办法，防止武器因受冻打不响和不连发的问题，等等。干部战士提高了战胜困难的信心，进一步坚定了吃大苦耐大劳的顽强意志。战士们说：“我们有困难，敌人更困难；敌人能到这里安设据点，侵占我们的土地，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斗！”“只有解放军克服困难，没有困难克服解放军。”在艰苦的环境中，干部战士用“风扫雪，月点灯，躺在床上看星星，寒风侵身不怕冷”的诗句表达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西段作战的边防部队，往往要爬几千米的大山，除携带武器、弹药外还要带帐篷、大衣、毛皮鞋，平均每人负重 25 公斤以上。有时还要背上炮弹、干粮上山，负重 50 多公斤。特别是炮兵部队，冒着摄氏零下 20—30 度的严寒，凭人力把火炮和炮弹扛上 5000 多米的高山，很多炮手的双手被冰冷的炮弹粘掉了皮，鲜血染红了炮弹，战士们仍坚持完成战斗任务。在一次战斗中，炮兵某部行至狮泉河渡口时，无桥过河，齐腰保的河水里漂着一块块磨盘大的冰块。为争取时间，干部战士脱下棉衣跳入冰河中，手拉着手，肩靠着肩，不怕冰块的冲击，齐心协力把火炮、汽车、弹药拖过河去。许多人的腿被锋利的冰块划破不叫一声痛，头发结了冰不叫一声冷。一位老战士为把汽车拖过河，脱光衣服 4 次跳入冰河挂好钢丝绳。一位副排长连续 13 次涉过冰河搬弹药。干部战士及时渡过冰河，完成了战斗任务。

发扬团结友爱精神。干部关心战士，战士爱护干部，是艰苦环境中最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战友之间在最困难的时候说几句安慰话，端一碗饭，送一壶水；兄弟单位之间，让帐篷，送蔬菜，写表扬信相互鼓励，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作战中，某部有一个排断了粮，3 班长考虑到排长要指挥战斗，不吃东西不行，就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干粮送给排长。排长想，机枪班战士背的重，体力消耗大，又把干粮转送机枪班。机枪班战士谁都不吃，最后只好用水和成汤，每人喝一点。大家就这样同心协力战胜疲劳和饥饿，完成了作战任务。

### 三、叫打就打，叫停就停，一切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政治性和策略性很强。作战对象是同中国仍保持着外交关系的印度；作战目的不是用武力解决争端，而是为了促进和平谈判，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因此，反击作战打不打，什么时间打，打到哪里；什么时间停，停在何处；什么时间撤，撤到什么地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都有具体的考虑和部署。部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坚决保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思想的贯彻执行。

参战部队各级党委首先抓好领导班子的思想，使党委成员深刻认识边防斗争受政治、外交斗争的制约，树立坚强的政策观念、全局观念和组织纪律

观念，并保证部队坚决贯彻执行。从一九六二年春开始，中印边境局势趋向紧张。印度军队深入中国境内安点设卡，步步逼进，连续攻击中国边防部队，打死打伤中国军队官兵。在这种严峻形势下，遵照毛泽东关于“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大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指示精神，总政治部于六月发出关于反对印度军队军事挑衅的政治工作指示，指出：“中印边境斗争是一场政策性很强的斗争，不仅凭枪炮，更要凭政策，既要有高度的战斗积极性，又要有坚强的政策观念。”边防部队党委坚决执行这些指示，自觉地以政治策略思想指导军事行动，面对印军的肆意挑衅，一再克制忍让。直到十月二十日，印度军队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中国边防部队才奉命被迫实施自卫反击。中国边防部队经过一个月的勇猛作战，取得了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印军全线溃退。此时，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军队必将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然而，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在参战部队各级党委领导下，全体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国政府的声明，服从命令，主动停火，后撤至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 20 公里以后地区。这一行动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扬。

为了保证部队万众一心地实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方政策和作战意图，各级政治机关注意通过深入的宣传教育，向干部战士讲清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使他们懂得，军事行动要从政治斗争的全局考虑，并为政治、外交斗争创造有利条件。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全体指战员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叫打就打，叫停就停；叫前进就迅速前进，叫后撤就准时后撤，坚决执行各项政策纪律。一次，山南军分区班长吴元明在绕桥哨卡执勤时，印军不断向他挑衅，用各种手段威胁、恫吓，诱他开枪，逼他后退。面对入侵印军的枪口和刺刀，他毫无惧色，始终坚守岗位，屹立不动，使印军的阴谋未能得逞。在反击作战取得胜利，达成停战协议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交还从印军手中缴获的武器装备和物资。开始，有的干部战士感到“意外”，一时转不过弯来。经过教育，说明这一行动的政治意义后，很快转变了认识。大家把缴获的武器和其他物资一一认真擦拭和整理，整整齐齐地放在指定地点；对缴获的筑路机械、汽车和坦克，不仅擦拭一新，而且加满了油。中国边防部队的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捍卫领土主权的正义立场与维护世界和平的诚意。

#### 四、严守纪律，尊重少数民族

在被印军侵占的部分地区，聚居着藏、门巴、洛巴和登巴等少数民族。他们由于长期受入侵印军的欺骗宣传，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边防军存有疑虑，在自卫反击作战开始时，纷纷弃家逃避。中国边防部队到达这些地区后，切实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执行各项政策，广泛开展为群众做好事活动。部队每到一地，做到不进寺庙，不住民房，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在邦迪拉、瓦弄地区的一些村庄，群众被印军劫走，民房被印军烧拆倒塌，家具、食物狼藉，家畜家禽无人照料，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中国边防军帮助群众收拾整理东西，饲养家畜家禽，收割成熟的庄稼，修补毁坏的门窗、篱笆，并派专人巡查守护。许多部队帮助群众修盖房屋，挖渠引水，抢收抢种。逃跑的居民陆续归来以后，部队为他们医治疾病，向他们赠送盐巴、糌粑、茶叶、粮食等物。有的部队还专门设置接待站，解决群众的食宿困难。有的连

队驻在群众的菜地旁，他们宁肯喝盐水，也不拔食一棵青菜。各部队还向群众反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和中印边境冲突的是非真相，使之家喻户晓。同时，教育干部战士了解并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例如，门巴族反对打狗吃狗肉，比较爱清洁，讲卫生；洛巴族禁忌从后门进入宅内；登巴族家人有病时，禁忌陌生人入内。对此，部队都作出具体规定，提出注意事项，要求指战员切实遵守，并不断进行检查。中国边防部队爱民助民、秋毫无犯的模范行动，使得印度当局散布的“解放军杀人放火，活埋头人”，“强迫喇嘛尼姑婚配，不准信教”等谎言不攻自破。广大群众称赞边防军是“仁义之师”，“消灾降福的救星”。

### 第三节 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

中国和越南山水相连，曾是友好的邻邦。在越南人民反对法、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长期斗争中，中国人民遵循国际主义原则，为支援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总金额达 200 亿美元，其中 93.3% 是无偿的，6.7% 是无息的。根据两国协议，中国还派出高炮、铁道部队和工程技术人员，援助越南的抗战和建设，有数以千计的中国人为了越南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中国的广西、云南两省区，一直是越南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可靠基地和后方。

然而，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刚结束，越南当局就走上反华的道路。他们不断在中越边界制造纠纷，蚕食中国领土，造成了大量流血事件，严重地破坏了中国边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中国政府珍惜友谊，以诚相待，曾多次给予诚恳规劝，提出抗议和警告，但越方却加剧其反华活动。

为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尊严，维护亚洲与世界的和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广西、云南的边防部队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起，奉命进行自卫还击。中国边防部队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同时向越军发起攻击，连克 20 余个军事要地，摧毁一批威胁中国安全的越军军事设施，歼灭一批越军，达到了自卫还击作战的预期目的。三月五日，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中国政府的声明，全线停止攻击，并于三月十六日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一九七九年中国边防部队自卫还击作战之后，越南当局仍坚持反华政策，继续不断派遣军队侵犯中国边境，抢占要地，构筑工事，进行军事挑衅，仅一九八一年，其武装挑衅即达 1500 余次。针对越军对中国领土的侵犯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先后于一九八一年五月和一九八四年四月进行了拔点作战，收复了被越军占领的法卡山、扣林山和老山、者阴山地区。随后，中国边防部队转入阵地防御作战，牢牢地守卫着中国南疆的安全。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是在许多新情况下进行的。作战对象是过去中国曾给予大力援助的邻邦越南；参战的部队多数二十多年未打过仗，团以下干部缺乏作战指挥经验；作战区域是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地形险恶、复杂，气候炎热、多雨，给作战行动带来许多困难；自卫还击作战涉及政治、外交各个方面，政策性很强。军队政治工作在这些新情况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作战的胜利。

#### 一、深入进行战斗动员

中央军委下达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命令后，参战各部队根据总政治部《关于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的政治工作指示》精神，立即深入进行了战时思想教育。

——揭露越南当局的扩张野心，说明自卫还击的正义性和必要性。越南当局推行“印度支那联邦”计划遭到中国的反对后，便把中国当作敌人，并提出了“一切为了打败中国”的口号。一九七五年七月八日，越军总政治部颁布的《关于新形势和任务的教育提纲》明确规定，要对中国采取“进攻战略”，要把中越边境地区变成反华战争的“阵地”和“堡垒”。在其国内，残酷地迫害和驱赶为越南解放和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华侨，煽动民族仇恨。同时，派遣军队侵入中国境内侦察地形，刺探情报；在中越边界构筑大批坚

固工事，埋设大量地雷，甚至把工事和地雷构筑、埋没在中国一侧。上述事实使干部战士认识到，中越边境冲突完全是越南当局挑起的，中越“同志加兄弟”的深厚友谊已被越南当局所破坏，中国对越南自卫还击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不给予还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得到一个安宁的国际环境，东南亚及亚洲的和平就会受到严重威胁。中国出师有名，还击有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广大指战员纷纷表示：“为了惩罚入侵者，捍卫四化大业，不怕抛头颅洒热血，坚决打好自卫还击这场正义战争。”

——控诉越军侵犯中国边境的累累行径，激发干部战士的民族义愤。自一九七四年起，越军就不断在中越边境进行武装挑衅，袭击中国边防哨所和巡逻分队，肆意向中国边境村寨、学校、医院开枪开炮，打死打伤中国军民。仅一九七八年，越南武装人员在中越边境制造挑衅事件就有 1100 余起。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至二月十六日，越军在边境挑衅 129 起，打死打伤中国边境军民 300 余人。广西凭祥市友谊公社召化大队，先后遭到两次抢掠，有 8 人惨遭杀害。其中有卧床的病人，有十二三岁的小孩，有 75 岁的老人。在进行武装入侵和挑衅的同时，越南当局加紧了对旅居越南华侨的迫害。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二月，被驱赶的华侨和华裔越南人超过 20 万人。各对越自卫还击参战部队组织干部战士阅读列举越南当局反华事实的材料；举办越军侵华行径的实物、图片展览；召开控诉大会，请受害华侨、边境居民诉说他们的亲身遭遇；到现地目睹被越军摧毁的农舍、学校、工厂。一桩桩、一件件铁的事实和血的控诉，激起了广大指战员极大的义愤，坚定了给越军以应有惩罚的决心。

——广泛开展“祖国在我心中”活动。各边防部队运用各种形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的部队用历史上不忍外辱、捍卫国家的民族英雄的事迹教育干部战士；有的部队举办“边疆山河美，战士责任重”演讲会，启发干部战士对伟大祖国的深厚感情，有的部队利用地方支前，家属来队的机会，进行爱祖国、爱边疆的教育。这些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大家为国为民自觉献身的精神。“留取丹心献祖国，愿洒碧血筑长城”，成为广大干部战士的共同决心。干部战士纷纷写决心书、请战书，求战情绪空前高涨。许多人不顾亲人病重或去世而走上战场，数以百计的战士放弃上大学深造的机会奔赴前线。被称为“八十年代娘子军”的“三八女子救护队”，年龄最大的 42 岁，最小的 17 岁，有 12 人已经做了母亲，她们为了保卫祖国，别娇儿，上战场，表现了革命军人为国为民忠心耿耿的精神风貌。

成功的战前动员和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化作成千上万干部战士为保卫祖国而战的英勇壮举，广西边防部队某部 2 营，在炮兵密切协同、兄弟部队和保障分队的有力支援下，坚守法卡山阵地三十二个昼夜，顶住了越军的猛烈炮击，打退越军从连至团规模的多次进攻，歼灭越军 300 多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在战斗中，广大干部战士舍生忘死，前仆后继，敢打敢拼，英勇杀敌。

有些干部战士在弹尽枪坏的情况下，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越军展开肉搏。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历史增添了新的光辉。为表彰 2 营的英雄事迹，中央军委于一九八一年十月授予 2 营以“法卡山英雄营”荣誉称号。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收复老山的战斗中，某部 9 连 2 排代理排长史光柱，先后 4 次、全身 8 处负伤，在双



目失明的情况下，仍然顽强地爬着前进，鼓舞战友们英勇冲杀，攻占了2个高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战后史光柱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他说：“力量和勇气主要来自对敌人的恨，对祖国的爱”。某部7连战士吴建国，战斗中勇猛冲杀，消灭3个越军，自己8处负伤。当1名越军军官从暗堡里出来，企图抢走他的冲锋枪时，他以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抱住越军一同滚下百米深的悬崖，用行动实践了他战前写下的“祖国啊，亲爱的母亲，我要用热血和生命来保卫您”的钢铁誓言。

## 二、保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初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出，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是有限度的惩罚性的战争，中国不要越南的1寸土地，要的是边境的和平和安宁；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作战目的。根据这一作战意图，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加强中越边防斗争中的政治工作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教育部队正确理解中央关于中越边境斗争的方针政策，牢固树立保卫祖国领上不受侵犯的坚强决心”。并进一步阐述了中央军委规定的斗争原则：“一般情况下约束在边防斗争的范围之内，不主动惹事，坚持后发制人，有理、有利、有节。越方向我开枪、威胁我生命安全时，应坚决自卫还击。”“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各级党委，及时召开常委会、常委扩大会和干部大会，传达学习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发动大家摆敌情，论战法，反复推敲修改作战方案。为了保证部队万众一心地去实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深入细致地做好各类人员的思想工作，使全体参战人员深刻认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的作战指导方针、原则包含的战略思想、政治意义，以及实现它的种种有利条件。由于思想工作做得有力，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深入人心，使千军万马步调一致，行动统一，斗志昂扬，为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作战过程中，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带领部队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规定的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坚决执行总政治部发布的《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人员政策纪律守则》，使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紧密地结合起来。参战部队为了“维护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培育的中越人民友谊”，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觉维护群众利益。在边境和因追击越军而一度进入越方村寨或城镇后，干部战士露宿野外、街头，吃干粮，喝生水，不过民宅，不动用越南群众的物品。有些越南群众躲在山上没有饭吃，战士们就把省下来的干粮送给他们。一位87岁的越南老人走不动，部队用担架把她抬下山，做饭给她吃。许多部队抓紧战斗间隙，为越南群众发放物资，医治伤病，喂养家畜，引水灌田等。据广西边防部队统计，他们为越南群众发放救济粮15.75万公斤，饼干2300公斤，食盐650公斤，医治伤病群众4600多人，整理、修盖房舍2800余间。战区的越南群众，由对中国边防部队疑虑、躲避、对立逐渐转变为友好，许多人表示要与中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中国边防部队坚决执行战场纪律，对放下武器的越军官兵坚持做到不杀害、不打骂、不虐待，对被俘的越军伤兵及时给予抢救治疗，喂水喂饭。有的俘虏取下手表、金戒指送给中国边防战士，都被一一拒绝。有个越军士兵，被俘时曾夺中国边防战士的手榴弹企图行凶被制止，到俘管所后很害怕。在宽俘政策的

感化下，他转变了态度，说：“从我的亲身感受中明白了你们的政策，我太对不起你们。”有个俘虏伤势很重，得到了妥善的救治和照顾，他在伤愈被释放时说：“永远忘不了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定为中越友谊贡献微薄的力量。”

在转入坚守防御作战后，为贯彻中央军委确定的方针，参战的部队深入进行了思想政治工作，说明边境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克服简单急躁的情绪。进行“热爱边疆，安心边疆，建设边疆”的教育，说明在前方受苦流血是为了后方人民的幸福，祖国边疆的安危关系着四化建设的成败，关系着10亿人民的幸福，从而激发大家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使命感和光荣感。在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同时，采取各种办法解决干部战士的实际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政治机关通过调查了解，建立干部战士的“家庭档案”，对经济困难较大的给予救济；对待业家属，采取扩大军人服务社和家属工厂的办法，安置更多的随军家属就业；改善幼儿园条件，使更多干部的子女入托。有的部队留守处成立“家属服务中心”，专门为干部家属买柴米油盐，对生病、分娩的家属专门派医护人员诊治、护理，包干负责。有的部队主动向干部战士家庭所在地政府通报军人家庭的困难，求得解决；派出干部到干部战士家庭相对集中的地区走访，与地方政府共同协商解决干部战士的实际问题。地方各级政府对部队反映的问题十分重视，给予了大力支持。不少参战人员家属住房严重困难的问题得到解决，责任田由地方组织群众代种。对于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部队实事求是地向干部战士讲清楚，继续创造条件，逐步解决。这种把做好思想工作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做法，有效地巩固了干部战士长期坚守的思想。

### 三、发扬无私奉献精神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是在中国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进行的。各参战部队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新情况、新特点积极主动地做好政治工作，培养干部战士的无私奉献精神，使他们正确对待生死、苦乐、得失。主要做法是：（一）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解放军唯一宗旨的教育和军人职责的教育。结合部队的实际，大讲军人是一种特殊职业，军人的奉献是不能用商品的价值尺度来计算的，军人的“吃亏”和流血牺牲是不能用金钱和物质来衡量的，军人在前方吃苦受累、流血牺牲正是军人职责所要求的，是履行职责的体现，是军人价值的表现。一九八一年以后，当商品经济的大潮波及广西，云南前线时，各部队又采取阵中报告会、“猫耳洞”奉献电话演讲会、战场思想调查、录像展播等形式，进行“得失观”的教育。从而使大家正确认识前后方的“差别”和“吃亏”问题，使“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崇高思想在干部战士心中扎根。（二）开展讲传统学英雄活动。许多部队把本单位的锦旗挂起来，把当年的老英雄、老模范请回来讲传统，把英雄们的事迹编印成册发给干部战士。组织观看歌颂英雄影片，演出赞颂英雄的文艺节目，激励干部战士像英雄那样发扬五种革命精神。（三）广借社会力量

---

“猫耳洞”，一种简陋狭小的掩体，可躬身蹲在里面防炮防弹或休息。

“五种革命精神”即：“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见《邓小平文选》

进行教育。宣传祖国“四化”建设的成就，宣传政府和人民群众拥军支前，对前线官兵的殷切期望，对家属的关心照顾，让大家了解人民群众对前线官兵出生入死、流血牺牲的理解、支持和感谢；组织部队到地方参观访问，请地方人员来队作报告；组织战士同地方青年共同谈理想，论奉献，探索人生之路，等等。这些做法，把干部战士从想个人家事、个人安危、个人前途，引导到想国家安危、人民幸福上来。（四）针对不同对象，有的放矢地做思想工作，对个别在生死、苦乐、荣辱等问题上认识模糊的人，分工专人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提高他们的认识；对有顾虑的新战士进行正确引导，帮助他们弄清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并帮助他们提高军事技术，在生活上关怀他们；对有后顾之忧的人，尽量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五）开展杀敌立功运动，激发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前向干部战士传达总政治部《关于做好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奖励工作的通知》、《自卫还击保卫边疆战时立功办法》。广州军区前指向部队印发了《关于在参战部队中开展争当战斗英雄、人民功臣群众运动的指示》。昆明军区政治部下达了《关于广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的意见》，号召“人人立功，事事立功，集体立功”。许多部队把杀敌立功条件印发到班，把它贴在“猫耳洞”里、炮盾上和驾驶室里。干部战士人人知道立功条件，时时想着杀敌立功。“自卫还击立战功，保卫边疆当英雄”成为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心愿。

通过深入的政治思想教育，指战员进一步树立了“祖国的尊严高于一切，人民的幸福重于一切，军人的职责大于一切”的崇高精神，懂得了在前方吃苦受累流血牺牲的价值，激发了无私奉献精神和革命斗志。许多干部战士把“丹心献祖国，碧血写青史”、“国责重如山，私利轻于尘”、“祖国万事连我心，无私奉献为人民”等战斗誓言写在衣服上、帽子里、腰带上，激励自己为保卫祖国冲锋陷阵，英勇杀敌。有些干部、战士把自己的满腔豪情写成对联“守卫边关，苦中有甜，甜中有苦，一人苦来万人甜；保卫边疆，圆中有缺，缺中有圆，一家缺来万家圆”。“碧血洒老山，捐躯为谁？为国威军威振奋；身居猫耳洞，幸福何在？在千家万户团圆”。这些豪言壮语，抒发了干部战士无私奉献、报效祖国的胸怀，激励了干部战士赴汤蹈火、有我无敌的气概。

在残酷激烈的作战中和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各部队发扬团结友爱精神，互相关怀，互相爱护，互相激励，干部关心战士，战士爱护干部。在一次作战中，有4名与部队失去联系的不同连队的伤员，自动结成战斗集体，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在没有吃没有喝的情况下，爬行四天三夜，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回到了部队。有一个连队在执行穿插作战任务中断粮，副连长想到指导员在前面开路很辛苦，把自己仅有的一块干粮给了他；指导员又把干粮递给身后的战士。这块干粮从队前传到队尾，又从队尾传到队前，最后还是原封不动地传到指导员的手里。这种同甘共苦，团结友爱的精神，使干部战士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凝聚成不可战胜的力量，征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

在每次战斗前，官兵主动写决心书，要求承担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在战斗中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去夺取胜利。云南边防部队某部1营，在一九七九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集体二等功。在一九八一年反击入侵云南麻栗坡县猛洞公社扣林地区越军的战斗中，他们坚决执行上级的命

令指示，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打垮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和袭扰，毙敌 200 多名，缴获武器弹药一批，牢牢守住阵地，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维护了祖国的尊严。为表彰 1 营的英雄事迹，中央军委于一九八一年十月授予 1 营以“扣林山战斗英雄营”荣誉称号。曾在抗日战争中荣获“白刃格斗连”称号的某部 8 连，在夺取老山战斗中以“血染战旗红，卫国当英雄”的气概，当尖兵，打头阵，勇猛冲杀，创立了突出战绩，又获“老山英雄连”光荣称号。某师 5 连战士、战斗英雄何学高，在一次战斗中被两个越军摔倒，一个卡他的脖子，一个拧他的手臂。在这危急时刻，他以有我无敌的英雄气概毅然拉响手榴弹，两名越军当场炸死，他自己也身负重伤。某部 5 连傣族战士岩龙，战斗中与连队失去联系，孤身奋战，机智地与敌人兜圈子，三个小时内打死打伤 20 余名越军。某部 6 连 2 排长王木舟，在攻打谅山的战斗中，发现越军投来的手榴弹在右前方 1 米处顺着山坡往下滚，他奋不顾身扑了上去，用身体压住手榴弹，为保护 7 名战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某师特务连班长、“杨根思式的战斗英雄”李水波，在子弹打光，被越军包围的紧急关头，抓起身边唯一的 1 根爆破筒，毅然拉燃导火索，勇猛地向敌群扑去，与 6 个越军同归于尽。某部 3 连副班长、“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李成文，在一次战斗中担任爆破组长。他不顾腿伤疼痛，抱起炸药包，摸到越军碉堡跟前，在上无悬挂处，下无支撑物的情况下，毅然手托炸药包炸毁越军地堡，用年轻的生命为部队打开了前进的通路。

在长达数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广西、云南边防部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英勇善战、不怕流血牺牲的战斗集体和个人。单是在一九七九年二月的自卫还击作战中，就有 123601 人立功，有 8 个营、36 个连队和 79 名干部战士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其中，丁化国、王息坤、朱仁义、李水波、李成文、陈金钢、李启、吴建国、陈武贤、郝修长、胡绪清、黄吴荣、梁英瑞、曹保勤、韩永民等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光荣称号。还有许多英雄集体和个人的荣誉称号，是大军区以下单位授予或以后的战斗中授予的。所有被授予荣誉称号的集体和个人，都为保卫祖国、守卫边疆作出了重大贡献。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侦察连”光荣称号的广州军区某守备师侦察连，一直驻守在广西边防前线，担负着侦察作战任务。他们每次前出执行潜伏、破袭和捕俘任务，都面临着踩地雷、落陷阶、遭敌伏击、被敌炮击的危险，特别是与越军短兵相接、生死搏斗时，随时可能献出自己的生命。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全连官兵没有一人畏惧后退，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 四、军政民共同保卫和建设边疆

在保卫边疆、自卫还击作战中，参战部队得到了全国人民在人力、物力和精神上的有力支持。特别是广西、云南两省区边境地区组织了几十万民兵、民工支前参战，许多地方出现了父子兄弟齐上阵，祖孙三代争支前的动人情景。仅广西靖西县报名参战的民兵就达 5 万人。广大民兵和民工，配合部队封锁边境、侦察敌情、救护伤员、运送物资、看押俘虏等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跟随部队执行支前任务的民兵，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出色地完成前送后运任务，涌现出许多“供得上，救得下，难不倒，拖不垮”的英雄集体和奋勇杀敌、舍己救人的英雄人物，有 1447 个单位 17595 名个人立功，有 20 个单位、26 名个人获得荣誉称号。

各参战部队十分注意与地方干部的团结，重视加强对民兵的思想政治工作，民兵到达部队之前，各部队都派干部到有关的州、县武装部了解民兵组建情况，做好接收、运送工作。民兵配属到部队后，各部队都指定一名领导干部负责民兵工作，并抽出责任心强、模范作用好的连排干部，协同带队的地方干部加强对民兵的组织领导，做好民兵的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机关还组织民兵学习上级的有关指示，请受迫害的华侨作控诉报告，宣传革命战争年代支前民兵的英雄事迹，激发他们的民族义愤，提高他们对自卫还击作战的认识，坚定他们完成任务的决心。在作战中，及时向民兵传播胜利消息，宣扬民兵的先进事迹，开展“看谁为战斗多做贡献”的活动，表彰遵守政策纪律好、完成任务好的集体和个人。许多部队领导干部经常深入民兵驻地，了解他们的食宿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例如，民兵不会野炊，部队就派老炊事员去传授技术；民兵缺乏军事知识，部队就指导他们进行防炮、防化学、宿营、警戒等训练；民兵缺粮，部队主动把干粮送去，民兵病了，部队及时派医生治疗。有的部队还专门为民兵开设临时食宿站、接待点，使前送后运的民兵随时都能吃上饭，喝上水，得到休息，为了确保民兵的安全，有些部队采取了各种具体措施。如为防越军特工人员混入民兵队伍，制作了特别标志，加强防范；开进时遇有敌情，由部队掩护民兵通过；宿营时把民兵安排在比较安全的地方；民兵单独执行任务时，部队派出分队加以掩护。配属某部的10个担架连，共2036名民兵，冒着炮火爬山涉水运送粮弹，抢救伤员，先后随队转战400多公里，无一人掉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部队的关心爱护，增添了民兵们完成任务的勇气和力量。他们不顾越军炮火封锁，冒着摄氏30多度的酷热，忍着饥饿和疲劳，千方百计把弹药、食品送上阵地，把伤员、烈士运往后方。他们无微不至地关怀伤员，当遇到越军炮火袭击时，有的民兵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员。支前民兵英雄沈玉龙，在一次运送伤员中，冒着越军密集的炮火抢渡外珊瑚河，一块弹片打进他的腰部，肠子流了出来。为了不使伤员掉进齐腰深的水里，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抬着担架，直到战友赶来接替，他用微弱的声音刚交代一句“一定要保护伤员”就壮烈牺牲了。

在战区开展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中，各部队本着“利国、利军、利民、利战”的精神，围绕建设文明富裕的新村寨和对越斗争的坚强防线这一中心，利用作战间隙，与当地政府、学校、工厂、村寨建立“共建”点，制定“共建”计划，热情帮助地方恢复、发展各种经济和文教事业，支援边疆建设。部队设置防御工事，开挖交通壕，既考虑到有利于作战，又考虑到方便群众生活，尽量做到军民两用。为了帮助群众恢复生产，部队派出侦察分队掩护耕种，抽出大量人员助民劳动，组织有专长的战士给群众修理农机具，传授栽培经济林木的技艺；为无校舍村寨修建校舍，为驻地群众开办文化夜校和专业技术训练班。有的学校因越军炮击被迫停学，部队就搭起帐篷、腾出掩体做教室，用炮弹箱改做桌凳，帮助群众办起战地小学。据某集团军统计，在一年内，他们为群众开挖防炮洞438个，构筑交通壕34条，派出9473名干部战士为群众整修被越军炸坏的房舍、院落和桥梁；修理车辆、农具1900多台（件），支援劳动日6.4万多个，看病1.32万人次，开办文化夜校26所，帐篷小学8所，山洞小学1所，专业技术训练班54个，并抽出321名干部战士担任教员，参加学习的各族群众达1530多人。

一些边防地区在军民共建中，组成了由乡村干部、公安人员、民兵骨干

和部队代表参加的“共防领导小组”；前沿重点村寨还设立了“共防联络站”。依靠当地政府，运用多种形式对各族群众进行建设边疆和保卫边疆的教育，提高群众搞好“共建”、“共守”的自觉性。由于组织落实，教育得力，使战区许多军民共建的文明村，成为拥军支前的模范村，军民“共防”的战斗村。麻栗坡县南温河乡南朵村是军民“共建”的先进点。作战中，全村凡有劳动能力的群众全部出动给部队运送弹药物资，其中3名民兵立了战功。一个火箭炮连在一次反击越军战斗时，驻地群众主动派出两个民兵班，扼守交通要道，防越军特工袭扰，保护炮阵地的安全。为使“共防”制度化，部队还与驻地民兵组织共同制定活动计划和协同方案，遇有敌情，军民就能迅速协同围剿。一次，越军两个特工班渗入船头地区，部队和驻地民兵立即采取行动，严守各个要点，使越特工人员寸步难行。群众高兴地说：“搞好‘共建’、‘共守’，我们再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

在“共建”、“共守”中，部队同驻地民兵和各族群众广泛开展对口学、对口帮活动。各部队在为群众做好事的同时，主动帮助民兵进行警戒、捕俘等训练，提高他们对敌斗争的本领。军队想着人民，人民更爱军队，把子弟兵当作亲人。群众看到部队生活艰苦，缺乏蔬菜，就给部队送豆腐、猪肉、鸡、鸭等生活物资。部队出征，群众杀猪宰羊，同干部战士一起吃“拥军饭”，饮“出征酒”，组织支前服务队踊跃参战。麻栗坡县领导人得知作战部队吃水困难，迅速调运6000公斤苹果送给子弟兵；听说第一线部队吃不上熟食，立即赶制了5000袋饭送往前线，干部战士深受教育和鼓舞。他们说：“部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我们为人民保边疆，人民待我们像亲人。”军政军民互尊互爱，互学互帮，形成了磐石般的团结，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钢铁防线。

## 第八章 军事训练中的政治工作

军事训练中的政治工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军事训练作为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掀起一次又一次训练热潮。政治工作围绕军事训练这一部队工作的中心，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有力地保证了中央军委训练方针原则的贯彻落实，保证了军事训练任务的圆满完成。

## 第一节 训练中的思想工作和群众路线

五十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了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阶段，逐步实现了由单一军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随着海军、空军、各特种兵的相继建立和武器装备的更新，部队迫切需要进行正规化训练。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中央军委召开的两次全军院校会议，都重申了一九五一年总参谋部提出的全军训练的基本方针，即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使部队学会掌握现代化的兵器及其他军事技术，以加速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毛泽东、朱德反复强调，部队要加强正规化建设，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培养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首先组建了训练领导机构和各级各类军事院校，组织了文化学习，举办了教学法集训，编写并颁发了条令、条例、大纲、教范等，为开展正规化训练，迎接训练高潮创造了条件。

为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军委总政治部于一九五三年五月发出《关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实施正规训练中的政治工作指示》，要求部队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动员全体指战员，用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勤学苦练的精神，投入这次训练中去”，在军事训练中，政治工作“应发挥其巨大的动员和组织作用”。全军各部队根据这一指示，反复向全体指战员阐明全军实施以军事为主的正规训练的战略意义；动员全体指战员爱护武器装备，掌握新的技术，贯彻执行条令，建立正规军事生活秩序；要求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带领与帮助群众搞好训练；表扬教学模范，号召指战员在正规训练中立功。各级党委重视正规训练中的思想领导，提倡注重训练的实际效果，反对走过场、赶进度、不求实效的形式主义；提倡按照条令建立正规军事生活秩序，反对自由散漫、怕严格、怕正规等游击习气；提倡学习现代军事技术，反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不愿虚心学习、狭隘保守的经验主义；提倡实事求是、深入群众的领导作风，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了全军正规训练的顺利进行。

正规训练开始以后，有相当数量的政治干部的军事素质与开展正规训练中的政治工作的要求不相适应。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在向大会作报告时分析了这一状况，指出：不少政治工作人员对于现代化的军事技术知识缺乏认真的学习和钻研，在军事训练中“插不上手”。因此，要把政治工作渗透到军事技术中去，政治干部必须懂得军事技术。不然，政治工作就会脱离实际，停留在一般化的号召上，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了提高政治干部的军事素质，一九五六年二月，总政治部对全军政治干部的军事学习做出了规划，要求各级政治干部在两年内学会本军种、兵种的一种到几种武器的射击技能，学会小分队的战术动作和组织实施方法，学会本级有关的战役战术课题，以便为做好军事训练中政治工作创造条件。各部队分期分批地抽调政治干部参加军事训练教学法集训，掀起了学习和钻研军事技术的热潮，涌现出大批既懂军事又会做政治工作的政治干部。政治干部深入到训练现场，政治工作渗透到训练全过程和所有训练领域！从部队训练到院校训练；从步兵、炮兵、装甲兵训练，到海军海上训练、空军飞行训练，以及国防科研专业训练；从技术训练到战术训练以至陆、海、空军合练和大规模军事演习，政治工作都十分活跃，保证了各项训练任务的完成。



“向苏军学习”是五十年代前期正规训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之一。通过向苏军学习，人民解放军在管理、训练、执勤中开始按新条令办事，确立了“首长教部属”、“上级教下级”的训练方法和原则，向正规化迈出了一大步。但是在向苏军学习中，也出现了一些糊涂观念和生搬硬套的做法，忽视人民解放军实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一些人认为，“现在部队正规啦，一切按条令办事就行了，用不着再去进行细致的发动群众工作了”。在训练中，他们只注意从上面往下“灌”，依靠和发动群众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练兵方法遭到冷落，发扬军事民主、教学民主的“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等正确做法不再强调了，影响了广大官兵练兵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影响了训练成绩。在一段时间内，许多部队未能完成训练任务。这一情况引起了军委、总部和各军兵种领导机关和首长的重视。

针对上述情况，国防部长彭德怀一九五六年三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一切较重大的工作，都应该运用民主和群众路线的方法，发挥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同年九月，彭德怀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中进一步指出，“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并未改变人民军队的本质，真正的高度集中只能建立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我们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必须反对削弱民主的倾向，必须进一步加强民主，发扬民主。”彭德怀的意见，得到全军官兵的拥护和支持。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团结和组织广大干部，通过深入调查、具体指导和一系列的思想工作，纠正了前一阶段出现的忽视群众路线，削弱民主的倾向，恢复和发扬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练兵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军事训练中实行群众路线的主要做法是：（一）召开军事民主会，也叫“诸葛亮会”。它是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完成训练任务的好形式。在年度训练或一个训练期、一个训练阶段开始之前，各部队除了进行训练动员之外，大部召开“诸葛亮会”，把训练计划、任务、目的和要求交给群众讨论。这样，一方面使训练计划更加完善，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干部战士完成训练任务的主人翁责任感。（二）实行评教评学。发动战士评论教练员的教学工作，同时也评论战士的学习状况。它是“官兵互教、兵兵互教”的具体运用。（三）开展训练竞赛。班与班、排与排、战士与战士之间开展竞赛活动，激发官兵的创造性和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四）开展教学互助活动。一种是包教保学，以老带新，以强带弱；再一种是互学互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五）开展创造优等射手、技术能手活动。这一活动，内容集中，目标明确，鼓励群众刻苦学习技术，对各军兵种广大官兵有巨大的吸引力。（六）开展谈心互助活动。这一活动，使思想工作渗透到每一项训练的全过程，使各种思想问题能够及时发现与解决，有效地巩固了群众的练兵热情。（七）表扬训练积极分子，各部队根据纪律条令规定实施表扬和奖励，并创造出新的形式，如靶前照像，发训练喜报、奖状，在营区设光荣榜，出板报表扬，广播站宣扬，等等。

群众路线的恢复和发扬，大大提高了全军广大官兵学习军事技术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训练计划上所要求的指标，不仅仅有领导上关心，而且成为群众自己的努力目标；许多训练课目和技术上的难点，一个个地为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所突破。训练高潮迭起，技术训练特别是射击训练取得明显效果。一九五六年，许多基层单位改变了射击训练几年不及格的局面，成绩达到优秀或良好，随后还出现了整师整团取得优秀或良好成绩的局面，军事技术水平

比过去提高了一大步。在技术兵种的射击训练和专业训练方面，多数单位的成绩都比过去好。炮兵的火炮操作和射击技术、射击指挥，装甲兵的实车驾驶、夜间行车驾驶和射击训练都有相当的进步。空军的训练强度提高了，加大了飞行日利用率，基本驾驶技术和战斗使用课目的训练质量较往年有所提高。防空军由于训练成绩的提高，对空情报兵雷达站的情报工作有了改善，在保证对空作战上有进步。海军舰艇部队、航空兵、岸防兵等的基础课目的训练也有提高。由于专业知识与技术操作能力的提高，全军的技术事故发生率降低，武器装备保管、维护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善。

这一时期全军在军事训练中实行群众路线的共同经验是：第一，军事训练既需要自上而下地领导，又需要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仅有自上而下的命令、要求，没有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处处被动，是难以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创造性的。教学上“首长教部属”的原则，一般说来是对的，但是，不能把这一原则与群众路线对立起来。训练当然是官教兵的工作，但也应有兵教兵的活动，同时也不应排斥在某种场合、某些问题上的兵教官，就是说，军官也要向士兵学习。事实上，只有善于走群众路线的首长，才能更好地教育部属。第二，实行群众路线，是以良好的官兵关系为基本条件的，而官兵团结的前提又是干部要有群众观念和民主作风。群众发动的好坏和训练成绩的好坏，与官兵团结状况的好坏一般是成正比例的，内部越团结，群众发动越充分，训练成绩就越大。命令主义和惩办主义是损害群众积极性、主动性的。有些同志在训练工作中只强调干部技术条件的重要，不强调干部作风的重要，这是不全面的。领导训练的干部仅有军事技术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良好的训练方法和领导作风。这样，才能训练好部队。训练中，政治工作如果不去抓住这个方面，而去忙于其他的不关重要的事务，是“舍本求末”，是不会产生多大效果的。第三，贯彻群众路线，不是简单号召一下就能办到的，这里面包含许许多多的思想工作。要在干部中进行思想教育，使他们深刻认识坚持群众路线与开展正规训练、充分调动群众练兵热情的关系，从而自觉增强群众观念；召开党代表大会、军人代表大会、军人大会，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开展民主检查，纠正各种脱离群众的作风。第四，实行群众路线必须遵守的原则是：民主的原则（不要领导包办）；自觉自愿的原则（不要强迫命令）；照顾多数的原则（不要只顾少数，脱离多数）；逐步提高的原则（不要不分步骤地一下子提出最高要求和目标）。这里除了一个领导同被领导亦即干部同群众的关系之外，还有积极分子同广大群众的关系，先进同落后的关系。这些关系处在不断变化中，只有经常注意这些情况的变化，才能正确处理其相互关系，使干部、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经常保持团结，从而调动起各方面的练兵积极性。

上述经验，总政治部在《关于在军事训练中执行群众路线的初步总结》一文中作了充分阐述。这个总结于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后，全军部队和院校普遍组织学习讨论，对照检查，有的还开办训练班，组织专门讲授，对人民解放军继承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做好军事训练中政治工作乃至整个政治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第二节 开展创造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活动

军队实施正规训练初期，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忽视技术训练的偏向，许多部队和军事学校军事技术训练未能完成规定的任务。到一九五五年底，部队虽然经过两年多的正规训练，但是，有些技术，特别是各种射击技术的提高是很不够的。为此，彭德怀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在辽东半岛军事演习的军官会议上提出：“对于勤学苦练而获得优良成绩的人员应该予以奖励，以便迅速把我军的射击技术和其它各种技术提高一步。”

为了迅速提高军事技术，一九五六年二月全军青年工作会议提出：动员青年努力提高军事技术，熟练掌握手中武器，开展创造优等射手和技术能手活动。某部队9位青年班长首先响应这一号召，给全军青年班长发出倡议信，希望共同率先开展创造优等射手和技术能手活动。三月二十三日，《解放军报》发表了他们的倡议信，许多部队的青年班长和战士纷纷响应。六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创造优等射手和技术能手问题的指示》。此后，创造优等射手和技术能手活动在全军普遍开展起来。至一九五七年，全军评出了数十万名优等射手和技术能手。步兵的步骑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实弹射击成绩，全军总评优秀，其中60%的师每种枪射击成绩都是优秀。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等技术兵种，都能熟练地使用本兵种的各种武器装备，能在一般情况下完成所担负的任务。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由于错误地反对教条主义，创造优等射手和技术能手的活动受到了一些削弱。一九六一年二月，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军青年工作会议重新发动全军青年“开展优等射手、特等射手和技术能手活动”。一九六二年四月三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联合颁发了《关于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基本标准的通知》，统一了“三手”的名称和评定标准。从此，创“三手”活动在全军又一次普遍地开展起来。

在开展创造“三手”活动中，为了使群众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把神枪手分为优等射手和特等射手，把神炮手分为优等炮手和特等炮手；把技术能手分为二级技术能手和一级技术能手。对不同等级提出不同的要求，便于逐步提高。如对优等炮手的要求是，熟练地掌握本职的专业技术，操作准确迅速，协同密切，爱护武器装备，年度训练重点课目和实弹射击成绩达到良好，总评良好，能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完成任务。对特等炮手则要求更高：除具备优等炮手的条件外，必须精通本职专业技术，年度训练重点课目和实弹射击成绩达到优等，总评优等，能在各种复杂的条件下完成任务。

“三手”一般是在年度训练结束时，结合训练考核、训练总结评定的。优等射手、优等炮手和二级技术能手在连队评定；特等射手、特等炮手和一级技术能手，经团一级或直属上级专业部门考核评定。学校和教导队的学员，依学期进度进行“三手”评定。评定“三手”贯彻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先由群众评议，后经领导批准，把评定的过程，作为总结经验，互相学习，进一步调动群众积极性的过程。凡按规定条件评出的优等射手、优等炮手和二级技术能手，由营审查批准，报团或相当于团的单位备案，并授予证书；特等射手、特等炮手和一级技术能手，由团或相当于团的单位审查批准，并授予证书和奖章。

“三手”活动的开展，使广大干部战士把保卫祖国的责任感和争取革命

荣誉的上进心紧密结合起来。经过反复宣传学习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重要意义，大张旗鼓地表彰苦练、巧练“三手”技术的典型，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干部战士苦练军事技术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无论在陆军，还是在海军、空军，争当“三手”的口号深入人心，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大量涌现，遍及全军的各行各业。全军普遍评定“三手”的第一年即一九六一年，就涌现出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 18.19 万名，一九六二年增加到 33.43 万名。“三手”活动的广泛开展，迅速改变了军事技术训练落后的状况，不仅普遍完成了技术训练任务，而且大大高于训练大纲规定的指标。如陆军某团 4 连，在一九六一年上半年还没有一名神枪手，下半年就培养出 57 名神枪手，一九六二年又增加到 100 名。一九六三年，他们向兄弟部队输送了 20 名特等射手和 34 名优等射手，在神枪手大批调离的情况下，年终又达到 102 名。自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4 连先后在严寒酷暑、大风大雨、白天黑夜、山地丛林等条件下打靶 25 次，头两次总评良好，以后次次优等。在此期间，4 连接受上级 6 次射击考核，不论是事先有通知的考核，还是没有通知的突然抽查，干部以及文书、炊事员、司号员等一律上场，6 次考核次次优等。这个连成为“打得准”的一面红旗和开展“三手”活动的典型，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他们以“神枪手四连”的称号。命令号召全军部队以“神枪手四连”为榜样，苦练过硬功夫，为提高战斗力而努力。在国防部的号召下，“三手”活动进一步开展，成绩更加显著。一九六四年全军的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上升到 43.55 万名，并涌现出一大批全军闻名的技术尖子。如 124 次射击 123 次优秀的神枪手雷凯，准确攻击空中目标的著名空中神炮手鲍寿根，在各种复杂条件下保证通信联络畅通的海军通信兵一级技术能手徐国兆，目测 260 个目标及格率达到 98.9%、优秀率达到 86.2% 的炮兵一级技术能手王金陵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一批又一批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的涌现，进一步推动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提高了整个部队的军事技术水平。

### 第三节 推广郭兴福教学法

人民解放军经过几年的正规训练，军事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进入六十年代，进一步提高战术训练水平的问题被突出地提到日程上来。许多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重视在抓好军事技术训练的基础上，加强部队的战术训练。在这种情况下，全军涌现出大批战术训练搞得好的单位和个人。南京军区某团2连副连长郭兴福是其中突出的典型。

一九六一年，南京军区某军军长李德生对部队的军事训练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后提出：部队的技术训练使用的时间太多，战术训练中的模式化、走过场现象严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一九六一年年度训练刚开始，李德生所在的军组织军、师、团联合工作组到某团2连蹲点，确定从单兵、小组、班战术训练开始，进行训练改革试验。这一年五月，该军召开了具有实战经验的营以上军事主官参加的现场会，审查了3个战术课题训练改革试点成果，认为某团2连副连长郭兴福在小组进攻战术训练中教学方法比较活，而且注意做好现场思想鼓动工作，值得推广。在军、师、团联合工作组的指导帮助下，郭兴福刻苦学习，勤于思考，教学水平又有了明显进步。一九六二年三月，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认真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指示，并运用郭兴福这个典型，召开现场会，组织巡回表演，在军区范围内大力推广，使部队训练工作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一九六三年，郭兴福和他带的一个教学班，应邀到广州军区、武汉军区、沈阳军区及本军区部队巡回表演250多场次，观众达10万多人。所到之处，无不引起极大反响。

中央军委主管军事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对郭兴福教学法十分关注。他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江苏省镇江参加了总参谋部召开的郭兴福教学法现场表演会，参观了郭兴福以及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之后涌现出来的许多优秀教练员和先进分队的表演，并与郭兴福、郭兴福式的教练员和主管训练的干部进行了座谈。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叶剑英将郭兴福教学法概括为5个特点：第一，善于在教学中做思想工作，充分调动战士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谁做的动作好，就请谁示范，让每个人的长处都能发挥出来。第二，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把过去战场上出现过的和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到战士面前，诱导战士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用各种办法去战胜敌人。既练了战术动作，又培养了勇敢灵活精神。第三，由简到繁，循序渐进，情况诱导，正误对比，使战士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一步步提高。组织很周密，教得很灵活。第四，把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要求战士做好的动作，自己首先做好，把每个训练动作的要领概括成易懂易记的几句话、几个字，先讲解、后示范，边练习、边讲评，使战士百听不厌，百练不倦。第五，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循循善诱，耐心说服。对战士做的动作，哪怕是细小的问题也不轻易放过。但是在纠正的时候，又耐心讲清道理，启发战士自觉改、喜欢改、改得快、改得好。叶剑英称郭兴福教学法“是我军传统教学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训练工作的一项重大革新”。并指出，郭兴福教学法不单是部队训练的一种方法，还要从继承解放军的光荣传

---

叶剑英：《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把我军训练提高到新的水平》，《解放军报》1964年1月21日第1版。

统和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高度来认识它的意义。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叶剑英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掀起军事训练的高潮。毛泽东主席看了报告后说：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热潮。一月下旬，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全军训练会议，对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作了部署，要求各部队、各军兵种和各院校，都要认真学习郭兴福和郭兴福式的教学方法，掀起学习郭兴福、赶上郭兴福、超过郭兴福的热潮，以军事训练的优异成绩，参加全军比武。二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宣传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指出：宣传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不仅是军事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是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全军要运用各种形式宣传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在中央军委的号召下，各部队采取现场汇报、办训练班、巡回表演等方式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大力提高战术技术水平的群众性的练兵热潮迅速兴起。

在群众性大练兵的热潮中，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十六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副主席董必武、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检阅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部队的军事表演。毛泽东等对受阅部队奋发的革命精神、高昂的战斗意志、顽强的战斗作风和精湛的军事表演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给全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把大规模的群众性练兵活动推向了新高潮。人民解放军分别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南，在天空、海洋，举行不同形式和规模的比武竞赛，比、学、赶、帮、超活动遍及陆、海、空三军。

在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比武中，政治工作空前活跃。陆、海、空军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的大批干部，纷纷深入部队的操场、炮场、机场、舰艇、各专业分队以及院校班组，广泛宣传中央军委的指示，宣传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重要意义；同时各级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一起，运用“深入一点，取得经验，推动全盘”的领导方法，培养自己的“郭兴福”，使本部队有学习的榜样。许多军区司令员、军长、师长、团长和各级政治委员，亲自蹲下去“种试验田”，“解剖麻雀”，和战士一起摸爬滚打，言传身教。在这一年的群众性练兵活动中，军政干部一起动手，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使全军传统的练兵方法有了新的发展，同时也使各级党委、政治机关的工作作风有了很大改进。

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极大地提高了基层政治干部学习军事的自觉性，对加强训练中政治工作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许多基层政治干部跟随分队一起训练，在训练过程中适时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总结出大量宝贵经验。在这方面，最早引起广泛瞩目的是南京军区的两位基层政治干部。一位是某部侦察连指导员侯书信，一位是通信团1连副指导员商顺嵩。他们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同战士一起摸爬滚打，生动地体现了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人员身先士卒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叶剑英和罗瑞卿的表扬。叶剑英在视察南京军区的战术演习后说：“这次演习分队有两个指导员跟班作业，自己以身作则，爬上悬崖，爬上高竿，这本身就是无言的政治工作。战士们很信服他们，提出了向他们学习的口号，这对战士练兵情绪是个鼓舞，对战士苦练技术是个好的榜样。”罗瑞卿说：“这两个分队的指导员跟班作业，既把政治工作渗透到军

事业务中去，又起了政治工作人员最实际的模范作用，这是很值得赞扬、很值得学习的。这也是我军政治工作人员的光荣传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继侯书信、商顺嵩之后，各军区、海军、空军出现了一批深入操场、炮场、机场、舰艇跟班作业的指导员、教导员、政治委员。政治干部大兴深入训练实际和联系群众的作风，切实保证了军事训练任务的完成。

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也提高了军事干部做好训练中政治工作的自觉性。相当多的军事干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提出了争当“四会”教练员的口号，即在教学中不但会讲、会做、会教，而且还会做思想工作，各部队都涌现出一大批“四会”教练员。这些教练员把思想政治工作同小分队战术训练全过程紧密结合起来，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及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和群众性大练兵热潮的兴起，对贯彻中央军委制定的训练方针，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增强战备观念，起了重要作用。全军一九六四年步兵武器训练获得优等成绩的师，比一九六三年增长4倍，投弹平均40米以上的师，比一九六三年增长6倍。但是，在比武中也产生了一些弄虚作假、拼凑尖子、搞形式主义的现象。总部及时发现了这些现象，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 第四节 保证教育训练的恢复与发展

从六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教育训练，经过几度挫折、恢复之后逐步走上了全面改革发展的历程。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以后，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夸大群众性练兵比武中出现的、而且已经被纠正的一些枝节问题，否定练兵运动的成绩与方向。他指责军事训练搞得过于突出，占用时间过多，“冲击了政治”，并诬蔑负责军事训练的领导人有“单纯军事观点”。与此同时，他在全军加紧推行极“左”的军事路线，一再鼓吹“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一切工作都要给政治让路。一九六九年，林彪又提出大砍大撤军队院校。林彪的这些做法，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受到了建军以来最严重的破坏，指挥院校差不多被全部撤销，大批军事训练先进典型和业务技术尖子受到排斥、打击，许多部队训练指标不明确，措施不落实，考核走过场，部队的战斗力明显下降。

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间，毛泽东针对林彪在军事训练上推行的取消主义，强调“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九·一三”事件以后，全军各部队大力加强教育训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干部战士结合批林整风，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深入批判林彪的极“左”军事路线，正确处理政治与军事、红与专的关系，自觉加强军事训练。各级党委成员和广大政治干部纷纷深入教育训练第一线，带头摸、爬、滚、打，抓思想、抓作风、抓管理，总结经验，培养典型，表彰先进，有力地推动了全军教育训练的恢复与发展。一九七二年全军恢复了教导队，1.9万余名有作战或训练经验的团以上干部到教导队任教，基层干部普遍到教导队轮训，研究现代战争，学习本职所必需的技术和战术。一九七三年开展了以打坦克为主的“三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兵）、“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训练和野营拉练，锻炼了领导机关和基层连队的思想、作风、技术、战术，密切了军民关系，增强了官兵团结，使全军的训练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一九七四年初江青一伙人发动所谓“批林批孔”（批判林彪、孔子）运动，让部队去“评法批儒”（评论法家，批评儒家），学习“儒法思想斗争史”，迫使部队停止了训练，又一次把重新兴起的练兵热潮打了下去。

一九七五年七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针对林彪、江青一伙人破坏军队建设的严重情况，提出“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在传达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过程中，全军各部队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领会邓小平的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搞好军事训练对军队建设和增强反侵略战争能力的重要作用，重新开展群众性的练兵活动。可是一九七五年底，江青等人又在患重病的毛泽东面前诬陷邓小平，在全党全军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们诬蔑邓小平提出的重要决策是“单纯军事观点抬头”、“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回潮”，再一次给部队的练兵热情泼了冷水。

---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叛逃出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邓小平：《军队整顿的任务》，《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21页。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中央军委迅速采取措施，在军事训练领域拨乱反正，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军事训练的罪行。一九七七年二月，叶剑英在军委座谈会上提出，在军队建设上肃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必须从思想上弄清楚十个问题，其中之一是“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同年八月，邓小平重申“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十二月，中央军委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和《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这两个决定是拨乱反正、全面恢复正规化训练秩序的纲领性文件，对全军教育训练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军委的指示，保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大力加强政治工作。（一）认真组织传达学习军委全会精神，提高部队对教育训练重大战略意义的认识。一九七八年初，全军部队召开各级党委扩大会，举办干部集训班，贯彻军委全会精神。基层单位进行了专题教育，组织学习中央军委的决定，学习领会邓小平关于“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指示，从军队的职能、军事素质的状况、现代战争的要求等方面认识加强教育训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二）进行教育训练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为了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提高指战员的练兵热情，各部队深入开展了“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讨论。通过批判林彪的“突出政治”和抓训练是“单纯军事观点”等谬论，弄清政治与军事、红与专的辩证统一关系，认清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是关系到军队建设、战争胜败、国家安危的大事。同时，大张旗鼓地为一九六四年开展的大练兵和比武恢复名誉，为受到错误批判的干部平反，澄清了“抓政治保险，抓军事危险”的模糊认识，消除了广大干部抓军事训练的思想顾虑。（三）恢复院校，培养军事人才。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从机关、部队选调干部，充实或组建院校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配备教员队伍，抓紧落实有关办校、收生、开课等问题。全军在原有基础上增建院校28所，至七十年代末使院校总数发展到116所。各院校党委，政治机关认真贯彻执行军委制定的办校方针、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教学为中心，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院校教育与部队建设相结合的原则，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四）在邓小平亲自指导下召开的一九七八年四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把加强教育训练、科研等项任务中的政治工作，列为一项重要议题。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广大指战员充分认识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重大意义，贯彻落实中央军委《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积极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习组织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艺术，学习现代化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要像战争年代保证胜利完成战斗任务一样，把政治工作贯穿到教育训练、科研等各项任务中去，提高部队战斗力。”这次政治工作会议，对于大力加强政治工作，保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具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的政治工作意见》，要求全军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决策，进一步落实一九七七年军委全会确定的方针、任务，加速实现国防现代化，并且明确指出：为了适应加快现代化革命军队建设和现代化作战

的要求，必须把部队的教育训练作为中心任务来抓。据此，各部队认真组织干部战士学习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精神，认清形势，分析军队建设的薄弱环节，提高对军队工作重点转移的认识，自觉地把军队工作的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集中主要时间和精力搞好教育训练，把部队的战术技术、协同作战的本领和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重视提高政治干部做教育训练政治工作的“三个能力”，即提高把政治工作贯穿、渗透到教育训练中去的能力；提高组织开展训练中群众性政治工作的能力；提高政治干部的战术技术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与此同时，还注意动员各种组织和人员都来做教育训练的政治工作。如，发动教练员，把教学、训练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加强教育训练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及时性；加强党支部对教育训练的领导，发挥共产党员在教育训练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给团支部、革命军人委员会交代任务，提出要求，通过他们开展练兵场的宣传鼓动，组织评比竞赛，调动团员、青年的练兵积极性。

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全军的教育训练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兴旺景象。各部队投入教育训练的人力、物力、时间逐渐增多，战术、技术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水平不断提高；各军事院校和军事科研机构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探讨现代战争的指导规律和战法，各军区、海军、空军和战略导弹部队，多次进行了现代条件下的作战演习和核反击演习。一九八一年秋，在华北地区组织的解放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方面军防御战役实兵演习，突出地显示了人民解放军在提高合成军队作战能力、运用现代化作战手段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突出地显示了在大规模的实兵演习中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这次演习有陆军、空军部队 11 万人参加，出动坦克、装甲车 1300 多辆，火炮 1500 多门，飞机 285 架，汽车 1 万多辆。参演部队的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深入扎实地开展了演习中的政治工作。演习任务一下达，北京军区政治部立即发出演习政治工作指示，提出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要求；召开有关会议，对演习中的政治工作、战时政治工作的研究和演练进行了部署；根据演习的进程和部队的思想实际，一环扣一环地加强对演习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在半年多时间里，为了使整师整团的部队合得成，充分发挥整体作战的威力，各级党委、政治机关重视用中央军委领导的有关指示不断进行思想发动，充分调动广大指战员搞好演习的积极性；不断教育指战员克服单一兵种思想，增强合同观念、全局观念、协作观念，把演习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做到以思想上的合成保证军事上的合成。演习中，无论是陆空之间，还是步炮、步坦、前后方之间，无论是部队的集结、开进、冲击、穿插，还是演习的各项保障工作，都能按照协同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各参演部队普遍讲友谊，讲风格，增进相互之间的信赖和团结，虚心向友军学习，处处为兄弟部队着想，有了困难宁肯自己吃苦受累，也要为兄弟部队提供方便；有了成绩争着给兄弟部队摆好、请功；出了问题实事求是地主动承担责任，严格要求自己，通过演习增强了友谊和团结，发扬了高尚的风格，体现了合成作战的新水平。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观看并高度评价了这次军事演习，称赞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军政素质好，具有优良战斗作风和严格组织纪律的有战斗力的军队。他在检阅参演部队时指示全军：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努力使部队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一定要在国民

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一定要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增强军队内部团结，加强民兵建设，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加强军政训练，进一步增强部队的军政素质，努力提高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进一步开展“四有、三讲、两不怕”的活动，加强作风培养，使部队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一定要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作出新的贡献。邓小平的指示为新时期军队建设，包括政治工作建设指出了方向，也是保证完成军事训练任务的重要依据。

一九八二年九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一九八四年五月，中央军委提出把解放军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一九八五年五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决定。为了保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这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现，进一步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位置上来，推动训练改革向纵深发展，军队政治工作重视适应教育训练情况的变化，不断研究解决新问题，推动教育训练任务的完成。

### 一、围绕训练指导思想转变进行宣传教育

一九八三年十月一日，邓小平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方针。一九八四年一月五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发出《关于全军训练改革的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了教育训练改革的指导思想、内容、步骤和方法。政治工作结合训练动员、干部集训等，认真宣传军委、总部的这些指示精神，抓好训练指导思想的三个转变，即在训练对象上，反复说明干部是军队建设的骨干，是带兵、练兵、养兵、用兵的领导者，是作战的指挥者，强调要把训练的重点从抓战士转变到抓干部方面来；在训练内容上，说明主要作战对手的特点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解放军还将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强调从着重抓步兵训练转变到着重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兵训练上来；在训练中心的掌握上，说明现代战争要求部队具有综合作战的能力，强调从着眼于单一兵种训练转变到诸军兵种合同战役战术训练上来。

一九八五年，中央军委提出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要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到平时时期的建设轨道以后，有的人认为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军事训练不那么重要和紧迫了。有的单位把注意力放到了抓生产、改善经济条件上，挤占了许多人员、时间、经费和装备。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各级党委、政治机关有针对性地组织部队学习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指导思想，举办国防系列教育，开展战争与和平、经济建设同国防建设的关系等专题讨论，帮助干部战士不断克服模糊认识，激发爱军习武、投入军事训练改革的热情。许多部队开展了谈形势、论训练的活动，使大家看到在国际形势缓和的情况下出现的不安全因素，从而促使指战员从保卫祖国的根本职能出发，自觉地从难从严进行训练。“从军不习武，不算尽

---

邓小平：《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350页。

义务；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成为广大干部战士的行动口号。许多部队从实战要求出发，努力提高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电子对抗能力、后勤保障能力和野外生存能力。沈阳军区某摩托化步兵师有意识增加训练难度，有车不坐，二十一个昼夜徒步奔袭 600 多公里，连续打了“伏击战”、“遭遇战”、“野战阵地防御战”等 3 场“恶仗”。济南军区某团在事先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断绝部队给养十天，磨砺野战生存能力。有两个营在连续三天喝菜汤、吃草根的情况下，打完“遭遇战”后，又立即进行奔袭 10 公里和翻越 5 个山头的急行军。在从严从难的训练中，政治工作发挥了坚强的保证作用。

## 二、推动教育训练改革

进入八十年代后，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给军队的教育训练及其思想政治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改革陈旧过时的训练思想、训练方法、训练内容，成为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一个重要特点。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全军教育训练改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在会上指出：“教育训练的改革非常必要，只有改革才能有出路，不改革就不会有发展，就不能保证训练质量，就不可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有效地提高战斗力。”“教育训练的改革，要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必须首先“破除墨守陈规、安于现状的保守思想”。一九八四年一月，中央军委印发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全军教育训练改革的若干问题》。文件认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军队的教育训练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同军队的建设和现代战争要求还不相适应，在内容、方法、体制和规章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全军必须在党的十二大和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指引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加强和改革教育训练，把我军的教育训练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保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有关改革的方针政策在全军贯彻执行，推进军队教育训练的改革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从一九八三年之后的一个阶段里，军队教育训练中的政治思想工作突出了以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教育。政治思想工作紧密配合军事训练的改革，广泛宣传训练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宣传改革的方针和原则，宣传改革的先进事迹和先进经验，促进改革的思想与实践逐步向军事训练的各个领域渗透。许多部队结合教育训练的实践，再三地向干部战士宣传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并说明它的理论根据和哲学原理，从而使大家充分认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对军队教育训练的广泛指导意义，自觉地“想改革的点子，走改革的路子，做改革的尖子”。有的部队通过分析科学技术的进步，武器装备的发展，战争条件的变化，传统练兵的优劣，激发干部战士进行训练改革的热情，不断提高训练的质量和效果。

对改革的宣传教育，促进了全军干部战士的思想解放，使得一些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加时效观念、人才观念、信息观念、现代作战观念等等逐步确立起来，从而推动了教育训练的改革。例如：陆、海、空三军部队广泛开展了模拟训练，用较短的时间和较少的物资、经费，取得了较好的训练效果。一些飞机、舰艇、导弹、坦克、火炮、车辆的模拟训练器材逐步推广。空军各航空兵学校、飞行团，在一九八五、一九八六两年中，利用模拟器材进行训练 9.4 万多小时，比在飞机上完成相同时间的训练减少经费

99.9%。

全军部队特别是高级领导机关，加强了军事科学理论的研究，重视学习外军教育训练的好经验、好做法。院校重视转变教育思想，汲取世界军事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从科学预测出发，大胆改革培训目标。面对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和战争的规模、样式、特点的迅速变化，各部队重视努力拓展战备训练的新领域，电子对抗等内容成为训练、演习的重要课题。全军加强了军事科学理论研究，从一九八六年开始，总部先后举办了“国防现代化发展战略”、“新时期军事斗争形势、任务与战略指导”等系列讲座。遵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的改革开放方针，许多部队重视学习外军教育训练的好经验，有的部队成立了信息研究中心，建立了信息传递网络，广泛搜集外军信息，学习外军先进的技术和训练方法，指导部队的学术研究工作和军事训练。在研究高度现代化发展的战役指挥和军事技术发展中，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干部，认真探讨政治工作的建设与改革。

### 三、总结训练中政治工作新经验

为使政治工作同正规化的军事训练相适应，一些部队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教育训练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南京军区政治部在发动群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陆军军、师、团政治部（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概则》、《连队军事训练政治工作概则》。空军根据以往“飞行训练四个阶段的政治工作”的实践经验，编写出师、团、飞行大队《飞行训练政治工作概则》。海军根据七十年代“出海三阶段的政治工作”实践经验，编写出《海军舰艇出海训练政治工作概则》。在此基础上，总政治部汇编成全军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概则》，于一九八四年初下发部队试行。这些《概则》对军事训练中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实施方法以及工作制度等作了明确规定，既反映了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又总结吸收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经验。例如，《陆军军、师、团政治部（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概则》明确要求政治机关“贯彻中央军委的训练方针、原则”，“要依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针对现代战争的特点，结合本部队的实际情况，确立训练改革的内容”。这些《概则》颁发后，全军部队以其为依据，大力开展军事训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于调动和保护干部、战士的练兵积极性，保证完成训练任务，提高部队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合成作战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大军区和海、空军，针对基层政治干部成份新、缺乏经验的状况，以《概则》为教材，普遍对政治干部进行了培训，进一步提高了他们在军事训练中开展政治工作的能力。

为适应教育训练改革深入发展而出现的新情况，政治工作也不断进行改进。例如，为了适应教育训练内容和重点的变化，政治工作从过去注重研究解决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五大技术训练中的思想问题，转变到着重研究解决干部训练、特种兵训练、合同战役训练中的思想问题上来；适应教育训练对象文化水平较高、知识面较宽、民主意识较强的新情况，注意引导干部战士把科学文化知识运用到军事训练中来，把师徒帮带的经验型训练方式，引导到启发智力型的学导式的训练方法上来，提高干部战士独自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

#### 四、开展战时政治工作的研究和演练

为了丰富政治干部的实战知识，提高政治机关、政治干部开展战时政治工作的能力，许多部队组织政治干部结合未来战争的样式、特点和规律，学习以往战时政治工作的成功范例和传统经验；学习未来战争的军事知识，预测未来战争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以及在参战人员的精神、心理上产生的影响，研究对应的解决办法；结合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临战训练，研究在边境、山岳丛林地对特殊对象作战的战时政治工作；结合合成军演习的机会，认真进行战时政治工作演练。

在合成军演习的条件下进行战时政治工作演练，是贯彻训练改革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丰富解放军战时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重要途径。在演练中，一些部队根据现代战争特点，确定政治工作研究和演练的重点内容。针对战争初期许多部队将实施坚守防御的作战形式，研究和演练教育部队坚决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树立长期坚守作战的思想；针对合成军作战的新情况，研究和演练保证协同作战的工作；针对现代战争空前激烈、残酷的特点，研究和演练保证部队具有顽强作战的精神素质的问题。多数部队进行战时政治工作演练的方法步骤是，（一）学习理论。主要是学习同演习有关的军事、政治理论原则，明确政治工作的特点、要求、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方法；（二）熟悉想定。

主要是熟悉军事演习的方案和实施计划，并组织实地勘察；（三）拟制政治工作方案，对演练的内容、实施时机、使用时间、工作手段、组织分工等等，作出周密的计划；（四）组织分练。各参演单位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演练的课题，进行沙盘推演、政治机关携带通信工具现地演练；（五）实兵合练。把政治工作演练作为整个军事演习的组成部分，与军事，后勤工作及部队的战斗行动紧密配合，同时展开。参加军事演习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通过从理论到实践、从基础到应用、从室内到室外、从分练到合练的研究和演练，有效地提高了组织实施战时政治工作的能力。

一九八一年，北京军区参加野营训练的政治干部，结合军事训练情况，演练战时政治工作，摸索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在演练之前，各部队组织政治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有关军事著作、军事理论材料以及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军、师两级普遍成立了理论小组，根据本部队担负的演练任务，探讨未来战争中战时政治工作的特点，编写了理论材料，拟制了政治工作的演练方案和文书。同时，各部队组织政治干部短期集训，请有实战经验的老干部传授战争年代政治工作经验。参加演练的政治干部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创造性，摸索了几种比较接近实战要求的、生动活泼的演练方法。如：（1）沙盘演练。某军政治部和装甲兵某师政治部分别在沙盘上，紧密结合军事演练想定，设置每个阶段政治工作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由政治机关、政治干部提出政治工作的内容和处置方法。（2）小场地演练。某炮兵团模拟实兵演练战斗队形，把团营指挥所、观察所和各连（1个排）集中在一个小场地上，进行面对面的政治工作演练。（3）携带通信工具的现地演练。某师政治部把政治干部带上山头，携带电话机、报话机等通信工具，根据军事演练想定，提出各种情况下政治工作的任务和要求进行推演。许多单位在进行上述分练后，还进行了司、政、后协同训练和带实兵的演练，使政治工作演练和军事演练紧密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第九章 国防科学技术战线的政治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适应由单一的陆军逐步发展成为拥有海军、空军和战略导弹部队等军兵种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建设的需要，迅速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相继成立了国防科研机构。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战斗在国防科技战线的科技人员、干部、战士、职工，胸怀大志，顽强拼搏，艰苦创业，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从五十年代起到六十年代中期，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尽管遇到过干扰，但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广大科技人员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因而战胜了国外技术封锁造成的困难，武器装备逐步从仿制向自行设计转变。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中国成为能自己制造和发射导弹的国家，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了世界。在这一时期，海军的武器装备从转让制造走上了逐步国产化的道路：作战飞机方面，成功地仿制了歼6飞机，研制了强5飞机，并装备了部队，陆军兵器从仿制向改进改型和部分自行设计转变：军事科学技术其他领域也有了长足的进展。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使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在总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指导，国防工业的管理体制作了较大的调整；广大科技人员抱着改变中国科技事业落后面貌的坚强信念，克服重重阻力，顽强拼搏，国防科技事业的很多方面仍有较大发展。这期间，大型电子设备的研制取得进展，核潜艇、导弹驱逐舰试航成功，一九六六年十月导弹核武器试验准确命中目标，一九六七年六月第一颗氢弹爆炸，一九七一年四月第一颗人造卫星遨游寰宇，一九七五年十一月首次成功地发射了一颗可以回收的人造地球卫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回收卫星的国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防科学技术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一九八一年五月首次成功地进行了洲际导弹全程试验，一九八一年九月用1枚火箭发射3颗卫星成功，一九八二年十月潜艇水下发射导弹成功，一九八四年四月试验通信卫星定点太空。截至一九八七年九月，中国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的运载火箭，已形成了较完备的系列，具备了发射近地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能力；相继突破了卫星回收、一箭多星、卫星测控、地球静止通信卫星发射等多项重大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并发射了21颗卫星；研制成功中程、中远程、远程导弹和固体燃料战略导弹，研制定型了多种空防、海防战术导弹。此外，在国产歼8飞机的基础上，采用新材料、新技术，研制出了歼8型歼击机；在国产高亚音速中程轰炸机轰6的基础上，研制生产出了第一代携带空舰导弹的轰6丁轰炸机，军用作战飞机全部实现国产化装备，共有27种60多个型号、1.3万多架飞机投入使用。新型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反潜护卫舰和导弹核潜艇等新舰艇研制成功；远洋测量船多次在太平洋海域胜利地完成测量任务；“银河”亿次计算机和一系列军用电子设备研制成功，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还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发明创造和科技成果。其中在一九七八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有2400多项科技成果、在一九八六年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有600多项科技成果、在一九八七年度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中有国防专用项目145个受到国家的奖励，是

新中国成立以后军队取得科技成果又多又好的时期。

国防科技事业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建立了专业门类比较齐全，科研试验、生产手段基本配套的体系，掌握了大批高新技术，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工程师。组织研制和生产的大批新型武器装备，使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火力、突击力、机动力、防护力和快速反应能力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也是战斗力，科技兴则国兴，科技强则军强。科学技术是增强国防实力的重要因素，用高科技增强国力，建设国防，走质量建军的道路已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

在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表明，越是进行现代化建设，越需要加强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国防科技事业的生命线。



## 第一节 保证中共中央发展国防科技重大决策的实现

三十多年中，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从奠基、发展到腾飞，每一个阶段都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正确的决策指引下前进的。政治工作号召、动员、组织国防科技战线的全体人员奋力攻关、顽强拼搏，保证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策得以实现。

### 一、保证常规武器装备的仿制和制式化的重要决策贯彻落实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十分繁杂，仅枪炮就有 100 多个品种，80 多种口径，产自几十个国家。这种状况难以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和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此，一九五二年五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抓紧进行武器装备的仿制，尽快实现武器装备制式化的重要决策。

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为贯彻落实这一决策，对全体人员深入进行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的教育和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教育，激发大家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热忱和为实现武器装备制式化献身的精神，使广大科技人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认识到进行武器装备的仿制，尽快完成武器装备制式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克服因物质条件缺乏、工艺水平落后而产生的畏难、低标准、分步实行制式化等思想，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一步制式化”的决定，即从一开始就严格按照制式武器的技术要求进行仿制，使产品一步达到完全合格的要求。

从一九五三年起，军工企业战线停止了旧式杂牌武器、弹药的生产，开始仿制生产制式武器。军工企业战线的人员在“一切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一切为了部队现代化建设”的口号鼓舞下，克服设备简陋、生活条件艰苦等困难，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夜以继日地忘我劳动，到一九五六年，旧式杂牌武器弹药全部被淘汰。至一九五九年，仿制定型生产的武器弹药共 80 多种，陆军武器装备初步实现了国产化和制式化，并培养了一支研究设计队伍。

### 二、保证“突破两弹”重要决策的实现

一九五五年，在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展顺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问题。就在这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定。次年五月，周恩来召集的中央军委会议又作出了发展导弹的决定。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突破两弹”的重要决策，人民解放军抽调大批精兵强将，组建了国防科研机构和试验基地。一九五六年十月，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此后，其他研究机构也相继组成。在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的鼓动下，许多科技工作者奔赴环境恶劣，条件简陋，生活艰苦的戈壁、草原、山沟安家、扎根。他们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热烈响应中共中央“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部学到手”的号召，认真向苏联专家学习。各单位纷纷举办各种学习班，请苏联专家传授技术。广大科技人员以极高的学习热情翻资料，做笔记，看图纸，不少科技人员很

快掌握了所需知识。

一九六一年初，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苏联政府拒绝向中国政府提供核武器研制方面的援助，以及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国家财力有限等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并要求以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时间突破以“两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技术。国防科技战线的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广泛宣传了这一方针，并发动大家用这一方针检查调整自己的工作，使军队装备建设突出重点，合理安排，集中人力、财力、物力，保证了“两弹”研制的需要。

一九六一年七月至九月，苏联政府撕毁协议，中断援助，撤走在华全部专家，给刚刚走上轨道的国防科技事业造成很大损失和困难。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时作出了坚持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两弹”技术的重要决定。这一正确决定，得到了国防科技战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坚决拥护。大家表示，尽管突破国防尖端技术在各方面存在着许多困难，然而，只要有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气概，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暂时的困难一定可以克服，我们的目的的一定能够达到。一九六一年六月，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集有关人员分析国防尖端技术的基本情况及其发展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在前几年国防尖端技术已取得一定成绩的基础上，只要齐心协力，坚持攻关，政策、措施对头，经过艰苦的努力，争取三年或者再长一些时间，突破“两弹”技术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分析，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赞同，鼓舞了广大科研试验人员奋发图强，克服困难，拼搏攻关。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一枚中近程地地导弹试验成功。同年十月十六日，“蘑菇云”在西北核试验基地升起，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了！第二天，当周恩来在第二届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宣布这一喜讯时，与会者全体起立，以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表示内心的喜悦。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第一枚核导弹精确命中目标。这一成就，实现了中国战略核武器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使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 三、保证三项重点科研试验任务的圆满完成

“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干扰了导弹核武器研制计划的完成。粉碎“四人帮”后，采取有力措施，加速武器装备的发展，是国防科技战线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一九七七年四月，中央军委及时作出了及早研制出洲际导弹，抓紧固体燃料火箭研制的决定。

根据中央军委这一决定，国防科委于同年九月十六日将一九八一年前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的研制计划上报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这个计划。

为了落实这个计划，圆满完成三项重点科研试验任务，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各单位深入开展了揭批“四人帮”活动，澄清了由于“四人帮”挥舞“单纯技术观点”、“唯武器论”的大棒搞乱了的思想，使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广大科技人员、干部、战士、工人分清了路线是非、理论是非和思想是非，思想获得了大解放，造成了为军队现代化钻研国防科学技术有理、为国防科技事业多作贡献有功的风气，为完成三项重点科研试验任务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国防科技战线的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以及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科研、生产、试验第一线，大讲完成三项重点科研试验任务的重大战略意义：从政治上讲，将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从军事上讲，将推动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迈上新的台阶，中国的核反击力量又增添一种新型号、新手段；从科学技术上看，不仅为新型战略导弹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可贵资料，而且为研制第二代新型战略导弹打下可靠的技术基础；从经济建设上看，不论对中国工业的发展，还是对整个四化建设，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通过宣传动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科研试验人员的积极性。人人为了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献计献策，增砖添瓦，努力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为完成三项重点科研试验任务，国防科技战线适时进行了组织整顿，消除了由于资产阶级派性严重造成的无组织无纪律、科研生产秩序混乱等现象。一九六八年三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阐明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在国防科技战线产生了强烈反响。大家经过学习贯彻，进一步肃清了“左”的思想影响，端正了对科技工作和知识分子地位、作用的认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形势较快好转，科研、生产、试验秩序迅速恢复正常。

经过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全体人员的不懈努力，一九八一年五月洲际导弹发射试验成功；一九八二年十月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试验圆满完成；一九八四年四月试验通信卫星胜利开空。三项重点科研试验任务胜利完成，是八十年代中国在国防尖端技术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三件大事。

#### 四、保证以常规武器为主、以陆军武器为重点的重要决策坚决执行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要有重点，有步骤，以常规武器为主，抓紧发展导弹核武器。在一定时期内，陆海空军装备，优先发展陆军；海空军装备，优先发展空军。

为了贯彻落实这一重要决策，国防科技战线各单位正确处理了完成三项重点科研试验任务与以发展常规武器为主的关系。大家认识到，在完成三项重点科研试验任务的同时，以发展常规武器为主、以陆军武器为重点，是符合国际战略格局的正确决断。发展前者是为了粉碎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威胁，使中国拥有一定的核还击力量，以保卫祖国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后者是为了应付最易发生的常规战争的需要，两者互不矛盾，不可偏废。只要妥善安排，合理分工，是可以比翼齐飞的。认识问题解决之后，国防科委在制订国防科技“七五”规划时，调整了研制经费，增加了常规武器研制费的比例，加强了对常规武器研制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使常规武器的研制工作有了良好的环境。

在发展常规武器方面，曾出现贪大求全，搞高指标、大计划的问题。一九七七年十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军委领导人讨论调整计划部署，决定用三年时间调整完原来计划规定的任务；制订了第六个“五年发展计划”和二

年的远景发展规划。国防科技战线领导机关根据这一精神，对常规武器的发展计划进行了调整，并制订了国防科技“六五”计划。这个计划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过去的高指标、大计划的错误。但是，贪大求快，项目多、型号乱等问题仍未完全解决。因此，在贯彻对外开放方针中，又出现了研制

项目有所膨胀，引进国外技术的计划偏大的问题。这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不相适应。到一九七九年国家经济建设实行三年调整时，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为此，邓小平多次亲自同军工部门领导人和军队高级干部谈话，强调国民经济建设处在调整时期，军队的装备费用和国防工业投资不可能有多大的增加；搞计划要精选重点，不能齐头并进，过去的计划，办不到的不算数，要继续压缩。他进一步指出，发展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根本问题，在于千方百计地搞好科研工作，即使少生产一些装备也要把科研搞上去。他要求大家克服贪大求全的思想，进一步调整科研、试验和生产计划。国防科技战线认真落实邓小平的指示，贪大求全的问题得以解决。

经过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全体人员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先后完成了1400多项常规武器装备的设计，其中261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在预先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为未来兵器型号研制提供了技术储备；在型号研制方面，已设计定型100多项。常规武器装备走上了自行研制为主的新阶段，基本上实现了重点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整体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有些项目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 五、保证“军民结合”决策的贯彻

所谓“军民结合”是指国防科技工业的“军品生产同民品生产结合”。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一九五六年五月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提出过。他说，要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两套生产技术，平时为民用生产，一旦有事，就可以把民用生产转为军用生产。然而，由于对这一问题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以及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错误地把进行民品生产看作是不务正业，是资产阶级经营思想，因此在很长时间内这一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

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国防科技工业要贯彻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的方针（一九八二年“以军为主”改为“军品优先”）。这是指导新时期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完整方针（简称“军民结合”方针）。一九八五年，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后，国防科技工业为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也实行了战略性转变，由过去主要为国防建设服务逐步转到为整个四化建设服务上来。领导机关提出要坚持“两个面向、两个服务”的方向，即：面向军队现代化，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新技术的发展服务；面向国家四个现代化，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这个方针受到了各级领导和广大科技人员的欢迎。但也有少数人认为，“国防科技单位是搞军品的，搞不了民品”，甚至把搞民品看作是“不务正业”、“额外负担”。针对这类认识，各单位运用多种形式进行教育，使大家懂得了国防现代化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要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的道理。

在实行“军民结合”的过程中又遇到许多具体问题。例如国防工业过去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计划由国家下达，材料由国家调拨，经费由国家拨给，产品由国家包销。在实行“军民结合”方针后，军品任务锐减，有些单位甚至没有军品生产任务。民品生产要“找米下锅”，自找出路，参与市场竞争，在激烈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这样，有的人因搞民品不适应，产生急躁情绪；因经济效益不高，产生泄气情绪；因怕搞民品的时间长了丢掉搞军品的经验，产生耽心情绪。针对这些思想反映，各单位党委广泛宣传“军

民结合”是“四化”大业赋予军工企业的特殊使命，是军工企业的“活力线”，使大家明确军转民的重大意义，尽快适应形势，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新贡献；摆国防工业搞民品生产的有利条件和搞好民品生产的可能性，增强大家的信心。许多单位还组织有关人员到地方企业学习经验，或提出“第二次创业”的口号，动员全体人员利用军事工业的优势保军转民，搞出拳头产品，占领国内市场，打入国际市场，在“军民结合”工作中建功立业。经过强有力的思想发动，国防科技战线全体人员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至一九八七年底，国防科技工业开始了由以军为主到军民结合的转变。国防科技工业开发的民品已达43大类、1万多个品种。军转民向高技术产业化、出口创汇方向发展，出现由生产实用消费品转向生产技术装备，由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由低档次转向高档次、高技术的可喜变化。被人们视为难以搞军转民项目的核试验基地，充分发挥技术人才和设备的优势，积极开展民用核技术的研究开发工作，搞出了近百个核能、核技术科研成果，为工农业和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贡献。兵器工业生产的700种民品中，有8种荣获国家金质奖，40种荣获国家银质奖。

许多单位在沿海开设“窗口”，建立起一批以沿海为枢纽、向内外辐射的企业集团，形成了国防科技工业参与和支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基地。

## 第二节 针对科技战线的特点开展政治工作

国防科技战线是军队现代化建设一条特殊的非常重要的战线。国防科研机构 and 试验基地的科技人员和干部、群众，长期奋战在崇山峻岭之中，荒原戈壁深处，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有技术、物质、生活、精神等方面的重重困难。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干部，团结、依靠本部门本单位的全体人员，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有关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路线方针政策，针对科学技术战线的特点，大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在全体从事科技工作的人员中努力培养无产阶级的理想、情操、意志，养成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奋力攻关、团结协作、科学求实的优良作风。

### 一、树立“自力更生”的思想

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建议，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同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这一方针。三十多年中，广大科技人员和指战员坚决贯彻了这个方针，战胜了无数困难，国防科技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在国防科技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在一些新组建的科技单位，对于贯彻“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有两种模糊认识：一种是自卑情绪，认为国家的工业和科技基础太薄弱，国防科学技术太复杂，因而缺乏信心；另一种是依赖思想，把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针对上述思想，聂荣臻及时提出，发展科技事业，第一要反对依赖思想；第二要反对自卑情绪，第三要破除迷信，反对把科学技术“神秘化”。各科技单位的党委和政治机关深入进行了“自力更生”方针的教育，讲清不能依赖外国，靠别人施舍实现不了国防现代化的道理；反复宣传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妄自菲薄。同时号召学习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以天下之长，补本国之短。在“自力更生为主”方针的指引下，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一批国防科学技术工程项目在戈壁、草原、深山勘测布点、施工建设、研究试验，迈开了艰难的第一步。

一九六一年，正是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奠基起步的关键时刻，由于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一九五七年中苏两国签订的有关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撕毁了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断绝设备和材料供应，给新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造成很大困难。为了顶住国际压力，振奋民族精神，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尖端科学技术事业，各科技单位的党委和政治机关面对严酷事实，宣传贯彻“自力更生”方针，使全体人员较好地克服了依赖思想，清醒了头脑，激发了革命热情，坚定了走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决心。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自力更生”教育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经常性课题，“自力更生”成为国防科学技术战线全体人员强大的精神支柱。在卫星发射中心，在综合性海上试验基地，在大规模风洞设备群所在地，在常规兵器试验中心，在核试验基地，以及千千万万个科研、技术工作岗位上，广大科技人员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艰苦奋斗，拼搏攻关，填补了一项又一项空白，创造了一项又一项世界第一等的成绩，为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振兴和腾飞作出了贡献。

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国防科技战线积极开

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不失时机地有重点地引进了一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这是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措施。但是，有的使用单位却希望通过购买外国武器装备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为此，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按照中央军委关于“在研制新型武器装备时，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必要时引进部分技术”的决定，引导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回顾历史经验教训，广泛讨论与深刻认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庞大的军队怎样实现现代化”这个重要的问题，从而更加坚定地走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事业的道路。广大科技人员一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面向世界，虚心学习和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把奋斗目标定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上；一方面更自觉地坚持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顽强拼搏的精神，不断取得开创性的成就。

## 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政策

为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国防科技工作的领导，做好科技单位的政治工作，在聂荣臻的领导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之后，于一九六一年六月草拟了《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以下简称“科学十四条”)。中共中央于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九日批转了这个报告和“科学十四条”，要求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

“科学十四条”明确规定，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共产党在科研机构的各级组织要保证这一根本任务的实现，只有研究所以上党委才有领导权，基层党支部应起保证作用，党员可以提出个人的见解，但不代表党的领导，更不能随便干预科技人员的研究工作。要求科技人员又红又专。“红”的标准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鼓励在学术问题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科技人员发扬“三敢”(敢想、敢说、敢干)、“三严”(严肃、严格、严密)精神。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保证科研人员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研究机构内党组织的主要任务”。这个文件对整个科技战线包括军队的科技工作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受到广大科技人员的欢迎。他们说，文件“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是及时雨”。许多人反映：“科学十四条”是中国第一部“科学宪法”，“使科技单位开展工作有所遵循”。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发出了《关于加强国防科学研究机构政治工作的指示》，强调：“目前应着重学习中央‘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聂荣臻同志的报告和‘十四条意见’，结合具体情况，一一落实”。国防科委为了及时了解情况，组织交流经验，于一九六二年一月成立了贯彻中央关于自然科学工作若干政策办公室，对贯彻“科学十四条”进行了有力指导。军队许多科技单位的党委和政治机关都制订了贯彻落实的措施。首先，注意合理使用科技人员，对专业不对口的大部分人员作了调整，选拔了一批科技人员担任领导干部；初步实行了“五定”(定方向、任务、人员、设备、制度)；建立了技术指挥线和技术责任制，明确了科技人员的职责和权限。其次，加强了研究室和技术处的思想政治工作，党支部包揽技术业务的现象减少了。第三，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对反右派以来政治运动中受过批判、处分的人进行了甄别，对批判错了或部分错了的，

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改正，撤销或修改了原结论和处分，影响到军衔级别和职务的也作了调整。国防部第10研究院第14所是贯彻“科学十四条”的先进单位。经中央军委批准，一九六四年四月，国防科委在这个所召开了现场会，总结推广了他们的先进经验，推动了党的自然科学工作政策的深入贯彻。

“科学十四条”和一系列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滋润了广大科技人员的心田，焕发了革命精神，出现了废寝忘食学习。通宵达旦攻关的景象。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科学十四条”都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攻击“科学十四条”是“修正主义的黑线”。周恩来批驳说：“科学十四条”是“红线”；“红线”在国防科技战线占主导地位。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规模盛大的全国科学大会，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邓小平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出并阐明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要“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要求科研机构的党委、政治机关“研究和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客观规律，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提高政治工作的水平，改进政治工作的方法”，保证科技人员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这次大会，针对“文化大革命”给科研事业造成的干扰破坏，旗帜鲜明地进行了拨乱反正，从根本上澄清了是非，使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事业的路线方针政策回到正确轨道上来，使“科学十四条”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和落实，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和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三、培养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精神

广大科技人员特别是从事国防尖端技术的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由于工作的需要，许多人长年工作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环境中。例如，在戈壁深处的一些试验基地，“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小风黄沙飘，大风石头跑”。要在那里站住脚，需要经受大风、高温、缺水的严峻考验。夏天有的地方地表温度高达四五十摄氏度。走上四五十公里也难找到一滴水，生活用水定量配给，一水多用，先用来洗脸，留下来洗脚，最后拿去浇地。国防科研要严格保密，既不能登报纸、上广播，也不能公开发表论文，要当无名英雄，默默地作奉献。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人产生了一些思想问题。有的感到老吃“代食品”，身体受不了，有的担心受核辐射太多，影响身体健康；不少年轻人怕不好找对象；还有的感到信息闭塞，技术上难以提高。科技单位的党委、政治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面对现实，及时进行思想工作，培养科技人员和干部、战士献身科技事业的精神。

进行“以场（海岛、草原、戈壁、深山、边疆）为家，以苦为荣”的教育。不少单位提出了具体要求，作为行动的准绳。要求大家愉快服从组织分配，长期安心科技单位工作；有旺盛的斗志和高度的革命事业心，积极钻研业务，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不怕艰苦困难，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的单位联系实际进行了“三热爱”教育，

---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83—96页。

“代食品”，即在1960年前后的3年经济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以野菜、甘草叶、骆驼刺等代替粮食。



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国防科技事业；热爱试验场区。

宣传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典型。先后被宣传的著名先进个人，有在核武器储存管理研究中取得 15 项成果的工程师贺先觉；有长期奋战在科尔沁草原的实验弹道专家陈光宇；有在空军服务三十多年的中国第一颗空爆原子弹投掷者于福海；有在神秘的枪炮世界拼搏三十余年的高级工程师、独脚大校陆载德；有三十多年中一直奋力攀登海军舰艇维修科学技术高峰的女科学家、全国“三八红旗手”萨本茂等。他们的模范事迹感人肺腑，催人奋进，是国防科技人员的楷模。六十年代，宣传了国防部授予“模范气象站”称号的阳平里气象站。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核试验基地的 10 名气象战士根据上级的指示，拿着指北针，坐着卡车走了三天，到了方圆千里不见人烟的戈壁深处，在能给国防科研提供准确气象资料的地方建站，这就是后来的阳平里气象站。当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在外国撤走专家、封锁资料的情况下，他们以“为国分忧”的崇高精神，住帐篷，睡地窖，喝苦水，战风沙，在零下 30 多摄氏度的严寒和零上 40—50 摄氏度的酷暑中，长年累月地进行气象观测，为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先后荣立一、二、三等功。国防科技战线深入宣传了这个典型，树起了一面奋发图强、顽强拼搏的旗帜，对全体人员发扬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精神，起了有力的鼓舞作用。进入八十年代，又陆续宣传了一批先进集体和英雄模范。如兰州军区“保障科研模范连”（防化团 2 连），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八六年担负国防科研的侦察、取样、测量的任务中，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在 40 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奋战了二十二个寒暑，数十次执行核试验下风方向保障作业任务，在没有路、没有水的广阔地区，克服重重困难，收集了几十万个效应数据，为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远望一号、远望二号远洋航天测量船，两船官兵发扬“远望精神”，战狂风、顶巨浪，先后九下太平洋，航程 12 万多海里，圆满完成了 12 次航天测量任务。

解决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相结合。政治机关和后勤部门一起，努力兴办福利设施，解除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不少驻地偏僻、远离城镇的国防科技单位，在领导机关和驻地政府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自办托儿所、小学、中学及中等专业学校，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实行内部招工、就地参军和请驻地政府安排工作等办法，解决家属、子女就业问题。一些远离城镇的科研试验基地，还先后成立了由所在省省会（自治区首府）直接领导的人民政府（行使县一级职权），下设教育局、公安局、粮食局等部门，并建立了电视台、银行支行、邮电支局和电影发行单位，大大改善了科研人员的物质文化生活。

自己动手建设家园。许多驻在边疆、海岛的国防科技单位，为使全体人员安下心，扎下根，一心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进行了“南泥湾精神”教育，组织开荒种地，植树造林，用自己的双手改造自然，美化环境，改善工作、生活条件，收到了良好效果。经过长年建设，许多沙漠建成了绿洲，海岛建成了花园，成为科研人员热爱的第二故乡。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来荒漠茫茫，人迹罕至。经过艰苦创业，如今这里已经楼房林立，街道井然，生活设施俱全，成为中国著名的航天城。西北某基地广大科技人员和指战员，在沙丘纵横的不毛之地，坚持植树造林、绿化营区。近三十年中，全基地共植树 290 多万棵，营造沙枣防风林带 2200 多亩，覆盖面积占营区的 40%，平均每人有树 120 棵。还建立了 80 亩果园。这里水渠纵横，树木葱茏，瓜果飘香，

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

#### 四、发扬团结协作精神

为了搞好国防科技重大项目的研制和试验，周恩来曾亲自组织全国协作网，中央各部、委和许多科研单位、院校，共同抽调科技人员，提供物资设备。其他领域的科研项目也都需要多方面的协调配合。因此，科技战线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是团结协作结出的硕果。如发射第一颗卫星时，参试人员成千上万，各行各业积极配合，仅参加护线的民兵就有60万人。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时，军内外有数以千计的单位参加试验任务。

为了搞好团结协作，各单位领导和政治机关对参试人员进行了服从全局的思想教育，使大家正确认识个人、单位在整个科研试验任务中的位置和作用，顾大局，讲团结，树立一盘棋思想，服从统一调度指挥，决不各行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搞好内外团结，为全体人员树立榜样。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每次重大试验，都成立了由参试部队和协作单位主要领导组成的试验临时党委，统一领导试验工作，使众多军内外参试人员形成一个坚强整体。发射与测控、陆上与海上、军队与地方、一线与二线，为着一个共同目标，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从一九八五年一月起，执行试验任务的组织领导形式有了新的改变，由试验临时党委改为由各方面的领导人参加组成的试验指挥部，实行指挥长负责制；建立总工程师、行政调度指挥线，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各行其权，成为一个集中统一的指挥系统；在试验指挥部里专门组成试验政工组，负责试验现场的政治工作。

在科研试验中，需要及时妥善解决在技术问题上发生的矛盾。如：讨论技术方案和技术措施时出现的认识上的分歧，在产品测试、设备安装时出现的责任不清甚至互相埋怨；在鉴定、评价产品和技术成果时出现的主观片面、各持己见等。对此，各级党委和党支部及时教育所属人员从大局出发；谦虚谨慎，尽量避免发生矛盾。发生了问题，则要求严以律己，实事求是，妥善解决。在试验工作取得进展或重大成绩时，各参试单位开展互相祝捷、慰问、学习、联欢，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为进一步的合作打下基础。

国防科技大学为了使各方面的技术力量在集团作战中形成合力，大力提倡社会主义协作精神。“织女一号”气象火箭的研制，涉及航天技术、电子工程等众多学科，学校组织了10多个单位260多人参加的课题组，在十一年的研制中始终拧成一股绳，有了困难，人家争着去克服；出了问题，谁也不埋怨谁；有了荣誉，互相谦让。由于整个课题组紧密团结，主动配合，历经几十次的失败和挫折，“织女一号”气象火箭终于发射升空。

#### 五、培养从严求实的作风

在六十年代第一次核试验的时候，周恩来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各单位的党委和政治机关将这一指示广为宣传，并结合技术业务工作订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使之成为国防科技工作者的座右铭。广大科技人员按照从严求实的要求，在工作中每划一条线，写一个小数点，焊一个接头，按一个电钮，拧一个螺钉，都一丝不苟，做到“试验产品不带问题出厂，试验装备不带故障参试”。第二炮兵某导弹试验

团，在操作中为了防止工具失手碰坏仪器，把扳手、螺丝刀套上塑料管，把各种工具拴在手腕上，一些操作手担心钮扣掉进仪器仓里，把衣服扣子全部剪掉，钉上布带系衣服。有一次，他们在实装操作后，清点剪下的铁丝头时发现少了1根。这虽然是不到1厘米长的细铁丝，倘若掉进仪器仓里，也有可能使飞行中的导弹造成短路，后果不堪设想。领导干部立即带领十几名人员认真查找。导弹仪器仓里安装的各种仪器和导线密密麻麻，伸不进去，他们就用小块磁铁吸，用小风箱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细心查找，终于挖出了隐患。某试验基地在一次试验前的导弹总检查时发现1根眉毛，科技人员捡了出来。主持试验工作的领导到北京开会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高兴地表扬了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为了把好产品试验质量关，各单位经常运用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向科技人员进行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养成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的宣传教育。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从领导到每个操作手，实行定岗位、定人员、定职责、定设备、定协同关系，坚持“双岗”（一岗、二岗）、“三检查”（一岗、二岗、领导检查）等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健全操作、安全、维护、值班、交接等各个环节的制度，做到人人有岗位、有职责、有要求，从而保证了试验和产品的质量。

各单位还引导科技人员围绕设备、方案的可靠性，充分发扬技术民主，强调既要发扬敢想敢说敢于的精神，又要有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的科学态度，不分职务高低、学历深浅，都来出主意想办法；对技术上的分歧意见，充分展开讨论，不急于定论；决定技术问题，不搞少数服从多数。某测量站发动群众摸索计算机工作的最佳室温条件，使机器的无故障时间提高了5倍。

## 六、做好安全保密工作，防止发生各种事故

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对调到科技单位的干部战士，首先进行安全保密教育，传授安全保密知识。团以上单位设立保密委员会，逢年过节进行安全保密教育和检查，增强人们的保密观念。把好容易造成泄密的口头、外出、通信、文件资料4关，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各基层单位设有安全小组，班、组设有安全员，从上到下形成安全工作网，层层有人抓安全工作。此外，还定期开展群众性安全预想活动，将事故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对接触核心机密、掌握关键设备和要害部位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消除一切不安全因素。

## 七、精心做好战略武器试验中的政治工作

战略武器试验，是国防科研试验单位的中心工作。科研单位的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对战略武器试验中的政治工作分外重视，总是以临战的姿态，严密地组织，全力以赴地进行。

战略武器试验中的政治工作一般是按照试验准备、试验实施和撤收总结3个阶段进行的。参试单位广大政治干部在试验指挥部领导下，根据试验各阶段的特点和参试人员的思想变化规律，及时地、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试验准备阶段。主要是了解和掌握参试人员的思想、技术和身体状况，

组织学习有关方针、政策和规定，进行试验任务的动员。根据需要进行组织调整，协助有关部门落实岗位责任制。研究和制订在各种情况下的政治工作预案。通过深入具体的工作，激发参试人员的革命热情，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全局观念、时效观念，发扬不畏艰险、不怕疲劳的优良作风。一九八六年二月发射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时，由于政治工作细致深入，使为国争光、为军壮威、为民造福、为四化作贡献的思想深入人心。不少干部战士放弃了探亲休假，有的亲人病危、病故也不回家探望，有的推迟了婚期，他们一切服从试验的需要，表现出崇高的奉献精神。

试验实施阶段。这一阶段时限要求严，安全要求高。政治工作根据这一要求，充分发挥及时性、战斗性，到试验第一线做好关键岗位和重点部位人员的思想工作；开展群众性的宣传鼓动，关心和改善参试人员的物质、文化生活，鼓励他们战胜各种困难，发挥最佳精神状态和技术状态。试验预令下达后，进行简短有力的动员，严格管理试验现场，保持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进入试验程序时，勉励参试人员从容不迫，顺利时不骄傲麻痹，受挫时不悲观泄气，发生意外情况不惊慌失措。一次，远洋测量船执行一项试验任务，海况恶劣，在三十七天里，3条船大部分时间在大风大浪中度过。大多数人员吃不下饭、睡不好觉，70%以上的人体重明显下降，两个人因疾病和劳累不幸以身殉职。为战胜重重困难，他们开展了向国防科技工作模范钱绍钧和华山抢险先进集体学习活动，运用简报、快报、广播、幻灯等宣传手段，及时表彰好人好事，鼓舞斗志。号召党员发挥模范作用，带头战胜困难。此外，还开展了群众性的立功创模活动，并根据风浪大小、航行漂泊等不同情况，适当地开展了各种文化体育活动。这些活动，活跃了海上航行生活，激发了参试人员的革命积极性，促进了试验任务的胜利完成。

撤收总结阶段。主要是成果回收、人员撤场、设备撤收和总结工作。在这个阶段，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及时教育参试人员防止思想松懈、纪律松弛、作风松散，要求大家善始善终地搞好撤收工作，并发动群众开展评功评奖活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同时，结合试验成功在国内外产生的巨大影响，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国防科技事业的教育，培养人们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精神。

在进行战略武器试验的多次实践中，政治工作总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入八十年代后，试验中的政治工作又有了发展。为使其系统化、规范化和理论化，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国防科工委政治部决定，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方法，编写战略武器试验政治工作细则，作为科研试验政治工作的规范和培训政工干部的教材。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编写出《导弹卫星飞行试验政治工作概则》（试行）、《核试验政治工作概则》（试行）和《常规兵器试验政治工作概则》（试行）。这些《概则》对试验政治工作的地位和指导思想、组织领导、基本任务、基本方法和政治机关的主要职责、基层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对政治干部的基本要求都作了明确规定。它是三十多年来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和广大政治干部集体实践的结晶。此后除首次执行新型号的重大试验任务外，国防科工委政治部一般不再专门下发政治工作指示。试验基地以下各级政治机关也不层层下发一般性政治工作指示，主要依据《概则》的要求，有针对性地作出具体安排。

此外，在常规武器试验中，许多科技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广州军区工程科研设计所重视把思想工作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让思想

政治工作进工程设计室，上科研试验场，创造良好心态，保证科研人员以主要精力做好本职工作。该所所长、党委书记胡在银实实在在地做好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一心一意地当好科技人员的“后勤部长”，被科技人员视为难得的“知音”。由于思想政治工作与科研紧密结合，三年中该所共取得了 31 项科研成果，其中获国家专利 4 项，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4 项，获全军科技成果奖 15 项，先后 4 次被评为全国、全军和军区科研先进单位，荣立集体二等功 1 次。

### 第三节 建设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

建设现代化的国防，研制先进武器装备，攻克各种技术难关，必须依靠掌握了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并愿为国防科技事业献身的知识分子。为此，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到各国防科技单位，都把建设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作为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

#### 一、组建国防科技队伍

五十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决定后，便采取各种措施为国防科技战线调集人才。

首先，争取了一批在国外的中国科学家回国。一些著名专家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冲破所在国的重重阻挠，于五十年代中后期回国，走上国防科技战线。

其次，从各条战线选调人才到国防科技单位。一九五六年组建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时，周恩来决定：只要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需要的技术专家和党政干部，都可以从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军队中抽调。各有关单位为落实周恩来的指示，顾全大局，大力支援。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主动表示，军事工程学院的科技专家调哪个给哪个。解放军总政治部先后为国防尖端科技单位选调了大批优秀党政干部和科技人员。

一九六一年，苏联专家撤走后，国防尖端科技战线要把科研试验任务独立承担起来，急需配备足够的科技人才。为此，中央书记处于同年三月初决定：技术干部调配应以尖端科研需要为重点，尽量保证，满足需要，其他项目所需如果与此有矛盾，应该让路。三月二十三日专门发出《关于迅速完成提前选调国防部五院应届大学毕业生的通知》，要求各省市指定组织部长亲自负责，进行挑选审查，按原定数额迅速选齐。这样，数千名大、中专毕业生，先后投身到了导弹研制技术队伍的行列。在中共中央的关怀下，在周恩来和聂荣臻的直接领导下，到一九六五年，国防尖端科技战线已拥有包括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老干部和高级专家、工程技术人员、解放军指战员、技术工人等 10 多万人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

#### 二、培养又红又专的国防科技人才

高科技的发展，归根结蒂要靠人才。培养和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好、善于攻关、敢打硬仗的国防科技队伍，走“科技强军”的发展道路，是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人民解放军先后创办了几十所高等和中等军事技术院校，形成了较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为科研、试验和使用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共中央决定创办军事工程学院。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所正规的、综合性的高级工程技术学院。到一九六六年就培养了 10921 名军事工程技术人才。以后又陆续组建了各军种、兵种的工程学院和各种专业技术学校，为部队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随着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对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安排，自一九六一年初到一九六五年，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先后将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

学、南京航空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太原机械学院、军事工程学院、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炮兵工程学院以及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等国防高等科技院校的教学业务工作划归国防科委领导（七十年代初又划给了各有关工业部领导）。并按照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需要，对尖端、常规及其他基础专业，作了统筹安排，合理调整，从而加快了新技术专业的发展，填补了缺门专业，增添了教学科研设备，提高了教学质量，为国防科技工业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此外，其他地方院校也给国防科技单位输送了大批毕业生。加上新中国成立前老一代知识分子和从海外归来的爱国科学家，组成了一支多学科、多专业、多层次的国防科技队伍。

在这支队伍里，有第一流的科学家，他们是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的带头人。如著名科学家、火箭专家钱学森。他一九五五年十月从美国归来后，于一九五六年二月便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最先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他还协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聂荣臻筹建了火箭导弹科技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并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迅速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奠基者、开拓者邓稼先，一九五五年九月冲破重重困难从美国回到祖国后，满腔热忱地从事核理论的研究。一九五八年八月，他参加组织领导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为研制原子弹、氢弹和新的核武器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还有获得中国最高学术荣誉称号——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朱光亚、陈芳允、慈云桂、程开甲等杰出科学家。

在这支队伍里，有大批中年科技干部，他们多数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他们怀着发奋图强、为国争光的宏大志向，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勇于开拓，逐步成为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的中坚力量。如中央军委授予“国防科技工作模范”光荣称号的某核试验基地司令员钱绍钧，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安心戈壁，艰苦奋斗。他勇于探索，刻苦攻关，填补了中国核测试中的一项空白；他与其他单位协作完成的某种核材料能耗的测定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他原来领导的研究室，仅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就获43项各种等级的科技成果。“科研试飞英雄”、空军试飞团副团长滑俊和王昂，热爱飞行事业，潜心钻研飞行技术，掌握了多种型号歼击机的驾驶技术。二十多年中，他们试飞数百架次，多次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新机种、新项目的试飞，获取大量准确的数据，为发展中国航空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海军“勇攀医学技术高峰的模范军医”程国良，一九七八年底开始专门从事外科、显微外科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工作。八年里，他和全科人共同为500多名断指患者做断指再植633个，成活576个。他所在的单位是中国同期断指再植最多的单位，成活率保持国际先进水平。在未节断指再植、小儿断指再植、10指离断再植等5个方面，取得突出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防科技工作模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测控技术部总工程师巫致中，参加了21颗卫星的测控工作，与其他人密切合作，先后有两项科技成果填补了中国航天测控的空白，有一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经过六年钻研，设计出了《近地卫星测控系统流程》，为发展中国通信卫星的测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优秀科技工作者”、解放军总医院研究员王湘生，身患心脏病，依然把全部精力倾注在科研事业上。他领导的实验室，先后完成了16项科研课题，其中两项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贡

献奖。他发明的“心脏室早/室速/室颤阈值自动化测定仪”，为心脏病病人筛选有效药物提供了简易测试手段，在全国发明展览会上获得金牌奖；在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荣获金牌及特别奖——亚洲代表团奖。

在这支队伍里，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是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的新鲜血液，其中大多数人是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培养起来的。据调查，到一九八七年，35岁以下的青年知识分子，已占科技人员总数的65—70%。他们思想活跃，专业基础扎实，高新技术掌握较好，外语水平高，勤于钻研，在老科技人员帮助带领下，在实践中锻炼成长，有些已经成为技术骨干，有的已经崭露头角。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茁壮成长，是国防科技事业的未来与希望。

这支由老、中、青梯次组成的科技大军，不仅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而且有为中华民族崛起、为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献身的高度觉悟，是中国国防科技事业振兴的中坚力量。

### 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政治上充分信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五十年代中期，周恩来关切地向聂荣臻交代说：归国的科学家是爱国的，要在政治上关心他们，工作上支持他们，生活上照顾他们。表达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老一辈科学家和科技人员的信任与关怀。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六日到三月八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和陈毅、聂荣臻一起，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了正确阐述，给他们“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聂荣臻强调要信任知识分子，他说：“要人家做事，就要信任人家，尊重人家，他们既不是外人也不是客人，是自己人，是我们自己的同志，要人家做事又不信任人家，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里，林彪、江青等人把广大科技知识分子作为异己力量加以打击排斥。对此，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人焦的万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地保护广大科技人员。有些科学家在本单位有被批斗的危险，就以工作需要为名，把他们临时“借”调到北京。周恩来先后接见国防科技战线的“群众组织”代表50多次，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多次指示不要揪斗科学家，从而使不少科学家免遭迫害，为发展国防科技事业保住了骨干。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和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大，反复要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根据这些精神，各科技单位广泛开展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宣传教育，并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做法进行了纠正，摘掉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政治帽子，解除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各单位还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九八二年九月关于发展党员的通知精神，积极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如国防科工委系统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七年发展的知识分子党员，占知识分子总数的70.6%。据一个知识分子较多的国防科技单位调查，在有高级技术职称的科技干部中，入党人数占92.7



%，在有中级技术职称的科技干部中，入党人数占 89.4%。不少老知识分子都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入党的。对于在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及时给予表彰和奖励。一些知识分子被中央军委或大单位授予荣誉称号，更多的知识分子则受到记功或嘉奖。一九八七年七月召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英模代表会议，在 320 名个人代表中，有从事科技工作的代表 41 人，占总数的 12.5%。

——工作上大胆使用。六十年代初期，各科技单位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干部政策和“科学十四条”的要求，提拔了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担任研究室和技术处以上的领导。“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工作中断了，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全国科学大会以后，提拔知识分子的工作又重新受到重视。各科技单位注意消除知识分子“只懂专业技术，不懂管理，当领导是外行”的偏见，培养、提拔了一大批有知识、有能力、适合担任领导工作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各单位党组织积极支持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有职有责有权，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许多科研单位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努力做到“理解、信任、尊重、支持”。对于学术论文的评价，科学技术人员业务水平的考核，研究计划的制订，研究成果的鉴定等，注意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广泛听取有关科技人员的意见。不少单位和部门，定期召开各类座谈会，请知识分子献计献策；对科技人员提出的每项改革建议和革新发明、科学研究，只要经论证有科学价值，都尽快采纳和支持。

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各科技单位都十分重视对科技人员特别是其中的“尖子”进行培养提高。采取派运专业技术干部出国学习、送部队院校进修、请地方院校代培、和大专院校联合办班等形式进行培养；在单位内部，则采用以老带新、以强带弱等方式，帮助专业技术干部提高专业水平，更新知识。第二炮兵第二研究所先后派出 70 名科技人员出国考察，选派了 400 多人到各类院校和有关单位进行培训。海军电子工程学院集资 18 万元，请地方院校代培研究生。国防科工委十分重视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工程，从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共举办各类培训班 784 个，培训科技干部 2.2 万人次；进军队和地方院校代培 4289 人次；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2067 次，有 44014 人次参加；选派到国外进修、考察、参观、访问 745 人次。

——生活上关心照顾。“科学十四条”明确提出了机关工作人员要“为科学研究工作、为科学工作者服务”的要求。邓小平说：“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愿意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聂荣臻多次表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管理员、勤务员，我自愿为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工作服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各级党委，广大后勤、行政和政治干部逐步树立起任劳任怨地为科技工作、为科技工作者服务的思想。

在三年经济严重困难时期，生活艰苦，许多忘我攻关的科技人员体力消耗很大，体质普遍下降。聂荣臻决定向几个大军区求援。当时，聂荣臻身体不适正住在医院里。去看他的陈毅闻听此事后，风趣他说：“你这是在‘募

---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95页。

《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第109页。

捐’啊，算上我一个！”海军和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的广大指战员，宁肯自己艰苦一些，将节省的大批猪肉、鱼、海带、黄豆、水果等食品支援为国防现代化奋战的科技人员。聂荣臻亲自规定，这批食品要专门分给科技人员，其他任何人不得动用，并派国防科委副主任陈赓检查落实此事。这件事直至八十年代还被广大科技人员传为佳话。

八十年代，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极为关怀。一九八一年三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科学技术干部确定与提升技术职称和技术等级的通知》，恢复了技术干部评定技术职称和技术等级工作。一九八四年六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关于稳定和加强国防科技工业艰苦地区科技队伍的若干政策，决定适当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专心致志地从事国防科技事业。一九八四年五月，广州军区针对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发出了《关于进一步认真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情况的通知》，促进了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总政治部于一九八四年七月转发了这个“通知”，要求各大单位都像广州军区那样，对本单位、本系统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再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并把这项工作作为整党中边整边改的一项重要内容。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各单位普遍多次检查了贯彻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解决存在的问题。抓紧进行了技术职称和技术等级的评定；对在艰苦地区工作的科技干部，在晋级方面给予优待；在住房分配、家属随军等问题上，对科技干部也尽量照顾。对老一代科学家在医疗、住房、用车、疗养等方面给予优先保证，尽量减少他们的行政事务，给有些人还配备了助手和秘书。第二炮兵是知识和技术密集的兵种，广大知识分子大多在边远地区或高原地区工作，条件比较艰苦。部队各级领导对他们的住房、治病、夫妻分居等实际问题，热情关心，积极帮助解决，在 332 一九八五年后的几年中先后筹集资金几百万元为他们解决住房问题。一些单位规定，在住房分配上优先考虑科研、教学、工程技术人员，使大多数知识分子改善了住房条件。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人民解放军重视进一步做好国防科技队伍的选拔、培养、提高工作，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合格、技术精湛、作风过硬的科技干部队伍。海军是技术密集、人才密集、多兵种合成的军种，为了搞好科技队伍建设，几年中做了大量工作。一是着眼充分发挥科技干部在海军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坚定不移地贯彻新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二是着眼培养政治合格、立志献身海军事业的科技人才，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建设；三是着眼当前部队的需要和面向未来的要求，努力抓好科技干部的培训；四是着眼海军科技干部队伍的特点，加强科学管理和干部制度建设；五是着眼为科技干部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积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国防科工委党委注意从高级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从一九八五年以后有大批高级知识分子走上试验、院校、研究所的领导岗位，他们有的是核科学家，有的是航天测控专家，有的是火箭专家，有的是某一学术、专业的带头人。

#### 四、做好经常性的思想工作

科技单位知识分子的一般特点是：有理想，热爱祖国，有较强的事业心、自尊心和自信心；求实，善恩，严谨，在探索科技奥秘的崎岖道路上顽强攀登、默默奉献；思想认识往往伴随科研试验进程发生相应变化。政治工作机关和政治干部针对他们的这些特点，在对他们进行经常性思想工作时，主要采取了如下一些方式方法：

——同知识分子广交朋友，加深感情。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希望得到领导的关心、体贴和帮助。他们把领导的关怀和帮助，看作是对自己的鼓励、支持和安慰。各科技单位的领导一般都能做到满腔热情地对待知识分子，主动接近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注意尊重和信任知识分子，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和他们打成一片，交知心朋友，建立密切的关系。

——思想工作结合科技任务一道去做。广大领导干部和政治干部深入现场，尽可能地跟班作业，了解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及时给他们以帮助。为了能更好地结合科技任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许多政治干部还努力学习有关科技知识，摸索工作规律，逐步由外行变成内行。有些单位把技术干部送到政治院校培养，使他们既懂专业技术，又熟悉政治工作。空军有26位已经取得专业技术学上学位的年轻干部，又送空军政治学院培训两年，于一九八七年七月获得“军队政治工作专业”学上学位，成为具有双学士学位的政治干部。这些政治干部与技术人员有共同感受、共同语言，对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有更多的有利条件。

——领导与知识分子谈心，沟通思想。谈心的内容一般是：对如何完成科研试验任务的探索；对时事政策的看法与理解；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意见和建议；了解并帮助解决学习、工作、生活中的困难。一些单位，逢年过节专门举行知识分子茶话会，由各级主要领导参加，和他们交流思想，听取意见，帮助科技人员加深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解，坚定他们完成科研试验任务的信心。这种做法受到广大知识分子和指战员的欢迎。实践表明，通过谈心，密切了上下级关系，创造了完成任务的良好环境，促进了科研试验任务的完成和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新人的培养。

——开展群众性的思想工作。广大政治干部不光是自己做思想工作，还注重发动和组织科技人员做思想工作，特别是发挥各级科技领导干部做思想工作的作用。他们是科技工作的组织者和指挥员，对科技工作的规律最清楚，和广大知识分子接触的时间最多，情况最了解，能够把思想工作渗透到各项活动中去。各科技单位还发动知识分子中的党员带头做思想工作，使他们成为思想工作骨干。基层党支部加强对群众性思想工作的组织领导，及时提出任务，了解情况，进行指导，造成了人人做思想工作的生动局面。

——把握时机，积极主动地开展思想工作。由于科技单位要保证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思想政治工作活动时间相对少一些。在既要做好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又不能和技术工作争时间的情况下，广大政治干部努力探索科技工作规律，改进思想工作方法，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在六分之一的政治工作时间里，传达上级的重要文件和会议精神，组织政治理论学习，进行时事政策教育，开展整党整风等等，力争提高时间利用率和增强各种活动的效果，还注意在六分之五的时间里，根据不同对象，用简练的语言，适当的方法，随时随地开展思想工作。

国防科技战线已经建设成一支人数较多、专业较全、基础理论知识扎实、

开拓创新精神比较强的科技大军，经过长期的实践锻炼，这支科技队伍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革命精神。即任务第一、忘我拼搏的革命献身精神；尊重规律、尊重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顾全大局、互相帮助的团结协作精神；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艰苦奋斗精神；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的一丝不苟精神。这些革命精神是无形的强大力量，成为国防科技事业赖以发展的强大精神因素。

## 第四节 推动群众性的技术革新

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建设，除了依靠专业科学技术队伍研制外，还注意放手发动群众，搞好技术革新，充分发挥现有装备的效能并不断加以改进。从五十年代末以后，军队武器装备的技术革新取得了大批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提高了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如总参测绘局革新成功的天文测量光电观测法，可使星光变成电信号，并自动显示观测时刻，比原来的观测法简便，精确度提高了1倍。某部改进后的70式130自行火箭炮液压升降装置，结构合理，升降平稳，缩短了射击准备时间，提高了火箭炮的快速反应能力。（二）改善了武器装备的使用条件，提高了对环境的适应性。沈阳军区某炮兵教导团等单位研制的炮阵地准备配套风动工具，提高了严寒条件下火炮射击准备速度3至6倍。（三）增强了战场维修保障能力。空军革新成功的歼6、歼7飞机测试车，实现了对机上设备的原位检测和监控，提高工效4至5倍。海军简易抗干扰器研制成功，大大简化了舰艇消磁电流的抗干扰调整过程。（四）改进和研制了一些装备，解决了某些战备急需。总参工程兵部改制的新的黄河岸滩路面器材，基本解决了周恩来早在五十年代就提出的“克服黄河岸滩障碍”这一战备急需项目。老山前线某部革新成功的哨位通信盒，可以报答、通报情况，还能代替人员查哨，应用后减少了阵地的人员流动和伤亡。济南军区某坦克团革新研制出坦克训练中以枪代炮的单发控制器，解决了几十年来坦克训练的难题。技术革新成果如群星闪烁，不胜枚举。

各单位党委、政治机关和广大政治干部，在发动群众开展技术革新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 一、破除技术革新中的思想障碍

技术革新开始兴起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当时部队指战员多数出身工农，科学文化知识水平较低，“科学神秘论”和“自卑感”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成为开展技术革新的思想障碍。各部队在思想教育中，运用古今中外众多活生生的事例，特别是用军队内部的发明创造事例，启发群众认清自己的力量，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技术革新，调动了广大指战员搞技术革新的积极性。

进入七十年代末期以后，国防科学技术发展迅速，技术革新难度增加。在这种形势下，有些人产生了“技术革新只能依靠科研单位”的思想。为了克服这种思想障碍，许多单位认真引导大家认识开展群众性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对于改善部队现有装备、促进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从而激发了群众开展技术革新活动的积极性。成都军区通信团根据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体验，深感要完成通信保障任务，不仅需要过硬的军政素质，而且需要适应现代战争的装备器材。获得这些装备器材，实现通讯器材的现代化，一方面要依靠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另一方面要依靠指战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提高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思想认识提高以后，这个单位出现了领导抓革新、群众想革新的局面，全团共革新成功14个项目，被评为全军区技术革新先进单位。北京军区某集团军有1100多名志愿兵活跃在技术革新第一线，自一九八六年上半年到一九八七年初，取得106项成果，其中

97 项获有关部门奖励。

## 二、明确技术革新的方向

一九五九年一月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充分肯定了部队技术革新活动的成绩和作用，并指出：“技术革新运动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进一步明确它的目的性，确定它的内容和目标”。会议确定，技术革新应以改善技术装备和改进操作方法为目的。它的具体目标是：将各种兵器、装备、工具加以改进，以增强性能，加快速度，减轻重量，缩小体积，提高效率，减轻劳动，一物多用，节约器材，易学易用，保障安全等 10 项。同年一月十八日，总政治部据此精神发出了《关于开展一专多能和技术革新运动的指示》，较好地统一了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认识，使部队的技术革新活动向前迈进了一步。

经过广大指战员的努力，全军的技术革新形成了广泛的群众性的活动，对于推动战备、训练、施工等各项国防建设任务的完成起了积极作用。存在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改革项目较偏。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在军队中进一步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指示》，指明了上述问题，并根据当时部队的实际情况，强调“改革工具，革新技术，改善劳动组织，变手工操作为机械操作，应成为广大群众技术革新的主要突击方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部队现代化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中央军委和各总部不断向部队提出开展技术革新的要求。一九八三年九月，总参谋部提出：武器装备技术革新工作必须坚持为部队服务，为战备服务，为全军装备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技术革新的重点是以改进提高现有的武器装备的战术性能为主，以反坦克、防空武器以及与其相关连的配套装备器材为主，以小、中型单个项目为主。立足干部队本身的力量，实事求是，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围绕上述方向和重点进行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技术革新活动的蓬勃发展，促进了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例如，某型猎潜艇已逐步装备部队，而海军朱口修理所承修不了该型号猎潜艇，送工厂修理，仅坞修 1 艘艇就要耗资 15 万元，由于维修费压缩，一些艇无法按计划进厂修理。威海水警区决定自己动手，改建朱口修理所滑道，承修猎潜艇。政治干部动员官兵和职工筹措资金，土法上马，仅用三个月时间完成了计划半年的施工任务，改变了该地区不能承修较大型舰艇的局面，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了贡献。

一九八五年，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之后，第二炮兵党委依据部队建设的总体目标，从建设完善的科技体系入手，推动武器装备发展和作战使用研究工作。他们一方面充实和加强专业科技队伍，使专业研究学科达 90 余个，科研人员知识、专业和年龄结构趋于合理；一方面以各部队的科技活动中心和技术室为依托，大力开展以“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为主的群众性科研技术革新活动。科研和技术革新发生了重大变化，“七五”期间共取得 2400 多项成果，其中 518 项获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

## 三、实行领导、群众和专业技术人员“三结合”

在技术革新活动中，许多单位采取领导、群众和专业技术人员“三结合”

的形式。这种形式有利于物资的供应和时间的保证，有利于敦促一些领导亲自参加技术革新活动，有利于专业技术人员发挥技术骨干作用，有利于吸取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有利于广大群众向专业技术人员学习科技知识，增长才干。由于“三结合”发挥了集体智慧和各方面的优势，有效地推动了技术革新的发展。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学习地方的经验，军队技术革新的组织领导方法也进行了改革，实行了“合同制”，改变过去搞技术革新自己出课题、上级管审批、指标不具体的做法。“合同制”增强了技术革新工作的计划性和约束力，使技术革新与成果的推广使用直接挂钩，调动了群众技术革新的积极性。

在“三结合”和“合同制”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注意不断促进团结协作，及时解决工作中的矛盾和思想问题，保证技术革新活动健康发展。

#### 四、表彰先进典型，推广革新成果

人民解放军总部领导机关和各级党委、政治机关，重视表彰先进典型和推广革新成果的工作。

五十年代末期，技术革新刚刚兴起不久，就涌现了一批革新典型。如济南军区宁国军创造的1人代替4人操作的“钻机滑板”；某部队滕洪图和卢广华创造的能使作业速度提高1倍以上，人力节约三分之一的“风钻自动推进架”和“弹簧滑锤”；还有战士发明家李金刚，一年中创造发明25件训练器材。对这些先进典型，报纸、电台及时进行了宣传表彰，许多单位召开现场会、展览会进行推广，对推动当时技术革新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

六十年代中期，部队群众性武器装备技术革新活动有了较大发展。为了总结交流经验，推广革新成果，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首次全军装备技术革新交流会，并展出革新成果2700多项，接待观众8500多人次。毛泽东、刘少奇等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参观，给全军技术革新工作以有力的鞭策和鼓舞。

八十年代初期，部队技术革新工作蓬勃发展，并取得了较大成绩。一九八三年九月，召开了有200多人参加的全军武器装备技术革新工作会议，从技术革新角度来促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为了配合开好这次会议，还举办了全军武器装备技术革新成果展览，共展出革新成果982项，接待观众2万余人。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这次展览，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等分别为展览题词或写信表示祝贺。这次会议为新时期军队武器装备的建设和技术革新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在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历程中，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是：

——明确政治工作的目的，加强政治工作的针对性。科技单位的政治工作，是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保证出成果、出人才，为国防现代化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工作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开展活动，充分显示服务和保证作用。

——正确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特别是要认真贯彻自力更生方针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知识分子当作依靠力量，使他们心情舒畅，勇攀高峰。

——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科技大军。这支大军要领导、专家、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相结合，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创造力；要培养具有国防科技战线特色的为革命献身、科学求实、开拓创新、大力协同、严守纪律和艰苦奋斗的思想作风。

——政治工作要渗透到技术工作中去，充分发挥它的威力。科技人员的许多思想问题，大都是在科研试验和其他技术活动中产生的。政治工作渗透到这些领域中去，结合科技工作一道去做，才能有针对性、及时性和有效性。

——适应任务和对象的特点，克服工作一般化。科技人员思考问题周密，内心世界情感丰富。政治工作人员应理解他们、尊重他们、体贴他们，与他们交知心朋友，帮助他们克服实际困难；应当多采用小型的、分散的、个别的活动方式，摸清各类人员的思想特点，采用不同的工作方法，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的。



## 第十章 后勤保障、国防工程施工和生产经营中的政治工作

后方勤务保障、国防工程施工和生产经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和发展的光辉历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后方勤务保障、国防工程施工及生产经营方面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治工作组织体系和制度，开展了生动扎实、坚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从而保证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保证了优良传统的继承发扬和新形势下的改革创新，保证了上下内外团结和广大指战员积极性的发挥，保证了各项艰难困苦任务的完成，保证了部队战斗力的不断提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 第一节 后勤保障中的政治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是军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能是把国家经济力转化为战斗力，保障军队建设和作战需要。

后勤保障政治工作是军队在执行后勤保障任务中开展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八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继承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了后勤保障中的政治工作，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后勤工作中贯彻落实，保证了后勤保障能力的提高，保证了后勤各项任务的完成。

### 一、继承后勤保障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保障政治工作，有着光荣的传统。早在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了建立之初，红军部队就建立了后勤部门，同时也建立了后勤保障政治工作。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三湾改编后，在茅坪的攀龙书院建立了第一所工农革命军医院。接着，红军又在广东惠阳县中洞乡创建了中洞红军军装厂，归江东特委领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陆续组建总经理部、总军医处、后方办事处、总兵站部、抚恤委员会等后勤机构，同时在这些机构中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设立了政治委员或其他政治主作干部。一九三二年，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对中国工农红军医院、兵站的任务和政治机关的设立及其工作内容作了具体规定。这一时期，红军围绕打仗消灭敌人、筹款筹粮、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开展丰富多采的政治工作，保证了红军的建设和前线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后勤保障政治工作贯彻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独立保障”的方针，动员组织部队做好物资筹供工作，保证八路军、新四军的物资供应。一九四一年八月，八路军总部在晋东南召开后勤领导干部会议，专门研究后勤上作，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开幕词中强调指出：政治建设、军事建设和后勤建设是建军的三大内容，缺一不可；军队必须有健全的后勤工作，否则就不能发挥应有的战斗力；加强后勤建设是加强军队建设，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会议报告中阐述了后勤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要求教育全体后勤人员不断学习，提高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坚定自力更生的观念，确立艰苦奋斗的精神，勤勤恳恳地为全军官兵服务，成为大公无私、艰苦朴素的模范。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的困难，中共中央发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后勤保障政治工作动员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形成了著名的“南泥湾精神”。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军委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设立总后勤部。随后各野战军后勤部相继配备政治委员和设立政治部。这一时期后勤保障政治工作贯彻“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原则，紧紧依靠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有力地保障了大兵团机动作战的供给，保障了迅速发展壮大的人民解放军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了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时期。军队后勤保障政治工作组织机构不断完善，领导关系进一步

理顺。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九日，中央军委电令各军区抽调人员建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勤部。在组建总后勤部各业务部的同时，建立了总后勤部政治部。全军团以上部队后勤机关都建立了政治工作部门或委派了政治工作人员。一九五二年六月召开的全军后勤部长会议，明确了总后勤部政治部与各大军区和军委海、空军后勤部政治部的关系。即：总后勤部政治部在总政治部领导下，在总后勤部党委和总后勤部首长领导意图下，为总后勤部及其直属各业务部党务与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总后勤部政治部对各级后勤政治部虽无垂直领导关系，但应经常与各级后勤部政治机关取得工作联系，研究后勤部门的政治工作，提出改进意见，报告总政治部，以指导全军后勤政治工作。各级后勤部政治部应定期将后勤政治工作向所在军区、部队作报告，并应同时向上级后勤部政治部作报告。一九五三年五月，总后勤部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军队后勤工作人员要树立“为国家负责、为部队负责”的思想，并以此作为后勤工作的指导思想。“文化大革命”中，后勤系统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遭到了严重破坏。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后勤工作在改革中发展。一九七八年四月，全军后勤工作会议重新明确了后勤建设的指导思想：“勤俭办一切事业，面向连队，面向基层，一切为部队服务，一切为战备服务，加速后勤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新的形势下，后勤保障政治工作要求后勤人员牢固树立全局观念、战备观念、群众观念、政策纪律观念和勤俭节约观念。

自新中国诞生至一九八七年的三十八年中，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体制包括后勤保障系统的编制体制作过多次调整，然而后勤保障政治工作组织机构和人员一直保持并不断得到加强。后勤保障政治工作，始终继承发扬战争岁月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紧紧围绕党、国家和军队各个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坚持从后勤自身特点和部队实际出发，牢牢把握事关军队后勤建设全局的关键，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较好地发挥了服务保障作用。

一是调整配备干部，建立健全后勤组织机构。新中国成立时，总后勤部机构不健全，后勤干部比较缺乏，直接影响了后勤系统工作的开展。一九五一年一月九日中央军委发出《注意加强后勤建设的指示》，指出，“在现代战争中，后勤组织的健全与否及工作的好坏，对于争取战争的胜利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各级首长必须引起对后勤工作的重视和加强领导，并应适当地选派较强的干部参加后勤工作，及随时注意提高后勤干部军政素质和业务能力，健全和充实后勤组织，以适应我国国防建设之需要。”同年六月，中央军委又发出了《关于由各大军区筹组总后勤部各部的通知》。遵照中央军委的这些指示，加紧了后勤组织机构和干部的调配工作。至一九五二年底，总后勤部设立了财务、军需、军械、卫生、运输、油料、营房管理、军需生产等8个业务部。新增设部门的干部，分别由各大军区负责配备。财务部、干部部干部由华北军区选配，军需部干部由华东军区选配，军械部干部由西南军区选配，运输部干部由中南军区选配，生产部干部由西北军区选配，营房部干部由东北军区选配。卫生部门所需干部，由总后勤部指名调任或从各军区抽调。另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在组建人民解放军空军、海军、炮兵等军兵种的同时，相应地设立了各军兵种的后勤机构，并调整、充实了各军区和陆军

部队的后勤机构。以后，全军各级后勤组织，在建设与管理中逐步配套、完善。在配备各级后勤领导班子中，严格掌握标准，注意走群众路线。一九八五年精简整编后，总后勤部二级部领导的平均年龄，由 59.6 岁降到 54.2 岁；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由 16.7% 提高到 27.8%。各大单位后勤二级部以上领导的平均年龄，由 53.7 岁降到 50 岁；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由 35.2% 提高到 48.1%，后勤科技单位和技术管理部门的领导班子，配备了德才兼备，有一定组织能力的专家和技术人员。

二是坚持和改进后勤系统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后勤保障工作体系庞杂，关系到作战、训练、科研以及全军官兵衣、食、住、行、医每一个方面，工作非常具体。建国之初，各种保障工作处在开创过程中，头绪纷繁，任务很重，部分领导忙干事务，对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重视不够。为了克服这种现象，一九五二年，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在全军后勤部长会议上，要求各级后勤党委和领导人员必须认真研究中央和军委的各项重要指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广泛开展自上而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民主，改进工作作风，克服事务主义和官僚主义。一九五三年十月，总后勤部党委颁发的《关于试行后方勤务部队政治工作概则（草案）》，明确规定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和支部建设，健全党的民主生活，加强党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总后勤部政治部在关于后勤政治工作任务的一系列指示中，也反复强调了这个问题。如在一九五四年的工作指示中指出：党委的领导主要的是政治、思想、原则的领导，不能把它降低为日常的事务机关，党委要善于发挥各个业务部门的积极性，不能去包揽代替各业务部门的工作，以便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政治思想和大政方针的领导。在实际工作中，各级后勤党委都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经常分析本单位的情况，适时地加以指导。

为了提高各级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在领导班子建设方面，注重提高各级后勤领导干部的素质。根据一九五三年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精神，调配了一些精干而有战斗经验的军政干部到各级后勤部门从事领导工作。各级后勤党组织和政治机关，还采取以会代训和举办理论、党务工作培训班的方法，提高党委（支部）书记做好工作的能力和领导水平。强调领导干部必须把主要功夫用在调查研究，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上，学会和注意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依靠群众的力量，重视总结实践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大家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挥党委一班人的集体智慧，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一九五六年五月召开的总后勤部首届党代表大会，提出必须切实贯彻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各级首长根据职责分工，负责处理自己所担负的工作，认真贯彻党委的决定。党对军队工厂企业的领导，一九五六年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即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一九七九年后勤科技管理工作会议之后，科研单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所领导分工负责制，或院所党委领导下的室主任负责制。为切实加强党对后勤工作的领导，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全军各级党委都有后勤部门一名主要领导人担任党委常委。

后勤系统所属仓库、医院、教学、科研等基层单位的党组织，大多是专业技术干部任党支部书记，有的人缺乏党务工作经验；有的单位编制人员少，

党员数量少，开展党的活动存在许多困难。针对这些情况，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注重增强支部书记的使命感、责任感，着力解决“不愿当、不会干”的问题；做好发展、调整和保留骨干的工作，建立起一支结构和分布比较合理、相对稳定的党员队伍，保证基层党组织的健全。

三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和各项指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提出了一些重大方针原则，发布了一系列指示、命令，后勤各级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扎扎实实地抓好贯彻落实工作。一九五一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增产节约的方针，向部队下达了《关于精简节约反贪污浪费的指示》。志愿军后勤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针对当时少数干部战士中存在的“战争环境，浪费一点无所谓”的错误观念和不爱惜物资、乱丢滥用现象，向全体干部战士介绍后方人民增加生产、节衣缩食支援前线的动人事迹，动员全体党团员、指战员自觉反省，彻底揭发浪费现象，严格追查贪污案件，广泛开展厉行节约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中共中央对此作了重要批示：“志愿军在前线作战，尚且应该和能够精简节约，我全国党、政、军处在和平环境，当然更加应该和更加能够大量地彻底地实行精简节约。”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的紧急指示。为落实这一指示，全军后勤机关把制订与实施“节约制度”作为人民军队经济管理的重要环节，从经费使用、爱护物资、精简机构与人员、军需生产等方面提出了节约的具体办法。全军各部队把提倡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掀起了群众性的节约运动。一九五三年九月至十二月，全军共节约 93170 亿元（旧币，下同），其中包括紧缩预算、增产节约、清理物资等项。可作财政收入的计 63948 亿元。军委财务部收到上缴节约款项 17026 亿元。共节约粮食 8925 万余斤。华东军区后勤部清理长期积压的物资总值为 2500 亿元，东北军区后勤部在九至十月，减少现金积压 3400 亿元。

为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后勤部党委提出后勤建设要与总路线精神相适应，后勤工作要随着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逐步提高到“指挥战斗，组织供应，保证战争胜利的更高阶段”。后勤保障政治工作，把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高全体人员的社会主义觉悟与现代化正规化的建军思想，作为中心任务。要求后勤人员认真贯彻“为国家负责、为部队负责”的指导思想和“克服浪费，改进供应工作与卫生医疗工作”的方针，使总路线的学习，成为改进和提高工作的巨大动力。为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勤俭建国，勤俭建军，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和中央军委“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总后勤部党委提出了 6 项贯彻措施。第一，紧缩机构，精简人员；第二，各项工作精打细算，经费使用分清主次缓急；第三，物资器材的管理和使用，加强计划性，挖掘潜力；第四，调整生活标准，进一步组织农副业生产，改善部队生活；第五，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产品质量和产量，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第六，防止和消灭工作中的损失、浪费现象和贪污行为。全军上下共同努力，做到少花钱，多办事，从各方面缩减了开支。军费开支从一九五六年占国家总预算的 20%，下降到一九五八年的占 15.12%。军费减少了，仍保证了军队的重点建设，完成了对部队作战、训练、国防工

程建筑等经费物资供应和卫生医疗任务。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贯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关于军队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的指示，后勤保障政治工作动员和教育后勤人员积极支援和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后勤部队腾出部分库房和场地，开展为社会服务的储运业务。全军各类医院及部分机场、港口、铁路专用线向社会开放，军需工厂积极发展民品生产。后勤科研单位调整科研方向，由单纯的军用科研，向军民结合方向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一九八五年，为贯彻中央军委裁军 100 万的重大决策，总后勤部机关的编制员额精简了 47.4%。各大军区、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国防科工委后勤机关编制员额精简了 39.3%。在精简整编中，广大后勤人员识大体，顾大局，坚守岗位，严守纪律，以实际行动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大局。对全军撤、并、缩单位的 3698 万平方米营房，作了调整使用、组织看管和经营开发；对编余的武器装备，收存入库 90 万件，对 4000 多件重型装备进行了检修封存；对撤、并和改变隶属关系的 900 多个团以上单位，加强了经费物资接管工作，调整了供应关系，保证了供应。

## 二、深入进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增强后勤人员的服务观念和奉献精神

后勤就是保障，后勤就是服务。叶剑英曾指出：“我军的后勤工作，从红军时期到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后勤工作部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这是后勤工作的光荣。”但是，在各个不同时期，都有不少后勤人员却看不到后勤工作在国防建设中所占的重要位置，而把后勤工作看作是“收收发发”、“看看管管”的事务性工作，有的人感到在后勤工作“没有出息”，“没有地位”，“没有前途”，甚至说“低人三等”。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一些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服务观念、奉献精神淡化，针对上述情况，后勤保障政治工作着力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引导广大后勤人员以做好本职工作、提高服务质量的具体行动来实践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

——领导机关率先改进工作作风，在优质服务方面做出榜样。在一九五六年总后勤部召开的首届党代会上，代表们针对后勤机关存在的办事拖拉、粗枝大叶等不良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会专门讨论了后勤机关应当树立什么样的作风问题。根据这次党代会的精神，总后勤部党委、总后勤部政治部把改善机关作风作为思想政治工作一项经常性的内容来抓，大力提倡善于调查，深入研究的作风，处理各种工作及时、准确的作风；相互密切协同、主动配合的作风；严肃、正规、细致的作风。以后，历次召开的全军后勤重大会议，总后勤部党委、首长都强调了改进领导作风和机关作风问题，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让我们一目了然，感人甚深。过去也知道守岛戍边的干部战士是很艰苦的，但没有这样如实地深切地看到他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战斗生活着。为了祖国的安全，他们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力量，他们是最可爱的人！看了深受感动。”

---

时剑英《在听取总后勤部洪学智部长汇报后对后勤工作的指示》，总后勤部司令部档案馆编印《后勤工作文件汇编》（1982年），第3—4页。

引自总后勤部司令部档案馆编印《后勤工作文件汇编》（1982年），第42—43页。

——引导全体后勤人员自觉贯彻“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为作战服务”的方针。一九八七年一月，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后勤保障对军队现代化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作用。要通过政治工作，教育广大后勤工作人员牢固树立一切为了部队、为了未来战争需要的思想，热爱本职，精通业务，努力完成各项后勤保障任务。”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为作战服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宗旨在后勤的具体体现，是后勤保障政治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新中国诞生后的三十多年中，全军后勤系统各级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结合抗美援朝、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以及防御国民党军队窜扰活动等战斗任务和所属人员的思想状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坚持不懈地进行“宗旨教育”，培养后勤人员必须具有的政治品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热爱党的事业，热爱后勤工作，热爱本职业务”；引导后勤人员充分认识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做好后勤工作的光荣感和自豪感。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使“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为作战服务”的方针在广大后勤人员的思想上深深扎根，发扬无私奉献精神，满腔热情、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做好战时后勤工作。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系统开展了爱伤员、爱物资、爱车辆的“三爱”运动。各部队则根据自身的特点，提出了不同的口号和要求。仓库以爱物资为重点，以“五防”（防空、防特、防火、防水、防霉烂变质）、“三保”（保质、保量、保安全）为中心；汽车部队以爱车辆为重点，以安全行车为中心；卫勤部队以爱伤员为重点，关键是英勇抢救、安全后送、精心医疗，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使大家既有远大理想，又有明确具体的奋斗目标。截至一九五四年，志愿军后勤部队共涌现出了48039名功臣、模范和766个立功单位。

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各参战部队和有关后勤保障部门，对全体后勤人员深入开展战时思想政治工作，根据一线后勤保障的急需，明确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全心全意为前线服务”的口号，狠抓了“以一线需要为己任”的教育，从机关到分队层层发动，大力提倡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急一线将士所急，想一线将士所难，提高工作姿态和工作标准，不断改进保障措施，做到前线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供应什么，保障部队作战需要。前线部队连续行军激战，广大官兵体力消耗大，口干舌燥，食欲减退，压缩干粮咽不进，猪肉罐头不想吃，严重影响战斗力。后勤部门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采购大量水果罐头、汽水、甘蔗及蔬菜等，分送各部队。为保证战地救护，除广州、昆明军区派出大量医护人员外，总后勤部从各军医大学和解放军总医院等单位抽调了一批包括专家、教授组成的医疗队奔赴前线，使云南方向需手术的伤员61.4%在一线及时动了手术，广西方向在一线的手术率为56%，许多危重伤员得到及时救治。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主治军医吕士才，不顾癌症病痛，主动请缨，奔赴前线，抢救了数以百计的伤员，荣立二等功。当他胜利归来后，因癌症恶化，医治无效，不幸病逝。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共总后勤部委员会作出决定，号召所属机关、部队开展向吕士才学习的活动。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建筑工程研究所，坚持科研为部队服务、为战备服务的方向，先后7次到法卡山、扣林山前沿阵地作调查，根据部队需要，研制成功防潮被、防水小帐篷、防潮粮袋和弹药防潮封套等，解决了阵地防潮问题，前线官兵深受感动，喊出了“机关万岁”的口号。一九八四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给该研究所记集

体二等功。

——倡导优质服务活动，提高日常后勤保障服务水平。服务质量、服务水平的优劣，反映了后勤单位和人员服务观念的强弱，思想品德的高低，奉献精神多少，也是对后勤工作好坏的基本检验。开展优质服务，适应了新形势的客观需要，对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发扬光荣传统，抵制各种不良倾向和歪风邪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长期以来，后勤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把强化优质服务观念，开展优质服务活动，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反复进行动员教育，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具体措施和规章制度，贯穿到整个后勤保障过程之中。一九六五年，后勤部门普遍开展了“物资下送，服务上门”活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后勤工作的优良传统逐步恢复和发扬。总后勤部党委提出“不要眼睛只看到首长，搞‘锦上添花’；要把眼睛看到基层干部战士，搞‘雪中送炭’”。后勤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开展了富有特色的活动。青藏兵站部制定了《三站（兵站、加油站、机务站）互爱优质服务公约》和《三站工作协调制度》，有力地促进青藏线全线优质服务活动的发展，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军医大学等医疗教学单位，坚持数十年派医疗队为边疆、高原部队和老区人民送医、送药，检查身体，并帮助培训医疗业务骨干，留下了“不走的医疗队”。物资供应部门，坚持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的“三全服务方针”，以良好的信誉、可靠的质量、合理的价格吸引用户。备军需工厂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坚持“军品第一、军品优先”的原则，坚持为部队服务、为战备服务的方向，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改进产品结构，按照“经济、适用、耐用、轻便、美观”的要求，生产更多更好的适合部队训练和现代化战争需要的产品。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自一九五八年建立以来，始终坚持为部队服务的方向，他们冬去寒区，夏去热带，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搞科研，把解决部队的实际需要，作为第一位的研究任务，先后开展了270项课题研究，直接为部队服务的就有245项，获科研成果111项，有44项达国内先进水平，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保障作战、训练等各项任务的完成作出了贡献。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总后勤部通令嘉奖该研究所。南京军区后勤部针对发展商品经济条件下部队医院、疗养院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地提出了4条要求：即坚持为部队服务的方向；保证部队正常医疗卫生工作任务的完成；坚决防止和纠正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现象；大力加强医德医风教育，保证医院、疗养院管理改革朝着健康方向发展。总后勤部向全军转发了他们的做法。

为了不断强化全体后勤人员的服务观念和奉献精神，后勤保障政治工作注意把正面思想教育和宣传表彰先进典型结合起来，广泛宣传长期扎根后勤基层的“老山沟”、“老边防”、“老海岛”的事迹，引导后勤人员正确对待个人得失，特别是当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发生矛盾时，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革命需要。广大后勤人员，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计个人的得失，长期默默奋斗，甘当无名英雄，在后勤工作岗位上发挥“螺丝钉”的作用，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仅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九年，总后勤部召开的两次全军后勤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就有1600多名先进代表出席。某坦克部队战士叶洪海，在学习地方经验的基础上，研制出“中曲醱化饲料”。该饲料具有制作简便，原料充足，节约粮食、燃料，减少猪病和长膘快等优点。一九七〇年十月，中央军委授予叶洪海“模范饲养员”光荣称号。原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甘祖昌，在战争年代跟



随毛泽东坚持井冈山斗争，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保卫延安的战斗和进军新疆。新中国成立后，他不居功自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踏踏实实做好后勤工作，一九五九年，自愿要求回故乡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乡，当了普通农民。“将军当农民”一度在全国传为佳话。全军工厂企业战线的广大职工，为支援前线，保障部队需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分子。一九八六年，总后勤部授予111名干部职工“全军劳动模范”称号，同时授予65个工厂“全军先进企业”称号。

后勤保障政治工作自身也坚持面向部队，面向基层，积极做好服务工作。主要表现5个方面：一是思想导向服务。坚持正面灌输，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后勤人员的头脑，使他们在复杂的形势面前，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二是政策服务。把研究政策、制定政策、落实政策作为一项根本性的任务来抓。对新出台的政策，积极宣传解释，使后勤人员了解政策，用好政策。在新的形势下，有些政策需要调整，后勤政治机关组织力量调查论证，提出建议，使其不断完善合理。三是法律服务。后勤工作与社会联系广泛，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涉法事务日益增多，后勤保障政治工作把提供法律服务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依法解决各类纠纷，挽回经济损失，维护了部队和官兵的合法权益。四是人才服务。除了加强对于部的考核，为党委提供准确的用人依据外，还积极排除影响人才成长的各种思想障碍，创造良好的成才环境。并及时提供人才需求信息，尽量做到合理调配，使后勤各个岗位都有合格的当家理财的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五是典型服务。根据后勤不同战线和不同行业，树立各类典型，较好地发挥了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推动了后勤各项任务的完成。事实表明，后勤保障政治工作服务得越好，越有地位和作为，威信也越高。

### 三、提高后勤人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当好家、理好财

后勤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管钱管物，国家供应军队的经费、物资都要通过后勤部门落实到全军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员。怎样使钱、物的安排使用既符合党的政策，服从整个国家的经济计划，又符合部队的实际情况；既使大量的经费、物资主要用于部队技术装备改善上，同时又能根据国家经济情况和人民生活水平，适当地保证部队训练、工作和生活上的要求，真正做到钱花得少、事办得好。这就对后勤机关、后勤人员的政策水平、政策观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几十年中，后勤保障政治工作重视针对这些特点开展工作。

进行政策法规教育，增强后勤人员的法纪观念。针对后勤工作管钱管物，管房管地，管生产经营，政策性很强的特点，后勤保障政治工作把搞好政策、法制、纪律教育作为长期的任务，常抓不懈，打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着重抓好3个方面的教育：一是抓好政策和法律常识教育。组织后勤人员学习党和国家的法律、法令和有关政策规定，学习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有关廉政建设的指示，使大家知法、懂法，并依法严格约束自己。二是抓好预防不正之风产生的教育。随着形势、任务的变化，针对易发生的问题和苗头，及时提要求，敲警钟，把工作做到前面。如在冬贮、元旦、春节，以及院校招生、分配等易发生问题的时机预先打招呼，提要求，较好地防止了一些不正之风。三是抓好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教育。大力培养宣传正面典型，发挥榜样的作用。对典型案件和问题，组织开展现身说法，起到“查处一案，

教育一片”的作用。通过教育，使广大后勤人员深刻认识自己肩负的光荣职责，牢固树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明确标准制度、条令条例是后勤工作的法规，时刻想到自己手中掌管的钱物，是人民的血汗，是军队建设的宝贵资产，要处处珍惜，绝不允许浪费损失。努力克服“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错误思想以及后勤院校、科研单位“清贫”，廉政建设与己关系不大的模糊认识。坚持原则，严格把关，模范地执行财经纪律和各项标准，不搞特殊化，不搞“近水楼台先得月”，不以权谋私，敢于同各种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努力管好物，理好财，争做“红管家”。在一九五七、一九五九年召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一九八三年召开的总后“双先会”（先进个人、先进单位）上表彰了一批遵纪守法、廉洁奉公、一身正气的典型。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中央军委纪委会表彰了在全军财经纪律大检查中涌现出来的 74 个财务工作先进单位和 35 名先进个人。

改革开放以来，后勤系统加强了反腐倡廉教育，坚决抵制和反对金钱至上、个人至上和享乐主义，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勤政廉政措施。总后勤部党委提出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上要为全军后勤做出好样子，领导干部要带头廉洁自律，并着力解决和查纠群众不满的行业不正之风。主要是利用批钱、批物、批指标的权力，索贿受贿、搞权钱交易；利用管钱管物等工作之便，吃拿卡，要，损公肥私；利用服务保障工作岗位，不讲职业道德，刁难勒索；利用业务工作之便建立关系网，私自从事经济中介活动，谋取好处，为家属子女经商办公司提供方便等问题。各级后勤党的纪律检查部门积极依靠切实可行的廉政制度保证廉政建设，加强监督，赏罚严明，蔚成廉政光荣、腐败可耻的氛围。解放军兽医大学党委，自一九八一年以来，历届领导班子都把廉政建设摆到突出位置上，提出“廉洁奉公的好规矩不能在自己手上破坏，而要发扬光大；为人师表的好风气不能在自己身上丢掉，而要增添光彩。”他们执行标准不越轨，不为亲属、子女办出格的事，不用公款吃喝。校领导不坐豪华小轿车，用节省的经费购买大客车。作为教职员工的班车。一九八五年，经国家批准，该校第一次单独组团赴日本考察，校领导主动把出国机会让给专家教授。该校党委为政清廉的事迹，受到中央军委纪委会的表彰。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惠侨楼，收治的病人大多是外宾和海外侨胞，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七年的八年间，住院病人送给医护人员大量的“红包”，但没发现有人为金钱所动，做出有损国格、人格和解放军声誉的事。相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崭新的精神风貌，传播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仅一九八五和一九八六年，上交的港币达 14 万元，物品 500 多件。一九八七年，惠侨楼作为先进集体，光荣地出席全军英模大会。

建立检查制度，确保有关政策规定的落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后勤各级党委、纪律检查机构和政治机关，同有关业务部门密切配合，组织进行了 10 余次全军性的清仓查库、清产核资和财经纪律大检查。这些检查，有的是根据上级的指示进行的，有的是后勤系统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检查，弄清了家底，发现了漏洞，纠正了问题，在全体后勤人员中筑牢了思想堤防。一九五五年，根据政务院关于全国仓库清理调配决定的要求，总后勤部和各大军区分别组成清仓委员会。截至同年底，全军清出粮食 30 亿斤，清除旧被服 120 万件，清理了军械物资 163.5 万吨。这次检查，有助于摸清家底，增加收入，节省开支，支援国家建设。一九七八年，总政治部、

总后勤部组织了全军财经纪律大检查，整顿了财务工作。总后勤部对财务、物资、工厂、基建、医疗卫生、军事代表的管理体制作了调整，对 343 项后勤规章制度和标准进行了清理，确定继续执行的有 124 项，对不适应现实情况和事业发展的则进行修改补充。一九八三年二月，中央军委部署全军财务大检查，各级司、政、后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共同组织实施。全军抽调 4 万亲人，组成近 7000 个检查组，重点检查了一九八 一至一九八二年的经费分配、管理使用情况，摸清了财务工作的状况，查清了银行存款和经费家底，全军共收回应交而未上文的款项 2.8 亿元，收回可压缩资金 3.7 亿元。一九八六年全军开展的财务经费大检查，重点检查了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投机倒把，偷税漏税，买空卖空，炒买炒卖外汇，出租出借帐户，截留应上交经费，设“小钱柜”，购买进口高级小轿车和高档商品，用公款请客送礼，游山玩水，私分公款公物，擅自处理营产装备等问题。通过这次检查，惩处了违法乱纪分子，收回赃款 310 万元。同时扼制了办公司经商风，纠正了一些不正之风。

#### 四、保证后勤人员不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发挥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后勤系统，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在繁多复杂的业务门类中，技术性都很强。因此，提高后勤工作的科学技术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曾经指出：“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后勤工作，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的科学，不需要有系统的学习、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后勤是一门科学，是军事科学的一部分，后勤每一种专业，都是技术，每个后勤干部必须精通专门业务。针对后勤专业特点，后勤保障政治工作十分重视教育后勤人员确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战斗力、保障力”的观念，不断提高后勤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后勤现代化建设中的巨大作用。

配合业务部门，提高后勤领导干部的科学管理水平。后勤工作是一门综合性的专门科学，首先领导干部要懂科学，增强科技意识，会从战略全局观察处理问题。国防部长彭德怀曾经指出：“现代战争的后勤组织与工作，不仅是单纯组织物资和伤病人员的运输和分配，而且要与敌人的空降、轰炸作严重的斗争，要指挥防空兵、铁道兵、工兵和步兵的活动和作战。如果没有精干的通晓战争知识、科学知识和有战斗经验的干部，是不能担任和完成这种严重指挥任务和补给任务的。”遵照中央军委领导关于后勤各级干部要努力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以适应军队建设和作战需要的指示，后勤机关各级党委有计划地组织培训在职领导干部，全面提高他们的素质。一九五三年三月至四月，总后勤部举办全军后勤领导干部集训班，参训的有各大军区后勤主官和军、师后勤领导干部共 250 人，朱德亲临集训班作重要指示。一

---

毛泽东：《对后勤学院第一期开学的训词》，总后方勤务部办公室编印《后勤工作文件汇编》（1953 年），第 21 页。

彭德怀：《在全同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总后方勤务部办公室编印《后勤工作文件汇编》（1953 年），第 174 页。

九五四年，总后勤部举办在职后勤领导干部后勤战役集训，参训的有各大军区后勤部长、参谋长，省军区和特种兵后勤部长，总后勤部各业务部部长等129人。一九八五年，总后勤部举办了2期全军后勤高、中级干部管理科学集训班，参训干部453人。全军各大单位也抓了后勤干部的培养，制定了人才培养规划，使后勤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如空军后勤部，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年，共培训了各类后勤干部1.2万人，其中达到大专以上学历的1339人，中专或经院校一年训练的1.1万人，受训率达65.9%。总后勤部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在上述活动中政治机关进行了很好的配合。

加强科技队伍建设。十年“文化大革命”，严重影响了后勤科技队伍建设，科技队伍的状况与后勤现代化建设很不相适应。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总后勤部党委采取有力措施，加速科技队伍建设。针对科技队伍力量薄弱，后继乏人的状况，积极从军队和地方院校中选拔优秀学员，从部队技术革新队伍中选拔技术骨干充实科技队伍。积极商调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复员转业的技术干部回部队工作，对技术干部尤其是科技骨干复员转业严格把关、尽量保留。重视科技人员的专业培训，尤其是中层科技干部，根据国家规定，每两、三年安排一次进修，有计划地选派一部分人出国留学、进修、考察。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派出留学人员逐年增加，对外交流不断扩大。截至一九八七年，总后勤部直属单位派遣出国留学、进修378人次。同时，妥善安排退居二线的老专家、老教授，发挥他们在人才培养、科研医疗、技术咨询、著书立说、学术交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引导老专家、老教授甘为人梯，鼓励后来居上，促进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和优秀人才的成长。要求中青年科技骨干虚心向老专家、老教授学习，在事业上发愤图强，在学问上精益求精，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努力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各级领导既重视老专家的作用，又为中青年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充分调动和发挥新、老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把优秀中青年骨干放到关键性的科技岗位上，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和地位。有计划地安排中青年人才参加重点项目协作攻关和学术活动。通过一系列措施，保证了多出人才，多出成果。以医疗卫生战线为例，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七年的五年间，全军共获医学科技成果9344项，其中获国家发明奖6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49项，军队科技成果一、二等奖353项，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第三军医大学组织胚胎教研室讲师蔡文琴，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进修学习期间，取得5项科研成果，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一九八三年，她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女博士。同年六月总后勤部党委批准，破格晋升蔡文琴为教授。

另外，军队各企业化工厂党组织，在抓好中级技术教育和干部培训的同时，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规格的办学方法，加速人才培养，鼓励自学成才，进一步提高了职工的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素质。

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后勤系统科技干部占多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后勤教学、科研、医疗、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主要技术力量。后勤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经常教育全体人员，充分认识知识分子在后勤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使大家懂得，实现后勤现代化，是高度复杂的科学技术建设，没有各项专门知识及精湛科技的人才，则无法进行现代化的后勤建设。在实际工作中，注意从多方面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大力宣传和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政治上关心知识分子。后勤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历来重视知识分子工作。一九五六年召开的总后勤部首届党代表大会，专门研究了知识分子工作问题，作出了《关于加强知识分子工作的决议》。这次大会邀请了10余名高级知识分子列席会议。同年，总后勤部政治部全面检查了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后勤各级政治机关按政策制度，解决知识分子的级别、职务、工资和福利待遇问题。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参军。推荐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参加政协和其他社会活动。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遭受林彪、邱会作一伙打击迫害的1200多名科技干部，于一九七九年底全部得到平反昭雪。一九八三年整党工作中，总后勤部党委又提出彻底消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影响，充分认识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地位和作用，切实做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大胆破格提拔使用。

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条件。为使知识分子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几十年中，总后勤部一再克服资金紧张的困难，找出专款，有计划地为医疗、教学、科研单位新建改建教学楼、科研楼、医疗大楼。各单位也从科技开发创收中，留出资金，用于购置设备、设施，改善教学、科研、医疗条件。总后勤部和一些医疗教学科研单位，还设立了留学人员回国科研启动基金和青年科研基金。对知识分子的家属调动、安排，子女入托、入学和就业积极创造条件。在住房分配上，一些单位优先考虑知识分子。有的单位“挤”出经费，修建科技干部宿舍楼、教授楼、博士公寓，以缓解知识分子住房紧张的矛盾，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有的单位设立专门食堂，供高级知识分子就餐，对自行起伙的高级知识分子，组织了粮、菜、油、肉的供应，送货上门，并有计划地安排科技干部疗养，千方百计解除知识分子的后顾之忧。

改进对知识分子的业务领导。后勤各级领导主动与知识分子交朋友，建立感情，热情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党内会议研究科技问题，请有关专家、教授列席；及时纠正对于技术工作的不适当的干涉，减掉一些不必要的行政会议、政治会议，减少某些科技人员的若干兼职和社会活动，以减轻他们的负担。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召开的后勤科学技术管理工作会议上，总后勤部部长张震指出：要注意领导方式，保证科技人员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只是一般的原则，有时候也可以六分之六。科学家在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废寝忘食，你不能叫他停下来参加政治活动。他把研究任务完成以后，搞一个小结或者一个段落，再来学习政治也行嘛。他研究出成果，这里面就有政治，就是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为国防服务，为改善人民的生活服务。

树立和表彰知识分子典型。几十年中，后勤系统广大知识分子，奋战在教学、医疗、科研、施工，生产第一线，呕心沥血，顽强拼搏，勇攀高峰，为国防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成为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后勤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重视发现典型，宣传典型，给予大力表彰，充分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群众为国防现代化多作贡献的热忱。一九八三年总后召开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代表大会，科技干部被树为先进个人标兵、晋升级别的有7人，其中副教授以上4人。被树为先进个人、分别记二等功和三等功的有12人，其中副教授以上的有6人。一九七八年以来，还突出宣扬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的模范事迹。如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研究所所长、总后卫生部专家组组长、一级教授姜泗长，早在一九

四七年，抱着“科技救国”的强烈愿望，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进修，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后，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几十年来，他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发展祖国医学事业。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精心育才，甘当人梯，成为中国现代耳鼻咽喉学科的一代宗师和杰出的医学教育家，先后获国家科技大会奖3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军队科技进步一、二等奖9项，被誉为“模范医学教授”。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分子遗传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黄翠芬，一九五一年从美国返回祖国。她“视名刊淡如水，看事业重如山”，为军事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六十年代，她主持的一项重要科研任务，主要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一九七八年以后，她领导筹建了全军第一个分子遗传研究室，获10项科研成果，其中两项为国内首创。一九八四年十月四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黄翠芬“模范科学工作者”荣誉称号。

几十年中，后勤系统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也曾有过失误和教训。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通过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纠正“左”的指导思想，对待知识分子的一些错误的和不适当的做法逐步得到纠正，大量新的正确的举措纷纷制定和实施，在后勤系统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

## 五、教育后勤人员发扬不怕艰难困苦的革命精神，做好安全防事故工作

后勤部队高度分散，驻地偏僻，条件艰苦，许多部队驻在高原、边疆、山沟，高寒缺氧，交通不便，物质文化生活较差，家属就业、子女上学困难。后勤仓库储备保管着大量物资，特别是油库、武器库、弹药库，预防事故工作难度比较大。一旦出事，将会造成重大损失。后勤保障政治工作针对这些特点大力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首先是加强信念教育，使后勤人员树立“五种革命精神”。组织后勤人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坚定信念。教育后勤人员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军委主席邓小平倡导的“五种革命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树立为国防事业献身的思想。引导后勤人员正确对待个人的得与失，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有的单位紧密联系实际，采取生动活泼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扎根基层、热爱后勤、献身国防”的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战略后方基地，开展“热爱山沟、热爱仓库、热爱本职”的教育，引导大家志在仓库无私奉献、建功立业，涌现出了一大批兢兢业业为后勤工作服务的“老山沟、老仓库、老基层”。嫩江基地开展“热爱边疆、热爱基地、热爱农垦事业”的教育，用敬业、创业精神凝聚军心。北京军区二六一医院，保持和发扬党和军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己动手，勤俭建院。一九五一年，该院全部设备、资产是一马车医疗器械和药品，几副担架，十几盏马灯，座落在北京郊区的3座破庙里。经过四年艰苦创业，逐步建立起一所科室齐全的综合医院。一九六四年三月，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该院“艰苦奋斗的二六一医院”的光荣称号，批准为该院记集体一等功。青藏兵站部，自一九五四年建站以来，始终坚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教育，以此作为官兵扎根高原的精神动力，培育出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三十多年中，他们在极

为艰苦的环境里，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有 586 名官兵为国防建设献出了宝贵生命。朱德、彭德怀、陈毅等先后到过该部视察，对官兵们扎根高原，献身国防的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六年，该部连续三年被总后勤部评为“完成任务出色、安全成绩显著”单位，有 3 个汽车团荣立集体三等功，39 名官兵荣获“边睡优秀儿女”奖章，27 个单位和 54 名个人被树为全国全军和总后勤部的先进典型。一九八七年，受到全军英模代表大会的表彰。长年奋战在千里川藏运输线的广大官兵，同样为国防建设作出了贡献。一九六八年，某汽车部队三营副教导员李显文等 10 名官兵，在一次执行战备运输任务中遇特大山崩，全部壮烈牺牲。一九六九年二月，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他们“川藏运输线上十英雄”的光荣称号。

其次，注意解决后勤干部战士的实际问题。后勤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经常深入到边远艰苦地区的后勤单位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的疾苦，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稳定后勤干部战士的思想，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如根据战略仓库的特点，配备领导班子时对那些政治责任心强、有干劲、有能力、身体好的年龄偏大的干部，适当放宽了年龄限制，在军衔、职务上，实行高配。对在边疆、高原、海岛服役的后勤干部，对其子女入学、就业等问题，实行倾斜政策。对三线艰苦地区军队工厂企业，遵照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指示，在解决职工夫妻两地分居、办理职工农村家属迁往城镇及离退休人员的安置等问题，都实行特殊、优惠的政策。

注重办好伙食，让干部战士吃饱吃好。一九六一年，总后勤部提出了办好伙食的 10 项要求，其中要求“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各级干部经常深入厨房了解情况，既做食堂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又做就餐人员的思想工作。各级党委（支部）指定一名委员专门负责管理伙食，发扬经济民主，实行群众管理。一九六四年，济南军区某部二连司务长孙乐义改善连队生活的先进事迹受到军区表彰。总后勤部推广了孙乐义的经验，在全军开展了创优优秀司务长的活动。一九八一年七月，全军又开展了评比先进食堂活动，其条件是：服务热情周到，积极改善伙食，实行经济民主，坚持增产节约，搞好饮食卫生。一九八三年，总后勤部在福州军区某师召开了全军先进食堂经验交流会。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发出通报，表彰了成绩显著的 40 个先进食堂。这对加强伙食管理、改善指战员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效果。针对后勤系统知识分子荟萃、学科门类多、业务性强的特点，各级后勤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人员，重视加强后勤系统政治工作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增强政治工作的针对性、群众性、及时性和指导性。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召开的全军后勤工作会议期间，经总政治部同意，召开了有各军区、军兵种、国防科工委后勤部政委、政治部主任和总后直属师以上单位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参加的全军后勤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研究了在新形势下改进和加强后勤思想政治工作的课题，对后勤保障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结合后勤业务工作一道去做，提高后勤政治干部的素质，加强后勤各级政治机关建设等问题，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批转了《全军后勤政治工作座谈会纪要》。

长期以来，后勤保障政治工作在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效果方面，重视抓好 4 个基本环节。一是坚持以后勤业务工作为中心，结合业务工作一道去做，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业务工作中去。学校、医院、科研单

位的政治工作，以提高教学、医疗、科学研究质量和水平为中心，保证教、医、研任务的完成，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仓库的政治工作，以管好物资为中心，保证在任何困难条件下都能收得进、管得好、发得出，准确无误，安全可靠；汽车部队的政治工作，以完成运输任务为中心，保证安全行驶。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所面临的严重困难，集中反映在运输问题上，而搞好运输的关键，又在于战胜敌人的封锁破坏，建设畅通的交通运输线。后勤保障政治工作以“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建设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战斗口号为内容，动员教育后勤人员同敌人的破坏作斗争，为做好运输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成为建设钢铁运输线的巨大精神力量。许多汽车部队几十年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好传统，即：车队上路前，团队领导到出发地点送行，进行简短的队前动员，干部跟车上路，做到了“政治工作跟车走，思想工作不断线”。二是提倡和发动业务行政干部做思想工作，弥补后勤政治工作干部少的不足。后勤有的单位，如医院、研究所的科室和一些勤务分队，没有专职政治工作干部，这就要依靠专家、教授等专业技术干部做思想政治工作。三是区别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单位、不同专业和不同对象，实行分类指导，树立各行各业的典型。后勤单位遍布全国各地，驻地条件差别较大。后勤战线门类多，业务各不相同，人员比较复杂，有干部、战士、学员，有一般专业技术人员和老专家、老教授，有职工、临时工。后勤保障政治工作在实施过程中，因地、因时制宜，因人施教，不搞“一刀切”、“一锅煮”。四是重视培养骨干，开展群众性的思想工作。后勤的一些小、散、远单位，远离领导机关，单独执勤，而且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除了依靠党支部以外，还充分发挥广大党团员、班长、志愿兵的作用，建立起一支政治觉悟高，模范作用好，活动能力强，会做思想工作的骨干队伍，使思想工作不断深入，情况能及时反映上来，问题能及时得到解决，使不少案件事故消灭在萌芽之中。

经常地开展安全防事故教育。后勤系统相当一部分干部战士成天同机械、车辆、油料、弹药、剧毒品打交道，危险性大。为确保部队的安全，后勤保障政治工作把安全防事故列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常抓不懈。主要有以下方法：

增强后勤人员的安全意识。各级后勤党委和政治机关，把安全防事故作为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进行安全常识、安全制度教育，增强责任心，严格照章办事，明确重点部位，加强防范措施。有的战略仓库提出了“千条万条，安全工作第一条”，“安全是仓库工作的生命线”等口号。这一些有效做法使广大后勤人员从思想上绷紧了“安全”这根“弦”，以高度的自觉性和纪律性，保证在分散执勤的情况下，人员不失控，在岗不失职，行动不越轨，有效地减少和防止案件与各种事故的发生。

抓住关键时机不放。在历次精简整编期间，后勤政治机关都提前向仓库部队发出通知，要求严格执行各项安全制度，保证仓库和物资的安全；加强仓库各项设施、设备维护，使之处于良好状态；加强对仓库的组织领导，抓好查库工作，把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进行教育。对有的单位领导和有关人员因严重失职造成重大事故的，及时通报全军；对安全工作做得好的，予以表彰。西藏军区汽车运输部队某部5连2班，自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四年，在气候恶劣、



道路艰险、人员车辆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十四年如一日，安全行车 212 万多公里，出色地完成了运输任务，被国防部命名为“青藏高原钢铁运输班”。在一九八三年十月召开的全军仓库工作会议上，三总部通令表彰了 5 个安全无事故先进仓库。

在一九八六年召开的总后直属汽车部队安全防事故工作座谈会上，交流了 10 个单位安全防事故工作的经验，分析了 4 个典型车辆事故的教训。开展安全竞赛和评比活动。在医院、仓库和汽车部队，广泛开展具有行业特点的安全竞赛活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一九七八年，三总部联合发出通知，在全军汽车分队开展“红旗驾驶员”评比活动，在爱车、守纪、安全。节约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截至一九八七年底，全军涌现出“红旗驾驶员”68 万人次。在开展这一活动十周年之际，三总部召开了全军“红旗驾驶员”代表会议，总结了十年来开展评比活动的经验，表彰了开展评比活动的先进单位和“红旗驾驶员”标兵。

## 第二节 国防工程施工中的政治工作

从中国大陆和沿海岛屿基本解放，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和各军（兵）种参加施工的部队，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祖国的安全，在沿海地区和中国领土四周的战略要地构筑起一系列战略工事；在内地为高级领导机关建起重要的指挥防护工程；在一些地区建成试验、生产、储存、发射导弹和核武器的工程；在全国各重点城镇建起初具规模的人民防空工程。三十多年来，工程施工部队为祖国筑起新的“钢铁长城”，一旦外敌入侵，它必将发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强大威力。

在完成这些宏伟工程任务的过程中，政治工作针对国防工程施工部队的特点，发挥了巨大的组织和鼓舞作用。

### 一、保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有关国防工程重大决策的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国防工程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例如，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鉴于美国陈兵台湾海峡，威胁中国安全，台湾国民党军也在美国支持庇护下经常窜犯骚扰东南沿海地区，决定在沿海的战略要地和重要作战方向，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筑永久性防御工事；一九五五年，中央军委决定建设一个供中央机关战时使用的指挥防护工程；一九六〇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决定给各地党、政、军领导机关修建指挥防护工程；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下令兴建原子弹、导弹试验基地，以后，又多次下令建设各种类型的导弹、核武器研制、试验、生产、储存、发射基地；一九六四年，鉴于苏联在中国东北、华北、西北的周边地区集结重兵，威胁中国的安全，决定在上述“三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设防御作战工程等等。

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这一系列关于国防工程建设的重大决策，人民解放军国防工程建筑部队的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激励部队坚决完成好各项重大施工任务。

认真传达贯彻每一项重要指示，正确领会中央战略决策的重大意义。工程建筑部队每次接受任务后，各级党委立即认真学习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吃透精神，召开各施工部队军政领导干部参加的工程会议和政治工作会议，具体研究落实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的措施。一九五二年当中央军委决定在东南沿海战略要地修筑永久性防御工事时，人民解放军正处于由战争环境向和平环境转变、任务由主要是打仗向建设转变的新时期。完成这样大的工程建设，对参加施工的部队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困难很多。但是人民解放军建筑部队坚决地执行了毛泽东就这一设防工程签发的命令。为完成好这一战略任务，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委托工程兵召集有沿海各大军区和海军、空军的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国防工程会议，讨论如何执行毛泽东的命令，落实中央军委的设防部署，拟订具体的设防计划，同时专门讨论了如何开展国防工程建筑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会议提出，在建筑部队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建筑部队的思想工作，保证全体将士的思想和行动顺利地由硝烟弥漫的战场转移到国防工程建设这个新战场上来。一九五四年，工程兵政治机关受总政治部的委托，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为依据，结合国防工程建筑部队的实际情况，拟订了《国防工程施工部队政

治工作条例》，作为加强建筑部队政治工作的行动准则。参加工程建筑部队的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都以这个条例为依据，进行深入的思想发动工作，讲清建设工程的重大意义，实事求是地分析施工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从而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增强了信心。施工部队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以战斗姿态投入到工程建设中去，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光荣任务。一九五八年，刚从朝鲜回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和工程兵指挥部，受命组建特种工程指挥部，立即奔赴甘肃酒泉，担负建设导弹试验发射基地的任务。这两个机关立即合并，召开临时党委会议、政治工作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建设导弹基地的指示，研究如何动员指战员“放下枪杆拿起锹，精神抖擞奔酒泉”的问题，并制定了政治工作方案。中共中央建设酒泉导弹试验发射基地的指示一传达，立即在部队中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有几支部队刚下从朝鲜开回祖国的列车，便立即登上前去西北的征程。他们一边行进，一边进行动员教育，一到达目的地，便立即开展各项施工准备工作。请假探亲的干部战士接到部队“速归”的电报，便立即告别亲人，奔赴风沙弥天的茫茫戈壁。他们都为能参加这一伟大工程建设感到无比自豪！

针对现实思想开展工作，保证中央军委战略方针的贯彻。有的干部由于囿于过去战争环境和作战经验，对国防工程建设意义认识不足，以为国防工程临战时再搞也来得及。工程兵党委和政治机关针对这一认识，大力宣传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环境条件变了，我们的任务也变了，不能用游击战、运动战的观点对待国防建设。我们的任务是保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随时准备反击外敌入侵，只有把祖国边疆建成铜墙铁壁，才能有备无患；修建以坑道工事为主体的永备性国防工程，绝不是临战施工所能解决的；早作准备，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是“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反侵略战争的主动权，夺取未来卫国战争的胜利。

经过教育，广大干部战士都把修建国防工程当作贯彻落实“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战略措施，自觉地投入国防工程建设中去。

大规模的国防工程建设展开以后，驻守各地区的部队指挥员都想在其防区内多建一些国防工程，希望岛岛有工事，处处设防线，“遍地开花”。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带领各军（兵）种司令员到各战略区视察，深入到边防海岛实地查看情况，然后召集战略区指挥员和守备部队的军政领导干部开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指出，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工事筑的越多越好，作战的目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旦战争爆发，我们不能完全御敌于国门之外，该顶的地方要顶，该放的地方要放，这样才能达到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这才是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因此，我们修工事不能满地开花，处处设防，而是要重点设防，重点守备。他的讲话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随后他又指导各战略区指挥员修订了设防计划，调整了国防工程建设的布局。总参谋长粟裕为切实解决好这一问题，也多次深入边防海岛检查工作。他每到一地，都向守备部队的指挥员宣讲国防工程建设必须贯彻“重点设防、重点守备”原则的道理，消除了一些干部“工事修得越多越好”的错误心理，增强了“重点设防”的自觉性。在千军万马踊跃参加国防工程建设以后，施工机械、工具、物资器材严重不足的问题就突出出来。原因之一是年度计划订得太大，没有分清轻重缓

急。工程兵领导机关便迅速召集有各战略区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解决这一矛盾。各战略区指挥员和工程部队指挥员按照“先重点、后次要，先急需、后一般”的原则去组织部队施工，从而既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使用在主要方向的重点工程上，又把国防工程建设建立在符合实战需要的基础上。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干部战士认清贯彻落实中央战略决策的意义。各施工部队认真组织干部战士学习中国近代史，使广大干部战士从鸦片战争以来各帝国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历史中，认清建筑坚固的国防工程，增强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的重要性，懂得建设国防与保卫祖国安宁和人民幸福生活的关系。在沿海施工的部队和海军各要塞区的施工部队，组织干部战士到当年外敌入侵中国登陆的地方，讲解帝国主义军队入侵中国的历史，宣扬卫国先驱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请当地人民群众讲述当年在外国侵略军铁蹄蹂躏下的悲惨生活，控诉侵略者的罪行！凭吊侵略军集体屠杀中国人民的万人坑。这些活动，激发了广大干部战士的爱国主义精神，激起了他们对帝国主义的强烈义愤，加深了对建筑国防工程重大意义的理解。他们说：旧中国之所以屡遭帝国主义入侵凌辱，重要原因就是国弱无防，历史的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我们这一代人不仅赶跑了帝国主义，还要用血和汗甚至生命为祖国筑起新的钢铁长城！他们喊出“建设国防，保卫祖国”的口号，并把这一口号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宣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对国防工程施工部队的关怀，激发指战员执行中央指示的自觉性和荣誉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人一直关心着国防工程建设，多次到施工部队视察，现场指导工作，解决部队存在的困难。各施工部队都把领导人的关怀作为鼓舞部队的巨大力量，及时进行宣传，使部队从中感到温暖，受到激励，增强荣誉感和责任心，促进施工任务的顺利完成。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华北某地视察时，特意到某工兵营看望干部战士。当时部队正在午睡，营的干部准备集合全营官兵聆听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立即制止说：“同志们太辛苦了，让大家好好休息一会吧！”然后进到一个刚修好的工事里仔细察看工程质量，非常满意。他对陪同的干部说：我们修的工事比国民党的好。国民党修的工事枪口对内，是镇压人民的。我们修的工事枪口对外，是对付帝国主义的。他询问了这个工程的造价以后又说：这个钱是要花的，是保卫国防的。战士们闻讯纷纷聚集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笑呵呵地同战士们握手。有的战士手上打满了老茧，沾上的灰浆尚未洗净，不好意思把手伸出来。毛泽东笑声朗朗地说，没关系，你们是建设国防的有功之臣嘛！建筑工程部队政治机关迅速将这一喜讯广为传播，提出“毛主席这样关心国防工程建设和施工部队，我们怎么办”的问题让大家讨论。大家说：“毛主席这样重视国防工程建设，这样关心我们施工部队，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他夸奖我们是有功之臣，我们没啥好说的，一定干好，不辜负党中央和人民的期望！”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在中南海亲切接见全军首届国防工程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毛泽东指示说：我们要打点洞子，帝国主义一旦向我们发动侵略战争，可能使用原子武器，我们要防它一下。在前面修了工事，在后面还要修一些。与会人员回部队传达了 this 指示，进一步推动了国防工程建设工作。三十多年中，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和其他几位元帅，都多次到施工部队视察，指导工作，关心施工部队干部战士的冷暖。

从实际出发，尽力排除干扰，保证中央决策的贯彻落实。一九六一年，林彪当国防部长以后，提出修坑道要“中、短、小”。各工程部队一开始执行就发现不少问题。一是将原有坑道改短要重复施工，造成不少浪费；二是新修工事要短、要小，势必抬高工事位置，山体防护层太薄，抗力不够，不符合毛泽东关于工事要能防原子弹的要求！三是影响整个阵地体系的合理布局，不符合实战需要。一些施工部队党委认真研究以后，认为还是应从实际情况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出发，该长就长，能短则短，不要机械地搞中、短、小。林彪提出“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其他”之后，使本来军政协调比较一致的施工部队，遇到了“突出政治”与完成繁重的施工任务的矛盾，给国防工程建设带来了许多困难。周恩来曾在一九六二年底就工程部队施工与加强政治工作的问题指出：执行工程施工任务的部队就是工程部队，不是战斗队！政治工作要保证施工任务的完成。周恩来的指示给工程施工部队指明了方向。一九六四年总参谋部下达通知，要求施工部队出勤率不得少于80%，每人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年不得少于二百四十天。各施工部队大力贯彻周恩来和总参谋部的指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林彪“突出政治”的干扰，保证了施工按计划正常进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又提出“山、散、洞”的三线工程建设方针。许多施工部队的党委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从实际出发，能不进洞的就不进洞，该集中的就尽量集中，加快了施工的进度，避免了许多浪费。“文化大革命”对全国各条战线的干扰破坏很大，国防工程战线也不例外，但相比之下影响较小。原因在于工程部队党委和广大干部战士深刻认识到许多重点工程都是毛泽东、周恩来下达的任务，必须坚决按时完成，“你乱你的，我干我的”。尽管当时“不突出政治”、“单纯军事观点”、“唯生产力论”等帽子满天飞，广大干部战士仍然是你批你的，我干我的，所以，在这一时期施工部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许多阵地工程、指挥防护工程、导弹和核武器工程，都是在这十年中建成的。

## 二、政治工作渗透到施工现场，坚持正确的施工方针

一九五二年，当工程部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在沿海地区设防的命令后，干部战士的积极性都很高，但由于没有经验，不知怎样干才能干到点子上。于是，许多干部都在思考着用什么样的口号，简明扼要地概括出施工的总要求，以作为全体干部战士施工的行动准则。工程兵领导机关组织政治工作干部到施工现场，发动群众动脑筋，献计献策，提出既简明扼要又符合施工规律的行动口号。经过群众创造，“多、快、好、省、安全”，“高速、优质、安全、低耗、保密”等口号先后出现在各个工地上。工程兵政治机关经过筛选，最后形成“好、快、省、安全、保密”的口号，作为施工部队的行动方针。报经总政治部同意后，这一方针便成为国防工程建设的准则，对部队起到了长久的指导作用。

这一方针确定后，有的单位对其具体含意理解不深，在执行中甚至发生偏差。例如，有的把“好”仅仅理解为构筑的工事没有蜂窝、麻面、鼠洞就行。有的把“安全”仅仅理解为不发生伤亡事故。工程兵领导机关发现问题后，便对这一施工方针的每一项内容作了具体的界定。指出“好”的具体含意，一是阵地设置要符合“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原则；二是阵地编成、工事布局要符合“积极防御”的方针；三是工程质量要符合战术技术要

求，技术必须服从战术；四是重要阵地、重点工事要经得住原子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的袭击。并规定，为保证“好”，从工程勘察、设计、材料采购到施工的全过程都必须严格按照这些要求办事。“快”和“省”都必须建立在“好”的基础上。“安全”的要求是：不仅不发生伤亡事故，还要保证干部战士不得矽肺病、关节炎、腰肌劳损等职业病，对战士的健康负责。对“保密”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要求，建立了相应的制度，采取了预防的措施。这样，施工部队就有了具体的工作准绳。工程兵领导人亲自对工程兵机关的全体干部宣讲了这一方针的各项具体内容，要求大家结合各自的业务工作加以贯彻，到施工部队调查研究检查工作时，广为宣传，并以它为标准去检查工作。

教育部队辩证地理解施工方针，全面地贯彻执行。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反复宣传施工方针中各项内容的辩证关系，强调“好”

是第一位的、是基础；“安全”是前提；“快”是坚持好、省、安全、保密的综合效果，在好、省、安全、保密的前提下去求快，才是真正的快，真正的对战备施工负责，快而不好、不安全，经不起战争的考验，是最大的浪费，是犯罪。宣传中反复说明，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重点是确保工程质量，也就是“好”；难点是保证施工安全。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开的全军第一次国防工程政治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讲话时，专就如何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问题作了强调。他要求修建每一个国防工事都必须确保工程质量，保证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能打胜仗；在和平环境里施工，一定要创造条件，争取不死人、不伤人、不得职业病。他还要求施工部队的各级军政领导干部都必须以对祖国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战士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切实抓好这两个问题。在以后召开的历次全军国防工程政治工作会议和各施工部队召开的各类会议上，都把这两个问题列为会议的内容加以讨论，提出要求。工程兵政治部还与《解放军报》社、《人民工兵》杂志社密切配合，每年都就这两个问题及时撰写评论文章，介绍先进经验，指导部队工作。

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针对不同任务、不同对象、不同环节，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勘察、设计是全面贯彻施工方针确保工程质量的首要环节。各高级领导机关都认真组织勘察测绘人员学习领会方针的精神实质，鼓励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去工作，切实查清设防地域的地形、地貌和水文地质状况，写好设防文书，向各级指挥员提出各类工程选点定位和阵地编成的建议，把每个工事都修在正确的位置上，把每个阵地都设在重要部位处。对工程设计人员，要求他们树立高度的质量观念、节约观念，精心设计出高质量、低消耗的最佳施工方案。在施工过程中，政治干部积极参与现场管理，要求部队按照方针精神，严格依照图纸施工，按《施工操作规程》办事，并建立严格的质量监督检查制度，使工程达到精心勘察、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的要求。由于狠抓质量宣传，并把这一宣传深入到施工现场，因此，勘察测绘人员不避艰险，跋山涉水，认真勘察；设计人员尽心尽职，到现场设计，力求图纸符合实际；工程技术人员深入现场指导施工，就地解决问题；施工人员严格按图纸和规程施工，不马虎，不盲目，从而保证了工程的质量。

国防工程大多建在地势险峻的崇山峻岭和水文地质状况复杂的地下深处。常常遇到各种构造不同、坚硬程度不同的岩石，还有流沙、冻土、断层、

裂缝、溶洞、深渊、地下河等变化莫测的复杂情况。每开掘一条坑道，都是一场硬仗，有的还是险仗、恶仗。经常遇到的问题是频繁塌方或严重塌方，不但影响施工进度，还易造成伤亡。干部战士长时间地经受了苦与乐、生与死的考验。施工部队的干部常常为此提心吊胆，寝食不安，连一些战功卓著的指挥员也感叹“老战士遇到了新麻烦”。因此，保证施工安全，是各级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战士最关心的问题。各级干部都把安全施工列为重要任务，格外尽力去做，他们深入施工现场，与战士并肩劳作，共历艰险，随时摸清每个地下工程不同地段的特点和干部战士的思想活动规律，及时针对畏难情绪、恐惧心理、急躁情绪、麻痹思想提前做好思想工作。为预防塌方、地陷等不测事件的发生，干部们深入坑道，仔细观察地质结构变化情况和地下水渗透的情况，及时分析可能发生的险情，随时提醒作业人员及早预防。一旦出现塌方征兆，立即果断地命令作业人员迅速撤离，视情况采取排险的措施。遇到严重塌方，尽快稳定部队情绪，抓紧做好基层干部和骨干队伍的思想工作，防止产生畏难情绪和急躁蛮干情绪；做好少数有恐惧心理的人的工作；挑选有经验的党团员和技术骨干，组成排险突击队去排险。一旦发生伤亡，迅速组织抢救，做好负伤战士和亡敌人员亲属的思想和安置抚恤工作。对因舍己救人伤亡的干部战士，及时记功授奖，广为宣传，鼓舞士气。

总结各施工部队安全施工的做法，主要有：一是探索发生事故的规律，增强预见性。凡是突击赶任务、坑道塌方、高空作业、山体滑坡、飓风突袭、现场管理混乱、违犯操作规程和思想麻痹时，容易发生工伤事故。政治工作就针对这些情况尽量提前做好思想工作，采取预防措施。对每条坑道和附近山体的水文地质状况，近期天气变化情况，海潮、洪水涨落的规律，都事先了解清楚，及时提醒部队预防。工地的各种机械、工具、器材，都要求按指定地点存放，对刀凿斧锯钉等易伤人的小件工具器材，责成专人收集保管，使现场井然有序，消除发生事故的隐患。二是要求干部以高度的爱兵观念，确立“安全第一”的思想，精心组织好每一道工序的操作，严格现场管理。对保障安全施工的工具器材、防护设备，千方百计予以保证，提供安全作业的条件，不让战士冒险作业。三是建立各种安全制度。定期动员组织干部战士对照《安全施工守则》找差距，提措施；学习《施工操作规程》，拟定防险保安措施，并落实到每一个人；各作业班组设安全监督员，选择责任心强有经验的干部战士担任，定人定位定点，专司险情预报和安全检查工作；每日三讲：工前动员讲，工后讲评讲，每天交接班讲，互通情况，形成天天讲安全、人人抓安全的浓烈气氛；实行安全否决权，凡是思想认识不端正，物资保障不落实，安全措施未跟上的，不准开工、上岗；每半年或一年给干部战士普查一次身体，发现有职业病就及时治疗。绝大多数施工部队由于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做得比较细，在自然险情频繁发生的情况下，仍能确保施工安全。武汉军区直属工兵营由于安全教育经常，要求明确具体，现场管理严格，物资保障及时，先后战胜70多次塌方，全营无一伤亡。建筑第116团第5连在一次施工中，当全连正在坑道作业面上钻孔打眼时，后面百米处岩石层的地段突然大塌方，上千立方岩石堵死了外出的唯一通道，40多名作业人员被困在里面，生命危险。连里干部临危不乱，指挥党团员和战士抢险排石，分班轮流突击。营、团、工区的各级军政主管干部火速赶到现场指挥抢险。经过一昼夜连续苦战，救出了遇险的战友，没有一人伤亡。这个连队先

后战胜 100 立方以上的大塌方百余次，持续奋战五年，建成了一座通道纵横交错，房间宽敞舒适，生活和工作设施现代化，能够长期在地下生活的地下城，受到国防部通令嘉奖，被工程兵党委授予“英勇顽强善于攻坚的硬作风五连”的荣誉称号。全军还出现了许多全年无伤亡、多年无伤亡、优质高速完成施工任务的团、师级单位。

勤俭施工是“省”的重要内容，也是经常性的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施工部队在赶任务时，容易忽视“省”；有的把保证工程质量与“省”对立起来，认为保证工程质量就不能“省”，“省”就不能保证质量，施工中过量消耗建筑材料，现场管理不严，浪费很大。根据中央军委和总部的指示精神，工程施工部队的政治机关提出“惜材如金，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国防工程建设事业”，“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坚持勤俭施工”等口号，并反复讲解好与省、快与省的辩证关系，教育部队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珍惜每一件机械工具器材。开展节约一寸木、一颗钉、一度电、一滴水、一粒粮的活动。这样，施工部队节约蔚然成风。各个连队都涌现出勤俭节约的标兵和先进班组。

南京军区舟嵎要塞区直属工兵营修理连勤俭创业，建起 8 个设备比较齐全的车间，既能修理各种施工机械，又能加工制造一般配件和机具，保证了部队施工的需要。他们还组织巡回修理组深入各工地，保证全区施工机械“大修不出岛，中修不下山”。一九六六年三月，被国防部命名为“勤俭创业修理连”。该军区施工部队在五十年代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先后创办 1 个炸药厂，5 个水泥厂，1 个机械修理厂和木材加工、石料加工等厂，生产的材料不仅保证了本区施工部队的急需，还把剩余物资支援国家建设。

“好、快、省、安全、保密”方针的贯彻，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沈阳军区施工部队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在坑道掘进中改进了钻孔的方向、角度，精确地计算钻孔的深度和爆破装药量，使坑道幅员一次爆破成型，既不多爆，也不少爆，大大减少了每次爆破后的出碴量和被复坑道时的回填量，节省了炸药和修整坑道幅员的时间，增强了坑道的抗力，加快了施工的进度。北京军区许多作业队从改进作业编组入手，实行一个作业班打一排炮、一次爆成幅员的“双一作业制”，在确保好、省、安全的前提下，普遍提高工效 12.3% 以上。建筑第 223 团 7 连自一九六一年担负国防工程施工任务以来，反复不断地进行“质量第一”、“安全第一”、“勤俭施工”的教育，年年超额完成任务，一九七七年，通过革新技术，完成坑道掘进任务两倍半，被工程兵领导机关命名为“国防筑城先进单位”。

### 三、开展技术革新活动，发扬技术民主，群策群力攻难关

国防工程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工种工序繁多，技术复杂，施工要求高，既有一般的作战掩蔽工程，又有运用高、精、尖的科研成果建设的现代化指挥防护工程。动员组织施工部队广大干部战士不懈地刻苦钻研工程业务技术，是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奋战在第一线的广大干部战士，为了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解决施工工具器材的不足问题，迫切需要技术革新。他们动脑筋、想办法、找窍门，因地制宜地解决了一些施工中遇到的小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如坑道施工没有通风照明设备，他们就将大斑竹打通，连接起来作通风管，在坑道口用木制风



箱向竹管里鼓风；用几面大镜子按一定的角度竖立在坑道口，向坑道作业面上折射光线，解决坑道照明的问题；在钢钎顶端套一顶藤编草帽作防护罩，以减轻滑锤的重力，避免抡锤打钎伤人的问题等等。……这些办法虽然简陋笨拙，效果也很有限，但反映了指战员迫切要求开展技术革新的强烈愿望。各政治机关发出号召，动员群众，发扬创造精神，结合施工的实际需要，群策群力开展技术革新活动。为把技术革新活动开展得踏实科学，许多施工部队提出用什么就学什么，边学边干，边干边学的口号，并采用群众路线的教学方法，能者为师，以老带新，包教保学，一人教一批，一批带全连。一些有技术基础知识又勤于动脑的干部战士，由利用代用品制作简易工具器材发展到革新和研制新的工具器材上来。建筑第 113 团 5 连测绘员季和生，改进弯弧形钢筋的作业台，减少了工序，提高工效 6 倍半。南京军区步兵第 81 师卢广华通过精心钻研，制作成功弹簧滑锤，解决了抡锤打钎既不安全又很劳累的问题，深受干部战士欢迎。济南军区有些连队用木料制作游锤支架，像撞钟那样撞钎钻孔，效果更好。在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开展起来之后，工程兵政治机关为激励干部战士搞技术革新和刻苦钻研工程技术，拟订了“技术能手”的评奖条件，在各施工部队普遍开展创造“技术能手”的活动。有些施工部队还开展了“技术比武”、技术表演等活动，推动了创造“技术能手”活动的深入开展。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工程兵党委向全军工程兵和施工部队发出了开展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号召。指出，技术革新活动对振奋施工部队干部战士的革命精神，改善施工条件，促进国防工程建设，是巨大的推动力，强调既要教育干部战士消除自卑胆怯和不思进取的思想障碍，又要防止图形式、走过场、华而不实的倾向发生，要求各级党委立即上马挥鞭，因势利导，扭转领导落后于群众的状态，把组织领导好这一群众运动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切实抓好。同时，也要求各级军事、政治、工程、后勤机关各尽其职，同心协力，帮助基层干部发动群众，及时解决他们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这个号召还对群众性技术革新的方向、内容、重点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一号召表达了群众的心愿，各施工部队上上下下一股劲，论革新，搞革新，很快形成了热潮。为指导好技术革新活动，落实工程兵党委的号召，工程兵党委责成负责国防工程工作的副司令员抽调兵种机关宣传、工程、器材部门的干部，组成一个精悍的技术革新办公室，具体指导各施工部队的技术革新活动。为取得对技术革新活动的指导权和发言权，政治工作干部也努力钻研工程技术，变外行为内行，增强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说服力。他们虚心向技术干部和革新能手学习，参加他们的革新活动，同他们一起研究解决难题的办法，有了成果及时宣传推广，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

帮助干部战士克服自卑情绪和因循守旧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反复宣传实践出真知的道理，介绍历史上某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中外名人发明创造的事迹，请勇于革新的工人、战士介绍经验，现身说法，宣传鼓励本单位勇于革新的设想和行动，积极扶助他们力争成功，搞出成果给予立功奖励，组织现场表演。这样在战士中树立起“我们也能搞革新”的信心。在尊重科学，敢于巧干的基础上，一些操作手变成了革新能手，“土工兵”变成了“小专家”。只学过三年文化的沈阳军区工程兵修理所电焊工韩玉昌，结合本职业务，创造了当时在国内还少有的能切割合金钢板的无齿电锯，引起了施工部队和附近工厂的重视，纷纷前来索取他的革新成果。某部队炮连五班班长徐富铎只

有初小文化程度，经过反复钻研，创造了风力排风机、脚踏打锤机和掏灰抽水两用的掏灰棒，解决了坑道掘进中钻孔、掏灰、吸水、排烟几个难题，既保证了安全施工，又大大地提高了施工效率，被战友们称为“土专家”。

在开展技术革新活动中，各级党委还针对一些干部强调工作忙，无时间搞革新，文化水平低，搞不了革新，搞不出成绩丢人现眼等思想障碍，进行思想发动工作。要求干部参加革新、带头革新，并把干部是否带头参加技术革新作为检查各单位技术革新活动开展得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指出干部搞革新不仅要在改革施工工具器材上下功夫，更应在改进组织指挥、现场管理、施工方法、操作技艺等方面想办法。《解放军报》报道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在施工部队视察时，深入坑道与战士们一起打游锤，一同研究进一步改进施工工具的消息和照片后，对各级干部起到了很大的激励和鞭策作用。海南军区工程指挥部主任李魁三以身作则，带头钻研技术，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革新施工机械工具 17 件。他的事迹带动了全军区施工部队的技术革新活动。南京军区工程兵器材部长黄振东研制的直筋机和弯筋机，解决了在钢筋混凝土作业中，钢筋的拉直和弯头工序复杂、工效低的问题，在全军区施工部队中推广运用，提高了工效。某部干部吴保贞在一个破旧的车库内，利用简易设备研制生产炸药，解决了坑道施工炸药消耗量大，国家一时供应不及时的问题。他创办的这个小炸药厂，后来发展成为全军大型炸药工厂之一，不仅满足了军队的需要，还支援了地方的建设。

实行领导干部、技术干部和群众三结合，发扬技术民主。技术革新活动是一场严格的学科学、用科学的活动，来不得虚假，搞不得武断。在技术革新活动中，各施工部队普遍建立了领导干部、技术干部和群众三结合的攻关小组。在攻关小组内充分发扬民主，不搞领导说了算，谁的意见对，符合科学道理，就按谁的意见办。如果意见暂时不能统一，就反复试验，用实践的结果来统一大家的认识。在攻关小组内特别注意尊重专业技术人员的意见，领导干部不居高临下，不以行政手段压制不同意见，出了问题，领导干部主动承担责任，不泼冷水，找出原因，商量改进办法，鼓励大家再接再厉，继续攻关。这样，多个方面的积极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保证了技术革新活动的健康发展。

工程建筑部队的技术革新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全军工程兵和施工部队就提出合理化建议和发明创造 10 多万件，有 2 万多件被推广采用。许多干部战士成了“革新家”、“发明家”。为总结推广技术革新经验，推动群众性技术革新活动继续深入健康地发展，工程兵于一九五八年九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军工程兵和施工部队技术革新经验交流会，展出群众创造革新的机械工具、器材、武器 1153 件，有 518 人获奖。各军区都展出了有代表性的革新成果。其中，大多数成果已在施工中应用，发挥了较好的作用。有些机械器材在国内尚属首创，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引起外国专家的关注。福州军区工程兵研制的远距离火箭爆破器，一些设计单位研制的防原子、化学武器装备，海岛施工部队研制的海水淡化装置，一些施工部队研制的一机多用施工机具等，都受到军队高层领导人和军内外专家的赞誉。罗荣桓看了展览兴彦地说：这次技术革新展览，是我军历史上头一次，对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国防工程建设都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施工部队在这方面为全军带了个好头。他还题词勉励大家“为技术革命而奋斗！”

这些丰硕的革新成果，为尔后工程兵和施工部队的装备机械化、现代化提供了广阔的思路和研究的基础。各单位纷纷组成技术革新研究推广小组，把群众轰轰烈烈的革新热情和扎扎实实的工作态度结合起来，进一步巩固、提高、推广已取得的革新成果。工程兵领导机关也专门责成科研装备部门分类指导，凡是比较完善在实践中又行之有效的，就组织批量制造，发给部队使用；凡不够完善，但又是施工急需的，便一边改进一边推广；凡是暂时不能使用，但思路正确，对改善部队装备有良好前景的，就请军内外专家协助研究提高完善，直至定型生产；凡是同一类型而大同小异的，就各取所长，集中研究出一种最先进的成品，生产装备部队。一九五九年一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充分肯定了国防工程建筑部队开展的技术革新活动，介绍了这一活动的经验。同月十八日，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开展一专多能和技术革新运动的指示》，这一指示进一步提高了施工部队的认识，坚定了信念，技术革新活动的第二个高潮很快在施工部队掀起了起来，涌现出一批一专多能的施工能手和技术革新活动的积极分子。这一年，全军各施工部队推广使用的革新成果即达 34000 多件。一九六一年三月召开的工程兵第二届积极分子会议又进一步要求各施工部队努力实现工程作业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和工程技术装备现代化。到一九六一年底，大多数施工部队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施工，部分作业实现了电气化、自动化，基本上摆脱了过去那种抡锤打钉、人挑肩扛的状况，把施工的装备和操作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在广州军区建筑第 114 团的工地上，掘进坑道有空气压缩机和风钻支架，土工作业有脚踏打夯机，坑道出碴有锄碴机和轨道运输车，运送建筑材料有吊车、索道运输架、自动装卸车、高山跑坡车、弓型运输车等机械工具，工效提高了 10 多倍。整个工地，空中跑的，地面动的，地下用的，基本上都是施工部队自己创造的机械器材，施工环环衔接，紧张而又有序，一年完成的施工任务，竟超过往年一倍多。

在群众性技术革新的基础上研究完善的施工机械、工具和各种器材，到六十年代中期，已成批地装备部队。到七十年代初期，所有重点工程全部用现代化的机械施工。在崇山峻岭间，铁流滚滚，机器轰鸣，呈现出一派用现代化装备建设现代化工程的崭新景象。但大家并未就此满足，群众的革新创造精神，仍如地下喷泉畅流不息。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更高层次的发明创造也都相继出现。大功率、多用途（既能钻孔，又能锯木、除锈、鼓风、震荡混凝土、发电照明）的凿岩机、混凝土自动计量搅拌机、工程机械快速保养机、两用混凝土湿法喷射机、低砂率高标号混凝土等，荣获国家、军队科技进步奖的成果，已陆续在施工部队中应用。

#### 四、激励部队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战胜艰难险阻

国防工程施工部队长年在山区、海岛进行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经受着艰苦生活的磨练。一些长期担负工程任务的专业建筑部队，四海为家，艰苦转战，住工棚，睡地铺，冒酷暑，耐严寒，踏冰雪，顶风沙。有些施工部队战斗在几十里、几百里荒无人烟的地区，饮用水也要到上百里以外的地方去取，用水不得限量，一盆水先洗脸擦身再洗脚，然后还要用去浇菜地。香喷喷的白米饭、面条汤，端在手里还未下筷，狂风就给洒上了一层黄沙；刚拿起的馒头，没咬几口就冻得又硬又凉。中午，要耐摄氏四、五十度的高温，晚

上在零下三、四十度下裹衣而睡。如遇飓风骤起，飞沙走石，不是将帐篷刮倒埋入沙里，就是刮上天空乱飞。有些地区，山上冰雪覆盖，山下杂草泥潭，野兽出没无常，难有安身之地，只得掘穴而居。工区里最受战士们欢迎的地方是收发室、小卖部，每到休息日就三五成群去逛一逛，戏称为逛“王府井”、“南京路”。许多来自城镇和鱼米之乡的干部战士，长期在这样的地区从事艰苦繁重的劳动，思想负重可想而知。

环境越是艰苦，条件越是困难，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是施工部队各级党委和干部的共同认识。每到一个新的工区，干部总是一边指挥部队抢修道路，安营扎寨，一边结合新到地区的特点进行思想教育，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新建工程的指示、要求和期望，阐明新的任务的重大意义，增强部队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讲明新中国的建立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继续艰苦奋斗，只有艰苦奋斗，才能使国家繁荣富强，军力更加强大，强调“以工地为家，以艰苦为荣”是人民战士的革命本色，是人生价值的光辉体现；介绍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革命前辈艰苦创业的事迹以及本单位艰苦奋斗的历史，宣传为革命吃苦的价值，说明经得起艰险考验才是最优秀的战士。许多单位还开展“三比三学”活动：与红军万里长征比艰苦，学习老红军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革命精神；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比牺牲和贡献，学习志愿军浴血战斗英勇献身的精神；与附近地区的人民群众比生活，学习他们不畏艰苦、建设家园的精神。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施工部队战胜困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万能的，它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作保证。因此，各施工部队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十分注意解决物资保障方面的困难，尽量保证施工部队基本的物资需要。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十分注意做好后勤保障部门的政治思想工作，激励他们发扬坚韧不拔的精神，不怕困难，不怕麻烦，战胜险山恶水、严寒酷暑，不顾长途跋涉，及时把主副食品和各类物资器材运到部队，保证施工部队的干部战士吃好、喝好、住好、休息好，有充沛的体力参加长年累月的艰苦劳动，有足够的工具器材可供使用，有必需的劳动保护用品可供需要，有一定的医疗卫生防疫条件保证干部战士身体健康。工程兵政治机关还派人到地处亚热带、温带、亚寒带和海拔3000米以上地区的施工部队进行调查，查清在各地施工的干部战士每日身体热量消耗的情况，对主副食品、被服、劳保用品、医药卫生用品等方面的特殊需要；并派人走访中华全国总工会、煤炭工业部，了解全国各类工种的职工劳动保护方面的措施，结合施工部队的实际情况，分别拟定地面、地下、高空作业人员的劳动保护条例，下发各施工部队执行。对不切合施工部队需要的主副食品、劳保用品供应标准和医疗卫生制度，工程兵政治机关主动与总后勤部有关部门协商，修订新的供应制度，督促各地区后勤系统按时按量供应。

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了干部战士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乐此不疲的精神。基本的后勤物资保障为他们战胜困难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精神的力量加上物质力量，使这些部队成为铁军，无坚不摧，无险不克。工程兵建筑第103团，从一九五一年修建川（康）藏公路起，连续三十余年转战在西北、西南的风雪高原、戈壁沙漠、丛林草地、深山峡谷，住的是帐篷、地窖和简陋的工棚。干部战士十多年没有睡过铺板，束荆为床，席地而卧；有时蔬菜、油盐、粮食供应不济，大家忍饥耐寒不误工。在修建川藏公路中，他们自豪地说：“我们走的是崎岖小道，住的是帐篷地窖，以一双长满老茧的手，建成了通向世

界屋脊的大道”。这个团的十连，由于思想工作深入细致，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断发扬光大，先后战胜了怒江天险、雪山绝壁、戈壁荒漠、草地泥沼、地下暗河、塌方等十分恶劣的自然环境，完成施工任务的事迹十分突出，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中央军委特授予“风雪高原好十连”的荣誉称号。

干部的模范作用，是无言的政治工作。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在对部队进行艰苦奋斗教育中，特别强调各级干部在艰苦环境中的模范带头作用。指出，部队能不能经受住长期艰难困苦环境的考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干部的模范作用。施工部队的干部都明白，坚持与战士同甘共苦，同历艰险，战士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再苦再累也无怨言。基层干部始终坚持与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娱乐。许多团营干部深入工地吃住和战士一样，同样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团以上机关于部下连帮助工作，和战士同吃一锅饭，同睡一个铺。许多干部不光组织指挥，还同战士并肩劳动，替战士开机作业，让战士休息。有些团营职干部在边远地区工作四五年，未休过一次假，未探过一次家。有的孩子已四五岁了，自己还未见过。在物资供应方面，许多部队党委明确规定：干部不搞特殊，一切供应先战士后干部，先连队后机关，好的主副食品，优先保证连队的需要，并规定各级干部都要经常下连队为战士服务，就地解决问题。

及时宣扬艰苦奋斗的典型，激励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各施工部队都有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它记载着一批又一批乐于吃苦、勇于献身、善于打硬仗、恶仗的先进单位、先进人物的事迹。“风雪高原好十连”、“劈山开路先锋连”、“勤俭创业修理连”

和雷锋、王杰、第二炮兵工程兵的英雄战士姚虎臣等，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各部队都广为宣传这些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以及本单位先进典型的事迹，使部队学有榜样，赶有目标，经常沐浴在“学英模，看行动”的气氛之中。干部战士都自觉地与“风雪高原好十连”比艰苦奋斗，与“劈山开路先锋连”比突击精神，与“勤俭创业修理连”比勤俭施工。越学越比越知不足。在学习雷锋活动中，战士们说，雷锋为建设国防工程开车运料，走一路做一路好事，我们为建设国防出力，也要走一路留下一串业绩。大家都以王杰“座座高山耸入云，我们施工为人民，工作不怕累和苦，愿把青春献人民”的诗句激励自己。许多新战士学习了国防工程战线的英模事迹，参观了本单位艰苦奋斗屡建功勋的荣誉室，了解到革命前辈吃尽千般苦、穿过万重山的光辉业绩之后，发出“愿为祖国献青春，建设国防立功勋”的豪言壮语，并在长期艰苦的施工中实践着自己的诺言。

千方百计改善部队的物质文化生活。环境越是艰苦，任务越是繁重，越要尽力改善部队的物质文化生活。施工部队经常处于艰苦的自然环境中是客观事实，这是难以避开的，但尽力创造条件改善部队物质文化生活则是可以做到的。总政治部分工负责全军国防工程政治工作的副主任甘泗琪在首届全军国防工程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了政治工作要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大大改善部队的物质文化生活。施工部队各级党委都把不断改善部队的物质文化生活，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分工专人负责，定期督促检查，各级政治机关也都把它看作是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主动协同后勤部门发动群众想办法，千方百计地采购主副食品，动员部队开荒种菜，养猪养鸡，生豆芽，做豆腐，腌咸菜，捕鱼捞虾，改善生活。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许多施工部队都能做到蔬菜、禽蛋自给或半自给，有的还能吃上自己产的新

鲜水果。各伙食单位实行经济民主，每周拟订食谱，每月公布伙食帐目，不得亏空，也不过多节余，保证每个干部战士都能按施工部队的供应标准吃到必需的主副食品。发动炊事员钻研烹调技术，做到粗粮细做，每日菜饭不重样，可口卫生。保证干部战士在工地上能喝上开水、吃上热饭热菜，收工后能洗上热水澡。医务人员到工地跟班监护，对有伤病的人员及时予以治疗，不让战士带伤带病施工。为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各师、团都组建了战士业余演出队，连队也有业余演唱组或文艺班，专门负责工地宣传鼓动工作和部队的文化娱乐活动。中央军委特地批准工程兵建立文工团，专门为活跃施工部队的文化生活服务。总政治部优先保证施工部队的文化活动经费、文娱器材，先后给部队供应了收音机、电影放映机、电视机和乐器球类等器材。八十年代还建了不少差转台，保证在高山深处、林海雪原、边疆海岛和一些荒无人烟地区的施工部队，也能天天听到广播、看上电视。在有了这些物质保证之后，偏僻沉寂的工区也显得生气勃勃。

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教育和艰苦生活的磨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遍及各个部队。广大干部战士身在苦中不觉苦，常从苦中寻乐。有些战士用长短不齐的钢钎吊在木架上，敲打出各种不同的音符，演奏大家喜闻的歌曲。有的用锯条、树叶奏出简单小曲。还有的把从海滩拾来的五颜六色的贝壳粘结成工艺品，把从戈壁滩拣来的各种形状的鹅卵石，打坑道打出的各种结构的石块陈列起来，供大家观赏。战士们常常吟诗明志。在行军路上，有的哼着：“别人的家在城镇里，在村庄里；我们的家在肩膀上，在荒野里。我们走到哪里，它（帐篷）就跟到哪里。”在风餐露宿时，则作诗：“冻上为床天作被，雪山作帐梦也香。莫道大兵无雅量，人间苦涩我甘尝。”在文娱演唱会上，战士们抒发豪情壮志的诗歌，更是朗朗不绝。改造环境，美化环境，也是战士们工余的一大乐事。在酒泉导弹发射试验基地的工地上，战士们在帐篷城的四周用砂石砌成“万里长城”，在“城”中央，用各种色彩的鹅卵石砌成天安门图案，两边用细的石子镶嵌成醒目的大标语：“建设基地不怕苦，火龙腾空我自豪！”在黄海的一个孤岛上，战士们利用工余时间种花种树，在棚区两侧用贝壳嵌成一副醒目的对联：“国门卫士，砥柱中流。”每当坑道修建完工之后，战士们总要怀着无比喜悦和自豪的心情，在坑道口刻上“英雄洞”、“钢铁阵地”、“地下长城”等匾额，“我们今天流汗，敌人将来还血”、“铜墙铁壁，严阵以待：金甲钢炮，来敌必歼”、“辛勤修工事，厉兵秣马，英勇杀敌人，保家卫国”等对联，铭志他们对祖国的满腹衷情。

### 第三节 生产经营中的政治工作

开展生产经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从建军开始，就把生产筹款作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以改善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开展的大生产运动，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保证了部队的供给，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毛泽东指出：“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故于天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在完成作战、训练等项任务的前提下，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弥补军费不足，保障部队供应，改善官兵生活，根据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积极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生产，认真办好军需生产、装备修理、军用器材制造等各类工厂，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兴办军办厂矿和第三产业。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军队的生产经营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在国家还不富裕、经济还有困难，“皇粮”不够的特定条件下，补充军费不足的一种特殊的有效措施。

人民解放军的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对部队的生产经营工作十分重视。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全体参加生产经营的干部、战士和职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生产经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保证部队生产经营活动沿着正确的方向稳步、健康地发展。

#### 一、不断提高部队对从事生产经营重要意义的认识

新中国建立初期，部队大批随军的军需生产、军械修理、印刷等工厂，要从农村进入城市，又要接收原国民党联勤总部的一批工厂，又要满足部队作战需要，特别是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的供应，部队生产面临十分繁重的任务。针对这种情况，各级政治机关积极配合生产部门，组织干部职工学习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开展民主改革与生产改革，组织劳动竞赛，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有力地保证了工厂调整改革的顺利进行，保证了各项战备生产任务的完成。随着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人民解放军除担负作战、执勤任务的部队以外，都投入了生产建设工作，并抽调了相当数量的建制部队专门从事生产活动。先后共抽出31个师零8个团，开赴天山南北的荒滩、东北的三江平原以及一些沿海和边远地区开荒屯垦。以后又组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铁道兵密山农垦局。参加生产劳动，给部队带来了新的思想问题，不少战士特别是新战士认为自己当的是“泥巴兵”，不光荣。一些干部也担心参加生产会影响部队战备训练和战斗力提高。担负生产经营任务的部队的党委、政治机关，针对这些问题，组织干部战士学习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有关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的指示，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决定，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召开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大会，人民解放军中的劳动模范主要在军工生产、公共工程、农业、手工业与医务工作中选拔，对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进行了

---

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929页。

广泛的宣传。这些做法，提高了全军干部战士对部队从事生产经营重大意义的理解。大家认识到，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举，国家经济还十分困难，服从大局，参加生产建设，是人民军队的一项光荣任务。部队在保证完成战备训练任务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参加生产劳动，对加强部队建设、保卫和建设祖国具有积极的作用。为了加强对生产工作的领导，做到统筹安排，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师以上单位都成立了由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共同组成的生产委员会，制定计划，掌握方针政策，加强思想领导。

经过反复动员教育，极大地调动了部队参加生产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许多驻在艰苦边远地区的部队，通过积极生产改善了生活条件。入藏部队战胜了高原缺水、土层薄、无霜期短等困难，种植了各种蔬菜，有的实现了自给有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辛勤的劳动，把不毛的荒漠变成富饶的绿洲，并开展多种经营，为新疆的经济建设和边防的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朝鲜战场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也利用战局相对稳定的间隙开荒种菜，仅一九五二年就种菜 27.6 万亩，产菜 2289 万斤，不少部队每人每天可吃到青菜 0.5 公斤以上。常年战斗在西北边陲的国防科工委某试验基地，地处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风沙多、温差大，少雨干旱，气候恶劣。基地建设初期，主副食品都靠内地长途转运。全体干部战士发扬了南泥湾垦荒精神，自己动手，开荒造田 3 万多亩，打井 300 多眼，修中型水库 2 座，筑防风墙约 400 公里，修温室 100 多个，把基地建成树木成行、百业兴旺、瓜菜满园的新型城镇。一九七七年以后达到了蔬菜半自给或自给，肉食也能部分自给，有力地保证了科研试验任务的完成。

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发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一九六一年五月，周恩来在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上提出，军队要实行“兵农结合”，“亦兵亦农”。中央军委决定把农副业生产作为全军中心任务之一，抽出一部分部队专门搞生产，建立生产基地。并根据不同部队的情况，规定了具体的生产指标和要求。为了解决训练和生产的关系到问题，军委强调要坚持“党委领导，统一安排”，训练和生产必须兼顾，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各级政治机关深入宣传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统一全体官兵的思想和行动，大大推动了部队农副业生产的发展。一九六一年，全军综合性农场发展到 700 多个。广州和武汉军区基本上做到团有农场。没有建立农场的团以上单位多数也都建有专业生产队，主要从事养猪、种饲料、油料作物，并因地制宜地进行多种经营。至一九六一年九月，全军共养猪 111.9 万头，牛羊 20 万头，种植油料作物 22 万亩，收菜 2.5 亿多斤。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全军每年参加生产的部队达到 50 多万人。到一九六五年，办起各种类型的农牧场（生产点）1220 个，多数部队有了自己的生产基地，使军队的生产经营上了一个新台阶。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占的比例逐年下降，军队经费的供需矛盾突出。中央军委要求全军自觉服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大局，积极从事生产经营。国务院、中央军委[1981]9 号文件明确指出：“多年来，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是有成绩的，对解决军队实际困难，减轻国家负担，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开发建设保卫边疆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这对保持和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也有重要意义。”一九八五年五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部队从事生产经营的规定



中指出：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新形势下，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对加强军队建设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一是保证了军需装备的生产供应和维修，使部队的战斗力具有必要的物质基础。二是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创造了物质财富。三是部分地补充了国防经费的不足，改善了官兵的物质文化生活。四是锻炼了部队的素质，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五是安排了数量可观的随军家属和子女就业，使部队干部减少后顾之忧，更加安心国防事业，为保卫祖国作贡献。强调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经常督促检查，不断总结经验，研究解决生产经营中出现的新问题。各部队认真贯彻了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指示，提高了对开展生产经营的认识，使之健康地向前发展。除全军基层单位普遍开展的农副业生产以外，到一九八七年，拥有军需生产、装备修理、军用器材制造等大中型企业化工厂 242 个、列编农场 575 个、军马场 16 个，还有一大批中小型军办厂矿企业、服务业和农工产品经贸单位等生产经营实体。

## 二、遵守国家的有关政策，坚持部队生产经营的正确方向

军队开展生产经营不仅关系自身的建设，也关系社会的经济生活，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因此在生产的内容、规模、土地使用、兵力安排以及收益使用等方面都必须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法令政策，保证战备训练任务的完成和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坚持为部队建设服务的方向。这也是搞好生产经营中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为了端正和保持生产经营的正确方向，全军各部队普遍重视抓好两个基本环节。一是及时传达学习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总部有关的政策指示，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认真贯彻执行，克服有些单位只顾埋头生产、不问政策方向的偏向；二是定期检查分析，肯定成绩，总结经验，宣扬典型，纠正偏向，解决存在的问题。一九六二年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厉行节约的指示，解放军三总部迅即联名发出通知，全军各部队加强了对农副业生产资金的管理，严格控制农副业生产的投资，把有限的资金首先用到当年能见效的事业上，暂时不见效的一律缓办；所有的农副业生产都实行经济核算，讲究经济效果，克服那种不计成本、不讲效果的供给制思想。一九六一年下半年较大规模地开展农副业生产后，福州军区所属部队出现了一些违反党的政策，破坏政府法令，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例如：烧山开荒，造成严重损失和伤亡事故；违反国家护林法令，乱代树木；打猎伤人；有些单位把开多少荒，收多少斤菜，修几个猪棚等任务“下放”给战士个人去完成，以致发生与民争地，拔群众的菜苗，挑群众的肥料，乱砍毛竹等违反纪律的事件。为了引起各部队的重视，总政治部向全军批转了《福州军区政治部关于部队在农副业生产中违反政策纪律情况的通报》，指出：“部队在农副业生产中的政策纪律问题，部队同地方党政机关、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必须认真地抓一抓。”“在执行农副业生产任务时，部队同地方党政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多，关系多；特别是今年的生产规模大，投入的部队多，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更为突出。生产重要，政策纪律更重要。既要完成生产任务，又要执行党的政策、维护军队的纪律。决不能只顾生产，不顾政策；只顾军队，不顾地方。谁违反了这一点，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生产任务，即使生产指标完成了，在政治上也必然造成损失。”

几十年中，部队生产经营活动总的看是好的，但也出现过一些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单位摊子铺的过大，生产用兵过多，影响战备训练，也出现了违反政策纪律的现象。一九七五年七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提出了整顿军队的指导方针，并明确指出：生产也要整顿。此后，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根据中央军委和总部机关的指示精神，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坚持军队工作以军为主，各项生产经营适当调配。各级领导注意合理安排军政训练与生产任务，全面加强部队建设。规定生产用兵比例，陆军的军和独立师，不超过10%，海军、空军和陆军中的特种技术部队，不超过5%。参加生产的部队，按建制抽调，定期轮换。不担负生产任务的部队，每年也安排一定时间参加生产劳动。

贯彻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发挥优势、综合利用、稳步发展的方针，大力发展以工农业、运输业和以智力、技术开发为主的生产性、服务性和开发性活动。军以下主要发展种植业、畜牧业、养殖业、林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农副业生产的规模以能解决部队的补助粮、饲料粮、种子粮为原则。部队的农场，一般由师以上单位办，团主要是组织部队业余生产和随军家属生产。

制定一些有利于部队全面建设和生产经营健康发展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军队生产属全民所有制性质。实行企业化经营的单位，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严格执行军企职责分开，官商分离的原则。产品收益的分配使用，要向作战部队和边防、海岛、基层部队倾斜，要有利于军内外团结，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同时照顾到部队的实际需要。生产粮由各军区、军兵种按照全军统一的规定调配使用。生产收益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和补助部队生活，解决基层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规定现役军人不准私人经商，不准个人合资办企业或入股分红，不得兼任公司的各种职务，不准利用职权为家属、亲友所办企业谋取利益。

严格遵守党和国家、军队的有关政策、法令和纪律。部队生产用地，贯彻以开荒为主的方针，尽量利用营区已有土地。借用地方的土地，原单位要求收回的应积极退还。严禁破坏草原和森林。部队生产的产品，在完成上级规定的补助调剂供应和上调任务后，多余部分在军人服务社销售，也可委托地方商业、供销部门代销。所有产品的销售，都应执行当地规定的市场价格，贯彻稳定物价的方针。加强纪律检查，严禁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偷税漏税和买空卖空、牟取高利、套购或倒卖国家紧俏物资以及变卖计划内分配物资的违法行为。

八十年代中期，全军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清理和整顿公司的通知》和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的《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的要求，把清理、整顿公司作为整顿党风的重要措施，清理了一批无实业基础、靠投机倒把、买空卖空攫取利润的公司。各军区、军兵种司政后等机关以及集团军（含兵团级）以下单位一律撤销公司。所有公司，按照中发[1984]27号文件和国发[1985]69号、102号文件精神，实行军企职责分开，现役干部兼任公司职务的，均辞去一头。集团军以下单位主要是发展农业、林业、养殖业、采矿业、加工业和服务行业，办好军人服务社。军队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补助部队供应。

### 三、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精神，出效益、育人才

从事生产经营，特别是农副业生产是一项十分艰苦的任务。一些生产基地在初创时期，部队面临的是野漠荒滩，连起码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不少人产生了怕苦怕累的思想，一些来自城市的战士，更是顾虑重重，怕耽误了自己的青春和前途。各担负生产任务部队的政治机关，把思想工作做到田间地头，政治干部带头参加劳动。组织干部战士讨论搞好生产的重要意义，广泛运用爱农场、建农场，以场为家的先进典型激励干部战士，使他们自觉地和革命前辈在战争年代所做出的牺牲比艰苦、比贡献、比思想境界，和广大海边防部队比条件。树立“人民需要我生产，乐在农场献青春”的思想，积极为部队建设、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

在艰苦奋斗精神的鼓舞下，部队在生产战线上同样创造了许多伟大业绩。湖北的沉湖地区素有江汉平原“锅底”之称。桔水季节，稀泥淤积，杂草丛生，雨季则湖水横流，十年九灾。武汉军区经湖北省人民政府同意，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决定“把沉湖 10 余万亩荒地变成良田”，开展了一场开垦沉湖的大会战。经过深入的动员，4 个师的干部战士以高昂的斗志，先后投入了艰苦的开垦治理工程。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共完成土方 1180 万立方米，开挖大型渠道 100 余公里，筑堤 48 公里，开垦总面积 9.8 万亩，建成了一个旱涝保收的大农场，为部队提供了大量农副产品，而且使湖区天门、汉川两县近 60 万亩土地受益。广州军区驻汕头某部，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七年，先后两次在牛田洋围海造田，在“涨潮一片海，退潮一片滩”的荒凉海涂上，运取土、沙、石 120 万立方米，筑起总长 15 公里、平均高 4 米的“海滩长城”，造田 2 万亩，建起了人民解放军第一个海滩农场。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历史上罕见的强台风使拦海大堤 62 处 2600 多米决口，万亩良田一片汪洋。广大指战员迎难而上，百折不挠，以为部队建设负责的高度英雄主义气概，经过四个月的日夜奋战完成了复建任务，加宽、加高、加固 23 公里海堤，使牛田洋农场屹立在祖国海疆。

广大从事生产的干部、战士、职工，在艰苦的劳动中，树立生产光荣，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思想，勤勤恳恳，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牡丹江军马场“十姐妹放牧班”的 10 位姑娘，一九六八年从城市来到马场，在长白山下的样川开辟新养马点。他们不畏艰难，披荆斩棘，搭窝棚，开草场。隆冬深夜，气温下降到零下 40 多摄氏度，马背上都凝结起一层霜，十姐妹为保护马匹安全，通宵达旦跟群放牧。经过辛勤劳动，终于在荒原上建起了新的放牧点。十姐妹经受了艰苦环境的锻炼，全班被评为总后勤部先进集体，班长李月荣两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八二年，全军各部队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1982]3 号文件，在完成战备、训练等任务的同时，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开展农副业生产，农林牧副渔业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涌现出大批先进农场、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三总部给予 124 个农场、51 个单位、2 个军马场、34 名个人通令表扬。这些先进事迹，经过政治机关的宣传推广，有力地调动了部队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 四、推动生产经营管理的完善与改革

搞好生产经营既要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也要靠科学的管理。各生产

单位的政治工作人员注意做改革的促进派，启发干部、战士、职工解放思想，向管理要效益。一九五一年十月开始抗美援朝战争后，军需品生产任务加重，由于多种原因，军需生产存在着严重的质量低劣现象，有些工厂不断发生质量责任事故和大量返工产品。为此，总后勤部党委提出了“克服浪费，改善供应”的要求，一方面加强对干部职工产品质量意识的教育，另一方面从改善管理上采取了4项措施：1.普遍开展一次群众性的质量大检查，彻底揭露问题，找出关键所在，以认真的态度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重数量不重质的单纯经济观点。2.发动群众检查技术操作与生产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可能解决的立即解决，不可能立即解决的作出计划分期解决。3.以质量低劣产品为实例，对全体职工进行教育，使之树立良好的质量意识和为部队服务和为战争服务的观念，建立与健全质量责任制和正规的操作规程，严格技术检查制度，加强正常的生产与技术管理以及严格劳动纪律。4.加强技术领导与研究工作，统一质量的计算标准，开展质量竞赛和合理化建议活动，推广先进经验。紧接着就提出并宣扬了质量第一的方针，把军品质量作为战斗力的一种因素，视为对官兵的一种政治态度，在职工中经常进行“质量第一”的思想教育；强化质量检验机构，建立健全一系列产品质量保证制度，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发动群众人人参加质量管理，开展群众性的自检互检和质量“信得过”的竞赛评比活动，使产品质量不断得到改进与提高。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军民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总政治部于同年四月十日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的通知》。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全军各部队一方面普遍深入地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思想教育，提高全体人员增产节约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加强对所属工厂、企业的领导，从提高技术、改进工艺、加强管理制度等方面寻找增产节约的办法，以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军队生产经营的改革也逐步深入。军队农副业生产的改革主要是：由单一生产粮食向多种经营、综合利用的方向转变；由封闭式的自给性生产向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方向转变；由主要靠行政手段管理向主要靠经济手段管理转变，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承包责任制；由经验指导向科学技术指导转变。军队工业企业和第三产业的改革，主要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明确党政分工，实行了厂（场）长负责制和承包经营责任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贯彻“军民结合”的方针，由单一的军品生产型转向军民结合型，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既面向部队，又面向社会，面向国际国内两大市场。在企业中普遍开展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抓管理、上等级、全面提高企业素质”的企业升级活动。推动企业由传统管理向现代化管理转变，由生产型转向生产经营型。政治机关通过宣传教育，动员引导全体人员参与改革，大胆探索，涌现出一批勇于实践，改革创新的先进单位。全军有50多个企业被评为国家二级企业，有100多个企业被评为省市和军队一级的先进企业。沈阳军区某师通北农场在一九八一年就实行了“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大胆改革了农场管理体制，精简了一些职能部门，实行“一兵多用、一专多能”，并将农场全部耕地分别承包给4个机械作业组。一九八三年虽然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粮、豆都获得丰收，生产收益102万元，比改革前的一九七七年增长6倍。一九八四年元月七日，中央军委给这个农场记集体一等功，号召全军农场向

他们学习。兰州军区华山基地全体官兵，在种好粮食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依靠科技进步，使基地的效益由一九八三年的 60 万元提高到 1000 万元，成为全军农场系统种养加工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典型。在中共中央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的指引下，从一九八六年起，总后直属单位的农副业生产开展了横向联合协作，即按照自愿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在生产、资金、科研、教学、人才培养、物资交流等方面开展联合协作。这种横向联合，破除了小而全、单打一的旧观念和传统的封闭式的小农经济经营方式，集中各方面人力、财力、物力、技术的优势，拓宽生产领域，进一步挖掘生产潜力，增加了生产效益，推动了农副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政治工作推动生产经营管理的改善与改革，集中表现于以下两方面。

一是建立和完善生产责任制，促进生产经营的全面改善。落实生产责任制，关键是明确责、权、利，把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治工作重视提高全体生产人员的认识，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尽职尽责，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达到要求的指标。根据完成任务和经济效益的好坏，奖惩兑现。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在搞好精神鼓励的同时，切实做好物质奖励工作。许多单位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时，注意克服只追求个人利益，“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和利益均沾，奖金人人有份的平均主义。通过落实生产责任制，造成比贡献、比责任、比效益、比进步的积极向上的好风气，使生产经营活动保持持久的活力。与此同时，政治工作还在生产经营人员中坚持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进行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培养全体人员爱党爱国和爱厂如家的集体主义思想，把个人的劳动与工作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树立正确的劳动态度和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思想。把建立健全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提高思想觉悟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是尊重知识，尊重科学，改善经营管理，开辟生产的广阔领域。军队的许多生产部队、生产单位都十分重视培养和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许多农场的政治干部都把鼓励大家学科学、用科学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干部战士学习科技知识，进行科学实验，推广优良品种，不断提高科学种田的水平，并取得了很好的效益。一九八二年以后，部队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培训生产经营系统的专业技术力量。全军生产经营系统先后办起了企业管理干部学院、专业管理学校、职工大学、技工学校等 40 多所专业技术院校，“六五”和“七五”期间为军队生产经营单位培养与输送大专程度的人才达 5000 多人，委托地方院校代培 16400 多名，使生产经营单位人员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农副业生产为例，到一九八五年，全军农副业生产专业技术人员已达到 2840 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 801 人，生产管理人员的业务技术素质得到了明显改善。通过广大技术人员推广了多项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全军的农副业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有了很大提高。

## 五、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搞好军政军民关系

军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必然要和社会发生多方面的联系和利害关系。长期以来，军队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爱护群众利益，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尊重地方党政机关的领导，服从大局，主动搞好团结，坚决杜绝与民争利和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发生。

对于解决部队生产经营中产生的军地、军民关系问题，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曾多次提出具体要求。规定部队进行生产，不要与地方争土地、争水源、争肥料。海军和驻岛部队进行水产养殖，不要与地方争水域。驻牧区的部队不要与地方争草场，不准与地方混放。一九六二年四月，陆军某师奉命在天津八里台地区开荒，建立生产基地。他们做到：不开垦村庄附近的土地，以便群众打草和满足群众扩大生产的需要；不多开垦少耕种，以免破坏草地；不和群众争草场，所需草料通过生产队购买；群众要求退地时坚决退还。基地种了 6000 多亩水稻，当生产用水紧张时，部队坚决不与民争水。一九六三年，天旱缺水，干部战士自觉到远处挑水浇地，让群众就近抽河水灌溉。步兵某团为安置家属子女就业，在营房附近办了一个沙场。由于这里沙质好，交通方便，沙的销路很广，但影响了附近地方沙场的生意。团党委听到群众有意见，毅然把沙场让给了驻地群众经营。他们爱护人民群众利益的行动，受到群众的欢迎。

当部队与地方出现矛盾发生纠纷时，部队的党委和政治机关都本着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军民兼顾，互谅互让的原则，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妥善加以解决。兰州军区山丹军马场，是解放军从国民党军队手里接管的马场，一九五二年经政务院批准归部队使用。一九五九年裕固族群众搬到附近居住，经常到马场放牧牛羊，此后逐渐发生了草原纠纷。兰州军区党委认为裕固族是一个只有 7000 人口的少数民族，为支援裕固族同胞发展生产，经与中共甘肃省委协商，确定由山丹军马场主动划出 18.6 万亩草原，无偿归肃南县划界栽桩，给裕固族群众使用。济南军区垦利军马场等一些单位在发生场界纠纷时，也都从照顾群众利益的立场出发，主动解决矛盾，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为了支援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地区的建设和方便人民群众，人民解放军将设在沿海港口城市的一些机场和军港码头、水道实行对外开放，军地合用，积极为民用提供服务。军队的修理部门在保证完成部队任务的前提下，主动承担地方的修理、加工任务。部队闲余的库房、场地对地方办理货物代存和出租。各类医院在完成军队救治任务前提下收治地方伤病员。院校、科研、文化、设计等单位，利用自身的优势，积极开展智力、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和咨询性服务。这些措施不仅拓宽了部队生产经营领域，也对国家的经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生产经营系统的广大政工干部，为发展军队生产、推动改革开放，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先后有 4 个工厂被授予“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光荣称号，有 79 个企业被评为“全军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有 100 多名政工干部被分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和“全军企业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 第三编 军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工作

#### 第十一章 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是通过军队党的各级组织具体实施的。加强军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规定,在部队干部、战士和职工中发展党员,在团以上部队和相当于团以上的单位建立党的委员会,在营和相当于营的单位建立党的基层委员会,在连和相当于连的单位建立党支部,实行党委(支部)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军队党的各级委员会和连队党支部,是各该部(分)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军队中各级党组织不断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和思想作风建设,充分发挥核心领导作用,从而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人民军队的性质,保证完成作战、训练、科研、施工、生产等任务,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为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发挥重要作用。

## 第一节 党委建设

### 一、党委员会的设立

党委制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解放军实行领导的根本制度。这一制度始建于红军时期，后来经历了中断、恢复和完善的过程，在解放战争时期确立起来并沿用至今。加强党委建设，对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以及保证军队各项任务的完成都具有决定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在向现代化、正规化转变的历史条件下，有人曾主张学习苏联军队“实行一长制”。一九五三年底至一九五四年初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重申了军队中党的各级委员会是各该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充分肯定了实行党委制的必要性与正确性。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五日由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用立法的形式把这一制度固定下来。之后历次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都明确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是各该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

军队团和相当于团以上单位党的各级委员会，由党的同级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各级党委委员的名额分别由上一级党委决定。师以上党委委员必须具有五年以上党龄，旅、团级党委委员必须具有三年以上党龄。党的各级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十年代，军以上为二年，师、团为一年；六十年代，军以上为三年，师、团为二年；八十年代，军以上为五年，师、旅、团为三年。党的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并报上级党委批准；必要时可由上级党委指定。科研所、仓库、医院等党员较少的单位，也可不设常务委员会。党的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名额为5—11人，由部队领导人和司令部、政治部主要领导人组成（经中央军委批准，从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起，后勤部门应有一名主要领导人参加同级党委的常务委员会）。党的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大军区级单位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军、师级单位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旅、团级单位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在委员会全体会议闭幕期间，党的常务委员会行使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职权。

营和相当于营的单位党的基层委员会或总支委员会，由全体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两年，每年召开一次党员大会。选出的委员和书记、副书记报上级党组织批准。营党委或总支委员会作为全营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和团以上部队党委的性质一样，所不同的是它具有基层党组织的性质，不设常务委员会，直接联系广大党员和干部战士。

党的各级委员会根据党的章程、政治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以及上级党委的决议、指示，结合部队的实际情况，统一领导部队工作，其讨论和决定的问题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的宪法、法律、法令，军队的条令、条例、规章制度，上级党委的决议和上级首长、领导机关的命令、重要指示的贯彻执行；部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部队的作战、训练及一定时期的军事、政治、后勤工作和民兵工作的方针、原则，年度和阶段性工作的计划，完成重大任务的要求和措施；党的各级组织的建设，所属单位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共产主义青年团建设的重大问题；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和干部的考核、培养、选拔、任免、



调配、奖惩和军衔、职级晋升等问题；军政、军民关系方面的重要问题；生产经营活动的方政策和重大经济开支问题；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决议的贯彻情况，向上级党的委员会提出的重要问题的请示报告，向本级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的工作报告；党委自身的建设问题等。

军队师以上部队和相当于师以上单位领导机关的司令部、政治部设立党的委员会（部党委）。部党委在同级部队党的委员会领导下，对本机关（部门）的工作实施集体领导，研究和决定本机关（部门）工作方针和计划以及本机关（部门）的其他重要问题。部党委成员由同级部队党的委员会指定。师以上部队的后勤部成立党的委员会，执行一级党委的权限，领导后勤机关及所属部队党组织，党委成员由党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旅、团和相当于旅、团级单位的机关、直属队，根据实际需要设立统一的党的直属委员会，负责管理机关、直属队党的工作和组织进行政治工作。直属党委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一九八五年以后，随着人民解放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和部队情况的变化，军、师机关不再设党组性质的部党委，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可以分别成立党的委员会，党委成员由同级部队党委指定，执行一级党委权限，领导本机关及其直属队的党组织。总政治部的二级部不再设部党委，建立部务会议和部办公会议制度。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的二级部，凡下同单位多的仍设党的委员会，下属单位少的是否设立部党委，由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党委根据具体情况研究确定。

## 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人民解放军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个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党委对部队实行统一领导。即所属部队中的一切组织、一切人员都必须置于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党的委员会对部队实行政治、思想和组织的统一领导。二是党委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紧急情况首长可临机处置，但事后必须及时向党委报告。三是实行首长分工负责制。重大问题经党委讨论决定后，由军政首长分工负责贯彻执行。属于军事工作方面的由军事主官负责组织实施，属于政治工作方面的由政治主官负责组织实施。军、政副职干部分别受军、政主官领导并向军、政主官负责。军政主官必须服从党委的领导，执行党委的决议，积极主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各级党委既要使部队首长置于党委的集体领导之下，又要尊重他们的职权，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十年代初，在部队进行正规化建设中，有的单位曾出现只重视个人领导而轻视党委集体领导，军事训练和演习计划不要党委过问，下达命令不要政治委员签署等现象。这些问题一经发现，很快就得到了纠正。一九五四年一月彭德怀代表中央军委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指出：“在组织方面，应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指示，根据党委员会集体领导和首长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一九五六年九月，邓小平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明确指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面，长期以来就实行着党委的集体领导制，或者说得完全些，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期战争的经验，证明这个制度对于部队工作是有利的。”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这一领导制度，既能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又适应军队的特点；既能发挥集体的智慧，又能发挥首长的作用；既能充分发扬民主，又能保持军队的高度的集中统一。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制度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和破坏。“书记挂帅”的口号也曾影响党委集体领导作用的发挥。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经过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党委的集体领导制度得到了恢复和加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地方企业党政分开，实行厂长负责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领导人明确指出：在军队中不要简单地提“党政分开”，军队仍然必须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种领导制度，是符合军队实际的。它既能体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又能充分发挥首长的作用。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要坚持，但领导方法要改进。根据这一精神，针对有的党委存在的职责不清，个人说了算，议事随意性较大等问题，各级党委普遍制订了议事规则，对党委的议事原则、议事程序和议事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保证了党委以主要精力抓好部队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提高了决策水平。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关键是要有一个坚强的党委领导班子。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中央军委通报表扬的“学习走在前，工作拼命干，生活不特殊，遵纪做模范”的航空兵1师党委；一九七九年三月中央军委通报表扬的坚守在祖国北部边疆九年如一日，以忘我的工作精神带领部队，把当年的不毛之地建设成保卫边疆钢铁阵地的北京军区守备1师党委；一九八四年九月中央军委通令嘉奖的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处处以身作则，深入前沿带领部队出色完成作战任务的某军第40师党委，等等，都是军队中坚强的党委班子的代表。这些部队都是因为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而成为全军著名的先进单位。

### 三、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根本制度，也是人民解放军中党的生活的一项基本准则。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只有在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集中全党智慧，保证党的决策的正确和有效实施，增强党的纪律和战斗力。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党的上级组织要经常倾听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等。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军中的各级委员会就是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

一九五六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部队各级党委对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情况普遍进行了检查总结，并制定了健全党委会议制度的措施。沈阳、济南、成都、兰州军区和海军、空军等大单位以及部分军师级党委相继召开了以检查贯彻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党委书记联席会。一九五七年

反右派斗争以后，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军队中党内生活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民主集中制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党的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级党委按照《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的精神，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各级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主要经验是：（1）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使党员的意见、建议、批评能及时准确地得到反映；在党内提倡说真话，不讲假话，发扬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党组织依据党章规定，支持和保护党员充分发表意见、对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侵犯党员民主权利，压制党员批评，进行打击报复或诬告陷害的人和事，认真查处。（2）正确实施集中。决定重大问题走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党组织内部讨论问题时提倡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什么意见都摆到桌面上来，经过充分讨论集中正确意见，以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精神为依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议；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保证决策的正确性，避免或减少工作失误；个人有不同意见，允许保留，但必须服从和执行集体的决定。（3）党委书记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党委书记对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学得更好一些，理解得更深一些，看得更远一些，并模范执行；有良好的民主作风和集体领导观念，经常和委员谈心，讨论问题时虚心听取委员的意见，决定问题时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搞一言堂，善于发挥每个委员的特长，把“一班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党性强，思想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维护党的利益和团结；正副书记密切配合，互相谅解，互相支持，平等相待，做到“赤诚相见”，建立深厚的革命友谊；言行一致，工作者老老实实，不争功，不诿过，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发生问题不推卸自己的责任，善于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有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做到严于律己，敢于正视和勇于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对别人的批评，特别是来自下面的批评，能够虚心听取，正确对待。各级党委成员都要坚持过双重组织生活，始终置于党组织的有效监督之下。（4）健全党的各种会议制度。党代表大会、党委会、常委会是集体领导的主要形式，必须定期召开。为使会议不流于形式，能真正充分发扬民主，会前早出“安民告示”，广泛收集委员和部门提交党委讨论的问题，确定会议的议题，让大家有充分准备，会议做到有议有决。党委作出决议之后，每个成员都坚决贯彻执行，不得擅自改变。对常委会、全委会和党代表大会的议事范围、例会时间、参加人员、决策方式作出规定，使之规范化。严格区分常委会和首长办公会、党委全会和党委扩大会的界限，不能互相混淆和代替。明确代表大会与全委会、常委会与全委会的领导关系，坚持做到军政首长向常委会负责，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全委会向代表大会负责，并定期报告工作，接受检查和监督。

#### 四、加强党委自身建设

加强党委自身建设是发挥党委核心领导作用的重要保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党委的自身建设，是紧密围绕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

军队建设和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进行的。以加强党委自身建设去推动军队建设和中心任务的完成，通过领导军队建设和完成中心任务来促进、检验党委自身建设。主要做法是。

加强学习，提高党委成员的政治素质。人民解放军各级党委经常组织党委成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中央军委的决议和上级指示，不断提高理论和政策水平，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处理问题，保证党委“一班人”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和任何复杂情况下，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五十年代，重点学习了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使各级党委成员的理论基础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同时深入学习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加深了对“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论断的理解，明确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有效地克服了一些党委成员在胜利面前滋长的居功骄傲、贪图享乐、松懈斗志的思想情绪，坚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六十年代初，各级党委带头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等书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九六四年以后，全军团以上党委普遍建立了党委学习中心小组及其学习制度，经常结合形势、任务和党委成员的思想实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统一党委“一班人”的思想，提高了党委成员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水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针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分裂党的阴谋，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各级党委结合学习这三项基本原则，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了以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为中心内容的自我教育，对促进党的集中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党委按照邓小平关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要求，带头学习中共中央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系统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对党委成员进行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教育，不断提高党委“一班人”的思想水平。通过学习，各级党委成员很快适应了全党工作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自觉地坚持以军队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使军队建设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广州军区某集团军一九八六年总结了保持清醒头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经验。他们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保证部队不偏离四项基本原则，在全面改革的潮流中保证部队不丢掉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最根本的是能紧密联系各个时期部队反映出来的倾向性问题学习政治理论，力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深议透，把握住基本点，并贯彻到实际中去。这样，他们的方向更明确了，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自觉了，处理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更加正确了，集体决策能力增强了。

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制度。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健全党的民主生活。人民解放军党的各级组织按照总政治部的要求，认真地贯彻了这次会议的精神。95%的团以上党委开了交心通气会，检查了坚持集体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情况，

改进了党委内部关系，活跃了党内民主生活。一九六五年全军宣扬了北京军区某炮兵师党委不断活跃党委民主生活，充分调动“一班人”的积极性；坚持原则，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重视党委成员的思想改造，不断促进思想革命化的经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之后，各级党委进一步健全了党委民主生活会的制度。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总政治部向全军转发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开好高级干部党的生活会的通知》。各级党委根据《通知》要求，普遍召开了民主生活会，检查党委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党委团结，坚持民主集中制和端正党风等方面的问题。一九八五年十月，军委各总部、各军区、军（兵）种和各院校等22个大单位普遍召开了以搞好部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为主要内容的党委民主生活会，回顾整党后党委的思想、工作和作风等方面的情况。会上，委员们谈感受，提希望，有检查，有批评，发言恳切，气氛融洽。普遍反映，这次民主生活会开得很适时，很必要，对搞好党委建设，保证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团以上党的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每年召开一至两次民主生活会已成为一项制度。通过民主生活会，相互交流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促进党委建设。兰州军区某集团军党委通过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对党委成员实施思想约束、组织约束、制度约束，使“一班人”成为联系群众、保持廉洁的好班子，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宣扬了他们的经验。

适时进行思想作风整顿。人民解放军各级党委经常通过党内民主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着重围绕联系群众、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增强党性和正确行使手中权力等内容，引导党委成员树立全心全意为部队建设服务的思想，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求真务实、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增强党委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检查、解决。对问题比较多而自身又难以解决的少数党委，上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及时派人进行帮助和整顿。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使人民解放军党组织的思想作风建设受到了极大削弱，党委领导存在着严重的软弱、涣散现象。一九七一年一月，济南军区党委在学习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谨慎”的指示中，针对一些党委成员存在的“一贯正确”的思想，进行了反骄破满教育，提出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们的经验经毛泽东批示转发全军，全军团以上的党委普遍进行了谦虚谨慎、反骄破满教育，对加强党委成员的思想作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一九七五年七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军队要整顿”，“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但遭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的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央军委全会肯定了一九七五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的整顿军队的正确方针，要求“领导班子要抓紧整顿，迅速改变软、懒、散的状况”。空军航空兵1师党委坚持经常搞整顿，年年迈新步，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中央军委通报表彰该师党委成员“学习走在前，工作拼命干，生活不特殊，遵纪做模范”的事迹。一九七八年的全军政工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各级党委“切实整顿领导班子，克服软、懒、散状态”，“从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作风上认真进行整顿”。根据上述指示精神，到一九七九年五月，全军84%的团以上党委分期分批进行了整顿。通过整

顿，党委软、懒、散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变，民主集中制原则得到了贯彻，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扬。在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六年的全军整党中，各级党委又集中地进行了思想、作风和组织整顿，着重克服官僚主义、以权谋私和弄虚作假等问题，使各级党委的自身建设有所加强。一九八六年六月，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宣扬了北京军区某集团军党委“竖不攀横不比，老老实实正自己”，“宁可揭露问题挨批评，也不掩盖问题图表扬”的经验。

重视抓好党委“一班人”的团结。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后，总政治部立即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在军队中传达和学习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的规定》，指出：“自全国大陆胜利解放以来，我们军队中严重地滋长着损害党的团结和党的集体领导的个人主义的居功骄傲情绪”，要求各级党委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学习七届四中全会文件，采取自我批评为主要的方法，检查这方面存在的缺点、错误。各级党委相继召开常委会、党委扩大会议或党代表大会，展开讨论，进行了思想检查。在华东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到会的289人中有210人作了有关团结问题的检查，45人在会上发言作了自我批评。东北军区各级党委在学习中，有90.7%的成员不同程度地检查了“老子打天下”的居功骄傲情绪和计较个人地位、荣誉等个人主义错误，加强了党内外的团结。许多党委作出了加强团结的决议。一九六三年，沈阳、济南、成都、兰州等军区、空军及部分军、师级党委，相继召开了以加强党委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党委书记联席会，有效地解决了党委内部的不同认识，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级党委更把加强团结作为党委建设的重要内容。搞好党委团结，最重要的是要坚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做到“一班人”相互讲风格、讲友谊、讲谅解，及时交流思想，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政治上互相信任，在思想上互相帮助，在工作上互相支持，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在人格上互相尊重。1981年海军常委扩大会议解决了海军历史上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增强了团结。沈阳军区某守备师是在一九八五年部队精简整编中由3个师级单位合编在一起的，整编中该师党委做到“合编、合心、合力”，一切从精简整编的大局出发，打牢合心合力的思想基础；按照党性原则办事，坚持合心合力的正确原则；依靠规章制度，巩固发展合心合力的成果；领导带头干事业，合心合力把部队建设搞上去，使各方面人员很快融为一体，各项工作很快走上正规。总政治部领导人称赞他们是一个合心合力的好党委。

## 五、实行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事系统和地方党的委员会双重领导制度

从革命战争年代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实行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事系统和地方党的委员会对军队的双重领导制度。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规定：“各级军区及军分区党的组织，除受各该上级党的组织领导外，并分别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中央分局、同级地方党的组织的领导。”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地方党委对军队的领导和密切地方党同军队关系的指示》，提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事系统和地方

党委对军队的双重领导制度”，并规定：省（自治区）军区、军分区和县（市）兵役局（后改称人民武装部），除保持军事系统垂直领导与隶属关系外，在党的关系上同时成为同级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并由地方党委书记兼任同级军事机构的政治委员；凡军事区域同地方行政区域相一致的军区，也应置于中共中央军委和同级地方党委双重领导之下，军事区域同地方行政区域不一致的军区以及其他军事单位，在与地方有关的工作上，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省军区应有一个主要负责人参加所在地的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工作。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一日中共中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委书记分别兼任省军区（警备区）、军分区党委第二书记，不再兼任政治委员。一九八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县（市）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工作人员改为地方编制，任务不变。县（市、区）人民武装部是本地区的军事领导机关，既是同级党委的军事部门，又是同级人民政府的兵役工作机关。

## 第二节 党支部建设

### 一、党支部的设立及其任务

“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提出的一条重要原则。几十年来，不管军队任务怎样变化，编制体制怎样调整，这一条原则始终没有变。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规定，凡有正式党员 3 人以上的连队都应当设立党的支部。成立党的支部应当经过团或者相当于团单位党的委员会批准。连队党支部的领导机关是支部党员大会，在支部党员大会闭会期间，是它选出的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的名额，以及它选出的书记和副书记，由团或者相当于团单位党的委员会决定或批准。支部委员会可根据实际情况，设书记、副书记和组织、纪律检查、宣传、青年、保卫、群众工作等委员，必要时可设敌军工作委员。在支部委员名额少的情况下，一个委员可以兼管几个委员的工作。正式党员少的支部可以建立 3 人支委会或者只设书记和副书记。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一年，委员如有缺额应召开党员大会及时补选。党支部一般按照排或者党员的数量和分布情况划分党的小组，每组选举组长一人。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机关中设立的支部，是党在军队机关中的基层组织，它在上级党组织和各该部队或机关直属党的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进行党的思想和组织工作，保证机关各项任务的完成。成立机关党支部由所在部队或机关直属党的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决定。支部委员会的名额由所在部队或机关直属党的委员会决定，每届任期二年，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并与行政负责人保持密切联系，主动反映情况，协助行政领导改进工作，提高效率。这些精神，原则上也适用于院校、医院、科研等单位具有机关性质的党支部。

总政治部还规定特种兵部（分）队在相应单位设置党支部；独立分散执行任务的分队，设临时支部或分支部；党员人数不够成立支部或支委会的独立分散小单位，可以采取调整力量，召开党员大会的办法，还可以就近参加当地驻军党的活动或委托地方党的组织实行领导；在执行作战等任务中因伤亡减员造成党组织缺损时，及时调整健全党支部组织，以保证党的领导。

连队党支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持党支部集体领导下的连长、指导员分工负责制，重大问题，必须经支委会或支部党员大会讨论决定，由连长、指导员按职责范围，分工组织实施。连队的所有人员、所有组织，都在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接受党支部的领导。党支部的主要任务，历次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都有明确的规定，主要是：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军队的条令、条例、规章制度和上级的决议，命令、指示，团结和带领群众完成作战、教育训练等各项任务；组织党员和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优良传统，学习军事、业务和科学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党员进行教育和管理，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监督党员切实履行义务，遵守纪律，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密切联系群众，经常了解并向上级如实反映群众对党员、党的工作的批评和意见，维护群众的正当权益，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提高他们的觉悟，关心和改善连队的物质、文化生活；加强对于部的管理和教育，对干部的选拔、



调配和奖惩提出建议，做好推荐优秀战士入学的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发现他们中间的先进分子以及各种专业技术人才，鼓励和支持他们改进工作，进行革新和创造，为部队建设和培养军队地方两用人才作贡献；坚持党员标准，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收缴党费，审查和鉴定党员，表扬党员中的模范事迹，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和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抵制、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教育党员和群众增强法制观念，提高革命警惕，坚决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破坏分子的犯罪活动作斗争；领导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和革命军人委员会的工作，充分发挥其作用。

## 二、党支部的经常性建设

连队工作的好坏，首先决定于党支部工作的好坏。加强连队建设，关键是加强党支部建设。几十年来，人民解放军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一直把党支部建设放在基层建设的首位，把健全组织，落实制度，坚持集体领导，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作为加强党支部建设的重点。

### （一）保持党支部组织的健全。

党支部组织的健全主要是通过做好党员发展工作、注意保留党员骨干、控制党员流动等得以保证的。人民解放军创建以来，不管情况有什么变化，连队都有一个健全的党支部组织，并选举产生党支部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划分若干党小组。党员人数多时，基本上都能达到连有支委会，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的要求。作战部队的建制连队党支部，绝大多数都能建立5人以上的支部委员会，不能建立5人支部委员会的少数基层支部，也都能建立3人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缺额时都能及时增补，每年老兵退伍后及时调整党员的分布，改选支部委员会。外出执行临时性任务时，根据党员人数临时成立党组织，做到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保证实施不间断的领导。

### （二）坚持严格的组织生活制度。

连队党支部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生活制度，主要有：（1）党日制度。每周半天用于党的活动。（2）会议制度。支部党员大会和党小组会每月召开一次，支部委员会根据需要及时召开，一般每月2次。（3）党课制度。每月用两个党日进行党课教育。（4）报告工作制度，支部委员会每季度向支部党员大会作一次自身建设和工作情况的报告。（5）支委民主生活会制度。支部委员会每季度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交心通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6）党员汇报制度。党员每月至少向党组织汇报一次思想、工作等情况；党员外出时间较长的，应采取书面或其他形式向党组织汇报。（7）评议党员制度。党支部每年组织一次对党员的民主评议，听取群众的意见，对党员进行讲评。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行，保证了党支部各项工作正常有序地进行和对党员的教育管理，有效地加强了党支部的领导。

### （三）加强党支部领导班子的建设。

人民解放军的党组织十分注意提高党支部正副书记的素质，培养他们坚强的集体领导观念，正确坚持党支部集体领导下的连长、指导员分工负责制，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等，使作为党支部正副书记的指导员或连长，既自觉地接受支委会的领导 and 监督，又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正确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防止独断专权、个人凌驾于党支部之上的错误倾向。同时注意

处理好正副书记之间、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一九六二年《解放军报》就正确处理支部书记和委员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专题讨论。通过讨论，使大家明确了书记和委员之间是平等关系，不是上级和下级、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支部书记是党支部工作和支委会议的主持者，但在讨论问题和决定问题时，必须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书记和委员有同等的发言权和表决权。一九八七年五月全军召开的基层政治工作会议，对党支部如何处理好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的关系，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总结交流了经验。同年七月总政治部制定的《新时期党支部建设纲要》进一步明确提出：“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关键是书记要有集体领导观念和民主作风，自觉处理好书记与委员、个人与组织、支委会与支部党员大会、行政领导与党的领导的关系。”

搞好支委会“一班人”的团结。根据一些连队党支部的经验，搞好“一班人”的团结主要做到以下几点：（1）“一班人”要同心协力。相互讲友谊，讲谅解，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互相信任要知心，互相帮助要诚心，互相关怀要热心，搞好工作要同心，心往连队建设上想，劲往连队建设上使。（2）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平时经常谈心交心，及时互通情况、交换意见，求得对工作的一致看法和思想上的统一。有了意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既不搞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互相整人的“左”的错误做法，又不搞“不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和“多栽花，少栽刺，留得人情好办事”的自由主义庸俗作风。（3）书记作团结的表率。正副书记严以律己，心胸开阔，乐于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正副书记密切配合，互相支持，有了成绩不争功，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多“补台”，不“拆台”。

由于全军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都比较重视帮助连队党支部搞好领导班子建设，所以大多数党支部的集体领导作用得到了较好的发挥。据原昆明军区一九七九年的统计表明，凡是仗打得好的连队，都有一个团结协作、有勇有谋的党支部领导班子。被中央军委和军区党委授予荣誉称号的22个连队中，党支部主要成员都荣立了战功。广州军区珠海警备区伶仃岛守备连，三十多年出色地完成了守岛、海域警戒、国防施工、营建等繁重任务。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该连虽然地处特区，毗邻港澳，却始终保持和发扬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根本原因是连队党支部的集体领导比较坚强，骨干队伍素质好。党支部“一班人”在处理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关系上，能自觉做到局部服从整体，“小家”服从“大家”，心操在革命事业上，劲使在连队建设上，为群众做出了好样子。

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历来重视选配思想作风正派、民主作风好、善于团结同志、敢于坚持原则、能够以身作则、有较强组织领导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干部党员担任支部书记。不少单位对新任支部书记坚持先培训后上岗的制度。为了提高支部书记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各级采取多种方法进行培训：（1）短期集训。从五十年代起，军、师就对支部书记进行分批集训，相对集中时间学习党建理论和做好党支部工作的基本知识。（2）以会代训。利用召开经验交流会、研讨会、书记联席会等，介绍，交流做好党支部工作的经验，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3）领导干部传帮带。领导干部下连蹲点、代职，直接参加党支部的活动，同支部书记一起研究问题，作典型示范，传经验、教方法、带作风。（4）送院校培养。进入八十年代后，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全军支部书记有计划地送到政治院校培训。经过培训和实

践锻炼，大多数支部书记基本能达到“六会”的要求，即：会做党务工作，会讲党课，会依靠组织制度管理和监督党员，会正确处理党内各种关系和矛盾，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会发挥共青团、军人委员会的作用。

#### （四）加强对党支部建设的指导。

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指导党支部建设的方法主要是：第一，着眼提高领导水平。新中国成立初期，总政治部曾规定，军、师、团党委委员和司政机关负责干部，都要直接联系一个或几个支部，经常去了解情况，帮助工作，教方法，作示范，帮助党支部总结经验，调动内在积极因素，区分不同类型的连队实行分类指导，培养党支部领导连队全面建设和分析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几十年来，各级党委和机关都把领导干部下连蹲点、代职作为一项重要制度坚持下来。第二，适时进行整顿。一九五三年十月至一九五六年三月，全军党支部普遍进行了整顿。这次整顿规模大，时间长，从实际出发，抓住重点问题，从教育入手，结合中心工作，依靠支部的内在力量，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整顿，支部骨干之间的团结加强了，集体领导观念增强了，官兵关系和党群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支部骨干的思想、工作水平和党员的素质有了显著提高。一九八三年中央军委提出大抓基层之后，许多部队遵照总政治部关于“抓党支部建设，要贯彻整顿的精神”的指示，有计划有重点地整顿了边防、海岛、分散单位和处于后进状态的基层党支部。第三，扎扎实实地做好打基础的工作。主要是运用多种形式帮助党支部抓好党的宗旨教育、优良传统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提高党员思想政治素质；完善各项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规范党支部的议事内容、程序和方法，防止包揽行政事务，集中主要精力抓好政治思想教育和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总结工作，着重从思想、工作和作风等方面摆问题，查原因，找教训，明确努力方向，制订改进措施，使党支部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人民解放军的基层党组织在各条战线上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党支部。他们的主要特点是：（1）党支部委员会核心领导作用发挥好。正副书记具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工作能力强，群众威信高，“一班人”视团结为生命，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研究决定连队的重大问题，不搞个人说了算，把干部战士紧密地团结在党支部周围，形成了很强的凝聚力。（2）思想政治领导坚强有力。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战士的头脑，经常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统一思想认识，保证全连在政治上思想上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做好经常性的思想工作，激励干部战士高昂的练兵热情和战斗意志，保证连队建设的正确方向。（3）对党员特别是干部党员的管理严格。坚持按制度抓建设，靠制度管党员，使党员人人都在组织中，人人都有组织管，没有特殊党员，没有不服管的干部：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依靠自身的力量，积极主动地解决连队建设和党员中的问题，做到解决战士党员的问题不出党小组，解决干部党员的问题不出党支部，党内生活有很强的原则性和战斗性。（4）有一支过硬的党员队伍。党员的党性强，素质好，在日常工作中当模范，在完成急难险重和特殊任务中当先锋，在思想工作中当骨干，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许多部队的党员饥让食，渴让水，冷让被，防炮击让洞，战评让功，被群众誉为“阵地之魂”、“战士之胆”。在突击队员和牺牲的烈士中，党员占60%以上；立功人员中，党员约占75%，

其中，立一等功的党员占 90% 以上；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的全部是党员。（5）领导连队全面建设能力强。党支部有一种争第一、创一流、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始终把着眼点放在提高部队战斗力上，在建设全面过硬连队，培养合格军人，完成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各项任务中，成绩突出。

### 第三节 党员队伍建设

党员队伍的素质直接影响着党的形象，决定着党的战斗力。中国共产党要求军队中的党员除坚决履行《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党员八条义务外，还必须在献身国防事业、维护安定团结以及艰苦奋斗、遵纪守法、服从命令、英勇作战等方面，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党组织一贯把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基础环节来抓，在部队中保持了一支相对稳定、质量较高的党员队伍。

#### 一、有计划地慎重地发展党员

五十年代初期，由于“三反”运动期间停止发展党员，部队整编时许多党员复员、转业，全军党员的数量锐减。为保持部队中有一定数量的党员，根据中共中央“必须有领导有计划地采取慎重的方针来发展党员”的指示精神，总政治部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发出《关于发展党员的工作指示》，要求“采取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进行发展党员工作，以连队为重点，尽可能做到每个战斗班有三个党员”，从一九五二年十月至一九五三年底“有步骤地吸收10%的非党群众入党”，“部队党员的数量，陆军连队可发展到30—35%，特种兵可发展到35—40%”。各部队党组织严格执行上述指示，既注意纠正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现象，同时也注意防止和不断纠正消极等待及关门主义的倾向，使发展党员的工作比较健康地进行。

一九五五年实行义务兵役制后，每年都有大批的老战士党员退役，连队党员数量逐年减少。到五十年代后期，不少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建立不起支部委员会，很多排没有党小组，一些人数较少的技术单位没有党员。为解决这一问题，全军在集中进行整顿党支部中，把发展党员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有效地推动了党的发展工作。一九六一年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发展党员首先要注重政治质量，做好考察教育工作，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义务兵只要具备入党条件，就应吸收入党，不应受服役年份的限制”，“连队至少经常保持十五名左右的党员”，“做到班有党员，排有小组，连建立支部委员会”。按照上述要求，各部队党组织在注重质量的前提下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党员数量有较大的增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部队发展党员工作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缺乏计划控制，吸收新党员过多，党员质量下降，影响了军队党组织的建设。在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一年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总政治部对连队发展党员提出了控制数量、保证质量的要求。后来针对许多连队党员队伍不够稳定，老兵退伍前党员数量骤然上升，老兵退伍后又大幅度下降，影响支部委员会的健全和活动的正常开展等问题，总政治部于一九八六年十月和一九八七年七月先后两次提出，发展党员的工作，要从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以及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需要出发，严格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控制数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原则进行。规定：“连队和相当于连队的基层单位，每年在义务兵中发展党员，一般应控制在义务兵总数的10%以内”，“一般情况下应有10名以上的正式党员”。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在贯彻上述要求中，不断端正指导思想，增强责任感，注意了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进与出的关系，把保证党员质量放在首位，加强宏观控制，计划指导，实行均衡发

展，注意入党前的培养和考察教育，严格发展程序；防止和纠正论资排辈、迁就照顾、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使党员数量得到有效控制，党员素质有了很大提高。遵照中共中央关于重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指示，各部队认真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使军队知识分子中党员的比例有了明显的提高，改善了党员队伍的构成。

党支部做好发展党员工作的主要做法，一是加强计划性。每年初，党支部选好“苗子”，对全年的发展数量、发展对象作出安排，报团政治处审批。然后按照计划，成熟一个发展一个，防止违反规定和无计划盲目发展。二是加强培养。党支部对发展对象分工专人培养。经常找他们谈心，吸收他们听党课，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端正他们的入党动机，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支部经常分析发展对象的情况，上级派人进行考核，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坚持不发展。三是严格履行入党手续。发展对象一般部经团支部推荐，党小组提名，支委会审定，成熟者提交支部党员大会充分讨论、表决，通过后报上级党委审批。

## 二、加强党员的教育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解放军中的党组织根据执政党建设的要求和部队的实际情况，反复对广大党员深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党的基本知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教育，使每个党员明确党的性质、纲领、宗旨、指导思想、最终目标和现阶段的总任务、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加强党性观念和纪律观念，牢固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一九五〇年冬至一九五三年上半年，集中进行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教育。主要是学习中共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的共产党员八项条件。这次教育是在试点的基础上展开的，总政治部统一编写了教材。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各部队培训了教员。一九五六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各部队针对新党员较多的情况，组织党员着重学习党章的总纲、党员的基本条件、义务和权利。六十年代初期，普遍组织党员学习《毛泽东同志论党的建设》，使广大党员加深了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理解。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全军先后两次组织全体党员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明确怎样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由于坚持不懈地对党员进行教育，提高了党员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明确了对党员的要求，一些不完全具备条件的党员，对照党员标准检查了自己的缺点、错误，找到了努力方向，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员的教育工作受到干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对党员进行教育的重要内容，严重地影响了党员的政治思想素质。

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人民解放军各级党组织引导广大党员深入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分裂党、破坏党和以派性代替党性、破坏党的组织纪律等罪行，清除其流毒和影响，逐步恢复了党的基本知识、党的纪律和优良传统教育的制度，使党的教育工作走上健康的轨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党组织先后组织党员深入进行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学习，进行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教育，加深了广大

党员对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理解，提高了对怎样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的认识。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之后，全军普遍开展了以学习新党章为主要内容的轮训党员工作，总政治部对此专门发出通知，并在南京政治学校举办了党员教育骨干训练班；全军有200多名师以上干部直接抓了教育试点。这次教育使广大党员对十二大制定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有了较好的理解。一九八六年总政治部统一编印了《党的建设讲话》、《中共党史讲话》、《党的基本知识讲话》和《新技术革命讲话》等4本党员学习材料，供全军党员进行学习。一九八七年各级党组织又及时组织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认真领会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教育，为广大党员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提高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同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性。

人民解放军各级党组织在进行党的教育工作中形成了一套制度和办法：

- (1) 上党课。这是对党员进行教育的基本形式。为了提高党课质量，许多单位坚持集体备课、领导干部上党课和请先进模范人物讲党课等。各级党组织注意把党课教育与一般政治教育区别开来，把新党员与老党员、党员干部与党员士兵区别开来，实行分类施教，避免“一锅煮”的现象，以增强教育的针对性。
- (2) 轮训党员。学习新党章和整党、整支教育，都采用这种办法。
- (3) 党员自学。由党组织指定有关文件或读物，组织有阅读能力的党员自学。
- (4) 整顿思想。针对党员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集中一段时间，学习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 (5) 请地方人员作报告，走出去参观访问，对党员进行党的路线政策教育。

### 三、对党员实行严格有效的管理和监督

坚持党管党员，对党员实行严格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是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方面。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人民解放军中党组织对党员的管理和监督，除了发挥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作用、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以外，主要是发挥组织的作用，坚持党内生活的各项制度，搞好党员的相互监督和群众对党员特别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这对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搞好对党员的管理和监督，就要对党员中的问题敢抓敢管，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此，一方面不断清除思想障碍，提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觉性，克服“遇到矛盾绕道走，是非面前不开口”和讲面子不讲真理、讲关系不讲原则的不良倾向，破庸俗关系学和好人主义以及怕伤和气、怕丢威信、怕打击报复等思想顾虑，在党内形成以讲党性、讲原则为荣，讲情面、讲关系为耻的良好风气。另一方面注意划清是非界限，坚持正确的批评方法，主要是划清坚持原则敢于批评与无限上纲的“左”的做法的界限，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与搞一团和气的界限，做到对党员的缺点、错误既敢于大胆揭露、严肃批评或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又热情诚恳、不借机整人，真正达到帮助人、教育人、挽救人，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的目的。对严重违犯党

的纪律的党员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以保持党组织的纯洁巩固。

发扬党内民主，调动全体党员的积极性。有了健全的民主制度和民主作风，拓宽了民主渠道，才能实施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有效监督。各级党组织比较注意以下三点：（1）教育党员珍惜应享有的民主权利，增强党内平等观念和参与管理党内事务的意识；同时教育群众关心党的建设，增强敢于对党员进行批评和监督的责任感，使之有意见乐于向党组织提出。（2）建立健全民主机制，在搞好党委、支部内部监督的同时，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动群众评议党委、评议支部、评议党员，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使党员和群众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能通过正常渠道反映问题，提出批评或建议。（3）领导干部自觉破除特权思想，不做特殊党员，带头形成接受群众批评监督的融洽环境，主要是尊重党员的批评建议权、检举控告权、表决和选举权、申诉辩护权等民主权利；对党内的一些重大问题、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或共同关注的问题，在决策过程中尽量增加公开程度和透明度；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闻过则喜，真心实意抱欢迎态度，不求全责备，不计较批评的场合、分寸和态度，更不能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或刁难，改变“我说你听”的单向模式，在融洽的气氛中搞好思想的双向交流。

#### 四、宣传党员的模范事迹

一九五二年八月，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经常收集和表扬共产党员模范事迹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经常收集和宣传有自我牺牲精神，模范执行党的政策纪律，工作一贯努力，廉洁奉公，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虚心学习，不断进步，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突出成绩的党员的先进事迹，用以教育党员和群众。各部队根据这一要求，几十年来，广泛宣传了本单位的党员模范事迹。他们中既有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杀敌的战斗英雄，也有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作出重大贡献的模范人物；既有年轻的新党员，也有久经考验的老党员。他们的先进事迹，成为广大党员和群众学习的榜样。

战斗英雄杨根思、黄继光等光辉形象鼓舞着广大党员冲锋陷阵，英勇牺牲；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事迹，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党员、好干部；“热爱海军事业的模范共产党员”萨本茂、“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模范共产党员”贺先觉等一大批科技战线的优秀党员，激励着广大党员大胆创新、刻苦攻关，为国防现代化努力奋进。许多老党员始终保持着革命者的光荣本色，原总参谋部顾问、红军老干部孙毅，战功卓著不居功，身为高级干部不特殊，严于律己，助人为乐，离休以后仍深入部队、地方院校讲传统，讲作风，被十多所大、中、小学聘请为校外辅导员。原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李贞，是参加过秋收起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将军，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多次把节余的工资捐献给儿童福利事业和教育、科研事业，他们的模范事迹，受到广泛的尊敬，成为党员学习的榜样。

每年结合纪念“七一”，各单位都评选和宣扬一批优秀党员的模范事迹，这对于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党的领导，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 第四节 整党整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党组织进行过多 40 次整党整风。

解放战争在大陆取得胜利之后，人民解放军中的广大党员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完成各项战斗任务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但也有一部分党员以为革命已经成功了，滋长了和平麻痹思想，松懈了战斗意志有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贪图安逸，追求享受，有的甚至贪污受贿，蜕化变质。一部分领导干部滋生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针对这些情况，军队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五五年五月《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立即在全军进行了一次整风运动，重点整顿干部作风，提高党员的战斗意志，克服和平麻痹思想。至同年冬整风基本结束。这次整风对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与军队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转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次整风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开展得不够普遍和深入。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全国开展了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军委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结合“三反”中揭露出来的问题，发出《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一九五二年二月至四月，军队各级党组织又进行了整顿。整顿中，各部队党组织按照党员标准各项条件，对党员进行了审查和处理，对不具备党员条件经教育无效的党员劝其退党；将严重贪污腐化分子、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清除出党。通过认真的教育和整顿，提高了党员的觉悟，纯洁了党的组织，改善了领导作风，进一步提高了党的威信。

一九五三年冬至一九五四年三月，全军进行了以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中心内容的整风，集中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以及居功骄傲、骄情、骄奢、骄横的行为。

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阶级斗争还将在中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解决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这一指示开展了整风，在反对官僚主义，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增强内外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反对个人主义等不良倾向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整风中还进行了部队工作的 8 项整改，即：反对浪费，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家属还乡，改造思想，整顿纪律，改进工作，调整关系。但由于后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这次整风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

从一九五七年全党整风之后至“文化大革命”之前，解放军党组织还多次进行整风。其中，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一九五八年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一九五九年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一九六〇年林彪错误地搞所谓“端正军队政治工作方向”，给军队中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造成损害，伤害了一大批干部，是军队党的建设中值得记取的严重教训。一九六二年贯彻中共中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也是以整风的形式进行的。这次整风，强调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活跃党内民主生活，对前几年政治运动中处理错了的或基本处理错了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不留尾巴，对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起到了较好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中党的组织根据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和毛泽东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五十字建党纲领”和“吐故纳新”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整党建党座谈会的要求，于一九六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七一年三月进行了整党建党。这次整党建党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作为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停止的党的组织生活的一个步骤。它把批判所谓“走资派”及其他“坏人”，作为整党的一个必经阶段，在军以上机关、院校和文体单位等，错误地批判、处分了一批领导干部。整党中搞的所谓路线分析、以人划线，对党的团结统一造成了不良影响。在这次整党建党中，极少数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混入了党内，给军队党的建设造成了损害。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从一九六一年一月起，在全军开展了“批陈整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集中批判由陈伯达、林彪等鼓吹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这对于提高广大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九·一三事件”后，根据中共中央同年十二月十日的通知精神，在全军开展了“批林整风”。重点是学习讨论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清查军队中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这对于纯洁军队中各级党组织，保证各级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

由于受到“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整风的效果受到严重影响。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全军各级党组织深入系统地揭发批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彻底清查与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拨乱反正，肃清“文化大革命”

“左”的流毒影响，取得很大成绩。一九八二年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以“把党的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为目标，用三年时间对党组织进行一次全面的整顿。一九八三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对整党的任务、方针、政策和基本方法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同年十月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全军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通知》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搞好这次整党，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特别是把‘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清理出来，对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枪杆子牢牢地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对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次整党从一九八三年冬季开始，分两期由上而下梯次展开。第一期由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工委、军事科学院、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党委和机关党组织进行整党；第二期分两批，第一批为军、师级党委和机关党组织进行整党，第二批为团级以下党委和党支部进行整党，至一九八七年春结束。整党中，全军遵照中共中央整党决定的精神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关于“以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整党”的指示，进行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统一了对

---

“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坚定了与中共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决心，增强了军内外的团结；各级党委和支部对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进行了检查和整顿，促进了领导班子建设；清理了“三种人”和其他有严重问题的人，纯洁了党的组织，同时清理整顿了军队办的公司、企业，严肃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这次整党，改变了以往曾发生过的“左”的做法，积累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新经验。但是，由于后期未能很好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对不正之风纠正不够有力，使作风的整顿出现了前紧后松的现象。

中国人民解放军整党整风的历史经验说明，在正确思想指导下，整党整风对党的建设可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整党整风就会混淆矛盾，伤害党员，对党的建设造成严重危害。军队几次整党整风的主要经验教训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认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着眼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

人民解放军在整党整风中，都比较注意组织各级党委、支部成员和广大共产党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五十年代初的整党整风，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规定的文件，联系实际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居功骄傲、贪污腐化的教育，对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八十年代的整党，这一点更为突出。首先，把学习贯穿于整党的全过程，使整党的每个阶段都在正确的理论、思想指导下进行，并用革命理论剖析揭露出来的问题，避免就事论事，达到从根本上提高党员政治素质的目的。如在第一期整党中，领导干部带头读书，学习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邓小平文选》、《党员必读》和中共中央规定的其他学习文件，共约100万字，有效地提高了理论水平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其次，注意防止“左”的和右的影响，认真统一思想。整党中坚决贯彻执行军委主席邓小平关于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指示，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使整党遵循正确的方针和方法进行。广大党员通过系统学习和思想清理，既肃清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思想影响，又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大力提倡大公无私、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把思想统一到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第三，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思想教育的核心内容。针对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的条件下出现的共产主义思想淡薄，只讲“实惠”、不讲奉献和不能正确使用手中权力等问题，引导党员按照党的宗旨规范自己的言行，从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高度，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关系，自觉接受新的考验。

### 二、正确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既要和风细雨、与人为善，又要讲真理不讲面子，只有这样做才能既解决问题，又不伤害党员。五十年代初期的整党整风强调“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比较正确地运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而自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之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对党员进行过火斗争，以至

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残酷斗争，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和“治病救人”的方针。在八十年代的整党中，中央军委领导反复强调，要恢复延安整风的优良传统，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解决问题。许多单位在整党中对党员摆出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发表的意见，实行“四不、四允许”的政策，即：不抓辫子、下树靶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允许收回、允许改正、允许申辩、允许保留。在学习中运用“四式”（讨论式、研究式、交谈式、启发式）的方法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大家的“扣子”大家解，使学习出现了畅所欲言的生动活泼的局面。为了消除党员之间的隔阂和互相戒备的心理，做到互相启发帮助，开展了广泛谈心活动，为解决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和环境。但是有些单位在摒弃了“过火斗争”的做法后，又产生了忽视批评的倾向，缺乏原则性，或者原则空气不浓，思想不见面，谈心不交心，使有些问题解决得不够好。因此，在防止“左”的一套做法的同时，还要反对自由主义等庸俗作风，使整党保持应有的原则空气。许多单位正确地开展批评的经验是：既不搞人人过关、大轰大嗡，又教育党员严格解剖自己，自觉进行自我批评；既不搞无限上纲，过火斗争，又对问题的性质、危害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不追不逼，耐心等待，又积极启发犯错误的党员端正态度，自觉改正错误；既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允许被批评者讲话，又严肃党的纪律，实事求是地进行结论处理，达到教育人和团结人的目的。

### 三、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坚定慎重地进行组织处理

各次整党整风都曾郑重地提出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的问题。但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则是受当时政治路线制约的。自反右派斗争到七十年代前期的各次整党整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主观地规定批判对象的比例，使许多党员受到打击，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八十年代的整党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清理工作“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既不可漏掉，又不要扩大化”的方针，吸取了历史上的教训，彻底摒弃了大轰大嗡的做法，自始至终在调查研究上下功夫，不搞群众性的揭发检举，不先定性后找材料，不提指标，不造声势，对审查对象不开批斗会，不搞隔离审查，不搞“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党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属于一般性的错误，在党员登记前及时予以解脱；犯有严重错误过去已作处理，这次整党又未发现新问题的，就不再作为问题提出；问题尚未查清的，待问题查清后再讨论是否予以登记或执行纪律，不急于进行处理。结论处理意见和所依据的材料都同本人见面、核实，听取本人的意见，使结论定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整党后期，把组织处理同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帮助犯错误的党员认识错误，吸取教训。结论处理后能工作的分配工作，尽量发挥其专长；不能工作的也进行妥善安置！对家属子女不株连，不歧视。这样做，避免了消极影响，并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四、边整边改

---

不抓辫子、不树靶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整党中正确对待党员思想认识问题的形象说法。即：对思想认识问题，不抓住不放，不搞典型批判，不进行过火斗争，不把材料存入档案；通过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思想认识。

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整党整风都比较注意这个问题。在八十年代的整党中，各单位把群众提出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属于对个人的意见交本人作为检查时的参考，属于工作上的意见则分门别类交有关部门提出整改方案，凡属本单位职权范围内的问题能改的立即改正，加以权谋私、官僚主义、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以及涉及群众生活、工作等方面的问题，都及时进行整改；对重大问题的改革，则经党委研究提出改革方案或提出建议报请上级党委审定。通过边整边改，使党组织改善和加强了领导，使广大党员实际地看到了整党的实效。

## 五、加强领导

每次整党整风，各级党委都很重视，不断加强指导。八十年代的整党，整党前对本单位党员的思想状况和党的组织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弄清存在的问题，使整党有的放矢；在整党全面展开前强调未整先学和未整先改，通过学习提高思想认识，使党员对整党有较好的思想准备，发现问题能改的立即改正，为整党创造良好气氛；选择有代表性的党委和支部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再全面展开；领导带头，党委和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先走一步，为下级做好样子；依靠各级党组织领导本单位的整党，改变以往上级派工作组包办代替的做法，调动了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增强了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在整党的全过程中，中央军委领导人多次听取汇报，召开会议，及时解决整党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经常检查情况，交流经验，保证了整党健康的发展。

## 第十二章 军队中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是依据中国共产党的章程、重要规章制度和军队中党的建设的实际需要建立的。军队中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各单位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的检查机关，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军队中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党的其他规章制度，检查监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军委的决议、命令、指示以及上级党委与上级纪委决议的贯彻执行，保证党组织和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协同政治机关对党员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检查、处理党组织和党员违犯党纪的案件；按照党的政策和批准权限，决定、改变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对同级和下级党委及其成员执行民主集中制、遵守党纪以及廉政建设等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受理对党组织和党员违犯党纪的检举和控告，受理党员的申诉，查处对党员的打击报复和诬告陷害等问题，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力，它的主要职权是：对本单位所属党的组织和党员违犯党纪的行为，有权进行检查；如发现同级党委及其成员违犯党纪国法，应当向同级党委提出，在同级党委不予解决或不于正确解决时，有权向上级纪委报告，请求协助处理；对同级党委处理案件的决定有不同意见，可以请求上一级纪委予以复查；上级纪委有权派委员参加并指导下级党委（常委）的民主生活会，上级纪委有权批准和改变下级纪委对于案件所作的决定，所要改变的决定，如果已得到下级纪委的同级党委批准，这种改变必须经过上级纪委的同级党委批准。

## 第一节 纪律检查工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开始建立时，就把维护党的纪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及来源，提出了纠正的方法。随着《决议》在红四军的实行，党的纪律和红四军的团结统一得到了有力的维护。一九三三年，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设立党务委员会的决定，在总政治部及军区、军团、师、军分区、总兵站、直属医院政治部中均设立党务委员会。党务委员会讨论和决定关于破坏党章、党道德的处理，以及接收党员与处分党员的一切事项。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规定军队中党务委员会必须选举产生；对党员的纪律处分，要通知本人和有关人员到会，作出书面决定，口头决定无效；要把党纪同军纪、政府法律区别开来，并正确执行；要保障党员权利，监督党员履行党员义务。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使全党全军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统一和团结，丰富了在革命战争条件下开展党的纪检工作的经验。

革命战争时期，军队中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主要由党务委员会或政治机关管理，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并为新中国成立后军队中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部队中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问题的指示》后，团以上单位党的纪委相继建立。全军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由总政治部主管。

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央和地方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中央和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根据会议决定，总政治部于同年九月七日发出《关于军队成立监察委员会的通知》，规定全军在团以上单位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各级监察委员会在上级党的监委和同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国共产党解放军监察委员会（简称解放军监委），由罗荣桓任书记，谭政、宋任穷任副书记，在中央军委、中央监委及总政治部领导下负责全军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总政治部组织部具体承解放军监委的日常工作。军队中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成立后，原来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撤消。解放军监委工作重点在于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特别是对高级干部的监督，主要监督他们有无违反党的路线、政策、章程和违犯党的纪律、国家法律、法令的行为。一九五七年九月，解放军监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结合军队实际情况，制定了《关于军队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工作概则（草案）》，对监委的领导体制、任务、职权以及工作制度都作了具体规定。

解放军监委成立后，其领导人有过几次变动。一九五七年二月，谭政任书记。一九六一年初罗荣桓任书记。同年六月，罗荣桓在解放军监委第三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就党的监察委员会不仅是执行纪律，而且还要维护民主的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坚持和维护了党的纪检工作的正确方向。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加强军队中党的监察工作的指示后，军队各级监委适当地扩大了委员名额；建立了经常的工作制度；加强了对同级机关干部党员、特别是团以上干部党员的监督；各级党委加强了对同级监委的领导，定期听取监委的工作汇报和讨论监委的工作。部队中党的监察委员会的工作进一步加强。

在十年动乱中，党的监察机关遭到全面破坏，解放军监委和三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各军区、军兵种系统党的监委均被取消，部队党的纪检工作受到损害。

十年动乱结束以后，通过深入揭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深刻地认识到，整顿军队必须整顿党纪，端正党风，这是医治“文化大革命”给军队造成的创伤，加强军队中党的建设的关键之一。

一九六八年九月，中央军委根据中共“十一大”通过的党章的要求，决定全军团以上单位成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九八一年一月，中国共产党解放军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同年十月改称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纪委），甘渭汉任书记。一九八五年三月郭林祥接任书记。中央军委纪委是全军党的最高纪律检查机关，在中央军委和中央纪委的双重领导下，和总政治部共同负责全军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军以上单位党的纪委没有常务委员会、书记、副书记、专职委员和专门办事机构，师以下单位党的纪委成员由本单位担任军事、政治、后勤工作的党员干部兼职，具体业务由师、团政治机关的组织部门管理。

军队各级纪委重建以后，根据党章的规定和中央军委、中央纪委的要求以及军队的实际情况，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中央军委纪委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纪律检查委员会条例》，对新时期军队中党的纪委的组织体制、选举办法、职权范围、任务和自身建设作了规定。在《条例》指导下，各级纪委的建设逐渐完善起来。



## 第二节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纪律检查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纪律检查工作。一九五五年五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德在中央直属系统（包括军队）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联席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由于我党领导中国人民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成为这一政权的领导党，……因此，坚持铁的纪律，加强党的纪律性，在今天就更有特殊重大的意义。”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军队中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围绕维护和加强党的纪律，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 一、检查处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

（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中的案件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底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情况表明，军队中绝大多数党员是廉洁奉公的，但是也揭露出一些问题。如有的党员干部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挥霍国家资财；有的党员干部贪污盗窃，接受贿赂等。各级纪委依据政策，对有一般错误的党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对有严重错误的党员执行了纪律，对触犯刑律的党员予以清除出党并提交军队政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使广大党员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党纪教育。

### 二、检查处理腐化堕落等违法乱纪案件

部队入城以后，在党员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党员干部中，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的案件有所增多，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上半年一年半内，总政治部直接受理的师以上党员干部违法乱纪案件有30%属于这类问题。为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等违法乱纪行为，一九五四年八月，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决定对全军高、中级干部的生活作风和道德品质状况进行一次严格的检查。至一九五五年十月，全军查出犯有道德品质错误的高、中级干部160人，根据他们的错误性质、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和党纪处分，并总结了经验教训，把反对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确定为纪律检查工作的一项经常性任务，加强了对高、中级党员干部的监督和管理。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四日，总政治部进一步采取措施，坚决制止某些高级干部的腐化堕落行为，要求师以上党委加强学习，深刻认识不坚决制止腐化倾向执政党搞不好，也可以亡国的严重性，联系实际进行检查，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从而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

### 三、严格政策纪律，保证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为保证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中顺利贯彻执行，军队中党的各级纪（监）委在协助党委协同政治机关对党员干部进行政策教育的同时，严肃认真地开展了对违反党和国家政策案件的查处工作。

一九五四年二月，总政治部转发了《华东军区党委和纪委关于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中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指示》；同年十月，发出了《关于执行棉布统购统销政策中纪检工作的指示》。两个《指示》要求各级纪委对党员中发生的违反政策的案件进行认真的查处。据统计，华北军区、空军、公安军、总后勤部等单位查出这一年发生违反粮食政策的案件共有128起。这些单位纪委对犯错误的党员，均按其错误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和党纪、军纪处分。与此同时，各级纪委对党员深入进行了政策纪律教育，提高了广大党员执行和维护党的政策纪律的自觉性。许多党员写信教育和勉励家属亲友遵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国家发生严重经济困难。为保证军队人员严守政策纪律，解放军监委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发出通知，要求党员认清形势，顾全大局，遵守纪律，不走后门购买紧俏商品，不搞特殊化。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从元帅到士兵，节衣缩食，勤俭建军。许多身经百战的老将军、老党员深入连队，与战士同吃、同住、同操练，带头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一九六三年三月全军开展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以后，解放军各级监委积极做好运动中的纪律检查工作，认真查处党员干部中的生活特殊化、铺张浪费等问题，及时进行政策纪律教育，促使部队在厉行增产节约，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大力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等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 四、整顿组织纪律

一九五七年解放军监委调查了部队党员干部的组织纪律状况。当时，绝大部分党员干部的组织纪律观念是强的，但是，在少数党员干部中出现了纪律松弛的现象。比如：成都军区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抽调3300名干部去康定、凉山等艰苦地区工作，其中有5%的人不服从分配；有的党员干部闹军衔、闹级别、闹地位，追求个人名利，公开向组织伸手；有的革命意志衰退，非病、非残却长期住在招待所和疗养院不干工作；等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现象，解放军监委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向中央监委报告后，在全军进行了一次纪律整顿。部队各级政治机关和党的监委对所属单位纪律松弛的问题作了检查，认真清理了长住招待所、疗养院不干工作的人员，对问题较多的分散单位进行了整顿，对极少数严重无组织无纪律的人坚决执行了纪律。

经过检查整顿，部队中的纪律松弛现象得到了纠正，党员的纪律观念得到增强，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优良传统得到发扬。整顿纪律后的一九五九年，全军有27.8万余名干部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下连当兵和赴农村帮助工作。

除开展以上工作外，军队纪（监）委还对土地改革、镇反、肃反等运动中极少数有抗拒土改、包庇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等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了检查处理，清除了极个别混进军队党组织的反革命分子，纯洁和巩固了军队党的组织。

这一时期，军队中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也存在一些偏差。自五十年代后期

起，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也影响到军队中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主要是政治运动中党纪处理工作存在“左”的偏向，处分错了一些人，伤害了一些干部。如，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搞了扩大化，全军有上千名党员干部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一九五八年开展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错误地批判了一些领导干部；一九五九年进行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又有上千名党员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不少人被错误地给予党纪处分。虽然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监委的指示，曾对运动中一些被错误处理的党员进行过甄别平反，对被错划为右派的干部进行过“摘帽”工作，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甄别平反工作不彻底，使一些冤假错案遗留下来。“左”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顶点，造成了更多冤假错案，教训极为惨痛、深刻。

### 第三节 新时期的纪律检查工作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军队中党的纪检工作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军队中各级纪委遵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精神，依据邓小平关于“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的指示，围绕完成新时期军队建设的各项任务，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 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广大党政军干部进行残酷迫害，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军队中许多高级干部，包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被无辜戴上“军阀”、“土匪”、“军内走资派”、“带枪的刘邓路线”以及“叛徒”、“特务”、“反革命”等政治帽子，受到迫害。有的被长期隔离，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迫害致死。不少党员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他们的配偶、子女和亲友也受到株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正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就“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军队重要领导人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平反问题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随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先后为军队中一些领导人作出了平反决定。一九七九年三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彻底平反的决定和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同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五月，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撤销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报告，为受《纪要》影响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平反；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林彪、江青等人蓄意制造的矛头直接指向曾在华北地区担任过主要领导的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杨成武及当时北京军区一部分主要领导人的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冤案公开平反；一九八〇年五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平反的通知；七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肖华平反的通知；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案彻底平反；一九八二年十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为贺龙彻底平反的决定，等等。

这一时期，军队各级政治机关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和反右派、“反教条主义”、“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的大批冤假错案和历史积案，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和处理。据统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2.6万亲人得到了平反昭雪。各级纪委复查“文化大革命”前历史遗留案件40519起，其中全错全平或撤销原结论和处分的占49.2%；部分错部分改正的占11.6%；维持原结论处理的占39.2%。被错划为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中右”的党员，均得

---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37页。

到彻底平反。各级纪委在复查工作中坚决、彻底纠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从实际工作方面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对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促进安定团结，推进军队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 二、审理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菜有车连的党纪案件

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军队中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对军队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以下简称“两案”）有牵连人员中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党纪案件进行了审理；审理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以政治斗争的办法处理问题的指导思想和“从宽从缓”的方针，以事实为结论定性的依据，组织处理充分考虑“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掌握政策界限，区别对待。经过审理，少数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受到了党纪、军纪处分，这部分人约占受审查人员的7.9%；多数人属于说错话做错事等一般性错误，未受处分。实践证明，慎重稳妥地做好与“两案”有牵连的党纪案件的审理工作，对于肃清林彪、江青的流毒，教育犯错误的人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一九八三年十月至一九八六年底的整党中，全军在“两案”审理的基础上，进行了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军队中党的各级纪委本着“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既不可漏掉，又不要扩大化”的方针，协同政治机关作了大量工作。各级纪委对清查出来的“三种人”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严重错误的党员给予了必要的党纪处分，其中被开除党籍的72人。这次清理，是为纯洁组织，加强干部、党员队伍建设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 三、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有关规定，纠正不正之风

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作了《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报告，军队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和讨论了这一报告。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中央军委于十二月十九日相应作出《关于军队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规定》对军职以上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从住房、营具、公勤人员编配、交通工具、出差、出国和外出疗养、文化娱乐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要求所有高级干部自觉遵守，对违反规定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对错误严重、情节恶劣的要给予纪律处分。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并向全党颁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军队各级党委和纪委组织部队认真学习贯彻。军内许多老干部带头执行《准则》，在广大党员干部中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同年，中央军委纪委和各大单位纪委对军职以上干部执行《规定》、《准则》的情况，普遍进行了检查，对少数违反《准则》和《规定》的，坚决做了纠正和处理。

一九八三年初，全军各级纪委和后勤部门密切配合，检查处理了部队建房和分房中的不正之风。一九八四年整党期间，中央军委纪委在部队中先后进行了纠正少数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和克服官僚主义的工作，同时还查处了一批严重弄虚作假的案件。

一九八六年一月四日，总政治部、军委纪委联合组成全军端正党风办公

室，指导全军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端正党风要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从查处具体案件入手，重点解决严重以权谋私、严重官僚主义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和中央军委关于端正党风军队要走在前头的要求，军队端正党风工作取得比较明显效果，领导作风有所改进，严重不正之风得以遏制。在此期间有 260 名党员干部其中包括一些中高级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一九八七年，全军各级纪委认真贯彻全国纪检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机关端正党风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突出抓了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和基层党风建设。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的指示，各级纪委从部队的实际出发，认真探索研究并制定了加强党内纪律监督的试行办法或暂行规定。军委纪委在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各单位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加强军队党内纪律监督的暂行规定，对各级党组织加强党内监督，抓好党风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 四、保证全军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提出：“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这一点在现在特别重要。谁要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到党的纪律的处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要把这一点作为当前的重点。”军队各级纪委为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肃查处了部队发生的政治性案件。一九八一年冬，河北省鸡泽县武装部军械库临时工郜怀明，携枪窜到某炮团进行反革命煽动，反对中共中央的现行政策，谎称自己是所谓“新中央委员会特派员”，要“另立中央”，“成立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团的政委祝福祥严重丧失立场，对部的煽动竟信以为真，予以接待；被郜胁迫召开了领导干部会。北京军区党委对这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作了严肃处理，将郜怀明移送地方法办，开除祝福祥党籍，撤销行政职务。总政治部向全军通报了这一严重政治事件。中央军委纪委就此严重事件指示部队各级纪委，对团以上单位党委和团以上领导干部在遵守党的纪律方面的状况进行普遍检查，总结经验教训。根据总政治部、军委纪委的要求，各部队进行了党的政治纪律的教育，切实提高党员、干部同中共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的自觉性。

一九八三年十月开始，军队纪检部门根据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要求，配合政治机关对于部战士进行了正面教育，检查处理了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邓小平在同中共中央领导谈话时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中共中央通知精神，一九八七年一月至二月，中央军委纪委先后发出两个通知，要求全军各级党组织，充分认识中共中央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性和长期性，把维护党章、维护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一项大事切实抓好；要求共产党员必须遵守党章，自觉用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规范自己的言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军委纪委还派出 3 个工作组，到部队了解检查遵守政治纪律的情况，并帮助一些单位总结和推广了坚持正面教育的经验，各级纪委严肃

查处了违犯政治纪律的人和事，纯洁了党的组织，保持了部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

## 五、查处经济案件，加强廉政建设

在改革开放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经济领域里的违法乱纪案件增多。针对这一新的情况，军队各级纪委把查处党员违法违纪的经济案件作为军队中党的纪检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九八二年初，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和决定，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委成立了全军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指导。部队各级纪委在同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协同保卫、检察、审判部门投入了查处经济大案要案的工作。到一九八三年底，全军共揭发出大案 174 件，主要涉及走私贩私、行贿受贿、贪污盗窃、投机诈骗、非法经商、偷税漏税等方面的问题。某步兵团领导班子中几名主要成员长期进行严重经济犯罪活动，这个部队的领导机关由于存在官僚主义、爱看表面文章的恶劣作风，不仅没有发现问题，反而把这个团树为“先进团党委”、“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单位”。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委向全军通报了这一事件和这个部队党委总结的经验教训。全军许多单位在查处经济案件的同时，认真检查和纠正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健全财务和物资管理制度，以堵塞漏洞。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总政治部、中央军委纪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和中央纪委关于纠正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风的通知，结合部队实际联合发出通知，要求部队检查和纠正生产经营中的违法乱纪行为和不正之风。截至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全军先后撤销、停办了 698 个不符合政策规定的公司或企业。

一九八六年二月，各级纪委协同审计、财务部门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共同负责组织开展了全军财经纪律大检查，查处了一批违犯财经纪律的问题和案件，追回贪污盗窃和私分的公款 350 万元，追回因滥办公司经商被骗的资金 1 亿多元。同时整顿了财经纪律，严格了规章制度，使全军的财经纪律得到加强。

## 六、保证军队改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军队在编制体制、教育训练、政治工作、后勤保障、国防科研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各级纪委把支持和保证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一九八四年十月和一九八五年五月，中央军委纪委先后召开二届二次全会和全军纪律检查工作会议，分别研究纪检工作如何保证军队改革和精简整编工作顺利进行的问题，强调军队纪检工作要成为支持和促进改革的重要力量，要在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中进行坚强有力的工作，保证部队服从命令听指挥，坚决纠正不服从调动、不服从分配的现象，保证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坚决纠正任人唯亲等不正之风和处理财、物上的违法乱纪现象。各级纪委认真贯彻这两次会议的精神，对精简整编的单位早打招呼、早抓教育、早做工作，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做了及时的处理。在精

简整编工作中，军委纪委曾派出由专职委员带领的工作组，到撤销建制的两个军区检查处理某些机关及个别部门滥发钱物和突击提升干部职务、级别和在处理退役汽车工作中的问题。对某守备师在精简整编前夕滥发钱物、某省军区机关在精简整编前夕滥发营具、某机关在精简整编前突击提升干部等问题查清处理后，军委纪委先后发出《通报》和《通知》，要求各单位引以为戒，认真吸取教训，检查纠正存在的问题，保证精简整编的顺利进行。军委纪委还先后通报了黑龙江省嫩江军分区、齐齐哈尔市人武部在机构合并中严格纪律、自觉防止不正之风，某集团军一个师以良好的党风党纪保证部队顺利完成撤编任务等好的典型。由于认真抓了精简整编中的党风党纪工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战士顾大局，守纪律，坚决执行精简整编方案，几十万干部转业或离退休，自觉服从组织决定：几十万战士退伍走得顺利；几千个县级人武部顺利移交地方。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建设的各个时期和阶段，既有对实事求是、严肃慎重优良传统的继承，也受过“左”的影响，经验丰富，教训深刻。

第一，纪检工作必须忠实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和军队建设的中心任务。

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新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军队中党的纪检工作应当体现这个指导思想，这样才能从总体上把握纪检工作的方向，在保证党的路线的贯彻和军队中心任务的完成上有所作为，有所建树。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中各级纪委主要抓了维护党的政策纪律、查处贪污腐化案件、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等问题，成效明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军队中各级纪检机构十分重视在一些事关全局的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发挥作用，比如坚定地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证四项基本原则在部队贯彻落实；适应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强化组织纪律，保证部队精简整编任务的完成；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自觉维护全局利益，保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重大决策在部队落实。这样做，不仅使部队各级党组织得以纯洁和巩固，广大党员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经受住了考验，保证和推进了部队中心工作的完成，而且锻炼和提高了纪检干部，促进了纪委自身建设。在新形势下，军队纪检工作对于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和党对军队的领导，保证军队党组织的纯洁和巩固负有特殊的使命，必须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第二，纪检工作要把着眼点放在预防上，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帮助。

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党的高度集中统一，保证党组织的纯洁和巩固，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顺利贯彻执行。同时也是为了使党员少犯或不犯错误，能够健康地成长进步。从这个目的出发，纪检工作不能只在党员犯了错误以后才去处理，而应该早做工作，这样才会使党的事业少受损失，才是对党员真正的关心和爱护，只有把着眼点放在预防上，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帮助，不断增强党员的党性观念和纪律观念，党员遵守纪律才有牢固的思想基础。

把着眼点放在预防上，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帮助，要强调调查研究，针对党风中带倾向性的问题，抓住苗头运用正反典型进行教育，把大量工作做在案件发生和问题成风之前，从根本上减少违纪案件和不正之风的发生。

第三，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必须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建立党风建设和廉政



建设责任制，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

各级党委要把发扬优良传统、加强廉政建设、端正党风，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并列为党委民主生活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书记、副书记要亲自抓，定期组织检查，专题分析本单位的情况，找准问题，拿出办法，抓紧解决。各级纪委和政治机关要协助党委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其他各部门要共同抓。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业务部门和广大群众的作用，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党委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

建立党风廉政建设和廉政建设责任制，特别要强调谁主管谁负责。领导机关的各个部门对保证本部门、本系统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防止和纠正不正之风和违纪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机关部门特别是管理人、财、物的部门，处在一些不正之风的“风口上”，这就对这些部门发扬优良传统、加强廉政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以往的工作中，由主管部门负责，纪委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进行专项治理，认真纠正建房分房、财务和物资管理、征兵接兵等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些表明，机关各部门只要明确自己的责任，结合业务工作纠正不正之风，不仅能够全面履行职责，而且能在发扬优良传统、加强廉政建设方面抓到点子上，抓出成效来。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廉政建设，既要抓住倾向性的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专项治理，更要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要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建立和完善制约以权谋私等行为的机制，制定和完善党纪党规，健全对领导干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以及党委内部的监督制度，走出一条靠法制加强廉政建设的路子。

第四，把查处违纪案件作为严肃党纪的中心环节，坚决惩治腐败。

查处党员违纪案件是严肃执纪的中心环节，各级纪委应抓紧抓好。要重视查办大案要案，坚决查清和严肃处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重点查处违背党的基本路线，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抵制改革开放方针政策，干扰军队重大改革措施的案件；查处领导干部严重以权谋私、严重官僚主义、失职和渎职案件；查处索贿受贿、贪污盗窃，以及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等案件。

查办案件，必须坚持在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坚决抵制说情风的干扰。不管是哪一级干部，违犯了党纪，都要按党的纪律严肃处理。近几年来，军委纪委和各大单位纪委都严肃查处了一些高中级干部的违纪案件，按照党纪党规分别给予了党纪处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军委纪委就这方面案件的处理还向全军发了通报，这对维护党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查办案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严肃慎重、区别对待”等指导原则。在核准事实、检验证据、确定性质、研究处理等各个环节上，都必须准确、恰当、手续完备，真正经得起检验。

严肃党纪，不能停留在单纯办案上，而是要通过对具体案件的揭露和剖析，总结经验教训，研究预防措施，堵塞漏洞，健全制度，使查处一案起到教育一片的作用。

第五，正确执行党的纪律，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历史上发生的过火的党内斗争，伤害了许多好干部，破坏了党内民主，破坏了法制，也破坏了党的纪律。历史的经验表明，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仅是挽救犯错误干部的需要，也是教育全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需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有对党风形势的正确分析，认清党内大多数成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一定要严格区分、正确

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把党内的是非和敌我问题混淆起来，搞无限上纲、过火斗争。不能认为执行纪律“左”比右好，重比轻好。对党员所犯错误性质的认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对人的处理一定要持慎重的态度。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能偏离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原则，应坚持有错必纠。同时，必须坚决防止和反对执行党的纪律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对消极腐败现象惩治不力，对犯有错误的党员干部姑息迁就等倾向。

第六，端正党风严肃党纪必须坚持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起。

端正党风，严肃党纪，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是关键。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党风如何，对本单位本部门的风气产生直接影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培育了优良的传统作风，他们的模范行为，成为全军学习的楷模。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对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抓好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党风和廉政建设，就能克服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等腐败现象，防止严重损害党的威信和军队声誉的事件发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党委、纪委注意从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抓起；许多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坚持“横不攀，竖不比，老老实实正自己”，使全军党风和廉政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加一九八五年，北京军区某集团军新一届党委组成后，宁肯揭露问题挨批评，也不弄虚作假图表扬，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坚决揭露和纠正，走在了端正党风的前列，受到了广大官兵的一致赞扬。广州军区某集团军省委常委“一班人”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对家属子女严格要求，使其不做“特殊人物”；对部属敢抓敢管，法纪严明。这些单位领导行得直，部队风气正，军内外反映很好。实践证明，发挥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既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也是新时期发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迫切要求。从领导机关做起，从党委正副书记、党委自身做起，自上而下地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就能把各级机关和各级干部都带起来。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自查自纠，就能为下级做出好样子。

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发挥表率作用主要做好以下几点：

(1) 严格教育和要求，要求领导干部带头执行党章和《准则》，首先管好自己，管好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还要对本单位的不正之风敢抓敢管。(2) 严格管理和监督。包括组织监督、群众监督，主要是搞好党委自身的监督。要求领导干部认真执行过双重组织生活的规定，既要参加党委民主生活会检查廉洁自律的情况，又要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定期汇报思想和保持廉洁的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把领导干部自身和所在单位的廉政状况，作为领导干部述职和对领导干部进行考察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级管人、管钱、管物的部门和人员，自觉接受监督检查，主动抓好本部门、本系统的廉政建设。(3) 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对严重违纪的干部，该给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不搞“上宽下严”；不能因为是领导干部，是领导机关的干部而姑息迁就。

第七，不断加强纪委和纪检干部队伍自身建设。

军队各级纪委及其办事机构是维护军队党纪的职能部门，是同级党委在党风建设方面的有力助手。“打铁先要自身硬”，搞好军队的党风建设，首先要把各级纪委和纪检部门建设成为维护党纪、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坚强集体。在新时期要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加强纪检工作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

究，摸索改革开放条件下纪检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增强纪检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要逐步制订和完善各级纪检部门的工作条例，从制度上加强各级纪检机构的建设。

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不断提高纪检干部的素质。多年来，在实际工作中锤炼了一批党性强、作风好、铁面无私的优秀纪检干部。他们在工作中坚持原则，一身正气，敢于碰硬，顶住各种压力，同不正之风作坚决斗争。他们宁可个人受屈辱，也不让党的形象受损害，宁可得罪人，决不辜负党，为端正党风，严肃党纪，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作出了贡献。实践证明，无私无畏，才能排除阻力，秉公执纪；畏难手软，计较个人得失，纪检工作就寸步难行。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要把纪检干部队伍建设得政治上更加坚定，作风上更加过硬，业务上更加精通。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头脑，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改革开放意识，克服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旧思想、旧观念，防止用老眼光观察事物。要围绕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和部队中心任务，不断提高政策水平、业务能力，在军队党风党纪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加强纪检队伍建设，做好纪检工作，要靠党委的重视和支持。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查处违纪案件的任务十分繁重，只有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机关各部门一起抓，纪检工作才有战斗力。党委加强对纪检工作的领导，主要是经常听取纪委和纪检部门的工作汇报，研究决定纪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积极支持纪检部门履行职能、大胆工作，对大案要案，党委主要负责人要亲自过问，支持纪检部门排除阻力，秉公执纪。要为坚持原则的干部撑腰，保护广大纪检干部的积极性。重视发挥司、政、后机关各部门的作用，指导他们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抓好本部门、本系统的党风和廉政建设，同时根据业务部门的特点积极参与和配合做好纪检工作。如，军务部门把好征兵接兵和兵员调动关口，纠正兵员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和违纪问题；组织、宣传部门要抓好党风党纪教育；干部部门结合考察干部、配备领导班子，进行党风党纪检查；政法部门严肃查处违法案件并支持对违纪案件的查处；财务、审计部门定期组织财经纪律检查等。党委要重视纪检队伍的建设，健全纪检组织和纪检机构，选配好各级纪委领导班子和纪检干部，关心纪检干部的工作和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从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为纪检部门履行职责创造好的工作条件。

### 第十三章 干部工作

干部工作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军队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人民解放军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造就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据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统计，当时全军排以上干部共 96.7 万人。其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入伍的占 1.13%，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占 22.44%，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伍的占 60.39%。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他们南征北战，为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丰功伟业。新中国建立后，为适应军队建设发展的需要，人民解放军发扬干部工作的优良传统，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在选拔任用、培养训练干部和完善政策制度等方面不断取得进步，使干部队伍的“四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 第一节 干部的选拔和配备

“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人民解放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标准选拔配备干部，保证了干部队伍具有较好的质量，使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在军队中贯彻执行，各项任务得以胜利完成。

### 一、适应建国初期军队发展和国家建设需要，大量充实干部队伍

一九四九年底，人民解放军面临多方面的繁重任务，除了作战外，还要加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组建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特种兵和一批院校；总部领导机关需要充实和加强，同时还要向地方输送干部，支援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这就需要大批干部。当时，军队排级以上干部只有46万多人，显然是不够的。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总干部管理部于一九五一年提出了大胆大量提拔，宁弱勿缺、宁缺勿滥的方针。要求各级领导克服保守依赖思想，树立眼睛向下、自力更生的观念，尽快生长干部，补齐缺额。同时，坚持德才并重的原则，确实保证提拔干部的质量。按照这个精神，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军从战士中提拔了100余万名干部，从地方招收了30余万名青年学生培养成干部，同时还提拔了大批团级以上干部，使干部数量不足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在此期间，还从各部队抽调1万多名干部充实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机关和直属单位，组建了总干部管理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和武装力量监察部；抽调近20万名干部。包括随建制调配的干部，组建了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和防化学兵；抽调1万多名干部，组建了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军事工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等上百所院校；同时，还向地方输送干部83万余人。

为了保证提拔干部的质量，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在《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中对德才兼备的标准作了具体阐述：德，就是对人民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其主要表现：

- (1) 政治立场坚定，思想意识正确，作风正派。
- (2) 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个人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坚决执行命令。
- (3) 战斗勇敢，工作积极负责，能克服困难。
- (4) 学习努力，善于团结群众，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

才，就是完成工作的能力。其主要表现：

- (1) 具有现职工作能力，能熟悉业务，掌握技术，完成任务，总结经验；在工作中有创造性，并能经常向上级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 (2) 能了解情况，执行政策，掌握原则，正确地处理问题。
- (3) 有民主作风，善于走群众路线和培养与提高下级的工作能力。

在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大胆大量提拔干部的过程中，全军上下注意纠

正比军龄、比党龄、比级别的倾向，以能否胜任工作为前提，注重德才表现，资历服从标准；注意克服山头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强调对干部实行统一管理，强调“任人唯贤”，强调党管干部。这期间，军队干部工作的成绩是很大的，较好地满足了军队建设和支援国家建设对干部的需要。但工作中也有失误，主要是在一九五六年的一段时间内对有些干部没有进行全面细致考核，有少量基层干部选得不够准；提拔数量控制也不严，多提拔了一些干部，造成了某些单位干部超编。其后，又“冻结”了一部分原准备送学校培养后提拔任用的战斗骨干，使之多数作了复员安排，流失了一部分部队建设需要的人才。

## 二、大胆提拔新生力量，认真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工作

一九六〇年十月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提出，要大胆提拔新生力量，培养接班人。一九六三年二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总参谋长罗瑞卿提出：培养选拔接班人是当前部队建设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要提到战略地位来考虑，不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就有失传的危险。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的领导人都要极大地注意这个问题。总政治部于一九六三年五月七日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的《关于干部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写到：长期革命战争中培养的大批干部，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逐渐衰老，其中一部分由于年龄过大、身体过弱，坚持军队工作已有困难。全军1000多名将军中，基本失去工作能力或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约占五分之一；野战军军长、政委中因健康状况不好，不能继续在野战军工作的占29%；各级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和一九五五年授衔时相比，增长了约四、五岁。如果不及早把一些德才优秀的年轻干部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有计划地加以培养，当大批高级干部不能继续在部队工作的时候，中级干部大多数也超过服役年龄了。《报告》建议尽快把那些忠于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才能、有干劲、作风好的优秀干部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召开的全军干部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了接班人的培养选拔问题。会议要求各部队在一、二年内，要从德才优秀的干部中选拔一批40岁以下的师长、师政委，35岁以下的团长、团政委，32岁以下的营长、教导员，28岁以下的连长、指导员。有些德才优秀的干部还可以从下级正职直接提拔为上级正职。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的重要讲话。他指出：革命接班人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团结那些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有事要同群众商量，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人家讲出来；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总政治部对照检查了全军培养选拔接班人的工作，提出了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并于一九六四年八月向中央军委作了专题报告，中央军委于同年十月将这个报告批转全军贯彻执行。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全军共选拔师以上干部4000多人，其中军级单位军政主官（包括海军基地司令员、政治委员）60多人，军长、军政委中，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占半数，平均年龄为47.6岁。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干部已开始进到师级领导班子，建国初期入伍的干部开

始进到团级领导班子。全军出现了一批 40 岁以下的师长、政委，35 岁以下的团长、政委，31 岁以下的营长、教导员，25 岁以下的连长、指导员。三年内从士兵中选拔基层干部 17 万人，从学校培养生长干部 2 万多人。这一时期选拔培养接班人的工作，总的说来是好的，选拔的干部绝大多数政治素质比较好，实际工作能力也比较强。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在选拔接班人时过分强调了干部的阶级成份、历史问题和社会关系，一度在部分干部思想上引起了混乱，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虽然总政治部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九日发出了《关于选拔、使用干部时正确对待出身成份社会关系和政治历史问题的指示》，但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左”的思潮进一步发展，上述不正确的做法变得更加严重。

### 三、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整顿调整各级领导班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干部工作的传统作风、政策制度、规定受到了很大破坏。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十三日林彪 3 次讲话谈到军队干部工作问题，提出了选拔干部的所谓三条标准，即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是不是突出政治，有没有革命干劲。这三条实际以“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人划线”等“左”的东西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标准。林彪甚至提出要对于部进行“全面考查、全面排队、全面调整”，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凡是拥护他们那一套的，站在他们一边的就是“头号大好”，就要大升大保；凡是反对他们那一套的，即所谓“站错了队”的，就要大整、大罢。结果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打倒了一大批军队领导人，打击迫害了一大批干部；提拔重用了一些投机分子和怀有个人野心的人，造成了军队干部队伍，特别是一些领导班子的不纯。

针对上述情况，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军队里的干部问题很值得注意。怎样按照选拔干部的条件去做，这很重要。提出要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和自上而下地整顿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要建立精干的、敢字当头的、强有力的各级领导班子，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调整和改组那些怕字当头的软班子、干劲不足的懒班子、闹不团结的散班子；要首先配备好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的领导班子和军级以上领导班子的军政一把手，然后配好师级以下的领导班子。

为了调整配备好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和总部的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牵头同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国防科委等 23 个大单位的主要领导协商，提出大军区级领导班子调整配备的方案。这个《方案》，重视对军政一把手和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的配备；对陷入派性或在一个地方工作时间过长的干部进行大范围交流；对有些越级提拔上来的干部“挂职下放”锻炼或降职使用。调整后的领导班子，政治上加强了，人员精干了，年龄相对年轻了。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方案。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调整是防止“四人帮”进一步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重大决策，是顺利粉碎“四人帮”并在斗争中保持军队稳定的重要条件。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央军委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召开军委座谈会，同年十二月召开军委全体会议，一九七八年四月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这些会议都强调要整顿、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把那些错误严重而又态度很坏

的人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决不能把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经常“造反”搞“地震”的人，看风使舵投机钻营的人，以及阿谀奉承、文过饰非的人配进领导班子；要把那些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人配备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一九七七年对一些领导班子作了调整。为解决机构臃肿问题，一九七八年作了大规模的调整。这次兵团级和军级领导班子调整的比例为53.2%；军区系统所属的师级领导班子的军政一把手调整的比例为46.7%。这次调整后，领导班子进一步纯洁了，特别是配强了军政一把手，增强了领导班子的核心作用，软、懒、散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变。野战军和省军区的领导班子基本上不再超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臃肿的问题。

#### 四、贯彻“四化”方针，全面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当时的干部队伍状况与军队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不相适应的，突出的问题是师以上领导班子老化情况比较严重。据一九七八年底的统计，兵团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为59.6岁，省军区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为59岁，野战军军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为54.8岁，军兵种军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为55.4岁。干部的文化程度和专业水平普遍较低。据一九八一年的统计，全军干部大专以上学历程度的只占9%，中专（含高中）占34.1%，初中以下占56.9%。在作战部队主官中受过本级院校训练的，军职占53.1%，师职占31.5%，团职占26.7%。对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适时提出了认真选拔好接班人，并逐步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人员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标准“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选干部“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

一九七九年九月，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军干部部长会议提出，对领导班子要进行自上而下的调整，选拔那些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大公无私，不搞派性的干部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师以上各级领导班子要配备必要的懂得专业技术的干部，特别要注意选拔年轻优秀的干部，实现作战部队干部的年轻化。此后，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又提出了领导班子调整配备的基本要求和目标。一九八〇年在广泛深入考核的基础上，对野战军和军兵种的兵团级及军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各大军区、军兵种对师、

---

邓小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177页。

邓小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177页。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286页。



团级领导班子也进行了调整。这次调整配备，注意选拔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对一部分年大体弱的干部作了适当安排。经过调整，野战军的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从 56 岁降为 54.1 岁，适龄干部占编制数的 50%；师级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为 48.9 岁，适龄干部占 60%；团级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为 40.1 岁，适龄干部占 90%。领导班子中还充实了一批懂专业的干部，野战军的班子中配备了懂炮兵、装甲兵的专业领导干部；空军航空部队的军、师主官都是能飞行的，绝大多数师长能带队升空作战；第二炮兵导弹部队团的领导干部中，懂专业的干部占三分之二以上。一九八二年，对大军区、军兵种、国防科工委的领导班子又进行了较大调整。有 53.2% 的干部退了下来。调整后的领导班子，平均年龄普遍下降 3 至 6 岁，专业化程度也有所提高，经过院校正规训练的干部达到 60%，领导班子人数也由平均 14 人降为 8.9 人。

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对领导班子的调整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是班子的“老化”、超编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知识化、专业化程度仍然不高。其原因，一是实现干部队伍“四化”的意义和迫切性还没有普遍被人们所认识，选拔干部冲不破论资排辈等老框框和习惯势力的束缚，不能开阔视野，从更年轻一些、经过院校系统培养的干部中选拔。二是经过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老干部重新安排工作，这一方面起到了落实政策、稳定局势、推动部队建设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离体制度实际上尚未真正建立和全面实行，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干部“老化”和超编的问题。同时，广大中青年干部长期任职较低或从事专业性工作，他们的知识才干未充分显示出来，领导和群众对他们不够了解，起用或重用他们的思想准备不足。

鉴于上述情况，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五年结合部队精简整编，对领导班子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调整，重点解决年轻化问题，同时注意知识化和专业化。中共十二大以后，邓小平提出：开创军队建设新局面，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实现领导班子年轻化，否则就难以为继。一九八三年三月召开的全军军级领导班子调整配备汇报会，认真总结了前几次调整配备领导班子的经验教训，提出要把眼界放开，路子拓宽，从年轻的干部中选优秀的。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研究了几十个军级领导班子、大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领导班子部分成员的配备方案。会后，相继研究了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国防科工委等单位的兵团级、军级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这次调整配备，使领导班子的成份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一，年龄明显下降。野战军军级班子，由调整前平均年龄 56 岁降为 48.1 岁；省军区领导班子，由 59.4 岁降为 52.9 岁；海军军级班子由 58.8 岁降为 53.2 岁；空军军级班子由 55.8 岁降为 49.6 岁；第二炮兵军级班子由 58.1 岁降为 50.5 岁，海军兵团级班子由 63.5 岁降为 58.1 岁；空军兵团级班子由 62.1 岁降为 55.5 岁。

第二，文化程度和专业水平有所提高。在野战军班子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从调整前的 2.9% 上升为 18.4%，经过院校训练的干部，从 71.6% 上升为 86.8%。在全军作战部队的军级班子中，高中以上程度的干部，从调整前的 42.5% 上升为 66.8%；经过院校训练的干部，从 64.7% 上升为 87.8%。

第三，领导班子更加精干了。野战军班子的人数比调整前减少了五分之一，省军区班子的人数减少了四分之一。

在一九八三年军级班子调整之后，各军区、军兵种和国防科工委等单位又先后调整了师、团级领导班子，年轻化也有明显提高。师级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从 49.3 岁下降为 43.2 岁，团级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从 39.7 岁下降为 35.8 岁。

一九八五年结合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大军区合并，又进一步调整配备了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国防科工委的领导班子，推进了高层领导班子的年轻化。大军区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从 64.1 岁下降为 56.1 岁，下降了 8 岁，60 岁以下的占 77.2%；各总部的领导班子分别由 60 多岁、50 多岁、40 多岁的干部组成，形成了梯次配备。

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五年调整配备领导班子，注意了打破军兵种之间、部队和机关、院校之间的界限，实行了干部交流；凡是到了离退休年龄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按规定离休或退休。大批高、中级老干部，表现了很高尚的思想境界和宽广的胸怀，拥护领导班子年轻化，服从大局，退出了领导岗位，为干部队伍“四化”建设作出了贡献。存在的不足是：有的过分强调年轻化，注意老、中、青梯次配备不够；有的把学历和能力等同起来，过分强调了“文凭”，忽视了实际水平；由于考核了解不够，有的干部选得不准，不能胜任现职。同时，由于宏观上控制不够，造成大批军师职干部编余。一九八五年以后，各级领导开始注意解决这些问题。

人民解放军历来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和培养。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平时时期，选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始终都是干部工作的重要内容。一九六一年三月八日，总政治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选拔工作的指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在昆明陆军学院专门开设了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重点为驻藏部队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历次领导班子调整，也都重视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使一批少数民族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至一九八四年底，全军少数民族干部近 2 万人，其中担任各级军政主官的 4968 人。

## 第二节 干部的培养和训练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十分重视对干部的培养训练，战争年代主要是通过作战和工作实践来进行；在和平时期主要是通过院校培训和在职培养。

### 一、院校培训

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解放军就非常重视办各类院校和训练队培训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干部队伍突出的问题是文化水平低，现代化科学知识少，专业基础差，不适应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为了大力加强干部的教育训练，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中央军委从五十年代初期起即着手建立各级各类军事、政治、后勤、技术院校，全面、系统地培养训练干部。并先后组建了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和军事工程学院等各类培训干部的高等学府。一九五三年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提出，“今后培养干部的方法，主要依靠办好学校。”到一九五六年九月，全军创办了正规院校 157 所。中央军委还要求：要选调最优秀的干部、战士到各院校去学习，坚决纠正有些部队怕干部毕业后回不去而不愿意选优送学的偏向；还决定抽调一批既有战斗经验、又有教学能力或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加强院校的 leadership 力量。到一九五七年三月，全军经过正规院校训练的干部占在职干部总数的 23.3%，还有在校学员 20 万人。一九五七年整编以后，进一步调整了院校，组建了高等军事学院，并在原军事工程学院的基础上组建了各军种、兵种工程学院，开始大量培训工程技术干部。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军队院校调整为 125 所，其规模同军队建设的需要基本适应，体制、结构也比较合理。军队干部受过正规院校训练的人数占编内干部总数的 42%，其中各级主官受训比重更大一些。

“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的院校建设遭受极大破坏。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九日，军委办事组发出《军队院校调整方案》，将全军院校裁减了 82 所，保留 43 所，砍掉了近三分之二。全军指挥院校除将军事、政治、后勤学院合并为军政大学外，其余全部砍掉，造成大量干部失训，素质下降；专业技术院校的专业结构和初、中、高级的培训层次被搞乱了，改变了招生条件，降低了训练质量；大批教员改行或复员，致使教员队伍数量减少，质量下降，专业不配套，严重影响了教学工作。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中央军委把军队院校的建设重新提到了战略地位，强调要把干部放到学校去培养训练。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军委决定恢复和增建 41 所院校。一九七七年五月邓小平指出：“要办各级学校，经过训练，使军队领导干部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战争知识”。同年八月二十三日，他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通过办学校解决干部问题，并明确要求，学校要“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用形象化的语言说，就是各级学校的本身要起到集体政治部的作用，或者说起到集体干部部的作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央军委作

---

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38页。

邓小平：《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

出了《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

一九八三年五月，中央军委印发了三总部《关于加强军队院校建设的报告》，提出“要舍得拿最强的干部办院校，舍得送优秀的干部、战士进院校学习，舍得把先进的技术装备发给院校，该花的钱要舍得花，要下大力把院校办好。”经过3次全军院校会议，拨乱反正，清除了“左”的思想的影响，重新确定了办校方针、原则，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办好院校的重大措施。

为了加快干部的培训速度，一九七七年十月，中央军委决定，全军除保持已有的84所院校外，再建28所。为了建立完整、系统的培训体制，中央军委在一九八一年颁发了《军队建设的三年规划》，确定指挥院校实行三级制（初级、中级、高级）；专业技术院校实行中等和高等院校两级制。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中央军委决定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后设后勤学院）。一九八六年六月，全军院校进行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确定将军队院校的数量调整为103所。同时，中央军委还提出院校体制改革要贯彻“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方针。指挥院校重点培训排、团、军级指挥军官；具备条件的中、高级指挥院校要招收研究生：初级指挥军官按中专、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3种层次培训，以中专为重点，有计划地开办大学专科，大学本科保持原有规模；专业技术军官按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等不同层次进行培训。重点加强中专、大专层次的人才培养，控制本科生的数量，稳步发展研究生教育，以改变各类人才比例失调、结构不合理的现象。这次院校体制改革还进一步调整了各级各类军官的培训比例。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央军委《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指出：军队办学要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培养又红又专又健的干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全军院校会议通过《关于经过院校培训提拔干部的规定》，确定要通过院校训练，尽快培养一支坚持党的路线、具有现代战争组织指挥才能和专业知识、比较年轻的干部队伍。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九日，中央军委领导在全军第十二次院校会议上明确要求，院校要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使干部队伍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教育的决定》规定：未经院校培训不能提为军官，未经本级院校培训不能进相应的领导班子，因作战需要直接提拔的军官，战后也要进相应院校培养提高；在培养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中，要特别注意提高军官的政治素质，防止和纠正轻视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的偏向；院校教育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改革政治理论课程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实施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引导全体学员和教职员工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有院校，尤其是初级指挥院校和专业技术院校，要把学员是否具有为国防事业献身的精神作为检验培养的人才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还要建立和完善课程与教材体系，初、中、高级指挥院校的教学内容要明确分工，互相衔接，逐步深化，要扎扎实实地搞好基础教育，重视重点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建设，改革现行教材，及时充实新鲜内容，拓宽适应领域，完善教学的总体设计。要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注重开发智力，培养能力，改革考试方法，着重考理解、考应用、考能力，实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树立良好的学风，实行开放办学。

一九七九年八月，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军委直属院校培训作战部队主官的请示》，决定由军委直属的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和南京、石家庄两所高级步兵学校优先培训作战部队团以上主官（军政一把手、第一副职、参谋长、主任、后勤部<处>长）以及首长、教导员或其预提对象。到一九八二年底，上述培训对象绝大部分得到了训练，军政素质得到明显提高。

一九七九年五月，中央军委决定从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参战部队中选调一批优秀的指挥员和战斗骨干，分别送军事学院、政治学院、高级步兵学校、步兵学校、政治学校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以及通信、防化、后勤等有关院校进行培养。这部分人有一定的战斗经验，再经过院校的专门训练，将对军队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从一九八一年开始，突出了培训中青年干部这个重点，全军先后选调了一批政治可靠、作风正派、有文化、有才干、身体健康、年龄在40岁左右的优秀师、团职干部，分别到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和海军学院、空军学院深造。在此期间，还从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及其他高等院校一九六六年以前毕业的、年龄在40岁左右的、仍在军队工作的干部中，选调了一批人到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培养。这些干部毕业后，大部分走上了军、师级领导岗位，有的担任了大军区和总部的领导职务。

招收地方大学生培训为军队指挥干部。为了改变军队指挥干部的知识结构，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五年，每年从地方高等院校吸收一批大学毕业生，经过军队初级指挥学校培训一年，分配到部队担任排长。尔后，视情况逐步培养为各级军政指挥干部，充实到部队。

人民解放军的基层干部，在一九七九年以前主要是从士兵中直接提拔的。经中央军委批准，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实行招收青年学生和部队优秀战士经过院校培训提为干部的制度。到一九八七年底，全军院校已培养基层干部30余万人。这些干部的特点是年纪轻，文化高，知识面宽，接受能力强，有发展前途。但在开展这项工作的头两年，由于经验不足，一些优秀战士未能及时输送到院校培训；有的学员选得不准，培训措施也不够得力，毕业后思想不够稳定，实际带兵能力不强。为解决这些问题，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先后对有关招生政策进行了多次调整，以保证基层干部的质量。一九八二年三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关于选拔培养基层干部的规定》，一方面肯定实行招收优秀战士和地方青年学生，经过院校培训考试合格，才能提拔干部的制度是完全正确的，对加速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并对招生的对象、条件、办法，预选部队学员的程序等作了具体规定，还提出了要严格把关，保证质量，严禁招生中的不正之风的要求。一九八五年一月规定：大军区级树立的先进模范人物和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干部、荣立一等功以上的战士，在年龄、身体、文化程度符合规定条件的前提下，可以免试保送入学。一九八七年，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又连续下发文件，规定了建立学员预选名单、培养锻炼措施以及保送部分优秀战士入学的有关问题等，进一步完善了院校培训生长干部的制度。

## 二、在职培养

人民解放军一向重视干部的在职培养。在战争年代，军队处在频繁的战斗生活中，环境艰苦，财力物力匾缺，不能兴办较多的学校培训干部。因此，在职培养便成为提高干部的一种主要形式。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院校成为培养干部的主要场所，但在在职培养仍作为训练干部的重要方式坚持了下来。所谓在职培养，就是干部不脱离工作岗位，边工作边学习，领导干部实行传、帮、带，或有计划地让干部到实践中去锻炼成长。其形式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

——举办教导队或短期集训队。这是从红军时期一直沿用下来的传统做法。一九七二年四月，中央军委针对于部培养教育工作受到严重削弱的状况，发出《关于办好教导队加速轮训基层干部的指示》，要求在两年内把基层干部轮训完毕，军、师、团领导干部要亲自任教；军、师的教导队，由军或师的领导干部当队长，师或团的领导干部当排长，团或营的领导干部当班长，营以下干部当兵，进行传帮带；通过训练，使干部达到会讲、会做、会教，能组织训练，能指挥打仗，每期训练三、四个月。指示下达后，半年内全军就办了 849 个教导队，轮训了基层干部的 75% 以上，成绩显著。之后，军、师级单位的教导队均列入编制，作为轮流培训在职干部的常设机构。此外，一些单位还举办临时性的轮训班、集训队，就某些方面的内容，对干部进行一个时期的集中训练教育。国防大学和原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还经常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举办各类短期训练班，集训军以上干部。教导队、轮训班或集训队培训干部都是结合部队任务，以短期突击的方式集中解决一两个问题。其特点是时间短，与部队任务结合紧，所学内容适用，收效快，很受部队的欢迎。

——坚持学习日制度和提倡业余自学。学习日一般是每周以一天或两个半天的时间，进行政治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业务知识的学习。业余自学主要提倡干部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和专业知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就规定了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人民解放军在战斗频繁的情况下，只要有时间，就坚持不懈地进行学习。这个制度一直得到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军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业余大学、专科教育，主要方法：一是参加军内外各种函授班学习；二是参加自学高考，即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党政干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三是参加电视大学和各单位自己组织的夜大学学习。这些学习主要利用业余时间，并由单位负担一部分学费，以示鼓励。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军队干部的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一九八五年完成了在职干部普及初中教育的任务，一九八七年底基本完成了在职干部普及高中教育的任务，开始进入了以大专教育为主的阶段。干部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的提高，对完成军事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任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曾一度出现少数干部片面追求学历和文凭的倾向，影响了工作任务的完成；有的选择专业与本职工作结合不紧，以致学非所用。

——到基层代职和下连当兵。为了锻炼干部，体验部队基层生活，增加实践经验，提高工作能力，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全军兴起了领导干部特别是机关于部到基层代职活动。主要做法是：团以上机关于部和没有经过基层工作锻炼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下到连队去代理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排长职务，时间两三个月以至半年、一年不等。这种方法对提高干

部的管理能力、组织领导能力有明显作用，特别是对一些未在连队工作过的干部好处更大。一九七二年五月，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重申，下连代职是加强干部在职培养的一项重要措施，要继续坚持。八十年代许多院校组织刚毕业的学员到参战部队代职见习，和指战员一起蹲“猫耳洞”，一起冲锋陷阵，有效地培养了学员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同时把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运用到阵地建设、战场管理、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保障等方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打了许多漂亮仗。许多高级领导机关组织机关的年轻干部，按照工作和本人成长的需要，有计划地到基层、边防第一线连队代职，既加强了基层建设，又提高了机关干部素质，深受部队指战员和机关于部的欢迎。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后期，还在全军兴起了领导干部下连当兵的作法。先后下连当兵的领导干部达到80多万人。这对改进领导作风，加深对部队的了解，及时解决部队基层的问题，发扬军队的光荣传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对从地方大学招收的大学本科生或从地方招收的青年学生入院校培养提高的干部，也采取了下连当兵、当班长的办法，进行培养锻炼，取得良好的效果。

派军官出国考察学习也是人民解放军培养干部的措施。在战争年代，人民解放军曾派高级指挥员到友好国家的军队中学习好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派遣出国学习的干部更多，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人民解放军为汲取外军建设的有益经验，加速自身的现代化建设，经常派遣代表团或军官到外军参观、访问、讲学，进行学术交流。

### 第三节 干部管理法规和制度

人民解放军在战争年代就已着手建立干部管理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根据新的历史特点，进一步建立起一套与军队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干部管理制度。

#### 一、干部管理基本法规

为适应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一九五三年中央军委提出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管理的基本法规——军官服役条例。经过近两年的调查研究，酝酿准备，并参考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干部管理的经验和法令，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颁布了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这部条例共分7章54条，内容包括军官的分类和来源；军官的军衔和肩章符号；军官职务的任免；军官的权利和义务；现役派遣军官；现役军官转入预备役和退役；预备役军官等。从总体上看，这是一部基本上符合当时军队实际的法律规范文件，对保证军官质量，加强军队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经验以及客观情况的变化等原因，《条例》颁布不久，有些内容便陆续停止执行。一九六三年九月，经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二次会议修正，通过了第二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这部条例仅实行两年，便随着一九六五年军衔制的取消而终止执行。一九七八年八月，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这部条例是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制定的，对若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了规定，对消除十年动乱给军队干部工作造成的不良影响，促进干部队伍建设向正常方向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因受当时主客观条件的局限，时隔不久就有相当部分内容与军队建设的新情况和新特点不相适应了。

为适应新时期军队干部建设的要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军委着手制定第四部军官服役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的有关规定，经过几年的调查论证，认真吸收八十年代干部管理工作的新鲜经验，拟制了条例草案。条例草案在以往3部条例的基础上，从国家和军队的实际情况出发，既考虑到战时，又考虑到平时；既注意当前军队建设需要，又着眼于长远发展，既保持中国军队特点，又借鉴外军的一些有益作法，使之有利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条例草案对军官的基本条件、职务任免、调换、奖惩、待遇、退役等作了明确规定，与以前的条例相比，在现役军官基本条件培训体制、任职最低年限和最高年龄、能上能下、奖惩等方面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 二、干部主长制度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干部，主要是从士兵中直接选拔和院校中培养生长。基层干部的选拔补充，一般是根据军队建设需要和干部的缺额情况，由总部领导机关制定选拔补充计划和院校培训计划，下达各单位掌握实施。在正常情况下，干部平均每年的补充更新率大约为干部总数的5%左右。



干部选拔的方法，战争年代采取领导提名，党支部讨论，报上级批准的程序。提拔排长以及相当于排的初级干部，一般经团级单位批准。解放战争期间，还试行过由士兵民主推荐干部候选人，报上级委任的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凡是由士兵直接提拔为干部的，都须按照党支部提名，群众评议，党委审查，上级批准的程序进行。院校招收学员的方法是：社会青年学生通过考试择优录取；部队考生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全面衡量，择优录取。为了确保学员质量，给部队培养合格的干部，一九八五年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学员筛选制暂行规定》，对学员筛选标准、筛选方法、淘汰安置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除招生选拔作为第一次筛选外，还要通过在校考核和毕业分配等环节实施第二、第三次筛选，以确保毕业学员的质量符合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另外，军队每年还从地方院校接收一定数量的大、中专毕业生和毕业研究生，主要办法是通过国家计划分配，军队审查接收的形式实施。它是军队专业技术干部来源之一。

### 三、干部退役制度

干部退出现役制度，是保证干部队伍新陈代谢正常进行的一个重要环节，基本有4种形式，即转业、复员、退休、离休。

转业。即退出现役，保留干部身份，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的德才条件，参照原在军队所任职务分配适当工作。这是军队干部“出”的主要途径，也是地方干部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三十多年中，已有270多万军队干部先后转业到地方工作。转业对象根据各时期国家建设的需要和部队实际情况而定，大体包括，一是为适应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党和国家决定从军队抽调干部支援者。二是达到平时服现役最高年龄者。三是受军队编制员额限制不能调整使用者。比如，为适应军队建设发展的需要，多次进行精简整编。精减整编中有不少干部转业。仅一九八五年“裁军百万”中，就有40多万名干部被安排转业。四是因伤病等不适合继续在部队工作者。党和政府对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一直很重视，强调军转安置工作要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服务，对转业干部要“热情欢迎，妥善安置，认真培训，合理使用”。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规定，保证了转业干部的妥善安置和合理使用，促进了部队的改革和建设。

复员。即退出现役，不保留干部身份，原则上“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从城镇入伍的由政府分配工作，从农村入伍的回乡参加生产劳动。军队干部复员制度，在战争年代就已形成。复员是军队干部“出”的一个辅助途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三十多年中，作复员安置的干部约有61万（不含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间错误安排的41万复员干部）人。复员的对象主要是，符合退出现役条件，本人要求复员或因部队裁减，以及政治、身体、家庭等原因，不宜作转业或退（离）休安置的干部。复员回乡的大多数是基层干部。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五年七月对退出现役的连排级职务干部一律作复员安置，致使许多人的工作和生活得不到保障，产生了不良后果。一九八〇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此期间复员的41万名干部改为转业安置。随后规定，干部除本人自愿、经组织批准或不宜保

留干部身份者外，一般不作复员安排。

退休。即退出现役休息，移交地方政府民政部门安置，按月由国家发给退休生活费。人民解放军的干部退休制度，是一九五八年国务院颁发《关于现役军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后才正式建立起来的。一九八一年一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新的情况颁发了《关于军队干部退休的暂行规定》。一九八七年九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调整军队干部退休生活费的通知》，对退休生活费的标准作了部分调整。退休条件规定，一是服满现役，男年满 55 周岁（女 50 周岁）；二是因积劳成疾或因公伤残，基本失去工作能力。军队干部退休的生活费，按军龄（包括工龄）在原工资 70% 至 90% 的范围内领取。服役期间立功的，连续在艰苦地区工作十年以上的，可按功绩大小和在艰苦地区工作时间长短，分别提高退休生活费 5% 至 15%，但累计不得超过本人的原工资。国家对军队退休干部还给予提供住房、公费医疗等优待，保证他们生活愉快，安度晚年。

离休。即离职休养，这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项特殊的退休制度。在战争年代，因伤病残不能继续在军队工作而无家可归的人员，只得交由解放区人民政府供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仍有少数军队干部采取留队供养的办法。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首次规定军队师职或大校军衔以上高级干部，“有病不能担任工作的，可以离职休养，其待遇照旧不变。”之后，干部的离休条件和办法几经变更，一九八二年以后的规定是，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具备离休条件后，可享受离休待遇。离休干部除保留离休时的原工资外，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每年增加两个月的工资；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参加革命工作的，每年增加一个半月工资；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参加革命工作的，每年增加一个月的工资。按照军队在职干部的标准由国家提供住房、医疗，并发给服装、交通和公勤人员费用；在阅读文件等方面按职务等级享有与在职干部同等的政治待遇。

#### 四、薪金制度

人民解放军在战争年代，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长期过着艰苦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那时只能供给干部和士兵每个人衣食的最低需要。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生产的发展，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军队干部的物质待遇随之发生变化。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国防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决定全军从一九五五年一月开始实行薪金制度。军官薪金由级薪、军龄补贴两部分组成。级薪从正排至军委主席共分 19 级。

军委主席、副主席月薪 450 万元人民币（旧币。一九五五年三月发行新币后，当时规定新旧人民币的比值为 1：1 万），正团级为 190 万元人民币，排级为 60 万元人民币。除级薪外，军龄在五年以上的还有军龄补助金。入伍五年以上至十年的补助级薪的 10%；十五至二十年的 15%；二十至二十五年的 20%；二十五年以上的 30%。薪金制的实行，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鼓励军官积极上进具有重要意义。三十多年中，人民解放军干部的薪金制度进行过多次改革：一九五五年一月至一九六五年五月，实行级别薪金加军龄补助金的工资制度；一九六五年六月至一九八一年三月，实行国

家机关行政干部级别的工资制度，一九八一年四月至一九八五年六月，实行职务工资与级别工资相结合的工资制度；一九八五年七月开始实行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加军龄津贴的工资制度。

## 五、军衔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加强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实行军衔制的问题很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有关部门开始着手研究军衔工作。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总干部管理部在向毛泽东并军委的报告中，对实行军衔制的准备工作等问题，拟定了初步计划。一九五三年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稿。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同年二月颁布的《军官服役条例》第二章，对军衔等级的设置和肩章符号等作了具体规定。《指示》和《条例》提出的评定军衔的标准，是以军官的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为基本依据。国务院确定，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度正式实施。

当时规定，军官军衔等级的设置为4等14级，即：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将官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军衔立法文件没有设置准尉，实际上授有此衔，原准备过渡一、两年后取消，但一直到一九六五年取消军衔时仍有少量准尉。

一九五五年首批授衔，获得准尉以上军衔者共64.4万余名。其中：准尉11.3万余名，尉级军官49.8万余名，校级军官3.2万余名，将官1042名，元帅10名。高级将领的授衔情况是：元帅10名：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大将10名：粟裕、黄克诚、谭政、肖劲光、王树声、陈度、罗瑞卿、许光达、徐海东、张云逸。上将52名，中将175名，少将800名，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一年补授上将5名、中将2名、少将6名。

按照条例规定，上校（一九六三年以后为中校）以下军官均有军衔晋升期限，军衔晋级期满后，按条件逐级晋升，大校（一九六三年后为上校）以上军官选升。由于受政治运动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军衔的晋升制度未能完全按条例规定执行。在第一次实行军衔的十年间，除个别晋升外，全军统一办理过5次晋升，全军首次授衔的1050名将官，十年间都没有晋升：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间由大校晋升为少将的有554名。少将以上高级将领，十年累计为1614人。一九六五年取消军衔制时，除去退出现役和死亡者外，实际留在军队的人数最多时为1478人（元帅9人、大将9人、上将48人、中将167人、少将1245人）。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议》，并从同年六月一日起生效。取消军衔制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作出的决定，当时认为“取消军衔制度，有利于加强我军革命化的建设”，有利于继承光荣传统。显然，这是片面地理解和强调革命化而忽视现代化和正规化的反映。

一九八二年修改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军队的“衔级制度”作了确认，一九八四年颁布的《兵役法》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实行军

衔制度”。此后，有关方面加紧了新的军衔条例的草拟及其他准备工作。新起草的《军官军衔条例》草案稿，从实际出发，适应军队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吸取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期间实行军衔制度的经验，借鉴外军好的做法，对军衔等级的设置，职务等级编制军衔，军衔的首次授予，军衔的晋升、降级、取消与剥夺，以及军衔的标志和佩戴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军官军衔设定为3等11级：将官：一级上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上尉、中尉、少尉到一九八七年底，军衔条例起草工作基本完成，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也基本就绪。

## 六、勋章奖章制度

在革命战争年代，各根据地或野战军，曾颁发过各种表彰英雄模范的奖章、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作为国家的一种重要奖励写入了《宪法》。一九五五年二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作出《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同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条例》，决定颁发八一勋章和奖章、独立自由勋章和奖章、解放勋章和奖章，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作一次总结性的奖励，以表彰长期参加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革命军人的历史功绩。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首次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颁布的一项褒奖法令，也是国家建立统一的正规奖励制度的开端。至一九五七年，授予人民解放军有功人员各种勋章10万余枚，各种奖章52万余枚。这一奖励，激发了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的荣誉感和上进心，调动了他们建设国防、保卫祖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干部队伍和军队的建设。各种勋章、奖章的授予对象是：八一勋章和奖章，授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工农红军并一直坚持革命工作而无重大过失的人员。独立自由勋章和奖章，授予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战争的有功人员。解放勋章和奖章，授予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战争的有功人员。各类勋章均区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奖章不分级，按各个时期每人担任职务的等级授予。

条例对授予国民党军队起义有功人员勋章、奖章问题还作了特别规定。

在酝酿制定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军衔条例、文职干部暂行条例期间，有关方面参照一九五五年国家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争年代有功人员勋章、奖章和外军授勋的做法，着手研究制定对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人民军队和参加革命工作的军队干部的授勋规定。经过调查、酝酿、讨论，到一九八七年拟就了《关于授予军队离休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的规定》。根据这个规定，凡已经离休的军队干部均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荣誉章分3种：红星功勋荣誉章授予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前参加革命者；独立功勋荣誉章授予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参加革命者；胜利功勋荣誉章授予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至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参加革命者。凡获功勋荣誉章的离休干部每月按等级得到定额荣誉金。

## 七、技术职称和专业技术职务制度

人民解放军在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接收了少量从旧社会、旧军队过来的专业技术人员，给他们任命了技术职务，并给予相应待遇。军队专业技术人员真正评定专业技术职称，是从一九六二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停顿下来，一九七九年又恢复了职称评定工作，经一九八三年的整顿和一九八六年的改革，开始实行专业技术职务任命制度。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决定按照国家的规定，在军队部分专业技术人员中确定职务名称。一九六二年二月九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科学技术干部职务名称和提升问题的通知》规定，军队专业技术干部的职称一般分为4级：在高等技术院校担任自然科学课程的教师，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分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实习员；工程技术人员，分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工程师、技术员；卫生技术人员，分科主任、副主任、主治军医、军医。这项制度实行了一段时间后，因“文化大革命”而停顿下来。

一九八一年三月，根据中央关于“恢复技术职称制度”的精神，经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科学技术干部确定与晋升技术职务和技术等级的通知》，规定在科学研究干部、高等学校教师、工程技术干部、卫生技术干部、科技情报干部、图书资料干部中评定技术职称。一九六六年底以前确定的技术职称也予以恢复。全军科技干部取得高级职称的占1.35%，中级职称占11.73%，初级职称占86.92%。

从一九八六年开始，全军进行了以专业技术职务任命制为主要内容的职称改革，将评定技术职称的制度改为专业技术职务任命制度。中央军委在一九八六年九月颁发的《关于军队实行专业技术职务任命制度的暂行规定》中指出：这项制度的基本内容，就是要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专业技术工作岗位，规定明确的职责；在定编定员的基础上，确定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合理结构比例；由军政首长在经过评审委员会评定的、符合相应任职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中任命或聘任，并规定，各种专业技术职务都有一定的任期。专业技术人员任职的基本条件是：

(1) 热爱祖国、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实际工作能力和业务知识。(3) 担任高级、中级、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一般应相应具备大学本科，大专、中专毕业的学历。对虽然不具备规定的学历，但确有真才实学、成绩显著、贡献突出、符合任职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可根据需要任命。(4) 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此外，各专业职务系列还规定了专业技术干部任职的具体条件。这项制度经过试点，取得经验，一九八七年全面展开，全军共设16个专业技术职务系列，有30多万人参加了评任。实行这项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将作为学术技术称号的“职称”改为有明确岗位职责的“职务”，按编配比例任命专业技术职务，以正确评价和合理使用干部，促进人才流动，打破禁锢人才、一潭死水的局面，逐步建立起充满活力的专业技术干部管理制度。专业技术职务任命制度的实施，使全军专业技术干部队伍的结构较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干部的平均年龄下降了6至8岁，高、中、初级职务的比例由评任前的1:9:64改变为1:4:12。同时，也拓宽了专业技术干部发展的路子，促进了专业技术干部队伍的稳定，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别是通过评任和晋升专业技术职务，基本形成了一套适合专业

技术干部特点的管理制度和办法，改变了过去用管理军事行政干部的办法管理专业技术干部的做法，但这项制度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 八、文职干部制度

实文职干部制度，是人民解放军干部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一九五五年，人民解放军曾实行职员制度，将从事行政事务、生活保障和部分专业技术工作的6万余名现役干部改为无军籍职员，留在原职岗位上继续工作。由于这项制度初次实行，缺乏经验，实施后遇到不少问题。一九六〇年将担任40种职务的3万人改为佩带专业符号的军人。一九六五年决定将在编职员改为现役军人，职员制度遂告中止。这十年职员制度的施行，实际上是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制度的一次尝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军队领导机关认真研究了文职干部制度，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实行的必要。一九八〇年，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军队有些方面的工作人员可以改成文职人员、雇佣人员”。不久文职干部制度的建立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有关部门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吸取外军的有益作法，着手拟制文职干部暂行条例。到一九八七年底，条例草案已经形成。

条例草案设定，文职干部的编制范围主要是：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医疗卫生、教学、新闻、出版、文化艺术、体育等单位的专业技术干部；为机关、院校、医院等单位内部服务的部分行政事务、生活保障干部。师以下作战部队、试验训练部队和保障部队，原则上不编制文职干部。

条例草案设定，文职干部是军队编制定额年不授予军衔的干部，他们承担着与现役军官基本相同的义务，也享有现役军官同等的参加政治生活、获得政治荣誉和物质鼓励的权利。由现役军官改任的文职干部均保留军籍。文职干部的升迁调补、奖励惩戒、转业退休、犯罪量刑等，均按军队的有关条令、条例办理。文职干部的工资水平、粮油定量、住房面积、医疗待遇、休假办法、家属随军、优待福利等，一律按照现役军官的有关规定执行。根据工作需要，文职干部也可以改任现役军官。

## 九、干部福利制度

人民解放军一贯重视干部的福利事业。在战争年代依靠集体福利制度，解决或减轻干部个人的某些困难，对于部安心工作，奋勇杀敌，起到了鼓舞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虽然干部的物质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干部的福利事业仍然作为军队干部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坚持下来。为了搞好福利工作，从总部到各军、师、团，曾先后建立了抚恤委员会、保健委员会、福利委员会等组织；干部管理部门设有抚保、福利处（科）等职能部门，专门管理干部的福利事项。为使干部福利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总部领导机关曾经颁发了《抚恤条例》、《保健工作规定》、《老年优待办法》、《中小灶待遇规定》、《休假办法规定》、《家属特殊困难救济办法》、《开办托儿所及小学、幼稚园的规定》、《妥善安置军官家属的规定》、《干部探亲待遇的规定》、《连队干部实行岗位津贴》等法规性文件，基本覆盖了干部生活补助、探亲休假、家属随军安置、医疗待遇、子女上学入托等方方面面。

干部福利费。对生活困难干部的补助费用，实行供给制时称“抚保费”，是从军粮和军费中拨出一定数量的粮食和款项，专门用以对于部特殊困难进行补助救济。一九五五年实行薪金制以后，补助干部特殊困难的费用称为福利费。福利费的数额按干部薪金总额的1%划拨，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干部福利费标准提高到干部工资总数的2.5%。福利费的使用，按照实际需要，由领导提名或本人申请，群众评议，党组织批准，困难大者多补助，困难小者少补助，以保障干部的基本生活需要。

干部的探亲 and 休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总政治部《关于动员军官家属还乡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明确规定，家属还乡后，准许军官每年探家一次。后来又规定可在家停留三十天，报销路费。一九八一年四月，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对未婚和已婚干部探望父母的假期做出了规定。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又把家属符合随军条件而不随军的干部的探亲假，由每年三十天延长为四十天。军队干部的休假制度经过了多次调整变化。正式的休假制度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一九六四年被取消，一九七八年又被恢复。

干部家属随军安置。为照顾夫妻团聚，经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于一九六三年发出《关于妥善安置军官家属的规定》，对部分干部家属随军的条件作了明确规定。同年七月，国务院内务部向全国转发了这个规定。在供给制时期，干部配偶可享受与战士同等的供给制待遇，子女由公家发给保育费，配偶有工作的还发给保姆费，子女入托、上学的生活费、学杂费全部由公家负担。在乡家属，则由当地政府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实行优待，以解除干部赡养家属子女的后顾之忧。一九五五年实行薪金制后，干部家属基本由干部本人薪金供养，但仍保留某些优待办法，如家属随军优待，探亲优待，医疗优待，子女入托优待等。

此外，还对于部实行各种补贴，如子女补贴，五十年代为多子女补贴，八十年代为独生子女补贴，高原、海岛及其他艰苦地区补贴，某些岗位补贴，出差补贴，战时伙食补贴，书报费补贴，物价补贴，水电补贴，洗澡理发补贴，交通补贴，女干部卫生补贴，家属够随军条件而未随军的分居补贴，等等。

总之，人民解放军的福利制度，是在特殊环境、特殊情况下给予干部本人及家庭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物质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关心群众生活的优良传统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人民解放军在几十年建军实践中培养造就了大批治军骨干，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干部工作经验。

第一、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是加强部队建设的根本性措施。党管干部，是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保证军队的各级领导权由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来掌握，保证干部队伍纯洁、团结和统一的重要组织措施。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就是要认真贯彻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军委关于干部工作的各项指示；干部的选拔任用要充分走群众路线，经政治机关考核，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严格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事；要对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干部的党性修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加强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管理，使他们置于党和群众的监督之中。为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一九五五年九月，中共中央军委正式成立了总干部管理部。随之各军区、军兵种及军、师、团各级也相

继成立了党委领导下的干部管理部门。总政治部及各部队政治机关成立了专门管理政治干部的机构。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各级干部管理机构划归同级政治机关建制。同时建立了一套统一的分级的管理体制，即在中央军委和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由总政治部和各级政治机关统一管理的分级管理体制。在纵的方面规定了各级的管理权限和范围，师长及其相当职务以上的干部，由军委任免管理；副师长、团长及其相当职务的干部，由大军区及其相当单位负责任免管理；副团长、营长及其相当职务的干部，由军、省军区及其相当单位负责任免管理；副营长至排长及其相当职务的干部由师、军分区及其相当单位负责任免管理。在横的方面，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在处理各类干部的任免、调配、培训、奖惩等问题时，要征求各类干部业务系统领导机关的意见，特别是对专业技术干部的管理，更应注意听取业务主管部门的意见，这样把纵向管理和横向管理、管人和用人结合起来。人民解放军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保证了按照军队建设和作战需要及时地统一调配干部，合理地使用干部，有计划地培养训练干部，从而使干部队伍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

第二、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是正确选拔任用干部的关键。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就是要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选拔使用干部，选贤任能。一是政治上的要求，听党的话，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二是业务能力上的要求，有知识，有实际经验，有组织领导才能，工作实绩突出。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各级党委和领导机关，特别是主要领导和干部部门，要有对党的事业、对军队建设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选拔任用干部，要从干部的德才和工作实绩出发；要公道正派，搞“五湖四海”，不论单位，不分亲疏，不抱成见，不以个人的好恶和熟悉与否，跳出狭隘的个人小圈子，放开眼界在大范围选人用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识别干部，大胆选拔干部，合理使用干部，各种优秀人才才会源源而来，革命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第三、建立完善的干部制度，是实现干部管理科学化的法律保证。实践证明，干部队伍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同制度不健全有关。制订并贯彻执行一套完善的干部管理制度，不轻易放弃和改变一些重要法规，可以保证正确的干部路线的贯彻落实，使干部成长获得良好的环境，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使干部的新老合作和交替走上正常化的轨道，保持干部队伍的勃勃生机与思想稳定。干部管理的制度化，包括干部的来源、选拔、培训、考核、晋升、交流、奖惩、服役、退役、退休、工资、福利等所有环节都要有完善的法规，使干部管理的每个环节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这是干部管理走向科学化的必经途径。制度只有得到法律保障，才能具有真正的权威性、稳定性和连续性，才能堵塞工作中的漏洞，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各种不正之风。



## 人名索引(上)

### A

安业民 59  
阿沛·阿旺晋美 135

### B

白崇禧 104 105 107 110  
白景龙 212  
包尔汉 130  
鲍寿根 269  
卜广德 188  
巴克 201

### C

陈毅 10 46 79 144 318 321 359 500  
陈云 37 54 370  
陈明仁 143 150  
陈德忠 188  
陈代富 237  
陈武贤 254  
陈金刚 254  
陈光宇 305  
陈赓 314 322 500  
陈芳允 317  
程子华 10  
程潜 143 144 149  
程砚秋 167  
程开甲 317  
程国良 317  
常宝华 167  
常宝坤 167  
常香玉 167  
曹绍华 112  
曹庆功 188  
曹玉海 188  
曹保勤 254  
慈云桂 317  
柴云振 188 321 359 600

蔡文琴 355

崔建国 188

崔莹 210

## D

邓小平 26 46 54 63 73

74 75 81 83 84 86

87 88 89 93 94 96

99 105 110 139 272 275 276 277 280 281 295 297 304 321 341 346 358  
359 370 396 413 419 421 437 445 458 461 462 463 471 478 780 482 486  
505

邓子恢 105

邓锡侯 143 149

邓兆祥 150

邓宝珊 149

邓稼先 316

董必武 54 272

董其武 143 150

董存瑞 236

丁炳林 123

丁文礼 194

丁化国 254

戴克敏 6

戴维斯 193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169 170

杜凤瑞 60

杜鲁门 163 203

## F

傅钟 39

傅作义 24 143 144 149

冯白驹 119

范弗里特 182

## G

甘泗淇 130 388

甘祖昌 348

甘渭汉 453

郭沫若 4

兴福 58 269 270 272

郭恩志 188

郭忠田 188  
郭林祥 453  
高树勋 30 145  
高岗 42  
高景瀛 188  
高成山 188  
顾永武 108  
郜怀明 462

## H

何长工 10  
何述林 196  
何学高 254  
贺龙 513 46 105 117 156 499  
贺昌 10  
贺先觉 305  
黄克诚 63 144 459 500  
黄有才 115  
黄继光 188 190 191 192 236 440  
黄家富 188  
黄吴荣 254 黄翠芬 358  
黄振东 381  
胡业桃 79  
胡宗南 104 105 108 110  
胡修道 188 192  
胡志明 248  
胡绪清 254  
胡在银 313  
韩先楚 121  
韩桂芝 212  
韩永民 254  
韩玉昌 380  
洪学智 96 43  
汉纳 203  
亨利·麦克马洪 235  
郝修长 254  
华国锋 84  
滑俊 317  
侯书信 273

## J

蒋介石 23 30

江青 67 68 73 76 79 82 84 275 276 319 459 460  
姜泗长 367  
金耳世 192  
金日成 205 212  
季和生 378

K

孙庆三 188

L

李大钊 2  
李富春 2  
李显文 79 360  
李自成 36  
李先念 96 227  
李安德 176  
李家发 188 196  
李延年 188  
李凤林 188  
李水波 254  
李启 254  
李德生 269  
李金刚 330  
李魁三 281  
李月荣 400  
李贞 440  
黎七 124  
刘少奇 19 24 30 37 46 54 156 157 272 331

刘伯坚 2  
刘伯承 13 105 110 144 500  
刘英俊 79  
刘玉 123  
刘文辉 143 149  
刘维汉 188 刘庆亮 188  
刘玉堤 188  
刘光子 189  
刘世忠 221  
雷锋 53 54 73 83 387 19 20 21 24 25 26 383 440  
雷宝森 188  
雷凯 269  
罗瑞卿 10 65 144 272 273

罗炳辉 10  
罗荣桓 39 47 63 105 156 382 452 476 500  
罗盛教 210 212  
罗光燮 237  
吕中和 192  
吕士才 345 346  
卢汉 143 149  
卢广华 330 379  
陆载德 305  
林伯渠 2  
林彪 49 53 55 63 64 65 67 68 69 70 72 73 74 76 79 82 84 89 105 274  
275 277 319 356 370 371 421 442 453 458 459 460 478 500  
林遵 150  
冷树国 192  
梁英瑞 254  
兰菲 200

#### M

毛泽东 1 3 4 6 9 11 13 19 20 21 24 25 26 28 29 35 36 37 40 48 49  
50 54 56 59 67 68 73 74 75 87 97 103 104 131 137 138 139 141 142 144  
149 156 158 163 166 168 173 179 198 205 240 248 259 271 272 275 276  
287 293 294 298 300 331 334 348 352 366 367 369 370 371 390 418 421  
424 474 477 479  
马福龙 115  
马连良 167  
马德金 196  
马修·李奇微 169  
梅兰芳 167  
麦克里安 172

#### N

聂荣臻 2 45 46 79 144 294 300 302 303 315 316 318 319 321 322 331  
343 459 500  
倪祥明 188  
牛宝才 192  
宁国军 330

#### P

彭德怀 10 38 45 46 47 59 63 130 156 168 170 173 181 188 197 214  
262 266 334 353 359 367 370 413 459 500  
彭真 96 370

潘文华 143 149  
朴在根 212

Q

秦建彬 188  
钱学森 316  
钱绍钧 312 317  
邱少云 188 191 192  
邱会作 356

R

任弼时 13 14 16 19 21  
任廷昌 208  
饶漱石 42

S

孙勇 128  
司马义·买买提 237  
史光柱 247  
单志玉 193  
商顺嵩 273  
萨本茂 306 440  
粟裕 144 368 500  
宋任穷 452

T

谭政 21 47 51 63 64 373 381 452 500  
谭冠三 135  
谭炳云 188  
汤恩伯 104  
坦维斯 201  
陶峙岳 130 143 150  
滕洪图 330

W

王稼祥 910  
王震 10 18 130  
王明 15 17  
王维福 113

王广文 122 王学风 188  
王兆才 188  
王德明 188  
王海 188 190  
王忠殿 237  
王木舟 254  
王息坤 254  
王金陵 269  
王昂 317  
王湘生 318  
王平 343  
王杰 387 388  
王树声 500  
吴志洲 188  
吴德华 196  
吴志瑞 200  
吴元明 237 241  
吴建国 247 254  
吴保贞 381  
巫致中 317  
伍先华 188  
韦国清 84  
魏新增 122  
魏玉德 188  
温纳瑞斯 204

X

熊雄 2  
徐向前 613 79 96 331 459 500  
徐汉林 112  
  
徐长富 188  
徐国兆 269  
徐富铎 380  
徐海东 500  
许家朋 188  
肖楚女 2  
肖克 10  
克华 39 45 156 260 459  
肖国宝 112  
肖明生 237  
肖劲光 500  
咸在福 212

谢道根 238

Y

恽代英 2

杨得志 10 96

杨金堂 78

杨尚昆 96 331

杨根思 171 172 188 192 440

杨友奎 175

杨连第 188 194

杨宝山 188

杨育才 188 193

李春增 188

杨从芳 194

杨立三 338

杨成武 459

阳廷安 237 叶剑英 46 73 74 75 79 82 84 156 227 270 271 273 276 331  
342 479 500

叶洪海 348

余秋里 96

余新发 188

于喜田 188

于泮宫 188

于福海 305

姚文元 67

姚显儒 189

姚虎臣 387

员宝山 188

岩龙 254

尹继发 187

Z

朱德 1 10 13 16 19 20 29 35 37 45 54 1063 136 144 182 259 272 353  
359 370 454 500

朱伯儒 83

朱金枝 167

朱仁义 254

朱光亚 317

祝福祥 462

周恩来 1 2 4 5 10 19 21 37 46 54 72 73 74 144 272 293 294 300 308  
309 310 314 315 316 318 319 326 370 371 393

周逸群 5



周全生 122  
周信芳 167  
周厚刚 188  
周天喜 237  
邹正亮 221  
张云逸 6 10 500  
张国焘 12 13 20  
张华 83  
张爱萍 96 125  
张国华 135 137  
张治中 144 150  
张桃芳 175 192  
张永富 188  
张积慧 188 193  
张长发 196  
张敬一 221  
张映鑫 237  
张代荣 237  
张震 357  
郑起 192  
曾泽生 150  
赵雄武 118  
赵宝桐 188  
赵毛臣 192  
赵承英 210

